

劉 曉 波 紀 念 文 集

蔡 楚 主 編





我期待我的國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達的土地，在這裏，每一位國民的發言都會得到同等的善待；在這裏，不同的價值、思想、信仰、政見……既相互競爭又和平共處；在這裏，多數的意見和少數的意見都會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別是那些不同於當權者的政見將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護；在這裏，所有的政見都將攤在陽光下接受民眾的選擇，每個國民都能毫無恐懼地發表政見，決不會因發表不同政見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將是中國綿綿不絕的文字獄的最後一個受害者，從此之後不再有人因言獲罪。

——劉曉波《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2009年12月23日



# 劉曉波紀念文集

蔡楚 主編

民主中國・中國民主轉型研究所

# 劉曉波紀念文集

Copyright © 2017 by 民主中國、中國民主轉型研究所

All rights reserved

主編：蔡楚

序言：達賴喇嘛、林培瑞、張祖樺

製作：獨立中文筆會

編輯：張裕

文校：廖天琪、彭小明

排版：張裕、潘永忠

封面：寒冰

出版：中國民主轉型研究所

PO Box 615, 26 S White Horse Pike, Somerdale

NJ08083-9998

USA

網址：<http://chinademocrat.org/>

電郵：[chinatransition2017@gmail.com](mailto:chinatransition2017@gmail.com)

2017年12月第一版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國際書號：ISBN-10: 1979830886

定價：30 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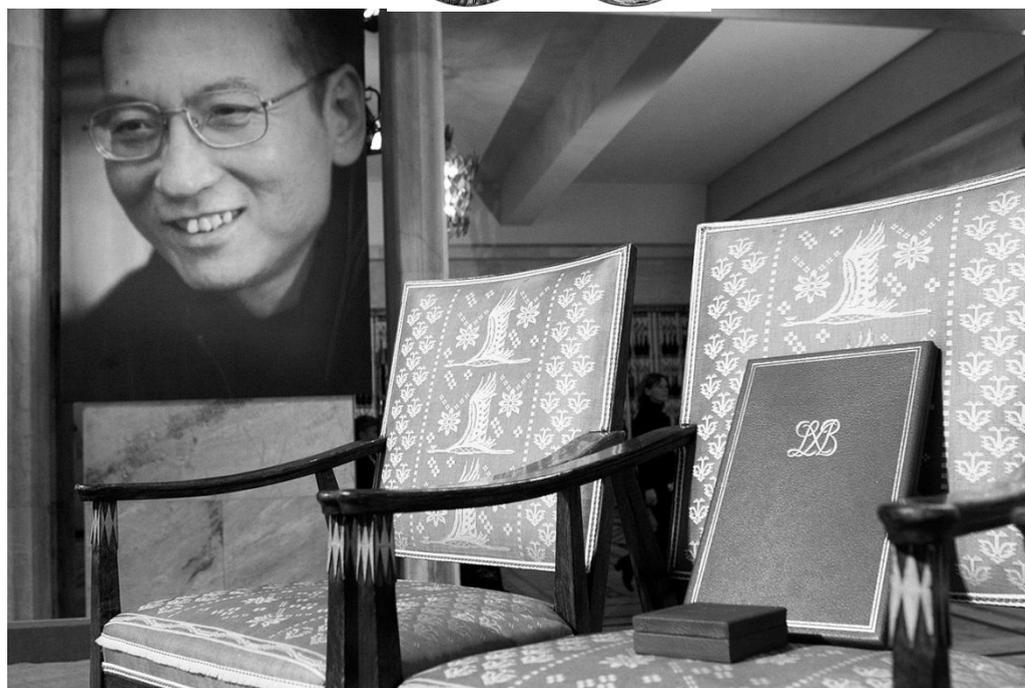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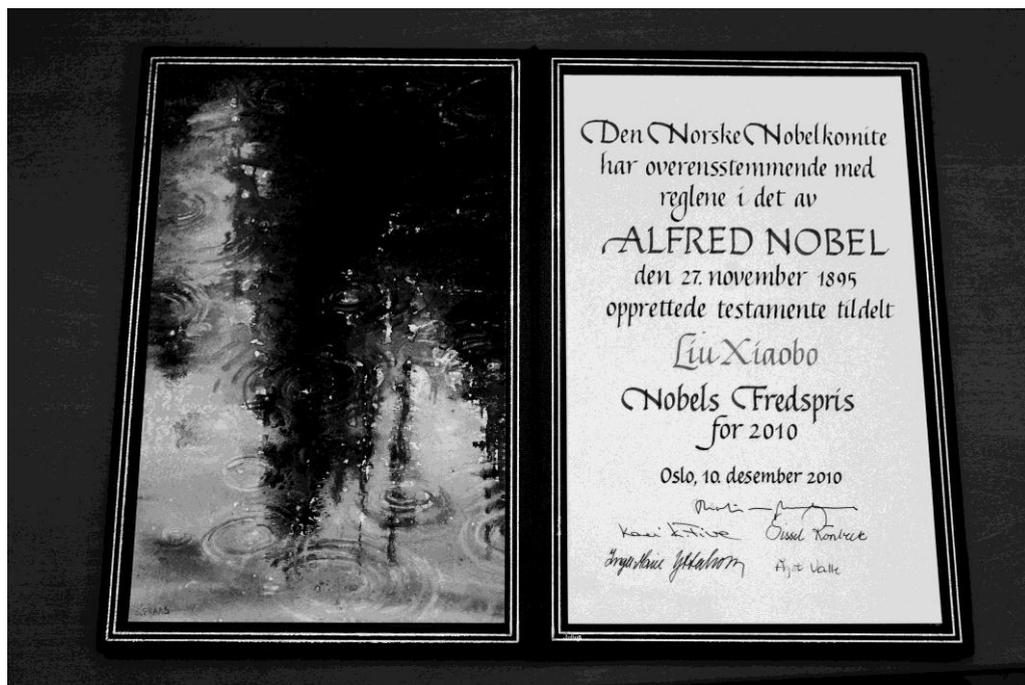
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2010年12月10日，奧斯陸）



筆會慶祝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遊行（2010年12月10日，奧斯陸）

（左起）蔡楚（前副會長），廖天琪（會長），

蔡詠梅（獄委）和胡平（獄委，右）



劉曉波的獲獎證書和獎章放在頒獎典禮現場因他缺席的空椅子上



劉曉波生前最喜愛的劉霞攝影



八九民運中天安門四君子絕食（1989年6月2日）  
下圖前排（左起）：高新，劉曉波，侯德健，周舵



和天安門母親運動發起人在江蘇三山島（2003年3月）  
（左起）劉曉波，蔣培坤，丁子霖，劉霞



獨立中文筆會第二屆自由寫作獎頒獎會（2004年10月30日，北京）  
（左起）包遵信，章貽和（獲獎人），劉曉波（會長）  
王怡（副秘書長），余杰（理事）



**三筆會代表聚會中國大陸（2005年5月13日，北京）**

獨立中文筆會：會長劉曉波（左三）及夫人劉霞（右一），  
理事余杰（右二）及夫人劉敏（左一），副秘書長王怡（後中）  
獄中作家委員會委員趙達功（後左一）和協調人張裕（攝影者）  
會刊主編余世存（後右二），取保候審的前獄中作家李柏光（後右一）

悉尼筆會：會長周思（Nicholas Jose，右三）

獄中作家委員會主席羅利（Chip Rolley，後左二）

瑞典筆會：國際秘書霍爾姆（Kjell Holm，左二）



**獨立中文筆會第三屆自由寫作獎頒獎會（2006年1月2日，北京）**

（左起）余杰（副會長），吳思（獲獎人）

劉曉波（會長），王怡（理事兼副秘書長）



包遵信先生追悼會（2007年11月3日，北京）

于浩成（筆會榮譽理事）致悼詞，

劉曉波（筆會卸任會長，《民主中國》網刊主編）

和張祖樺（《民主中國》網刊理事）主持

包遵信（1937年9月1日—2007年10月28日）

生前任獨立中文筆會榮譽理事



劉曉波（左）在三味書屋二十周年紀念會（2008年5月18日，北京）



劉曉波保外就醫在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2017年7月，瀋陽）



劉霞和劉暉（弟）向劉曉波遺體告別（2017年7月15日，瀋陽）



劉曉波骨灰海葬及撒花祭奠（2017年7月15日，大連外海）  
（右起）劉暄（弟）和劉霞



香港悼念劉曉波燭光遊行（2017年7月15日）



紐約劉曉波追思會（2017年7月15日）



華盛頓劉曉波追悼會（2017年7月16日）



北京劉曉波「頭七」追思會（2017年7月19日）

# 目 錄

## 序 言

序一 達賴喇嘛祝願..... 7

序二 林培瑞：被後人所知曉和銘記..... 错误！未定义书签。

序三 張祖樺：自由之火，生生不息..... 9

## 宣告篇

2010 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公告..... 25

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主席托爾比約恩·亞格蘭的演講詞..... 错误！未定义书签。

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哀悼劉曉波..... 错误！未定义书签。

國際筆會唁辭..... 错误！未定义书签。

國際特赦組織秘書長薩利爾·賽迪唁辭..... 错误！未定义书签。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侯賽因評論..... 错误！未定义书签。

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與歐洲理事會主席圖斯克聯合聲明..... 错误！未定义书签。

美國國務卿雷克斯·蒂勒森聲明..... 错误！未定义书签。

佩洛西關於劉曉波去世的聲明..... 错误！未定义书签。

史密斯關於劉曉波去世的聲明..... 错误！未定义书签。

魯比奧致劉曉波遺孀劉霞的公開信..... 错误！未定义书签。

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向劉曉波致敬..... 25

美國筆會執行主任蘇珊·諾塞爾聲明..... 26

獨立中文筆會唁辭..... 26

天安門母親羣體唁辭..... 27

劉曉波先生訃告..... 28

劉曉波先生追思會成立公告..... 30

## 呼應篇

高寶玲：劉曉波的自由之爭..... 错误！未定义书签。

黎安友：劉曉波之死和中國當局的恐懼..... 错误！未定义书签。

白 夏：知行合一的劉曉波.....	错误！未定义书签。
喬安尼 利多姆—阿克曼：思想前沿的劉曉波.....	错误！未定义书签。
崛武昭：諾貝爾文學獎與和平獎間的困境和矛盾.....	错误！未定义书签。
紀思道：劉曉波歷盡磨難，他人才得享自由之光.....	错误！未定义书签。
牧野聖修、王進忠：劉曉波「沒有敵人」的精神在日本永存.....	33
桑傑嘉：希望劉曉波的生命能喚醒中國人的良知.....	37

### 祭奠篇

鄭 義：最有寬恕精神的反對派.....	42
廖天琪：一首響徹華夏荒蕪大地的美麗交響詩.....	43
陳奎德：登臨祭壇.....	45
洪哲勝：悼念曉波小兄.....	47
于建嶸：永別.....	48
李 海：落淚，為我的朋友劉曉波.....	50
胡 佳：紀念曉波.....	52
孫文廣：悼念劉曉波.....	54
秦 耕：中國的自由神.....	55
咎愛宗：別曉波，西湖的柔波應該記著你.....	57
小 喬：向死而生.....	59
李金芳：在深重的黑暗面前.....	62
謝燕益：劉曉波給世界留下了什麼？.....	65
王玉民：劉曉波與大海一起托起明天的太陽.....	67

### 輓歌篇

廖亦武：給劉曉波的輓歌.....	72
師 濤：敵人.....	74
唯 色：再生：致劉曉波.....	74
杜導斌：好兄長，為什麼要去死呢？.....	75
徐 琳：悼曉波.....	76
子 抗：名字離去之後的井.....	77

李詠勝：中國的路標.....	78
<b>追憶篇</b>	
蔡 楚：我所知道的劉曉波.....	82
蘇曉康：劉曉波把激進煎熬成溫和.....	82
艾曉明：我期待一場盛大的告別.....	89
江棋生：深切惦念危在旦夕的劉曉波.....	95
巫一毛：曉波，今夜為你點一支煙.....	98
莫之許：未盡的征途.....	100
齊家貞：劉曉波、我和筆會.....	105
蔣宣文：念曉波，告別的日子.....	110
王德邦：不意一別成永訣.....	112
溫克堅：回憶劉曉波操持的一次葬禮.....	117
王金波：雙重噩耗，無以復加.....	119
王 瑋：最後一個理想主義者.....	122
韓三洲：我見過他三次.....	124
嚴家偉：沉重的記憶，永遠的懷念.....	126
丁家喜：瀋陽行簡記.....	130
<b>述評篇</b>	
鮑 彤：劉曉波和他的政治主張.....	134
沙葉新：諾獎有眼 曉波中狀元.....	136
徐友漁：苦難中的修煉.....	140
崔衛平：民主鐵人.....	140
余 杰：曉波與他的時代.....	151
金 鐘：劉曉波和他的無敵論.....	158
李曉蓉：劉曉波的樂觀精神從未動搖.....	160
邵 江：劉曉波的抵抗.....	162
蔡咏梅：劉曉波是香港人的英雄.....	168
野 渡：路上的囚徒.....	171
滕 彪：作為人類精神事件的劉曉波之死.....	175

趙常青：致敬劉曉波！.....	179
魯揚：我為什麼追隨劉曉波先生.....	183
李南央：劉曉波走了.....	185
潘永忠：永遠的豐碑——劉曉波.....	188

### 思考篇

余英時：談劉曉波事件.....	195
胡平：喪鐘為誰而鳴.....	198
嚴家祺：劉曉波爭議原因論.....	207
王丹：走康有為的路 流譚嗣同的血.....	215
一平：走上祭壇的劉曉波.....	217
何清漣：劉曉波與他代表的「非暴力抗爭」路線.....	242
裴毅然：評劉曉波思想遺產之一.....	246
吳祚來：和平理性價值永恆.....	250
楊光：中國民主轉型的道義巨人——劉曉波.....	253
陳破空：劉曉波之死，見證新納粹的誕生.....	258
梁文道：結局之後的劇情.....	260
曾建元：中國不容劉曉波 他卻與天地同在.....	262
尾生：劉曉波之死的神學思考.....	264
彭小明：從毒氣室、放射線到劉曉波的晚期癌癥.....	267
錢躍君：中國文化的脊梁.....	269
張裕：劉曉波諾獎無敵.....	273

### 後記

蔡楚：編後記.....	275
王天成：出版後記.....	276

# 序 言



# 達賴喇嘛祝愿（序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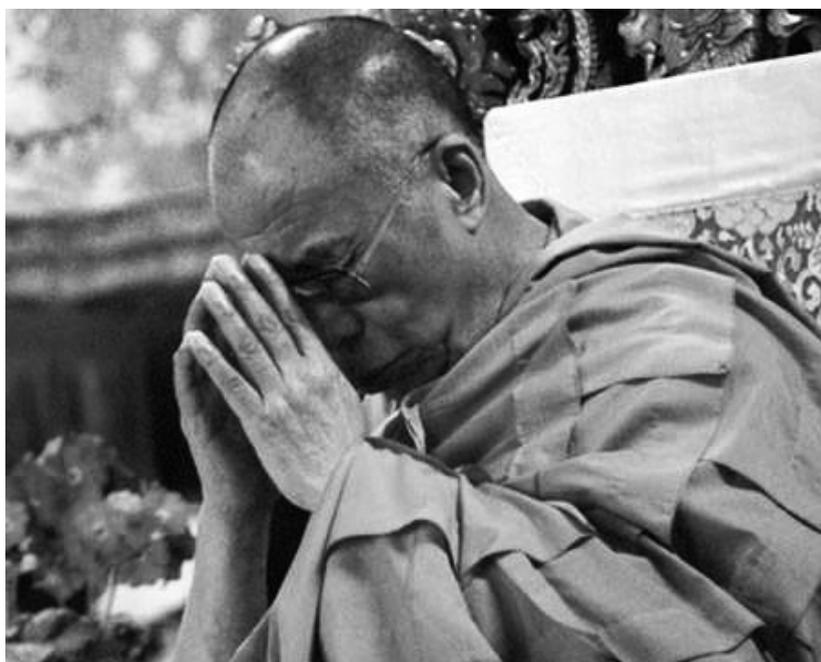
劉曉波先生是一位中國現代史上人權與社會公平的捍衛者，尤其他對中國的人權、民主、法治等的發展不僅做出了長期的努力，也是明確了解（中共）對西藏社會的不公平與不公正而表示同情與吶喊的中國知識分子中的最佳代表。故此，我對劉曉波先生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表示贊同和隨喜。

然而，不幸的是沒有言論自由的中共統治下，這位諾獎獲得者卻遭到中共的長期監禁，最後，很遺憾地在病房裏告別了人世。對此深感悲痛。

近期，與劉曉波先生生前有過交往的一批華人知識分子整理出版紀念劉曉波先生作品，對此實在值得讚頌。紀念這位聖人的主要意義就在於繼承和發揚他們生前的利他思想和高尚情操。我們要永遠緬懷劉曉波先生的這種大無畏氣概和普世價值觀，以及捍衛人權、民主、法治等的堅定信念。願大家盡心竭力為實現這位聖人的遺願而不斷做出努力！

**釋迦比丘達賴喇嘛旦增嘉措**

藏曆 2144 年；公元 2017 年 11 月 12 日





# 自由之火，生生不息

## ——論劉曉波的精神遺產（序三）

張祖樺

2017年7月13日，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博士在經受了長期持續的政治迫害和文字獄之後與世長辭。學識廣博，才華超羣，激情洋溢，能量過人的劉曉波把自己年僅六十一歲的寶貴生命和畢生精力奉獻給了爭取自由、捍衛人權與人的尊嚴、實現民主憲政的偉大事業。劉曉波不僅是中國當代自由主義的旗手和民主運動的主將，也是當今世界堅守普世價值和道義良知，抗擊極權主義和專制強權的傑出精神領袖。



劉曉波英年早逝，世界各地的良知人士無不痛心疾首，悲憤填膺，紛紛用各種形式紀念他，追思他，感恩他，銘記他，為他和家人衷心祈禱！作為他的同道和戰友，更有義務認真梳理劉曉波的精神、思想和政治遺產，以便把劉曉波的理想和道義薪火相傳，含弘光大。故此，筆者不揣淺薄，提出幾點陋見，供大家參考。

### 一、對自由主義理念的傳承與堅守精神

劉曉波一生最珍視的價值是自由，最憎惡的是桎梏自由的專制制度。從他青年時期接受與信奉自由主義思想之後，就從不動搖地高擎自由主義的大旗，堅守與傳承自由主義的理念，英勇地捍衛自由主義學說，堅持不懈地進行自由主義的言說與實踐。

何謂自由主義？自由主義是當今文明世界的主流價值觀和根本義理，是對抗各種形式的專制主義、極權主義、威權主義的有力武器。李慎之先生嘗言：「自由主義可以是一種政治學說，可以是一種經濟思想，也可以是一種社會哲學。它可以是一種社會政治制度，更是一種生活態度。只有全社會多數人基本上都具備了這樣的生活態度，也就是正確的公民意識，這個社會才可以算是一個現代化的社會，這個國家才可以成為一個法治國家。」（1）

自由主義在其三百多年的發展過程中，經過洛克、孟德斯鳩、休謨、斯密、拜倫、雪萊、柏克、洪堡、貢斯當、托克維爾、康德、約翰 穆勒（又譯作約翰 斯圖爾

特·密爾)、阿克頓、潘恩、傑斐遜、哈耶克、卡爾·波普爾等先賢的闡發，逐步獲得了四個方面的內涵。第一，政治自由主義，基本主張是建立憲政政府，實行代議制民主，實行法治，保障人權；第二，經濟自由主義，核心內涵是保護私有財產，實行市場經濟，主張國家盡可能地減少對經濟活動的幹預與控制；第三，社會自由主義，關注社會正義，關注弱者的基本生存條件和權利保障；第四，堅持個人主義的立場，強調個人的價值與權利，強調個人應該得到最高的尊重，應該享有做人的基本權利和尊嚴。(2) 自由主義的基本理念如個人自由、個人尊嚴、言論自由、信仰寬容、人民主權、普遍人權、法治、政府透明公開、限制政府權力、保護私有產權、基本的平等、自由市場經濟和自由貿易在當今世界大多數地方已經深入人心，成為人們普遍認同的主流文明。

李慎之先生明確指出：自由主義並不是中國幾千年文化中固有的傳統，而是西學東漸的產物，它傳入中國的時間才不過一百來年。第一個把「自由」的概念引入中國的是嚴復（1854年1月8日—1921年10月27日）。他翻譯了約翰·穆勒的《論自由》（中譯《羣己權界論》），給中國帶來了自由的經典定義：人生而自由，他可以做任何他願意做的事情，但是必須以不妨礙他人的自由為界限。1895年，面對甲午戰敗後岌岌可危的中國，總結鴉片戰爭以降的歷史經驗，嚴復發表〈論世變之亟〉，明確提出：西方富強而中國貧弱的關鍵就在「自由不自由異耳」。(3)

在嚴復之後，梁啟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於1902年5月發表《論自由》，指出「不自由毋寧死！」斯語也，實十八九兩世紀中，歐美諸國民所以立國之本原也。在〈新民說〉中進而指出「自由之義，適用於今日之中國乎？曰：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無往而不適用者也。」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於1917年出任北大校長，提出「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方針，把北大改造成為一所名符其實的現代大學，使北大成為在中國引進和發揚自由主義的基地。因此，嚴復、梁啟超、蔡元培三位先賢堪稱中國自由主義的奠基人，是中國第一代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

嚴、梁、蔡之後，在中國扛起自由主義大旗的是胡適（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胡適先生畢生都在為自由鼓與呼，包括思想的自由、言論的自由、政治的自由、信仰的自由。他還和同道一起把「自由主義」從書本搬到了現實中，形成了一場持久的社會運動。他以懷疑精神，推動理性覺醒，形成獨立人格；以報刊為輿論平台，倡導自由、容忍、多元的價值譜系；通過個人影響力反對政治獨裁，倡導民主憲政的理念。而他所有的努力，都處於20世紀上半葉自由民主低潮、專制主義時髦的時代。尤其是他的一些朋友們都開始為各種專制獨裁鼓吹時，他依舊堅貞不屈地恪守著自由主義的理想。在胡適周邊，形成了一個個具備現代知識份子特徵的新團體，包括努力社、新月社、獨立評論社、自由中國社。在每一個圈子中，他都是當然的主角。胡適借此幫助中國剛剛形成的知識份子們創造了一種新的傳統——自由主義傳統。因此，在近代中國自由主義的發展史上，胡適成為公認的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4)

1949年是一個歷史轉折點。隨著中共以非法的暴力革命方式奪取政權，胡適、蔣夢麟、蔣廷黻、傅斯年、梁實秋、殷海光、雷震等大批自由主義知識份子遷居台灣，「民國憲法之父」張君勱及童冠賢、顧孟余、晏陽初、錢穆等諸多博學賢明的國

士流亡海外，自此，中國大陸的自由主義花果飄零，滿目瘡痍。在共產極權持續不斷的政治打壓下，留在大陸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無一漏網，均受到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殘酷打壓，或被羅織罪名關押囚禁，或遭戴帽迫害與強制改造，1957年反右運動之後即陷入沉淪，歸於空寂。直至上世紀七十年代初自由主義思潮才開始重新萌動，到1976年「四五」運動悄然登場，遂成為抵制專制主義和極權統治的思想利器。(5)

從1976年「四五」運動到七十年代末民主牆，再到八十年代的思想啟蒙與思想解放運動和八九民主運動，中國大陸產生了一批新起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構成了中國自由主義的第三代傳人造成自由主義思潮的復興，對中國的社會轉型和政治變革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觀念導向。我認為，這一時期中國大陸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當推胡平、陳子明、劉曉波。(6)

胡平(1947年8月18日出生，現居紐約)於1975年7月完成了〈論言論自由〉，1979年2月完成第四稿，發表在民主牆時期北京的一家民辦刊物《沃土》特刊上。第五稿完成於1980年初，在1980年11月北京大學競選期間曾抄成大字報張貼並以油印形式作為競選文件而廣泛流傳於北京大學；之後，該油印本輾轉傳到海外，香港《七十年代》(即後來的《九十年代》)在1981年第3、4、5、6期連載。1986年，這篇文章第一次以鉛印形式在大陸公諸於世，刊登在武漢的《青年論壇》1986年7月號和9月號上。一時被四處傳抄，風靡校園，對自由主義在中國大陸的復興貢獻很大。此後迄今，胡平先生筆耕不輟，著作等身，只因去國日久，加之當局刻意封殺，使其在中國大陸的影響受到限制。

陳子明(1952年1月—2014年10月21日)是「四五」運動、民主牆、思想解放運動和八九民運的幾朝元老，一生幾度坐牢，勤於著述，撰寫和編著了大量膾炙人口的論述政治自由主義、憲政民主理論和中國民主運動史料方面的文章，最後彙編為煌煌12卷文集和多部著作(包括《四五運動：中國二十世紀的轉折點——三十年後的回憶與思考》上下集；《憲政的萌芽——1980年競選運動》(上)(下)卷；《中國憲政運動史讀本》(上)(下)卷；《中國改革的末路》等)。可惜由於當局的極力遮蔽，使陳子明的著作在中國大陸無法出版，公開的文論只能以筆名發表，幸逢網絡時代降臨，才使子明先生的文章思想得以流傳。

劉曉波(1955年12月28日—2017年7月13日)較上述二人年輕，是文革後恢復高考的首屆大學生，之後分別於1984年、1988年在北京師範大學獲得文藝學碩士、博士學位。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先後出版了《選擇的批判——與李澤厚對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第1版)；博士論文《審美與人的自由》(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形而上學的迷霧》(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赤身裸體走向上帝》(時代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選擇的批判》注明是「內部發行」，後三本書都是剛出版即被查禁，《赤身裸體，走向上帝》還未上市就被收回銷毀。這幾本書的發表標誌著劉曉波從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左翼青年轉變為自由主義知識份子。

余英時先生指出：「曉波在思想成長最初階段已完全認同自由的價值。但在第二、第三兩個階段中，他則不斷地致力於自由的深化和擴張。從他最早(1984年)發表的〈論藝術直覺〉和〈論莊子〉兩文來看，他是在文學和藝術的領域中尋求自由。這正是為甚麼他特別注意到莊子的緣由。因為，一方面，《莊子》這部書恰好體現了

最純淨的自由精神。自嚴復至蕭公權，凡是深入西方思想的現代學人，都對《莊子》有這樣的理解，如〈逍遙遊〉可以看作是自由的至境，而〈在宥〉則是『最徹底之自由思想』。另一方面，如所周知，《莊子》也是中國藝術精神的一個最重要的源頭。但是曉波很快地便將自由推向文化和思想的廣大世界，1986年轟動一時的〈危機！新時期文學面臨危機〉即其明證。不但如此，他在字面上斥責的雖是中國傳統文化和專制制度，但事實上為『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劍鋒遙指『黨天下』的統治。這可以說，在擴充的過程中已將自由深化了。」(7)

劉曉波在《選擇的批判——與李澤厚對話》後記中寫道：「自由意味著每個人都有闡發自己思想的天賦權利；平等意味著尊重他人的發言權。俯視眾生的是神，仰視權威的是奴隸，唯有自由、平等的對話才是充分人性的。在學術上，我有權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無權剝奪你說出這種觀點的自由。應該以生命為代價去捍衛每個人說出自己的真實心理的權利。換言之，敢於並能夠做一個自由的思考者的人就必須尊重他人的自由。」劉曉波言出踐行，以生命為代價爭取和捍衛個人權利與自由，使自己的生命歷程放射出無比絢爛的光芒。

劉曉波在《審美與人的自由》論文中，更是以詩化的語言激情澎湃地論述了美是自由的象徵，審美是自由的運動。通過美與審美，人的本質得到全面肯定，人的創造力得到充分發揮，人的生命得到徹底解放。「只有在審美中，人類才能在一段短暫的時間裏，視功名富貴如浮雲，徹底擺脫各種功利欲求對人的束縛，自由地來往於一個純淨的精神世界中。」《審美與人的自由》可以視為美學的自由主義宣言。

如果說在1989年以前劉曉波還是一個學院派自由主義者，那麼，經歷過八九民主運動的劉曉波就迅速成長為主張人權、民主、法治、憲政的政治自由主義者。在他起草的「四君子絕食宣言」中寫道：「全社會應該逐步地放棄旁觀者和單純的同情態度，建立公民意識。公民意識首先是政治權利平等的意識，每個公民都應該有自信：自己的政治權利與總理是平等的。其次，公民意識不只是正義感和同情心，更是理性化的參與意識，也就是政治責任感。每個人不只是同情與支持，而且要直接參與民主建設。最後，公民意識是承擔責任和義務的自覺性。社會政治合理合法，有每個人的功勞；而社會政治不合理不合法。也有每個人的責任。自覺地參與社會政治和自覺地承擔責任，是每個公民的天職。」

八九民運以後，劉曉波撰寫了上千篇時政文章，特別是其代表性著作《未來的自由中國在民間》和他參與起草和發起的〈零八憲章〉，深刻地闡釋了政治自由主義的普世價值觀和基本理念，對中國大陸的憲政民主運動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使他當之無愧地成為中國當代自由主義的旗手。

他在《未來的自由中國在民間》一書中寫道：「私有產權是自由憲政基礎。私有產權之所以神聖，乃在於：1、私有產權，不僅是基本人權之一：個人擁有財物的權利，它不可剝奪，其界限也不可移動。2、私有產權還是基礎性人權，與其它人權高度相關。它是個人自主地謀求自身幸福的最大資本，並為其它人權的確立和保護提供基礎。……3、對私有產權的憲法保護是憲政民主的最基本制度安排之一，關乎一整套經濟、政治和法律的制度安排，特別是關乎個人與政府之間的關係的制度安排，以立憲方式來尊重和保護私有產權的制度，使個人得以獨立自主地謀求幸福，使個人擁有自我保護的法定權利來對抗政府的強制，無數分立的個人產權可以對政府權

力形成有效制約。」他還在該書中提出了以爭取民權（民眾參與公共事務的法定權利）為核心的 9 點政治訴求：1、經濟改革；2、司法改革；3、行政改革；4、媒體改革；5、人大改革；6、選舉改革；7、財政和稅收改革；8、軍隊改革；9、教育改革。並且痛批「民主緩行論」。(8)

劉曉波參與起草和發起的〈零八憲章〉進一步指出：「自由是普世價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論、出版、信仰、集會、結社、遷徙、罷工和遊行示威等權利都是自由的具體體現。自由不昌，則無現代文明可言。」並具體地提出了多條落實自由原則的政治訴求（參見〈零八憲章〉第 7-14 條）。

劉曉波因參與起草和發起〈零八憲章〉被捕受審，在法庭上，他大義凜然地宣讀〈我的最後陳述〉：「表達自由，人權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殺言論自由，踐踏人權，窒息人性，壓抑真理。為踐行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權利，當盡到一個中國公民的社會責任，我的所作所為無罪，即便為此被指控，也無怨言。」「我期待我的國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達的土地，在這裏，每一位國民的發言都會得到同等的善待；在這裏，不同的價值、思想、信仰、政見……既相互競爭又和平共處；在這裏，多數的意見和少數的意見都會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別是那些不同於當權者的政見將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護；在這裏，所有的政見都將攤在陽光下接受民眾的選擇，每個國民都能毫無恐懼地發表政見，決不會因發表不同政見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將是中國綿綿不絕的文字獄的最後一個受害者，從此之後不再有人因言獲罪。」劉曉波身處囹圄，面對構陷，想到的不是個人安危，而是在祖國結束文字獄，實現言論自由和不同價值、思想、信仰、政見的自由表達，充分展現出大義凜然，捨生取義，義薄雲天的大海般胸懷。

當代中國，對自由主義復興做出貢獻的知識份子人數眾多，(9) 然而，若論及知行合一與社會影響力，則無人能出劉曉波之右。所以說，劉曉波是中國大陸第三代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傑出代表，是當之無愧的中國當代自由主義的旗手。

## 二、知行合一、勇於擔當的大無畏精神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劉曉波高擎的自由主義大旗自始至終都是反犬儒化的自由主義。在極權主義和專制政治的高壓統治下，中國社會盛行不問世事，明哲保身的犬儒主義，而在劉曉波身上卻充溢著知行合一，不懼風險，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的大無畏精神。

劉曉波在文章中寫道：以「心學」和「知行一體」而著名的哲人王陽明說：「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可惜，中國知識人大都處在『知而不行』的『未知』狀態。在分工日趨詳盡的當代世界，知識份子的知行一體，就是不被任何外在權威所左右，誠實地說出你的知。而身處被制度性的恐怖和謊言所恫嚇所遮蔽的當代中國，知識份子的知行一體，就是以直面恐怖的良知勇氣，誠實地說出你的知。這是知識份子的天職。」(10)「面對愈演愈烈的分散的羣眾反抗運動，我們呼喚秉持自由主義理念的各界社會精英們的良知和理性，現在已經到了不僅在言論上更要在行動上挺身而出的時刻了。」(11)「在不許自由的地方，如果要實現自由理想，只有用行動踐行它；在泯滅真理的地方，如果相信真理不滅，就要用行動見證它。」(12)

劉曉波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1989 年 4 月，當天安門民主運動爆發時，

劉曉波正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做訪問學者，但他毅然從紐約回到北京，主動投身到這場震撼世界的偉大的民主運動中，並始終堅守在運動第一線，成為運動中最重要知識份子代表之一。六四大屠殺之後，當一些人紛紛選擇出國避難甚至放棄民主運動的時候，他卻選擇肩負起道義與政治的雙重責任，忍辱負重，繼續堅持留守在國內進行抗爭。此後的二十八年裏，他不斷地進出監獄，一多半時間在監禁中度過。在監獄外的歲月裏，他一方面奮筆疾書，為自由民主人權大聲疾呼；另一方面又不畏艱險地戰鬥在爭取自由民主的社會運動的最前線，幾乎無役不與，從不退縮。

1991年出獄不久，劉曉波就來到六四難屬丁子霖老師家裏。丁老師在回憶文章中記述：「那天他聽蔣簡述了連兒參加學運、遇難前後的情況後，就扭身告退出外，半個小時後，他手捧一束鮮花來到連兒靈前，一下子就哭倒在地……。我們彼此都沉浸難以扼制的悲痛之中。隔了一天，他又來到我們家裏，在連兒靈前朗誦了他連夜創作的〈給十七歲〉。聲音嗚咽，不忍卒讀。他為這首詩寫了一個題記：「你不聽母親的含淚勸告，從家中廁所小窗跳出；你擎著旗幟倒下時，僅十七歲。我卻活下來，已經三十六歲。面對你的亡靈，活下來就是犯罪，給你寫詩更是一種恥辱。活人必須閉嘴，聽墳墓訴說。給你寫詩，我不配。你的十七歲超越所有的語言和人工的造物。」(13)此後，劉曉波一直冒著極大風險全力以赴地幫助六四難屬和天安門母親羣體進行維權抗爭，撰寫了大量文章為六四難屬和天安門母親運動在國際上爭取支持，並帶頭發起和推進為「天安門母親」羣體提名諾貝爾和平獎的行動。劉曉波去世後，丁子霖老師抱病代表天安門母親羣體表達哀悼：「曉波，您雖然失去了自由、失去了生命，但您擁有人間大愛是世上任誰都無法比擬的。在我們的心目中，您是永生的。」



1995年2月20日，劉曉波起草並與包遵信、王若水、陳子明、徐文立等12人聯署發表〈反腐敗建議書——致八屆人大三次全會〉，提出了近期改革的七項目標與遠期改革的五項目標。劉曉波還和包遵信先生共同發起要求陳子明保外就醫的公開信，動員了一批著名知識份子，包括北京大學的季羨林、湯一介、樂黛雲，北京師範大學的童慶炳、何茲全、王富仁等人簽名聯署。1995年5月，劉曉波又和陳小平

共同起草〈汲取血的教訓推進民主與法治進程——「六四」六周年呼籲書〉，並與包遵信、王丹、王之虹、劉念春、江棋生等十四人發起聯署。而他本人在正式發表前就被北京市公安局以「監視居住」的形式單獨關押在北京郊區，直到 1996 年 2 月才被釋放。

1996 年 8 月，劉曉波到廣州與著名異議人士王希哲會見，討論了一些共同關注的問題，商定向國民黨和共產黨提出〈對當前我國若干重大國是的意見〉，在兩黨簽署和平協議《雙十協定》五十一周年的 10 月 10 日發表，也稱〈雙十宣言〉，包括兩岸統一的政治基礎問題、西藏問題、關於健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的問題、釣魚島問題等四項。在該宣言正式發表的前兩天，劉曉波再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留，隨後被以「擾亂社會秩序」的罪名處勞動教養三年，關押在大連市勞動教養所，直到 1999 年 10 月勞教期滿才獲釋。



劉曉波在〈我與互聯網〉一文中自陳：「1999 年 10 月 7 日，我結束了三年的牢獄回到家中，家中已經有了一台電腦，是朋友送給我妻子的。我一回來，電腦很快就變成了我的寫作工具」。從此，曉波就以電腦和網絡為工具，以極快的速度寫作和發表了上千篇傳播普世價值和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憲政的時政評論，產生了極大的社會影響。（14）

進入新世紀以來，劉曉波一直站在民主運動和維權運動的最前列，從聲援「新青年學會四君子」到營救「不鏽鋼老鼠」劉荻、杜導斌等文字獄的受害者，從聲援被迫害的法輪功學員到抗議孫志剛之死，從抗議當局封網到呼籲廢除「煽動顛覆罪」，從抗議汕尾血案，抗議關閉「世紀中國網」，到抗議當局對盲人維權人士陳光誠和人權律師高智晟、滕彪的政治迫害，到參與發起〈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同樣的人權〉簽名活動，曉波無不奮筆疾書，並參與和發起了許多封有較大社會影響的公開信和呼籲書。劉曉波秉持自由至上，人權至上的理念，多年來，他針對中共當局打壓台灣民主、剝奪香港自由、侵犯西藏、新疆人權等方面的問題撰寫了上百篇評論文章。2008 年 3 月西藏鎮壓事件發生後，劉曉波與王力雄等人共同發表了處理西藏局勢的十二點意見。這是國內民間人士對西藏問題的第一次聯合聲明，具有重要

的歷史意義。2017年7月14日，達賴喇嘛尊者發表聲明：

「得知同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劉曉波在服長刑期間逝世，令我沉痛不已。我為他的妻子劉霞與其他家庭成員祈禱，並表示誠摯慰問。雖然他已不在人世，但我們可以透過發揚他長期體現的宗旨，來向他致意。這也將幫助促成一個更加和諧、穩定與繁榮的中國。」尊者還強調指出：「我相信，劉曉波在自由事業中長期付出的不懈努力，很快將取得成果。」(15)

新疆維吾爾人买买提明·艾孜來提 (Mehmet Emin HAZRET) 在紀念文章中寫道：「劉曉波是維吾爾族的知心朋友。他在2000年11月發表的〈自治的權利〉一篇文章中要求中國的憲法和自治法應保障維吾爾族和藏族有權利擁有真正的自治。」(16)

2001年7月，劉曉波參與創立中國獨立作家筆會(後改名為獨立中文筆會)。2003年11月當選第二屆筆會會長；2005年11月2日再次當選連任第三屆筆會會長；2007年10月筆會換屆，劉曉波繼續擔任理事直到2008年12月再次被捕。在劉曉波擔任筆會會長的四年間，獨立中文筆會獲得了長足發展，會員人數大幅增長，國內會員人數開始超過海外會員，筆會在國內的知名度和影響力與日俱增，要求言論自由和寫作自由的呼聲空前高漲。同時，這也成為中共當局忌憚他，必欲除之而後快的重要原因之一。



劉曉波不僅始終關懷、傾心投入中國的自由民主事業，而且具有世界公民的人道情懷。2001年9月11日，美國發生九一一恐怖襲擊事件。次日，劉曉波和友人一道發起致布希總統和美國人民的公開信，表達對美國人民的同情和聲援及對國際恐怖主義反人類暴行的強烈譴責。公開信在網上開放聯署，共徵集到六百七十三人簽名。

對伊拉克在獨裁者薩達姆的統治下屠殺平民，踐踏人權，剝奪人民自由的暴行，

劉曉波給予了嚴正的譴責。對伊拉克人民爭取自由民主的鬥爭，劉曉波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對美英為代表的民主國家出兵幫助伊拉克人民推翻薩達姆政權，劉曉波公開表示讚賞和支持。他在文章中寫道：「冷戰後，由美國領導的幾大局部戰爭，就是現代文明的道義規則如何約束戰爭行為的最好實例：在戰時盡量減少平民傷亡，在戰後盡量做到文明重建，最終讓當地人民享有和平、自由和民主……從 911 後美國及其盟國的言行中，我看到了人性的光輝和自由的力量，更加堅定了自由必勝的信念。正是對自由的信念使我相信：美英聯軍決不會屈從於流氓的恫嚇和要挾，自由世界也決不會敗於獨裁殘余及恐怖主義，一個自由、民主、和平的伊拉克必將誕生。」（劉曉波：〈美英自由聯盟必勝〉，2004 年 4 月 11 日）

正因為如此，劉曉波的逝世，不僅得到中國的民主人士、維權人士和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發自內心的沉痛哀悼和深切追思，而且獲得國際人權組織和正義人士的高度評價。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扎伊德·拉阿德·侯賽因專門發表聲明對劉曉波逝世表達深切哀悼！聲明指出，中國的人權運動乃至全世界已失去了一位標誌性的傑出人物，劉曉波將其畢生貢獻給了和平、持續性地捍衛和推進人權事業，其本人更因維護這一信仰而被監禁坐牢。國際特赦組織專門表示，劉曉波是捍衛人權的巨人，他的逝世將給中國及世界留下永恆的遺產。國際特赦組織秘書長賽迪表示，「我們為失去一位捍衛人權的巨人感到悲痛。劉曉波知識淵博，堅持原則，幽默風趣，富有人道精神。」劉曉波雖然去世了，但是他所代表的一切都將留下來。我們現在對他最好的悼念，就是繼續為中國人權而鬥爭，珍惜他所留下的重大遺產。正是因為劉曉波，中國和世界數以百萬計的人士受到感召，雖然面對打壓，卻勇敢地站出來為自由和正義而鬥爭。」國際人權組織「人權觀察」發表聲明，譴責北京當局囚禁劉曉波至死的行徑，凸顯其政權的殘暴。「人權觀察」中國部主任索菲·理查森指出：「劉曉波為中國人權與民主奮鬥的理念必將長存。各國政府應向北京發出明確信息：縱然壯志未酬，劉曉波以自己生命澆灌的理念終將在他身後開花結果。」一直支持中國民主運動的美國眾議院少數黨領袖佩洛西表示：「劉曉波在中國吹響的人權和民主的號角代表了人類最美好的希望。」劉曉波的勇氣、他的文章和他對民主自由的陳述將會永存，我們也會確保這些能流傳下去。」

### 三、對中國憲政道路堅持不懈的探索精神

經歷了八九民運和六四屠殺之後，劉曉波一直在思考面對中共推行的極權統治和暴力文化，選擇切實可行的方式動員民間力量合力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探索盡可能以非暴力的和平方式實現民主轉型、建立憲政國家的路徑。為此，在近二十年的時間裏，他撰寫了許多篇論述憲政民主思想和中國民主轉型道路的文章和著作，集中體現在 2005 年出版的《未來的自由中國在民間》一書中。他在書中全面探討了在中國進行政治改革的有利條件：民權與官權的相對漲落，產權的改革，人權意識的覺醒，工潮的興起，基層民主自治實踐，民間網路言論維權運動，新聞改革的民間動力和體制內異見的崛起；系統地論述了中國社會各方面的發展與中國政治民主化的關係。他認為：1848 年至 1949 年，中國經歷了整整百年的現代化努力，經歷曲折、教訓多多，但最終還是誤入歧途，且是誤入了最大的歧途——選擇了蘇聯模式的共產極權。隨著毛澤東的自然死亡，中國重新開始了又一次現代化努力：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共，一直奉行著鄧小平開創的跛足改革。到本世紀初的中國現代化，雖

不能說已經進入了正途，然而，中國所處的內外環境，確達到百年未遇之良機，國際大勢的明朗和國內民間的覺醒，正在共同推動著歧途知返的進程。

劉曉波在書中指出：「當共產極權體制在整體上崩潰之後，人類歷史的發展方向已經明確：個人自由權利成為最受尊重的價值，憲政民主也就必然成為最受尊重的制度。」對自由的追求和對強制的厭惡，在根本上並不是來自理論和設計，也不是來自所謂『文化素質』或『知識積累』，而是來自人性的本能欲求和自發行動，來自多元化的個人經驗的漸進累積。理論至多起到喚醒被壓抑被遮蔽的本能的作用，人工設計常常起到適得其反的強制壓迫。然而，追求自由權利的本能欲求一旦覺醒，就會導致難以抑制的自發行動，並通過漸進累積和成功示範而逐步變成普及性的社會常識，任何強制力量都無法滅絕其頑強的生命力。在此意義上可以說：人是命定要自由的，此乃上帝所賜的最好禮物，而追求自由就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天職』。」當中國民間的權利意識和自由意識覺醒之時，推動中國變革的根本希望就不在官府而在民間。覺醒之後的國人，只有堅持體制外立場和持之以恆發出獨立的聲音，必將逐漸凝聚成組織化的民間壓力。這才是催生民間的自發建設性力量的根本動力，也是使體制內部發生有益變化的最佳壓力，……。」（17）

為了彙集眾人的智慧深入探索中國的民主轉型道路與促成建立憲政民主政體的目標，2006年10月，劉曉波和我與蔡楚先生一起在美國注冊了《民主中國》網刊（18）。曉波親自擔任網刊主編，為《民主中國》確定了「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憲政」十字辦刊宗旨，親自負責刊物的工作計劃和對外聯繫工作，組建了精幹的編委會和高水平的顧問團隊，聯繫和邀請了大批學者、政論作家和民運人士為刊物撰稿。創刊迄今，《民主中國》先後開展了紀念八九「六四」、中國民主轉型的現狀與前瞻、中國民主轉型路徑探討、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與中國民主轉型、民主轉型與制度變革、民主轉型與培育公民社會、民主轉型與社會運動、民主轉型與網絡時代、民主轉型與十字方針徵文活動，首發了六千多篇文稿。全方位、多視角地研討與中國民主轉型相關的各種問題和難點，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思想觀點。同時，《民主中國》網刊還獲授權編譯了多篇來自其他國家長期研究世界各地民主轉型案例和經驗教訓的學者的論文，作為中國民主轉型的借鑒與參考。《民主中國》網刊的作者中約有90%左右來自中國大陸，10%左右來自世界各地。所有這些工作為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和結束一黨專制，建立憲政政體提供了寶貴的理論指導和豐厚的經驗積累。

劉曉波還在2005年前後和我及其他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開始醞釀、討論為民間民主力量起草一份建立最大共識的政治綱領，以便把分散在各地民間民主力量、人權捍衛者和自由派人士凝聚起來，形成一股強大的合力，共同推動中國的憲政民主進程。這個綱領性文件就是2008年12月9日公開發表的〈零八憲章〉。

劉曉波全程參與了〈零八憲章〉的醞釀、籌劃、起草、討論、修改、徵求意見、最後定稿、徵集聯署簽名的整個過程。由於曉波當時擔任獨立中文筆會會長和《民主中國》網刊主編，事務性的工作非常多，所以，朋友們推選我負責起草初稿（暫命名為〈政治文本〉），何永勤（筆名溫克堅）、王治晶（筆名王德邦）協助；包遵信先生進行統籌、指導；曉波負責聯繫各方人士，徵集意見，對文本進行修訂。初稿分為總綱和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四個部分。因我對經濟問題缺乏深入研究，

故請經濟學專業出身的何永勤負責起草涉及經濟的部分；涉及政治學方面的內容較多，我碰到吃不太準的問題就請教劉軍寧博士，得到許多幫助；王治晶協助我召集了多次網上線下的文本研討活動，搜集反饋了不少修改意見和建議；江棋生先生也是最早參與者之一，為文本的修改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意見，並被吸納到文本中。結尾的最後一段文字在初稿中是沒有的，在後期討論中由趙常青起草添加。選舉專家姚立法則在聯絡各地志士，徵集聯署簽名上發揮了重要作用。

從一開始，參與者就一致同意起草一份像美國〈獨立宣言〉、法國〈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並參照〈世界人權宣言〉）那樣高屋建瓴、條目分明的政綱性文件，既能為當下的中國民主運動提供原則性指導，又能為未來的民主中國立憲建國提供根本性的旨要。

文本起草參考了世界各地民主轉型和人權保障的大量重要文獻，第一稿早在 2005 年年底就寫出來了，共計六十餘條目，一萬多字。討論中，包遵信、劉曉波和一些朋友提出，篇幅過大，條目太多，不夠精煉，有的提法需要斟酌。採納曉波、包先生和其他參與者提出的意見，我又對文本初稿進行了較大幅度的修改，僅 2006 年就修改了七、八稿，將文字壓縮到四千多字，三十五條。當時，估計能徵集到一百人聯署，曾考慮在 2006 年歲末發表，因部分參與者認為時機未宜而擱置。2007 年，我們又為文本的修改舉行過若干次研討會，其中一次是當年 6 月在北京延慶下營村丁子霖老師的鄉下農家小院舉行的，參加者有劉曉波、包遵信、丁子霖、蔣培坤、江棋生、莫少平、楊建利、張祖樞、六四難屬趙先生等。（19）

在文本研討過程中，參與者對認同普世價值和建立憲政民主制度的訴求具有高度共識，只是對聯邦制、極權主義、土地制度、法輪功和民間宗教信仰等問題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和意見；此外，就是對一些具體條文和文字表述各陳己見，多有建議。每次研討會後都會吸收大家的意見和建議對文本進行修改。這樣，在 2007 年中又對文本做了多次修改，條目內容有增有減，但條目總數壓縮為二十幾條。2007 年年底又曾考慮是否公開發表，部分參與者仍然認為時機尚不成熟，並提出應擴大參與者的範圍，動員體制內有一定社會聲望的民主派人士、工商界人士和公共知識份子參加聯署，所以就進到 2008 年。

在徵集聯署簽名的過程中，劉曉波付出了極大努力，他和我一起拜訪過茅於軾、鮑彤、江平等德高望重的體制內外的賢達人士。此外，他個人還拿著文本打印件先後私下會見了七十多人，一個一個耐心地解說，徵集修改意見和聯署簽名。他還委託外地友人登門拜訪當地的社會賢達，徵集聯署。加上其他參與者的協力推介，這才徵得遍佈全國各地的三百零三名首批聯署人，比起初籌劃的一百名發起人多出兩倍。

2008 年是中國立憲百年，〈世界人權宣言〉公佈六十周年，「民主牆」誕生三十周年，中國政府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十周年。我們一致決定在 12 月 10 日〈世界人權宣言〉公佈六十周年之際發表這個文本，命名為〈零八憲章〉。最終定稿是劉曉波完成的，他在原稿的基礎上根據大家的建議進行了認真細致地修訂，力求確當、精煉、典雅，這才成就了十九條四千零二十四字的〈零八憲章〉。

〈零八憲章〉發起者的立意是：第一、就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和當下的現實及

未來的發展目標，提出公民社會的總體性的願景和建議；第二、鮮明地表達中國公民社會對自由、民主、人權、平等、法治、共和、憲政這些普世價值和制度安排的堅定認同與努力追求的基本原則立場；第三、對待專制統治不能總是停留在道德批判與義憤聲討的水平上，需要提出理性和建設性的改變現狀的具體目標和原則主張，供人們在實踐中加以參照；第四、對於如何妥善解決社會政治轉型中的疑難問題，盡可能降低轉型的代價與成本，實現轉型正義與社會和解，提出可供參考的思路；第五、學習和借鑒世界各國的先進經驗，預先為未來的自由民主中國提出立憲原則，指出一個大體的方向和輪廓，供各界有識之士深入思考和討論，以期早日達成共識，形成預案；憲章雖然不是憲法，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憲章中闡釋的憲政、民主、共和、法治、保障人權和聯邦制的原則卻是真正意義上的共和國的制憲原則與立法原則；第六、在憲章共識的基礎上逐步集結社會力量，形成持續不懈的公民運動，直至最終在中國建立立憲民主制度。(20)

在〈零八憲章〉的起草、討論、修改、成型的過程，許許多多的各界人士參與其中，提供了寶貴的意見和建議，如于浩成、李普、杜光、張顯揚、張思之、流沙河、沙葉新、孫文廣、馮正虎、張先玲、徐珏、戴晴、莫少平、陳子明、高瑜、張倫、李曉蓉、楊建利、蔡楚、童屹、賀衛方、張大軍、徐友漁、崔衛平、郝建、艾曉明、梁曉燕、徐曉、胡發雲、張博樹、張旭昆、葉航、沈敏驊、李公明、李大同、栗憲庭、張鳴、夏業良、吳思、滕彪、浦志強、李柏光、張星水、馬綱權、陳永苗、馬少方、李海、楊海、李金芳、劉曉峰、趙達功、蔣宣文、劉荻、莊道鶴、咎愛宗、王怡、余杰、冉雲飛、余世存、王俊秀、古川、薛野、趙達功、趙暉、野渡、劉逸明、傅國湧、張閔、王曉漁、蘇元真、周鴻陵、馮剛、陳林、周明、凌滄洲、鐵流、陳奉孝、張津郡、李劍虹、張善光、李德銘、劉建安、周明初、趙誠、陳西、李元龍、申有連、廖雙元、吳玉琴、盧雪松、郭玉閃、朱久虎、金光鴻、高超羣、鄭旭光、曾金燕、杜義龍、張輝、朱健國、張耀傑、吳報建、楊光、俞梅蓀、王光澤、吳祚來、高旻、高強、唐荊陵、黎小龍、荊楚、李彪、郭艷、楊寬興、王玉文、楊中義、武辛源、杜和平、黎雄兵、黃曉敏、鄭恩寵、宋先科、王京龍、劉正有、馬蕭、萬延海、余樟法、陳啟勇、劉賢斌、陳衛、歐陽懿、鄧煥武、賀偉華、李東卓、田永德、智效民、李昌玉、李智英、余以為、陳青林、曾伯炎、馬亞蓮、車宏年、李建強、李仁兵、蘭志學、劉巍、郭永豐、袁新亭、謝福林、野火、鄒巍、田奇莊、鄧太清、李喜閣、侯文豹、唐吉田、張鑒康（實際參與者遠不止上列名單，沒有提到的請原諒並致歉！）從這個意義上講，〈零八憲章〉是羣體智識的結晶，是追求自由民主的中國人長期思索與研討的成果。誠如徐友漁先生所言：「它可以說是中國追求自由民主的知識份子的集體作品，是他們在六四屠殺之後面對歷史交上的一份答卷，也折射了曉波個人的努力、轉向和提高。」(21)

截止 2017 年 7 月 16 日〈零八憲章〉簽名整理小組共發佈了三十六批簽名聯署，參加〈零八憲章〉簽名的總人數達到一萬三千五百二十人，且參加簽名的人數仍在不斷增加。只要中國一天不實現民主憲政，簽名聯署就將持續進行，直到中國加入民主國家行列為止。

在現代化和全球化的歷史背景下，中國正在經歷兩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歷史學家唐德剛提出：兩千多年前，秦始皇「廢封建，立郡縣；廢井田，開阡陌。」從封建

制轉變為郡縣制，建立皇權專制大一統的政權，是中國政治社會制度的第一次大轉型。前後「轉」了二三百年之久！這一秦漢模式延續到清朝末葉「鴉片戰爭」時期（1839-1842年），就逐漸維持不下去了——在西方文明挑戰之下，中國的傳統制度被迫作有史以來「第二次政治社會制度大轉型」。地球人都知道，第二次大轉型的核心是制度變革，從專制轉為民主，從人治轉為法治，從專政轉為憲政。唐先生把這次大轉型命名為「歷史三峽」，預言「要通過這個可怕的三峽，大致也要歷時兩百年。自1840年開始，我們能在2040年通過三峽，享受點風平浪靜的清福，就算是很幸運的了。」「不論時間長短，歷史三峽終必有通過之一日。」（22）

以劉曉波為代表的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正是在這樣艱苦卓絕的歷史條件下，以畢生的精力和生命的代價上下求索著怎樣實現人的自由與解放，怎樣使人權和人的尊嚴得到有效保障，怎樣建立憲政民主的政治制度，怎樣使中國走上現代文明之路。鮑彤先生指出：「劉曉波找到了一條阻力最小，理由最充分的道路，他的最終目標是沒有人膽敢公開提出反對的。如果中國真的走上了民主的道路，那麼，不僅是中國人民的福祉，而且全世界將會得到一個負責任的大國。這對人類共同的文明發展可以起絕大的積極作用。」（23）

劉曉波百折不撓追求自由的精神；知行合一、坐言起行，爭取民主、捍衛人權與人的尊嚴的精神；對中國憲政道路堅持不懈的探索精神；是他身後留下的最為寶貴的精神遺產。劉曉波把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了爭取自由民主的偉大事業，他將與大海同在，滋潤中華大地，澤被世界文明。自由之火，生生不息，薪火相傳，不知其盡。

宋石男挽聯曰：

君去時赤縣遍地風雨，抑或天亦有情，欲留此自由精魂？金石之志，倚空常鳴，不與俱盡，綿綿神理；

情歸處神州滿目瘡痍，縱使人間無道，能殺盡民主志士？憲章所思，海內永傳，孰謂公死，凜凜猶生！

#### 注釋：

- （1）（3）李慎之：〈弘揚北大的自由主義傳統〉，劉軍寧主編《北大傳統與近代中國——自由主義的先聲》序，中國人事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
- （2）李強：《自由主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
- （4）李偉：〈胡適與自由主義——被四面夾擊的胡適〉，三聯生活周刊2012年第21期；閻潤魚：《自由主義與近代中國》，新星出版社2007年5月出版。
- （5）包遵信：〈中國自由主義思想發展的譜系〉，載獨立中文筆會網刊。
- （6）研究1949年以後中國自由主義的生長史，還有一個代表人物必須提及，就是顧準先生。顧準（1915年7月1日—1974年12月3日），字哲雲，上海人，中國當代學者，思想家，經濟學家，歷史學家。主要著作有：《希臘城邦制度》、《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顧準文集》、《顧準日記》、《顧準自述》等；譯著有：約瑟夫·熊彼特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瓊·羅賓遜的《經

濟論文集》。顧準堅持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的原則，晚年反思理想主義烏托邦及其造成的災難，批評計劃經濟體制，主張實行市場經濟。李慎之曾說，顧準是拆下自己的肋骨當作火把，用以照亮黑暗。不幸的是，顧準的著作和傳記直到上世紀 90 年代中期他本人已被迫害慘死二十多年以後才得以陸續出版，在本世紀初年才廣為人知。

- (7) 余英時：〈劉曉波的精神旅程〉；來源：民主中國網刊。
- (8) (11) (17) 劉曉波：《未來的自由中國在民間》，勞改基金會 2005 年出版。
- (9) 榮劍：〈中國自由主義「第三波」〉；來源：網絡。
- (10) 劉曉波：〈中國民間反對派的貧困——「六四」13 周年祭〉；來源：博訊. 劉曉波文集。
- (12) 劉曉波：〈自由是起而行的果實——有感於茅於軾的聲明〉；來源：博訊. 劉曉波文集。
- (13) 丁子霖蔣培坤：〈我們與曉波的相知、相識和相交〉；來源：民主中國網刊。
- (14) 劉曉波：〈我與互聯網〉；來源：民主中國網刊。
- (15) 達賴喇嘛悼劉曉波：他為自由事業付出的不懈努力終將取得成果；西藏之聲 2017 年 7 月 14 日報導。
- (16) Mehmet Emin HAZRET：〈劉曉波沒死，十三億中國人的良心死了〉，2017 年 7 月 23 日博訊。
- (18) 蔡楚：〈我所知道的劉曉波〉；來源：民主中國網刊。
- (19) 香港開放出版社出版的〈零八憲章〉(珍藏本)收錄了這次聚會參加者的照片，但把日期錯寫為 2006 年 6 月)。
- (20) 張祖樺：〈從憲章共識到憲章運動——紀念〈零八憲章〉發佈一周年〉；〈零八憲章〉月刊第 6 期。
- (21) 徐友漁：〈劉曉波與零八憲章〉；縱覽中國網刊 2017 年 7 月 16 日。
- (22)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岳麓書社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 (23) 鮑彤：〈劉曉波和他的政治主張〉；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2017 年 7 月 13 日。

2017 年 7 月初稿，11 月訂稿

**張祖樺**——北京學者、作家、編輯，《民主中國》網刊理事兼編輯，〈零八憲章〉主要起草人；曾任共青團中央常委、中央國家機關團委書記，北京六四事件後離職。

# 宣告篇



# 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向劉曉波致敬



今晚，全世界關心中國人權的人，都和我們一樣，為劉曉波先生的病逝感到無比哀慟。我要向這位人權鬥士致上最高敬意。我也要向劉曉波先生的家屬，特別是仍然遭到軟禁的劉霞女士，致上我最誠摯的慰問。

2010年，劉曉波先生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上，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那張空椅子。現在，那張椅子確定永遠等不到劉曉波本人。

劉曉波在〈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曾經說過：「我堅信中國的政治進步不會停止，我對未來自由中國的降臨充滿樂觀的期待，因為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攔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國終將變成人權至上的法治國」。

這是劉曉波的中國夢。我們期待中國大陸當局展現自信，推行政治改革，讓中國大陸人民享有民主自由的天賦權利，並為兩岸關係打開新的契機。中國夢不應是耀武揚威，中國夢應該把劉曉波先生的夢想也一起思考進去。落實民主，讓每個中國人都有自由與尊嚴，才是值得驕傲的真正大國。

如果中國夢是民主，台灣會在中國大陸實現中國夢的過程中，提供必要的協助。我相信這是劉曉波先生在天之靈所樂見。

劉曉波先生沒有敵人，因為民主沒有敵人。再一次向劉曉波先生一生的理想與堅持致敬。

（2017年7月13日晚發表於 facebook）



# 獨立中文筆會唁辭

曉波，一首美麗的生命交響詩

親愛的曉波：

一切的努力都無法留住你，你終於還是走了。這最後的日子，你病中的狀況牽動了全世界善良人們的心，大家為你祈禱祝福。也許上蒼不願你再受病魔的折磨，不願你繼續被那邪惡的各式代理人圍繞，讓你在摯愛的妻子劉霞的懷中離開這個對你有所虧欠的世界。

從青年時代你就開始了你無畏無懼的爭抗，對傳統的虛偽，對壓迫人的勢力進行挑戰，你那清晰銳利的思維，優美典雅的文字，吸引了無數青年甚至長者，他們成為你的愛戴者和擁護者。在大時代變革的時刻，你從不畏懼，不考慮個人前途安危，毅然地投入運動中去。你數十年來不斷地以文字和行動來體現對中國這個畸形社會的批判，對苦難者的同情和幫助，對惡勢力的挑釁你從來沒有缺席過。

在獨立中文筆會，你眾望所歸地擔任了四年會長，以個人的魅力和包容斡旋的胸襟，團結了國內外大量異議寫作者，使筆會成為維護中國言論自由尤其關注獄中作家及其作品的最有生氣的文學團體。〈零八憲章〉是中國民主化的路線圖，一盞指路的明燈，但是卻把你推進了黑暗的萬丈深淵，連諾貝爾和平獎這樣的最高榮譽也沒有能讓你重獲自由。

親愛的曉波，你的一生是一首美麗的交響詩，你嚮往追求自由，為了千萬國人能得到自由，毅然犧牲了個人的自由，至死不渝。你留給我們的精神遺產是一個知識份子的風範，是一個民族的自由魂，是人類永不放棄追尋自由的希望和勇氣。

曉波，你的靈魂不滅，精神永存！

獨立中文筆會



# 天安門母親羣體唁辭

致劉曉波、劉霞夫婦



曉波：

您雖然失去了自由、失去了生命，但您擁有的人間大愛，  
是世上任誰都無法比擬的。  
在我們的心目中您是永生的。

劉霞：

為了曉波、為了您自己、為了世上所有摯愛你們的人，  
您一定要堅強地、有尊嚴地活下去！  
愛您！  
您不孤單，我們與您同在。

天安門母親羣體

2017年7月14日

# 劉曉波先生訃告

## 自由劉曉波工作組

中國民主轉型運動的先驅劉曉波先生，於公元 2017 年 7 月 13 日，因肝癌被延誤治療而逝世於中國瀋陽，享年六十一歲。劉曉波先生在過去三十餘年中，積極致力於中國的民主轉型事務，為中國人的民主、自由與人權事業，宵衣旰食嘔心瀝血，並因此四度繫獄累計長達十五年。他是當代中國自由與人權運動的代言人，是一座標誌著中國人為自由而不懈奮鬥的豐碑。

劉曉波先生 1955 年 12 月 28 日生於中國長春。1977 年入吉林大學中文系，1982 年入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1988 年獲文藝學博士並留校任教，係當代中國第一個文藝學博士。1989 年，劉曉波參與八九民主運動，被捕入獄，1991 年 1 月出獄。1995 年 5 月，因起草〈六四六週年呼籲書〉再次被捕，1996 年 2 月獲釋。1996 年 10 月，因起草〈雙十宣言〉三度被捕，1999 年 10 月獲釋。入獄間隙在北京從事政論寫作。直至 2008 年 12 月因〈零八憲章〉四度繫獄，被判刑十一年，並在獄中榮膺 2010 年諾貝爾和平獎。

劉曉波先生是 1980 年代中國思想啟蒙運動的先行者。博士在讀期間，劉曉波多次發表文章及公眾演講，從文學進入文化、思想領域，進而至哲學領域。《選擇的對話》、《形而上學的迷霧》等著作，不斷闡發其最徹底的自由思想與對普世價值的追求。其博士論文〈審美與人的自由〉，使得我們對於自由的理解深入到哲學層次，從而徹底否定共產意識形態及其統治。他在一九八零年代提出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文化多元化的主張，遠超八十年代的思想啟蒙的高度

劉曉波先生是六四民主運動的親歷者、倖存者。1989 年四二六社論發表次日，北京當局武裝鎮壓已見端倪之時，劉曉波毅然放棄哥倫比亞大學訪學，孤身飛返危城，立即投入廣場運動之中，並撰寫多封呼籲當局啟動民主改革的公開信，發表〈六二絕食宣言〉，深獲廣場學生信任。在北京當局出動武裝鎮壓民主運動時，劉曉波於 6 月 4 日凌晨與軍方談判，帶領數千大學生自槍口下安全撤離，避免了更大的流血衝突。他自稱是「共產主義末日到來之際的倖存者和見證人」。

劉曉波先生是六四精神的守護者。在六四後萬馬齊喑的日子裏，劉曉波窮十數年之功，孜孜不倦協助天安門母親羣體整理資料，撰寫或修改聲明，協調安排諸多事務，呼籲國內外媒體關注天安門母親羣體。他是天安門母親羣體最忠實可靠的同行者。每年六四他都會以自己的方式紀念這個日子，他在物質及精神上幫助了諸多八九一代。

劉曉波先生是中國自由寫作共同體的組織者。劉曉波 2003 年至 2007 年擔任獨立中文筆會第一、二屆會長，並擔任網刊《民主中國》之主編。在他的感召下，許

多年輕的政治異議寫作者加入獨立中文筆會，積極關注在中國大陸寫作者的言論及出版自由。在劉曉波的主持之下，筆會活動重點向海內傾斜，創立了立足於中國大陸的「自由寫作共同體」，並在北京成功舉辦兩屆自由寫作頒獎禮，使得筆會成為舉足輕重的民間組織。

劉曉波先生是中國零八憲章運動的領導者。劉曉波是〈零八憲章〉的主要的修訂者、組織者，並幾乎為此付出生命代價。〈零八憲章〉是一份關於未來中國政治的藍圖，一份和平轉型的建設性文本，是以民間為主體構建的憲政共和的集體發聲。劉曉波以自己的人格魅力與影響力，徵集到首批三百餘社會知名人士的簽名。憲章運動立即遭到北京當局的殘酷打壓，劉曉波一身承擔，鋃鐺入獄，從而榮膺諾貝爾和平獎。

劉曉波先生是當代中國最重要的社會活動家和獨立知識份子。他在六四後，承擔了中國政治反對運動的組織化工作。他多次介入人權運動與維權運動，關注獄中政治犯、作家及良心犯家屬，縱橫於體制內外，有意識的構建政治反對的人際網絡。他關心下一代青年作家和異議知識份子，為他們創造良好的發展條件。他放棄了自己的學術研究，以積極幹預的姿態，為中國弱勢羣體做不平之鳴。

劉曉波先生是當今中文世界最重要的政論家和詩人。在過去的二十餘年裏，劉曉波寫了大量關注中國現實問題的政論文章，他以深厚的政治與哲學功底，鞭辟入裏、振聾發聵地分析當代中國問題之根本所在。他同時亦是一個浪漫奔放的詩人，下筆繡辭，揚手文飛，在文學領域馳騁縱橫。美之追求與人之解放，其理一也。劉曉波已出版的著作有十六部之多。

劉曉波先生是中國民主轉型運動的殉道者。他以一己之力，垂三十年而不輟，百折不撓地踐行著自己的理念與信仰。正如他自己所說，自由不只是言說，而是踐行。自由不昌，則無現代文明可言。他對當代中國的民主化、現代化、文明化進程念茲在茲，有生之日皆其奮鬥之年。因此，劉曉波歷年榮膺全球各國相關獎項如海爾曼人權獎等，達十四項之多，其筆路藍縷承先啟後之功，舉世罕有。

劉曉波先生是中國悲劇中的道義巨人。他認為，「為了所有人都有自私的權利，必須有一個人無私地犧牲。為了爭取到一個消極自由，必須有一種積極抗爭的意志。一個殉難者的出現就會徹底改變一個民族的靈魂。」劉曉波在多年的精神打壓和身體監禁之中，愈加溫和、寬容、謙卑，也使得他的感召力量愈加強大，無遠弗屆。

嗚呼！劉曉波先生之逝，為吾人、吾國之大慟。昊天不吊，折我赤子。河山改色，日月韜光。先生之恙，為繫獄所生，吾人當為先生紀其事；先生之萎，為中國而死，吾人當為先生續其志。先生身後之中國，當為先生一哭。

嗟大志之所存，故表節而不忘。臨遺籍以慷慨，佈茲文以哀傷。

# 劉曉波先生追思會成立公告



昊天不吊，折我赤子。河山改色，日月韜光！

2017年7月13日，一生致力於中國民主自由事業的劉曉波先生與世長辭，一座中國人為自由而不懈奮鬥的豐碑巍然屹立。

先生之恙，為繫獄所生，吾人當為先生紀其事；先生之萎，為中國而死，吾人當為先生續其志；長歌痛哭，為先生身後之中國。於茲發起成立劉曉波先生追思會。

劉曉波先生追思會，將擇日為劉曉波先生舉辦（網路）公祭，設立劉曉波先生永久（網路）靈堂，持續推出並最終印行紀念劉曉波先生文章，逝者已矣，來者可追，凡我同道，皆可以簽名加入及留言，以托哀思。

特此公告。

**劉曉波先生生前友好**

**零八憲章簽署人羣體**

**自由劉曉波工作組**

**劉曉波先生追思會（籌）**

成員：王之虹、艾曉明、梁曉燕、唯色、查建英、徐曉、崔衛平、王荔蕪、王力雄、張祖樺、劉蘇里、張煥萍、馬少方、浦志強、周忠陵、陳小平、何頻、劉軍寧、徐

友漁、查建國、江棋生、郝建、蔡楚、吳思、秦耕、張旭昆、葉航、王丹、吾爾開希、廖亦武、王軍濤、劉衛華、丁家喜、趙長青、莊道鶴、咎愛宗、田原、吳仁華、余世存、王俊秀、薛野、王怡、鄒幸彤、野渡、余怀谦、溫雲超、温克坚、燕文薪、莫之许、華春輝、王譯、賈葭、慕容雪村、蔣亶文、王五四、吳明良、長平、葛永喜、游精佑、胡佳、余杰、滕彪、趙思樂、甄江華、陳進學、劉荻、何霖、吳魁明、馮船林、陳軍、陳奎德、蘇曉康、楊建利、嚴家祺、高皋、李曉蓉、一平、高文謙、張博樹、蔡詠梅、鄭義、韓連潮、許暉、楊子立、黎學文、任重遠、王雲、潘嘉偉、StacyM sher、項小吉、李進進、金鐘、宋永毅、張樸、李恆青、王進忠、李天明、阿鐘、潘晴、王策、孫寶強、楊錦霞、方政、侯芷明、武宜三、阿森、胡平、劉青、黃貝嶺、費良勇、潘永忠、梁永燦、鐘錦江、陶君行、王興中、李卓人、何俊仁、麥海華、蔡耀昌、張文光、林欣怡、黃怡碧、邱伊翎、札西慈仁、黃嵩立、呂思翰、楊宗澧、尹兆堅、Eleanor Lam、劉家儀、鍾婉儀、盧林慧、蔡菫文、胡露茜、楊焯煒、陳翠樺、何式凝、王美鳳、杜潔麗、韋少力、陳文慧、Evon Leung、關振邦、朱慕芳、岑子杰、岑駿逸、張小鳴、黃默、莊豐嘉、梁文道、何宗勳

# 呼應篇

# 劉曉波「沒有敵人」的精神在日本永存

牧野聖修、王進忠

我們都出生在中國，對中國感情深厚，一直非常關注中國的繁榮進步和中國人權問題，全力支持中國的民主化，積極推動中日兩國和平交往，因此對劉曉波幾十年來堅持「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的和平博愛精神，非常欽佩和認同，看作是日本和世界文明發展進步的希望。

劉曉波先生自遭中國當局重判以來，就受到日本輿論越來越多的關注。2010年10月8日，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宣佈將當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劉曉波先生，日本各大報刊都在第一時間作為頭版新聞報導，成為1980年代主張「中日要世代友好下去」的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之外，至今唯一獲得這種殊榮的中國人。2010年12月31日，日本共同社以及各加盟報社、電台、電視台的報導和社論負責人，從新聞第一線視角出發，評選當年日本國內外十大新聞，將劉曉波獲獎評選為2010年日本國際十大新聞之一。

## 支持中國民主化

我們對劉曉波先生的關注、欽佩和支持是在他獲獎之前。王進忠於2005年加入獨立中文筆會，隨後由擔任會長的劉曉波任命為獄中作家委員會和翻譯與語言權利委員會委員，作為筆會在日本的代表，對劉曉波的支持自不待言。牧野聖修於1945年5月4日出生在當時為「滿洲國」的中國東北，戰後隨家人返回日本，二十五歲起就相繼當選靜岡市、縣議員，四十八歲起又先後四次當選日本國會眾議院議員，次年出任羽田內閣法務副大臣，2011年任野田內閣經濟產業副大臣，2012年任日本民主黨副幹事長。由於關注中國的民主化和國際民主力量的合作，我們都出席了2006年5月在德國首都柏林召開的「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化論壇」成立大會，牧野聖修被推舉為副主席，王進忠任理事。同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我們又在東京舉行「支持亞洲和中國的民主化思考會」成立大會，牧野當選會長，王進忠為理事，《刑事辯護》季刊總編北井大輔出任秘書長。

## 支持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

2009年9月，國際筆會在東京召開第76屆代表大會，獨立中文筆會會長廖天琪、副會長潘嘉偉、理事馬建、國際筆會理事楊煉、網絡工作委員會協調人野渡、獄中作家委員會助理協調人李劍虹和委員王進忠等十人到會。王進忠受筆會委托協調安排在東京舉行其它活動。9月25日，國際筆會代表大會開幕之前一天，獨立中文筆會和大赦國際日本分部、美國筆會聯合舉辦「聲援劉曉波等中國作家演講會」，當晚六時在早稻田大學附近的早稻田奉仕園會館的自由廳召開，由國際特赦日本分部代表北井大輔主持，廖天琪為引言人，潘嘉偉、馬建、楊煉、野渡為演講人。世界各地先期到達的國際筆會大會代表和嘉賓、當地聽眾和媒體記者約70多人應邀出席，包括：國際筆會獄中作家委員會主席瑪莉安·博茨福特·弗雷澤，國際筆會理事克里絲

汀·舒尼德、崛武昭，維吾爾筆會會長凱撒，日本筆會秘書長井出勉，韓國、捷克、丹麥、瑞士德語筆會、加拿大、比利時等筆會的代表。



（左起）王進忠、潘嘉偉、牧野聖修、廖天琪、小喬、野渡

9月30日上午大會閉幕，下午由王進忠聯繫安排，筆會代表團廖天琪、潘嘉偉、野渡、李劍虹及他五人一行，到日本國會眾議院第一會館，拜會了時任日本執政黨民主黨的國會對策委員會代理委員長牧野聖修眾議員，感謝他長期關注中國言論自由和民主化，希望他呼籲日本各界聲援劉曉波爭取諾貝爾和平獎並促使劉曉波早日獲釋。牧野聖修當即表示：「我將於近期發表聲明要求中國政府釋放劉曉波，並呼籲各界聲援劉曉波爭取諾貝爾和平獎。」

八天後，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公佈劉曉波獲獎，牧野聖修當晚發表聲明，「熱烈祝賀劉曉波榮獲2010年度諾貝爾和平獎。要求中國政府立即無條件釋放劉曉波等獨立中文筆會會員。」由於他呼籲日本國會議員組織「日本支持劉曉波國會議員聯盟」，10月21號下午在日本國會第一議員會館舉行成立大會，牧野聖修出任會長。國會兩院議員十一人和其它議員代表十人，以及各人權團體負責人或代表等近百人出席大會，是日本國會議員首次舉辦支援中國異議人士的活動。會議由議員聯盟秘書長、民主黨參議員今野東主持，牧野聖修首先致辭表示：「對劉曉波判處徒刑，從人權角度來看是無法令人接受的。我們要求中國政府立即釋放劉曉波，解除在北京家中對劉霞實施的軟禁措施，保障言論自由。我們將通過日本外務省將我們決議轉交給中國政府。」日本支持亞洲與中國民主化思考會秘書長北井大輔、獨立中文筆會代表王進忠、國際特赦日本分部理事長藤田真利子、著名人權律師伊藤和子相繼演講，隨後宣讀了劉曉波妻子劉霞、《北京之春》主編胡平、獨立中文筆會會長廖天琪的感謝信。劉霞在感謝信中表示：「你們對劉曉波的祝賀與支持，不僅表達了你們對劉曉波的關切，而且也表達了對中國所有良心犯的關切，表達了對中國人權問題以及世界

和平的關切。作為劉曉波的妻子，我向你們表示深深的敬意。」廖天琪的感謝信表示：「感謝你們對本會榮譽會長劉曉波的關注和支持。希望中國政府能夠早日釋放劉曉波。」大會結束前宣讀了「要求立即釋放劉曉波和中國民主化的決議案」，祝賀劉曉波獲獎，對授予他和平獎的挪威諾貝爾委員會表示敬意，並認同該委員會表彰劉曉波以非暴力方式爭取基本人權的活動，表示不能聽任中國政府違反已經參與簽署的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而迫害劉曉波，強烈要求中國當局立即釋放劉曉波及其他中國民主人權活動人士，恢復劉霞的自由，保障言論自由等基本人權及相關和平活動。

同年 12 月，我們和北井大輔一行三人，應邀出席了 12 月 10 號在挪威奧斯陸舉行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儀式。我們在那裏和獨立中文筆會的其他成員會合，他們包括會長廖天琪，副會長潘嘉偉和齊家貞，前副會長蔡楚和陳奎德，常務秘書兼獄中作家委員協調人張裕，助理協調人小喬，顧問胡平和蔡詠梅，澳洲會員阿木和阿森等等。我們還參加了筆會在此期間與國際筆會、國際特赦、香港支聯會等團體代表舉行的其它相關活動，到中國駐挪威大使館前示威等等。

### 關注劉曉波患病、醫療和去世

2017 年 6 月 26 日，劉曉波被診斷出患晚期肝癌獲保外就醫在瀋陽醫院中接受治療的消息傳出，日本輿論大嘩，各界人士於同月 30 日晚在東京文京區政府會議廳舉行集會，日本支持亞洲和中國的民主化思考會、國際特赦日本分部、獨立中文筆會代表、旅日中國民運團體代表和日本學界、政界人士近百人出席，紛紛發言要求中國政府讓劉曉波到國外接受治療。日本支持亞洲和中國的民主化思考會秘書長北井大輔主持，獨立中文筆會日本會員、紀實作家麻生晴一郎在集會介紹了劉曉波。日本法政大學教授大崎雄二則介紹了劉曉波的現狀與他二十八年前在天安門廣場見到劉曉波的情景。牧野聖修在集會上表示：「天安門事件對中國的民主化有積極的意義。……我對劉曉波判刑無法接受。我要求中國政府釋放劉曉波到國外接受治療，將通過日本外務省將我的要求轉達給中國政府。」

7 月 4 日，我們前往日本首相府遞交給安倍晉三首相的親筆信，要求安倍在參加當月 7 日在德國漢堡舉行二十國集團峰會期間，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談時，提出讓劉曉波到國外接受治療的建議。牧野聖修在與首相府接待官員會見時，還提交全球一百五十四位諾貝爾獎得主聯署發表給習近平的公開信復印件，要求中國政府以人道主義的原則盡快放行劉曉波和妻子劉霞到美國醫治。特別提及簽署者中包括的日本人得主——物理獎得主天野浩、中村修二、梶田隆章和化學獎得主下村脩、鈴木章。接待官員表示：「一定會把您的要求與親筆信轉交給安倍首相。」據悉，安倍首相也確實在會談中提及對劉曉波的關注。

7 月 13 日，劉曉波病逝，我們和北井大輔於次日發表公開信，對劉曉波去世表示深切哀悼，並要求釋放劉霞；表示繼續完成劉曉波未盡心願，為了實現中國的自由民主和平繼續努力奮鬥。

7 月 21 號晚 7 點，日本各界在東京、靜岡、大阪、福岡、仙台等多個城市，同時開始舉行劉曉波追悼會，並要求釋放劉霞。東京追悼會由日本人權活動家古川郁繪主持，日本執政的自民黨國會議員長尾敬發表聲明，獨立中文筆會候補理事王進

忠也在會議上發言。牧野聖修則在靜岡市八幡神社主持了追悼會。

8月4號晚，日本各界在東京港區集會，要求中國政府讓劉曉波遺孀劉霞及其弟弟劉暉能自由地離開中國，我們也到會發言。牧野聖修在會上表示：「我出席了在奧斯陸舉行的劉曉波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儀式。我堅決支持中國實現民主化。……我要求中國政府以人道主義的原則盡快放行劉曉波的妻子劉霞到國外。」

8月28-30日，第一屆四筆會平台國際會議在瑞典南部城市馬爾默市舉行，會議由瑞典筆會、獨立中文筆會、維吾爾筆會和藏人海外作家筆會聯合主辦，主題為「尋求共識空間：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牧野聖修和北井大輔作為特邀嘉賓出席。29日上午，會議在馬爾默市政廳的會議大廳舉行開幕式，獨立中文筆會會長廖天琪作為主持人之一致歡迎詞，介紹嘉賓時提到：「牧野先生多年來始終如一支持中國海外民運。2010年9月國際筆會年會在東京舉行，我第一次見到牧野先生。我們當時談到繫獄的劉曉波，牧野先生當即決定成立了「日本支持劉曉波國會議員聯盟」並擔任會長。該年12月，牧野先生和我皆被邀請到奧斯陸參加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獎典禮。眾所周知，當時觀禮台上放著一張空椅子，應當坐在椅子上的劉曉波正在一萬公里以外的錦州監獄中。」30日晚，會議在馬爾默圖書館會議廳舉行閉幕式，由國際筆會副會長喬安妮-利多姆-阿克曼女士主持，她總結道：四筆會平台為各國各族裔的作家提供了寶貴的交流平台，是國際筆會大家庭的一種新的、具有創意的交流模式，在這裏我們感謝主辦的四筆會。此外，我們將會採取行動，營救劉霞和伊力哈木提到議事日程上。

對此，我們表示非常認同。最後，廖天琪代表會議組織者暨獨立中文筆會宣佈向喬安妮-利多姆-阿克曼女士和牧野聖修頒發「劉曉波紀念獎」，以感謝他們對中國人權的長期關注和對劉曉波的長期支持。廖天琪說：2010年牧野先生成立了「日本支持劉曉波國會議員聯盟」，並擔任會長，這是國際上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國會議員直接聲援劉曉波的團體，能夠主持這樣的行動，需要勇氣，更需要正氣，牧野先生兩者俱備，他是中國人民的真正朋友，獲得劉曉波紀念獎是實至名歸。

隨後，會議秘書處成員、獨立中文筆會發行和翻譯委員會協調人向兩位獲獎人相繼獻上獎品——銅塑的劉曉波頭像。牧野聖修對此深感榮幸，遠在東京不克到會的王進忠也與有榮焉。

我們一致認為，劉曉波雖與世長辭，但他的精神將永存中國、日本及全世界，代表了我們繼續努力的方向和希望！

**牧野聖修**——日本政治家，人權基金會會長，日本國會前眾議員，日本支持劉曉波國會議員聯盟會長

**王進忠**——旅日記者，人權民運活動家，獨立中文筆會候補理事。

# 希望劉曉波的生命 能喚醒中國人的良知

桑傑嘉

劉曉波的逝世震驚了世界，特別引起了人權組織、中國知識分子和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劉曉波肝癌晚期後才送醫院治療，病情不斷惡化，劉先生自己和家人都想出國治療，外國專業醫生已經明確說明出國治療不能拖延，並表示願意提供國外治療條件，中國政府以各種理由阻止，直至劉曉波先生駕鶴西去。在悲痛中希望劉曉波先生寶貴的生命能喚醒更多的中國人良知。

7月13日，瀋陽司法局發表消息稱，劉曉波「7月13日，因多臟器功能衰竭，經搶救無效死亡。」噩耗傳出，世界悲痛（中共和大部分中國人除外），臉書上用各種不同的語言在討論劉曉波、哀悼劉曉波，更多的在譴責中國政府殺害了劉曉波。

7月14日，圖伯特領袖達賴喇嘛尊者向劉曉波先生致哀：

獲悉歷經長時間監禁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離世，我深感悲痛。在此，向他的妻子劉霞和其家屬表達我深切的慰問及真誠的祈禱。

雖然劉曉波已經離開人世，但我們尚存的人，可以借由發揚劉曉波長期以來所堅定的原則，引領中國走向更和諧、穩定與繁榮。

我深信，諾貝爾獎得主劉曉波為自由事業的努力不懈，將在不久後開花結果。

達賴喇嘛

2017年7月14日

很多圖伯特人也在社交媒體上對劉曉波先生的逝世表示了悲痛，同時也對中共集權政府對異議人士的迫害深表痛恨和憤怒。

中國著名異議人士，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因起草〈零八憲章〉被捕入獄，於2009年12月被北京當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十一年監禁，剝奪政治權利兩年，在遼寧錦州監獄服刑。媒體報道劉曉波癌癥晚期住院治療的消息後，各人權組織和政府紛紛呼籲中國政府給劉曉波先生就醫治療的自由，美國政府和德國政府還特別派遣癌癥專家會診，外國專家一致認為可以到國外治療，而中國政府封殺信息，並發出與外國醫生相反的說法。對此，德國政府則表示，主導劉曉波治療的不是醫生而是中國的安全部門。最終驗證了德國政府的說法，沒有醫生救活，卻被安全部門關死了劉曉波。

劉曉波先生是中國人，作家、文學評論家、人權活動家、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

得主，在監獄患肝癌已至晚期，生命垂危之際，中國政府對他實施各種打擊，使中共暴政的殘忍性和中共領導人的狠毒暴露無遺。中國政府對中國的良知者、律師、學生殘酷的打壓，特別是在全世界的目光下對國際上有著很高影響力，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如此遭迫害，對於「非我類」的圖伯特人、東突人、蒙古人的迫害就可想而知了。

劉曉波事件是二十一世紀中共集權政府對中國異議人士殘忍迫害的又一罪行，劉曉波先生也是在關押中去世的第二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第一位是在納粹德國，第二位是在所謂的「崛起」的、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國。而劉曉波事件對圖伯特人等發出的信號是——中國政府對異議人士和良心犯的打壓和迫害走向更極端化。中國政府不顧國際社會的呼籲和譴責最終關死劉曉波，而且，軟禁其夫人劉霞。說明中國政府與文明世界漸行漸遠，並無視國際社會一意孤行，霸氣凌人。

因此，圖伯特人開始討論，中國政府既然對中國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國際上知名度極高的劉曉波如此非人道的進行折磨，最後遭殺害。那麼，圖伯特的良心犯和異議人士的未來又會怎麼樣？

在圖伯特，很多良心犯遭中國政府的公安人員和獄警的暴虐之後，長期無法得到治療，生命有危險的時候送回家中去世的事件頻繁發生。在監獄中關押期間沒有提供醫療條件而死亡的事件不斷發生。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丹增德勒仁波切事件，中共非法關押丹增德勒仁波切十三年後的 2015 年 7 月 12 日，突然通知「阿安扎西（丹增德勒仁波切法名）於今日下午病故」。不歸還遺體給家人，監獄方面非法火化遺體連骨灰都不讓家人帶走。2002 年，丹增德勒仁波切遭中共非法拘捕後，流亡圖伯特人展開了大規模的抗議，國際社會呼籲公開審理、公正判決以及要求釋放。丹增德勒仁波切在監獄中圓寂之後，家人和國際社會呼籲中國政府對去世的原因展開調查，中國政府根本不理國際社會的呼籲，至今對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圓寂沒有任何的說明。因此，丹增德勒仁波切二十六歲的外甥女尼瑪拉姆悲離母親，和六歲的女兒 2016 年流亡印度，為的就是「呼籲國際社會徹查真相」。尼瑪拉姆就在 7 月 13 日繼續在美國國會蘭托斯人權委員會作證、哭訴和呼籲國際社會調查丹增德勒仁波切在監獄中圓寂的真相。

大部分從中國監獄中出來的圖伯特良心犯的心靈和身體遭到非常嚴重的摧殘。如，2012 年獲得國際新聞自由獎的圖伯特人頓珠旺青因拍攝紀錄片《無懼》拘捕，以煽動分裂國家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年，服完刑期回家時健康狀況極度不佳而需要治療。服完五年徒刑出獄的著名西藏政治犯僧人晉美嘉措被診斷出患有多種疾病而住院治療。

還有今年二十八歲的第十一世班禪喇嘛更登確吉尼瑪以及家人被中國政府強迫失蹤二十二年。

自 2009 年至今有一百五十多名圖伯特人自焚抗議中共政府。

對圖伯特人民的壓迫和遭遇，絕大部分的中國人不聞不問、無動於衷、冷漠無情，似乎跟他們沒有任何的關係。甚至很多中國人站在中共一邊對圖伯特人、南蒙古人和東突人殘酷的打壓推波逐浪、火上澆油，使圖伯特人等遭受雙重的迫害。

劉曉波是：「世界人權運動的『堅定的引導者』」、「我們時代偉大的道德的聲音」，

「劉曉波的去世使得中國『失去了一位有高度原則的典範』」，劉曉波也是中國良知的代表。中共殺害劉曉波事件證明，國際社會營救中國良心犯的可能性變得越來越渺茫，中共集權政府對異議人士的打壓變本加厲，自由、人權、民主等普世價值在中國大地上扎根的夢想又一次被中共砸碎了。

作為圖伯特人，希望中國人能繼承劉曉波的精神遺產，沿著劉曉波先生的腳印，為自由、民主和人權事業繼續奮鬥，這才是對他最好的懷念和敬仰。更希望劉曉波的生命能喚醒更多中國人的良知，更多的「劉曉波」站出來為中共集權統治下的所有人說話，也希望聽到一百五十多位圖伯特人生命點燃之熊熊大火中的呼喚，能看到數以千計的良心犯在監獄中遭受的暴虐。

願如達賴喇嘛尊者所說：「我深信，諾貝爾獎得主劉曉波為自由事業的努力不懈，將在不久後開花結果。」相信劉曉波精神之光驅逐黑暗的中共集權統治的那一天並不遙遠。

2017年7月14日

桑傑嘉——西藏流亡作家、學者、翻譯，《西藏通訊》前主編。



桑傑嘉在巴黎為劉曉波聲援

# 祭奠篇



# 最有寬恕精神的反對派

## ——公祭劉曉波先生的發言

鄭義

今天我們到這兒來，是為了紀念我們在天安門廣場的戰友，我們獨立筆會的前會長劉曉波先生。剛才曉康唸的悼詞，我覺得非常好，說出了我心裏的很多很多的感受。劉曉波的勇敢堅定，他為理想獻身，這些，我認為他做的非常傑出，但是，這並不是他所特有的品質。我們在場的和中國大陸的很多為民主自由而奮鬥的同道們，他們都是秉持了這樣的精神和意志。

劉曉波給我的最深的印象，是他的溫和。他和劉賓雁和我們幾個人一起創立了獨立筆會，從此之後，我們之間除了在天安門廣場的接觸以外，我們在筆會內部又有了更多的接觸。當時，我的感覺是，我覺得曉波這個人不是一個怒目金剛式的勇士，在筆會內大家都認為他是一個老婆婆。為什麼呢？大家知道，中國人在一起做一件事情很不容易，有很多的矛盾和各種各樣的不同意見。但曉波在做會長時，他一天到晚守在電腦前頭，幾乎把時間都用在和全世界的筆會會員來討論問題。實際上這是調解大家各種各樣的意見、衝突，包括個人之間的人際關係，他為此付出了太多的精力。從他卸任以後，筆會就再也找不到一個這樣溫和有耐心有愛心的會長。

剛才曉康說他心裏很沉痛，對於中國的未來懷著很深的憂慮。實際上，這也是我想說的。劉曉波完全是被謀殺的。這是很難想像的。一個政府竟然把反對派中最溫和的一位領袖人物，這樣兇殘地謀殺。我同意這樣一種判斷：實際上，他們是關上了和平轉型的大門。他們積累的仇恨太多了，他們欠下的血債太深了。本來，劉曉波作為一個最溫和的，最有理性的，最有寬恕精神的反對派，是可以來參與和領導中國這場和平轉型的。但是，這個最後的機會被這些魔鬼們徹底葬送了。所以，我對中國的未來，心裏懷著很深刻的憂慮。我覺得將來可能是一個血流成河的時代。當然，我們作為劉曉波的同道，作為他的戰友，我們應當繼承他的遺志，我們將盡力地使中國和平地，不流血或者少流血地轉向憲政民主和自由。

我們大家會長久地懷念他！

此文為作者在華盛頓共產主義死難者紀念碑前公祭劉曉波先生的發言

鄭義——僑居美國的中國流亡作家，獨立中文筆會前會長、榮譽理事。



# 一首響徹華夏荒蕪大地的 美麗交響詩

——緬懷曉波

廖天琪

一切的努力都無法留住你，親愛的曉波，你終於還是走了。這最後的日子，你病中的狀況牽動了全世界善良人們的心，大家為你祈禱祝福。也許上蒼不願你再受病魔的折磨，不願你繼續被那個邪惡黨的各式代理人圍繞，讓你在摯愛的妻子劉霞的懷中離開這個對你有所虧欠的世界。

從青年時代你就開始了無畏無懼的爭抗，對傳統的虛偽，對壓迫人的勢力進行挑戰，你那清晰銳利的思維，優美典雅的文字，吸引了無數青年甚至長者，他們成為你的愛戴者和擁護者。在大時代變革的時刻，你從不畏懼，不考慮個人前途安危，毅然地投入運動中去。你數十年來不斷地以文字和行動來體現對中國這個畸形社會的批判，對苦難者的同情和幫助，對惡勢力的挑釁你從來沒有缺席過。

在獨立中文筆會，你眾望所歸地擔任了四年會長，以個人的魅力和包容幹旋的胸襟，團結了國內外大量異議寫作者，使筆會成為維護中國言論自由尤其關注獄中作家及其作品的最有生氣的文學團體。〈零八憲章〉是中國民主化的路線圖，一盞指路的明燈，但是卻把你推進了黑暗的萬丈深淵，連諾貝爾和平獎這樣的最高榮譽也沒有能讓你重獲自由。

自從柏林圍牆坍塌、冷戰結束之後，世人曾經短暫地狂喜，興高采烈幻覺般地認為世界已經變成一個和平繁榮的樂園了。然而二十一世紀伊始，恐怖份子進行了九一一的襲擊，引爆了新一輪的不確定性，造成焦慮，恐懼無處不在。美國發動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戰爭。有些人認為當薩達姆 侯賽因被殺之後，或者最遲當賓拉登死亡之後，戰爭就結束了。糟糕的是，事與願違。直到今天，戰爭還在繼續著，何時結束無人知曉，它甚至於有從中東擴散到西非，甚至亞洲的可能。

我們今日的世界正面臨著各個民族的大遷徙。成千上萬的人為了逃避戰爭和饑餓，潮水一般湧向歐洲、北美和其他地區。我們日日聽聞到有大量的難民溺死在海上或窒息在逃亡路上的大卡車中。而同一時間，我們也知道全球的軍火工業正在熱火朝天地發展。依照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的報告，當前世界重型軍火貿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領頭的五強是：美國、俄國、德、法和中國。這是怎樣一種精神分裂的邏輯，何等瘋狂的世界？

你生命中最後的那篇文字〈我的最後陳述〉裏，提出「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這是你個人謙卑、發自內心的想法。然而北京政府卻將你和筆會會員和一切追

求中國的自由民主法治的人士當作敵人。革命正在吞噬自己的孩子。中國人民面對的是一個極為殘酷野蠻的政權，中國大地一片荒蕪。你的這句話如今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經常被引用的警句。人們用這句話的精神來感召兇惡的敵人，來為處於岌岌可危的本身境遇尋求鎮定的力量。不論有沒有敵人，有沒有仇恨，我們都不會停止，將前仆後繼，直到中國成為一個自由的國家，人人都能成為享有天賦人權，過上有尊嚴有法律保障的生活為止。

親愛的曉波，你的一生是一首美麗交響詩，響徹在滿目蒼夷的華夏大地。你嚮往追求自由，為了千萬國人能得到自由，毅然犧牲了個人的自由，至死不渝。你留給我們的精神遺產是一個知識份子的風範，是一個民族的自由魂，是人類永不放棄追尋自由的希望和勇氣。

曉波，你的靈魂不滅，精神永存！

**廖天琪**——旅德華裔作家、編輯、翻譯，獨立中文筆會會長。



# 登臨祭壇—悼劉曉波

陳奎德



從西元 2017 年 6 月 26 日到 7 月 13 日這十八天，在中國瀋陽的一間病房裏發生的事，是一樁中國的公共事件，也是一樁重要的精神事件。它將載入中國史冊。

這就是劉曉波先生在全世界目光注視下的殉難，驚心動魄可歌可泣的走向祭壇的歷程。

有賴於當局蠻橫而精心的嚴密掌控，我們的朋友、國家的囚徒——劉曉波，在衆目睽睽之下，一步復一步，一日復一日，脫骨剔肉，形銷骨立，在心力交瘁的愛妻攙扶下，活生生地走向了犧牲的祭壇。全世界的目睹者，親歷這一人間悲劇在光天化日下出演，無助無奈，無力回天；揪心揪肺，肝膽欲裂。

曉波就這樣去了！

冥冥之中，我仿佛聽到了曉波的歎息，聽到了他的呼喚，他的吶喊。在悠悠綿長的史冊恍思中，不由叩問蒼天，曉波，如今你身處何方？

我知道了，你已翩然升天，與天安門上空未曾瞑目的亡靈，泫然相聚了。

人們曾說，中國二十八年前的六四大屠殺悲劇，尚未產生象徵性的殉道者；如今，劉曉波的巨大悲劇降臨了。他以他天安門血腥之夜談判撤離的生命拯救者的身份，他以他被暴政謀害而死的巨大悲劇性份量，他以他從容邁向祭壇犧牲的沈甸甸的道義形象，無可爭辯地被鑄成了這一天安門殉道者的象徵符號。

七年前，當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時，筆者曾寫過：「真正的桂冠，都是由荊

棘編織而成。劉曉波頭頂的諾貝爾和平獎，正是一頂『自由荊冠』。如今，這一預言不幸而兌現。那無邊無際的極權荊棘，最後竟編織成了死亡的荊冠。曉波在全世界聚焦之下十八天的受難歷程，是一首無與倫比的樂章，是他一生中最為輝煌的臨終受難曲。它已經砌成了一座不朽的十字架。如此，劉曉波為自由跋涉的荊棘路徑波瀾壯闊的一生，終於功德圓滿，走到了它的終點。

實質上，二十八年來中國人的苦難，六十八年來中國人的苦難，戲劇性地濃縮在劉曉波這十八天的臨終磨難中，曉波最後時日的掙扎，是中國人苦難的縮影。這一幕悲愴的歷史舞臺劇，凝聚了當代中國人的多少歌哭生死！

劉曉波去了。他知行合一、因反抗暴政、天安門血腥之夜談判撤離廣場、組建獨立中文筆會而立功；他犀利批判極權體制並參與起草〈零八憲章〉而立言；他捨生取義，從容入獄，慷慨赴死而立德。如此，他已經臻於立功立言立德的三不朽境界。

作為自由中國的當代象徵，作為公民社會的代言人，作為憲政中國的殉難者，作為民主中國的第一位公民，劉曉波，已經進入了中國的乃至世界的《賢人堂》。

劉曉波去了。但是「那坐在黑暗裏的百姓看見了大光；坐在死蔭之地的人有光發現照著他們。」

2017年7月13日，不僅是劉曉波的忌日，也是當代中國人的受難日。劉曉波代中國而受難。

而受難日之後，復活的日子也就不遠了。

**陳奎德**——旅美華裔學者、作家、編輯，哲學博士，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執行主席，《縱覽中國》網刊發行人兼主編，獨立中文筆會前副會長（會長劉曉波）。

# 悼念曉波小兄

洪哲勝

曉波小兄，咱們沒有見過面，但是，通暢的溝通，讓咱們有著相同的民主理念和運動觀點；而且在長長的時段裏，咱們交心、攜手推動了中國民主運動的一個又一個戰役。



98年《民主論壇》創刊不久，你剛坐完第三次監牢，一出獄就接到了我托北京朋友帶給你、邀你投稿的訊息，很快地你就成為了《民主論壇》的重要作家，於是你連連收到不少的稿費，得以到處遊歷、訪友。你不但慷慨支援了民運難友，而且廣招作家為《民主論壇》撰稿。

這使得你和遼寧的唐元雋以及山東的王金波，成為了擴大《民主論壇》作家隊伍和刊物影響的推手和功臣。

中共懼怕你，把你打入天牢，最後還用忽視你的罹癌的手法謀殺了你。中共實在可惡至極。但是，這無疑地也證明了：咱們的民主運動方向正確，咱們給它的壓力夠強、夠大。不是嗎？

你走了，不但中國人心有不甘，世界輿論也為你大抱不平，最有意思的乃是：正被嚴厲統治著的藏維人民、正被「一國兩制」哄著的港人，以及正被逼迫著去承認「台灣屬於中國」的、過去拒絕關切中國事務的台灣人，無不踏出來悼念著你。因為——你關心人民的福祉和意願，而非他們的家園是否屬於中國；你的〈零八憲章〉的民主憲政廣獲這些人民的喜愛；你的聯邦制或邦聯制主張是這些人民可能接受中國的必要前提！

眼睜睜地看著你的不得不走，非常無奈。但是，我相信你心裏知道，已經把二十年奉獻給中國民主運動的我，一定會繼續為咱們的共同事業賣力，讓〈零八憲章〉的夢想變成現實。

曉波小兄走好！劉霞自由！

（2017-07-15，發表於美國紐約市台灣會館的劉曉波追悼會）原載：民主論壇·電子特刊

**洪哲勝**——旅美台裔作家、編輯、政治活動家，土木工程博士，《民主論壇》網站主編。

# 永別

于建嶸



我是非常不希望寫這篇文章的。這是由於，這些年來，我除了為母親寫過此類文字外，許多親朋好友的離世，如陳子明、蔡定劍、高華等等，我都沒有表達過生離死別之類的心情。不是我不熱愛和尊敬他們，而是感到他們有許多朋友，我想傾訴的悲哀，大家都在訴說，我成為一位聽眾就行了。當然，您有更多的朋友。您將離去，已經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撼和悲傷。可我還是決定，與正在病危的您，有一個正式的告別。

我們相識是在三味書屋組織的一次演講會上。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那天，我是主角。我應邀向數十位聽眾講述農民抗稅費的維權行動，呼籲應取消農業稅。您靜靜地坐在一個角落裏，聽著、記著、思考著，但始終一言不發。待我講完要離開時，您才過來告訴我，您是廣場那只黑手。我們握著手，哈哈一笑，算是相識了。

隨後，我們走進了不遠的一個路邊小店，點了幾個小菜，以茶代酒，對飲起來。記得，您風趣幽默地對那個一直跟在您身邊的小伙子說：我們兩個博士吃飯聊天，你就不用參加了吧。那小伙紅著臉，退出了小店。我們天南地北地聊了許久，許多觀點，相視一笑，算是告訴對方了。這之後，我們通過幾次電話，聊過一些事情，都是點到為止，並沒有深入。

2007年夏天，您給我電話，說想到我在郊區宋莊的農家小院住幾天，討論一些很重要的問題。我當然是歡迎的。但我希望，您不用晚上來，要在白天光明正大地來。您說：如果讓他們發現，會對你不利的。我笑著告訴您：晚上來，他們也是知

道的。

您是同張耀傑教授一起來宋莊的。當然是白天，而且是我親自開車接你們大搖大擺過來的。您就住在東書房西邊的客房裏。當時，您正在思考起草那份後來成為您罪狀的文件。您急需與遠在他鄉的朋友商量。您很神秘地告訴我，有一個軟件，聊天不被監控，可以放心使用。我很驚訝您的單純，竟然相信有如此神奇的技術。當然，出於禮貌，我還是許可您在我電腦上安裝了這個神奇的軟件，並讓您用它與外面的朋友聊天。只是，您一離開東書房，我就將那軟件刪掉了。

您在東書房的日子裏，除了看書和寫作，就是聊天。您用有些結巴但富有激情的言語，系統而清晰地講述了您對中國社會現實和未來的觀察和思考。應該說，對您的基本觀點，我原則是同意的。只是，我反復表述的一個觀點是，我不喜歡那種在宏大話語下，對個體特別是當今最弱勢羣體生存狀態的無視。或者說：我從來不認同，那些希望受壓迫者遭到更殘酷的迫害好最後奮起革命的觀點。對此，您很認真地聽著和思考過。

您離開東書房不久，就發表了那份給您又一次帶來牢獄之災的文件。雖然，我基本上同意您文中表述的觀點，但我還是堅守不聯名，沒有參與其中。

後來，您再一次徹底失去了自由。我當時想，我們還應該有機會再見的。直到有一天，我才有了另一種結論。那是在您獲獎的那一天。當時，我同美國著名學者裴敏欣教授在社科院旁邊的酒家吃飯。他在網上得知了您獲獎的消息，一改以往斯文沉穩的風格，用力拍著桌子說：太好了！太好了！終於有機會出來了。而我卻難過得淚流滿面。我對驚訝不解的裴教授說：我們再見不到他了。

我想，我們此生是難以再見了。無論您是否能闖過病危這一關，都是如此。事實上，見面與否，並不是什麼重要的事情。年過半百，對人性之惡有了較為深刻的理解，對這個世界的人與事也人看得比較淡了。人總是要死的。無論是帝王將相，還是貧民百姓，都難免會從塵世中消失。這並不可怕。只是對於您來說，還有許多事情沒有做，還背負著許多人的期待。這也許是件痛苦的事情。更讓朋友們感到悲哀和憤怒的是，他們無視您最後的基本自由。而在我看來，無論他們如何對待您，都不應感到意外。我說過，您就是一座高山，無論多少人將您踏在腳下，都無損您的尊嚴與偉岸。

只是，就我們而言，相識一場，此生相見無望，我又不相信有什麼來世，那就在此永別吧。

原載：博訊，2017年7月13日

**于建嶸**——法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

# 落淚，為我的朋友劉曉波

李海



那個晚上，他暴死在見不到天日的囚禁中，至死也未能被許可來到太陽底下，也沒有呼吸到哪怕一口自由的空氣。

他的死，其猝然而至與出人意料，其悲慘和恐怖，其草率而無情的了結，給人們帶來了巨大的心理衝擊。

他在漫長的囚禁中，究竟經歷了什麼，看到了什麼，想到了什麼？此前的監視居住，他是否也遭遇像 709 那樣的酷刑？如此等等，他永遠也不可能告訴我們了。

耶穌在他最後的時刻，喊道「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但他知道他會復活。而曉波死的時候，面對的是：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能夠幫助他，只有他正在被投向的最深的黑暗。這是何等的絕望！我們都是人，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同樣的感受力。他的絕望實際上是為我們所有的人而經歷的，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可能遭遇到他所遭遇的。

有自認為信神的朋友，他對曉波的論斷，我是不能同意的。他說曉波的遭遇，只是「人的成功」，「是完全屬於魔鬼性質的，與造物主的榮耀見證沒有絲毫關係」。你怎麼知道的？如果神真有他的安排？

他只是將自己理解的、也就是從他人遺傳而來的某種神學話語作為尺子去輕率比量，而居然看不見他本來應該追隨的神，所明顯給這個時代看的真實作為。正如耶穌所說，你們如果真的瞎了就沒有罪了，而正因為你自以為看見，所以罪是推不掉的。神的代言人，豈是說自己是，就能夠是的嗎？以旁觀者這樣那樣的妄測，用人頭腦中被遺傳而來的標準去論斷，那就是在屬靈問題上的驕傲，是最大的罪，按照耶穌的話說，唯有這樣的罪是不得赦免的。

一個人作為個體的形象，是在每時每刻以他的言行表現，用工筆勾勒在旁人的心目中，它充滿了細節，表現出他獨有的特點。而人的歷史形象，卻是在忽略了他的個人性的一切細節後，用他的主張、他在關鍵時刻的表現，特別是他的遭遇，用如椽大筆塗抹在時代的背景上。所謂神來之筆，正是使用本來根本承擔不起的渺小個人、用烈火輝煌的光照投下巨大的影子，給萬人看他的意思。而在這個人，就是用他被焚燒般的巨大痛苦。

在他死去的時刻，在天上，我們親眼看到那罕見而奇特的景象顯現出來，看到那連續不斷的閃電出乎天幕，聽到像鼓聲一樣持續不斷的隱隱雷聲。如此的巧合，在他被焚燒的那個早晨又出現一次，徹夜，在黑色天幕邊連續不斷的閃電，像他遠去的腳步。這使得人們不能不思考關於靈界的事情。在中國傳說的傳統中，要有多

大的冤屈才能如此感通自然呢？

曉波是在個性上開朗熱情的人，他活躍的社會生活恰逢中國的大時代，使得他擁有許多朋友，並且會有越來越多的人認為自己是他的朋友。因此他的悲壯死去，不可避免地會打動許多人的心。而我，從來沒有細想過我自己算不算他的朋友。他怎麼看待我，我並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應該怎麼確認他在我內心的位置。跟著老鼠，我吃過他的許多次飯。飯不錯，而每一次都沒有掏錢。在飯局中，他議論風生，活躍著思考，對於剛剛出獄不久的我，只有忙著吸收消化，沒有能力做出定論。因此起到的主要是對我本人的康復作用吧。

但當他的病況和死訊相繼傳來，一種深沉的悲痛開始抓住了我，淚水突如其來，使我竟無法將悲痛在我的弟兄姊妹之前說出來。這使我意識到：現在我心裏，確是已經將他認作朋友了。

他從來就是個爭議人物。這與他一直處在事件的焦點上有關。而且我想，他也是樂在其中的。這些爭議經常是有合理原因誘發的。坦白說，對於他的許多做法和說法，我也許都不能贊同。但是今天回過頭來，一眼所能看見的是他的坦誠和願意負責任的態度。這種態度幫助他從歷史中站了出來，並成為永恆。

按照基督教的說法，他是處在罪中，他有自己個人的抱負，有自己為實現抱負的聰明和巧妙，也有個人的局限性和缺陷。但是他所已經達到的效果（無論筆會還是憲章，無論他對民主憲政的渴望還是國際社會的巨大認可）卻是公眾的、有價值的，並且為此他也做出了堅持和付出犧牲。而神借著他在公眾效果上的堅持，出乎他意外地使用了他，為他造就了他本來僅憑個人之力無法達到的、輝煌的歷史形象。

神的這個計劃，可能遠遠超出了他的預想、他的願望和他的承受力。但是神成就了「在人是不可能的，在神卻能」。他先是為憲章而被入獄迫害，而後得到諾獎，最後在絕望中死去，這些非常之事，都是超出他的個人願望的。因此我們看到，神對人的使用，有時候是會超越他的罪性、他的軟弱，而給予他出乎意料的歷史內涵。與之相比，他作為個人的所有細節，都顯得微不足道了。

這是像你我一樣普通的人，帶有並不比你我少的個人缺點。像你我一樣，他看到了他眼前的那份真理。而他用自己的全部生活去追隨它，去使之成為真實。當六四風雲激蕩的那個時刻，他趕回來，義無反顧地投入，並經歷了由此而來的後來一切，包括他能夠勝任的，和他在其中被挫敗、被詬病的。他都直面它們，並不回避。

正是這一點與你我不同，也正是這一點使得他走進了歷史。

斯人已去，留在了初曉的大海波光上。他也將他已經沒有能力完成的心願留給了我們所有人。他的紀念碑已經樹立起來，那不是人手所能建造的。他的事業，與他個人所留下的記憶，都已經成為我們所有人的寶貴財富。

**李海**——北京異議人士，獨立中文筆會副會長；1989年學運時為北京大學哲學研究生，曾任「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聯絡部部长，1995-2004年以「泄露國家秘密罪」受刑九年。

# 紀念曉波

胡佳



自從 2017 年 7 月 13 日之後，從盛夏到深秋，持續軟禁中好多個日子的下午 5：35，頻頻生起沉重、悵然，這是劉曉波抱憾離世的時刻。似乎聽聞到劉霞失聲地慟哭，似乎目睹他彌留之際對妻子之愛和對社會和平轉型的不捨。一個為尋覓與爭取自由而堅守和奮戰六十一年之勇士，「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2017 年，最受全世界關注的一場生離死別，就發生在中國的瀋陽。而指揮者在北京的中南海，導演悲劇的罪魁禍首是暴君習近平。

全世界和劉曉波的家庭，伴隨著為奔向自由升起的點滴希望並最終破滅，一個享有世界性道義的中國公民，用他死於牢獄的犧牲，向世界與歷史證明了中國共產黨的冷血，及專制體制對自由和人道的無情敵視。這才是對中共十九大華麗言辭包裝下「美麗新世界」的真實注解。未來對暴政和暴君進行道義和法律審判的起訴書中增加了一本厚厚的證據案卷。

和曉波一樣我曾感染過乙肝，並因為被失蹤和牢獄而有十一年的肝硬化歷史。也曾在監獄因為整月發燒和出現肝部囊腫而被懷疑是肝癌。讓我有更確證的依據判斷劉曉波死於中國共產黨政法機關設計和實施的政治謀殺。錦州監獄用視頻所反映的例行身體檢查和腫瘤篩查，絕對可以發現肝癌腫瘤。而最終被發展到肝癌末期病人膏肓回天無力，是慢性而隱性的處決。結尾不惜成本上演的搶救大戲，為了遮蔽

世人對曉波死因的追責。問責和聲討下官方資訊公開的過程，病痛折磨下日漸垂危的治療如直播行刑。

在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之後，中共把他和高智晟作為「有政治野心」且具有中國社會和國際社會影響力的最重要政治對手之列。在當局政治風險防控的預期中，如果伴隨著香港爭取真普選的運動而點燃中國大陸公民要求開放黨禁和自由競選，那麼劉曉波和高智晟將是中共主要的勁敵之一。他們可能成為類似韓國金大中和盧武鉉那樣的人物。在權衡政治利益下，提前讓這樣的對手死於人為操控的疾病或意外，符合中共的根本利益，符合中共秘密敵我鬥爭的手段。

劉曉波被海葬百日，遺孀劉霞長達七年的軟禁封鎖依然。身體和精神長期處於崩潰邊緣的劉霞會否追隨曉波而去是非常現實的問題。自由曉波全面延伸為自由劉霞，但德國和美國從 4 月和 6 月先後啟動的外交斡旋尚未有實質性進展。我被囚於家獄無法接近劉霞，紀念曉波的大連和廣東公民逐個被捕、被遣送原籍。中共的警察帝國盡情施展著強權、傲慢。劉霞無論在大連老虎灘還是在大理洱海邊，都只能是「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裏歎零丁」。只要在中國共產黨統治的地域，無論北京還是香港，都是劉霞和劉暉的苦海地獄，他們被政治警察看守和隔絕著。真正能療愈創傷的彼岸只有德國和美國。

中共十九大是一場習近平皇權獨掌和權力分贓的盛宴，赤色沙皇是民主、自由和憲政的敵人，他起於習特勒而可能終於習奧塞斯庫。2018，何以告慰曉波，唯有劉霞和劉暉獲得自由，唯有讓他為之犧牲的〈零八憲章〉成為他理想和追求的延續重獲生命力。

曉波，一百多年了，多少國人跋涉於暗夜，志在尋覓道路走出千年萬里專制戈壁，雖一代一代在寒冷與乾涸中倒下，但無人不信、不曉浩瀚的民主大海就在前方。追求自由的必經之路往往首先是投身牢獄、付出犧牲，我們的使命就是做黎明之前夜空中最亮的星。

**胡佳**——北京異議人士，社會活動家，2008-2011 年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受刑三年六個月，歐洲議會薩哈羅夫人權獎得主。

# 悼念劉曉波

孫文廣

劉曉波起草〈零八憲章〉當年被捕，2009 判刑十一年。2010 獲諾貝爾和平獎。

他在獄中關了九年，大家都盼他早日歸來，沒想到，2017 年 6 月他已經是肝癌晚期，保外就醫後，只過了不到二十天就去世了。噩訊傳來，大家痛苦不已。



本期望他刑滿出獄，去競選國家總統，沒想到，現在卻是一個挫骨揚灰的歸宿。

在極權下的中國，劉曉波是民主運動的偉大旗手，是黑夜中的火炬，他照亮了前進的道路，溫暖著苦難者的心。

在中國大陸，劉曉波寄託大家的希望，是眾望所歸。二十多年來，他不斷發表評論，著書立說，抨擊極權，推動中國的自由民主。他是一只號角，鼓舞著民間大眾，震撼著上層的統治。他不僅是個鼓舞者，也是個組織者，他擔任獨立中文筆會兩屆會長。經常聯繫民間各界的代表人物，多次主持、召集各種聚會。他不但是一個思想家，也是個組織家、行動組織者。

〈零八憲章〉是他的思想力和執行力的典型代表。為此他收集了方方面面的意見，不但自己去徵求意見，還派人到各地，拿著草稿徵求意見，最後徵得了三百多人的簽名，我本人也在其中。簽名者不但有北京上海的人士，還有四川、山東、廣東等地的人士。其中包括了很多作家、學者，各界代表人士。

大家所以簽名，既是看中〈零八憲章〉的內容，也是敬重劉曉波的為人。

安息吧，曉波。中國的大眾一定會記住你。你的言、行、文字為世人留下寶貴的精神財富。你的精神的光芒將會照亮通向自由民主的曲折道路，你的精神熱量將會溫暖眾多苦難者的心靈。

高層認為將你的骨灰投向大海，人們會找不到紀念你的聚集地。他們錯了，一個偉大的形象，將會深深地埋藏到眾人的心中，是永遠不會消失的。人們會在每年的 7 月 13 日，或前後，在天南海北、城市鄉村，聚會紀念劉曉波〈零八憲章〉已經有上萬人簽名，將來會有更多人簽名。

安息吧，曉波，你的精神將永垂不朽。

2017 年 7 月 18 日於山東大學（7 月 29 日再發）

孫文廣——山東大學退休教授，獨立中文筆會榮譽理事。

# 中國的自由神

## ——悼念我的師友劉曉波

秦耕



十八天！從你患病的消息傳出，到你溘然離世，之間僅有十八天！看了7月12日醫院例行的病情報告，我已經意識到你與我永訣的日子，可能就在7月13日！

在這十八天裏，全世界的目光一直聚焦在你身上，地球的每一處都有人在為你呼喊和禱告，眾多朋友關山重重，奔赴瀋陽，找遍醫院的每個角落。我一反常態每天發佈多條微信，每條微信都在表達同一個詞語：悲憤！在這十八天裏，我雖遠在天涯，心卻被

緊緊牽在那間具體位置並不明確的病房裏。

在令我和其他朋友悲憤異常的這十八天裏，你始終被隔離在某個角落，密不透風，刺刀、鐵網與高牆，將你與親人和朋輩強制隔離，那怕是在你生命的最後十八天。親人的愛被阻擋，朋友的情被隔離，任由孤獨與病魔輪番折磨。你被監禁，僅僅因為你是一個無罪的人！

我看了你最後的遺言，你說八年前你失去自由，現在又即將失去時間，臨近生命的盡頭，但你並無恐懼！是的，八年前你無懼失去自由，今天你無懼失去生命，因為你心中充滿自由，你的理念永遠不死！神說，那些能敗壞你身體的，不要怕他！

現在你走了，你用自己的死亡，終於戰勝了他們的監獄！你自由了！

在人們習慣使用 MSN 的時候，你 MSN 的名字是 llx，那是劉老俠的縮寫，我沒有問過你，但我猜度老俠是相對於劉霞而言，因為她是小霞；後來是你教我如何使用 Skype 與朋友溝通，你在電話中親自指導了我下載和安裝的全過程，後來那些日子你也是我在 Skype 上說話最多的人，到現在只要我登錄 Skype，還能看見你消瘦但很精神的頭像；你的電話是 13552972115，至今仍存在我的通訊錄裏，我退役的諾基亞手機裏，還保存著與你之間所有的短信往來；在人們開始使用智能手機和微信的時候，我還傻傻的等待你走出監獄，在新手機上安裝微信，然後每天去你的朋友圈點讚；如今在我三星手機的字母表上只要輸入 xiao，系統自動跳出的兩個字就是曉波……但我已經永遠失去你了！無論是通過 Skype 還是中國移動，我都再也無法聽到你那渾厚且時有結巴的嗓音了。

2006 年我低調參與基層人代選舉，在最後一刻，控制選舉過程的機構，勒令其中一人退選，故意讓參選人數不足法定最低差額，然後在午夜緊急宣佈我所在選區的選舉暫停，以這種「合法」的方式，非法阻止了我的當選。事後你對我說，只差

半步，你就偷襲成功！因為在那個選舉年裏，全國各地二百多個高調的獨立參選者，都被扼殺在起步階段，只有在你指導下採用低調方式的我，走到了即將進入正式候選人名單公佈的最後一刻，下一步就是正式投票。你還笑著這說，我還指著去海南時有人大代表陪我呢。

那年你得知我要結婚，表現得甚至比我還要高興！因為你希望人間愛情美滿，朋友們個個家庭幸福。你給我說，你平日出行，身後總是跟著七八個尾巴，陣仗過大，走到哪裏，就把麻煩帶給哪裏的朋友，並讓朋友在日後失去往日生活的那種寧靜。你把自己這種遭遇貼身緊逼的常年監控，稱作出行不便，也儘量減少出行。因此你專門委託另一位共同的好友，像使節一般，奔波數千公里，專程來海南向我表示祝賀。

那年的北京的一個夜裏，在計程車上，你對我說也許我啥時候又會被關起來，因此我現在拼命寫作，想盡量多積攢一些稿費，到時候留作你嫂子的生活費。我非常瞭解你的想法，你從不願意看到任何一個發表言論的人坐牢，也總是勸告每個朋友，不要激進，不要浮躁，用理性而溫和的調子發言。每有認識或不認識的人因言繫獄，你總是痛心疾首，第一個站起來為之奔走呼號。但卻平靜的面對著自己隨時降臨的牢獄之災。2008年你身陷牢獄，每次律師會見，你第一個問的就是，還牽連了誰？當得知最後按照「該硬的硬，該軟的軟」的最高指示，放過我等，千般罪惡，由你一身擔當時，你心裏非常踏實了。以我對你的瞭解，你在審訊中肯定是大包大攬，把事情全往自己身上攬，還是那種大哥風範，想罩著一羣小弟。也就在這個夜裏，七賢村路上你下計程車後與我握別，時至今日其情景還歷歷在目。翌年我到京辦事，因為知道的你的作息習慣，這次就沒有登門拜訪，一念之差，竟讓上年的那次午夜握別，成為最後一面。

你走了，自由了！把無盡悲傷留給我們，也把未來的艱難留給我們，今後再沒有人像能你那樣，以大哥般的身姿替我們擔當，以你的身體，把我們遮擋在盡可能安全的地方。但不管路多難走，我們還要毅然前行，你雖然以這種令人措手不及的方式退出，但你永遠活在了每個渴望自由的人心中，你已經成為這國這族的自由之神！

一篇千字文當然無法表達我的悲傷和無邊懷念，我所能做的，就是向神禱告，我堅信神已經有了一個完美的拯救計劃，一定會帶領我們走向你用盡自己生命所追求的自由！

願你的靈抵達耶和華的國度，永享安息！願曾經捆綁你肉身的枷鎖，不再捆綁還活著的人，願神眷顧你留下的這國這族，願神拯救！願神施恩！

曉波，我親愛的兄長，在我年輕時你是偶像，在我中年時你既是良師亦是益友，永別了！願你的靈魂與神同在，永享自由！

2017-07-13

秦耕——海南作家，獨立中文筆會會員。

# 別曉波，西湖的柔波應該記著你

## 答愛宗

曉波走了，在最後的病痛中，在最後的囚禁中，毫無真正的自由，也沒能留下最後的聲音。

想想真是悲哀，在這個黑暗的奇葩國度。

其實，曉波並沒有走，他還靜靜地躺在那裏，身上還貼著「囚犯」的標籤，旁邊的警察與便衣虎視眈眈。

而真正走了的，是曉波不被囚禁的靈魂——不屈的靈魂，他走在自由的空間中，誰也不能阻擋——無論是無數的黑暗，還是高牆的監獄。

原本，6月7日，曉波的家人就已經接到曉波患上絕癥的消息，處處保密，發不出聲音，只是醫院官方網到6月26日這天才公佈出來，還稱之「保外就醫」，為什麼不早通報病情，不早日送往醫療條件較好的國外醫治？

7月12日這天，瀋陽醫院的官網上分別在上午和下午發出兩條資訊，說明曉波的病情，與往日只發一條不同——這明顯是不祥之兆。但13日這天，瀋陽醫院官網上卻隻字不提，甚至官網差點被網友刷崩潰。

當晚七八點的時候，瀋陽司法局的官方發佈消息，稱「劉曉波病亡」（具體時間有兩個版本，第一個傳出的是6點40分，第二個傳出的是5點35分，多數報導以5點35分為准），原來，在他們眼裏，劉曉波正是一個十惡不赦的罪犯，他的結局是死亡的「亡」。

其實，曉波並沒有死，他的名仍在，而且他的名讓那個號稱偉光正的所謂大多數人擁護的特大組織害怕，於是他們網上封鎖，敏感詞遮罩，甚至連劉曉波的各种照片都「無法顯示」，劉曉波活著讓他們怕，死了讓他們更怕，他們到底怕劉曉波什麼呢？

劉曉波說，「我沒有敵人」，可是他們卻一直把劉曉波當做敵人。

一個沒有敵人的人，卻被某個組織驚駭，可見某個號稱強大的組織處處顯得那麼脆弱和無能，以及厚顏無恥。

曉波明明是世界公認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是無罪的自由戰士，可他們卻一直把他關進監獄，不能發表和出版作品，不能出國領獎，不能出國治病，甚至彌留之際，還不能讓他的朋友們見他最後一面。

那幾個極其煎熬的日子裏，我們一些曉波的同道們只能合個影，呼籲自由曉波，然後陷入某個莫名的悲哀之中。

入獄八年了，餘下還有三年多的囚禁時間，原本期待曉波自由了，可以一道出遊，一道品茗，一道追憶往昔，一道高談闊論，甚至繼續向他傳耶穌基督的福音好消息，可這些都無法進行了，太陽落山可以再度升起，但奔流的河流卻無法再回頭

了。

想一想，這更多的無比悲哀的事情，都無法一一述說，只能寫出這些隻言片語，雖然警方多次警告這些柔和的行為是尋釁滋事，但依然要把當說的話說出來，因為我再也見不到他最後一面了，再也聽不到他爽朗的笑聲了，十年前他還能在西湖邊走走，想必西湖的柔波依然記著他，只是他再也不能來看西湖落日前的柔波了……

謹以此，紀念曉波，紀念那奔向自由的不屈的靈魂！

於 2017 年 7 月 14 日凌晨

**魯愛宗**——浙江作家，獨立中文筆會前理事、林昭紀念獎得主，曾任中國海洋報記者、浙江記者站站長。



# 向死而生——懷念曉波

## 小喬

劉曉波先生離開我們轉眼已經百日。數月來，我沉浸在難以言訴的傷痛之中，卻不知能以怎樣的方式，去表達對先生的哀思。先生「沒有敵人」，視您為「敵」者卻將您囚禁至生命的最後一息！您在禁錮之中離開這個冰冷的世界，陪伴您最後時刻的只有您摯愛的伴侶霞姐和寥寥幾位親人。日夜牽掛著您、與您被迫分離已九年的朋友們無法與您最後道別，無法送您一程。剝奪您自由的當權者甚至不允許在您身後有一個正常的葬禮——在您離去的第三天，他們就匆忙將您的骨灰撒入大海。各地公開表達悼念之情的公民被以「莫須有」的罪名抓捕入獄。即便您已經離開這個世界，他們仍舊對您恐懼入骨！

劉曉波先生是我尊敬的師長和摯友。最早與先生相識，是在 2003 年春，先生攜愛妻霞姐來南方旅遊，那天杭州朋友溫克堅開車送先生伉儷來滬，那是我第一次見到先生，而此前，我早已在文字中熟悉先生並引為精神導師。從我學生時代文章驚宇內的文壇「黑馬」，到後來在那個難忘的春夏之交中斷國外訪學毅然回國，在那個血色黎明，與死神擦肩而過，從容帶領數千學生撤離死亡廣場，既而被欽定的「黑手」，經歷了二十個月的牢獄之災後，一位廣受學子們歡迎的優秀教師失去了講壇，一個才華橫溢的作家在自己的國度被封殺從讀者視野裏消失。這樣的傳奇經歷，令我在與先生結識之前就已心嚮往之，原以為這樣高大上的人物，只可遠觀，高山仰止，然互聯網的技術進步大大縮短了人與人之間的空間距離，也打破了專制者的信息封鎖，我竟有緣與先生相識、相知。與曉波近距離接觸後我才發覺，這個激揚文字、狂放不羈的文學才子，私底下其實是個很平和的人，或許生活的磨礪，早已經將您淬煉成鋼，歲月褪去了桀驁「黑馬」的幾許年少輕狂，更積澱了一份沉穩、大氣與從容。曉波很為朋友著想，他本身是一個積極行動者，但從不以自己的觀點強加於人，更不以道德高標去責難別人，他甚至對待長年監控自己的「有關部門」的同志都平和、友善。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曉波的理念和行動在我眼裏都堪稱完美。

那幾年我在顛沛流離中，只為了在網上的率性表達，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曉波在自身的困厄中，卻時時不忘給予朋友和同道暖心的幫助，如同許多受到過先生無私幫助的人一樣，我也得到過先生很多的鼓勵和幫助。一多半是出於對先生人品才情的仰慕，我申請加入了先生所主持的獨立中文筆會，還冒昧地請先生做了我的人會介紹人。

我與上海國保部門的關係日益緊張，父母和朋友們都為此惴惴不安！在曉波的關懷和筆會的直接幫助下，2008 年初，我得到一個國際援助機構提供的機會，瑞典斯德哥爾摩市文化部邀請我出訪瑞典一年。在接到訪問邀請後，我與上海的國保展開艱難的「談判」，其間的曲折和屈辱，令我一度想放棄出國的機會！當另一位我親近的朋友告訴曉波我和國保之間爆發的激烈衝突，朋友後來轉告我，曉波卻以責怪

的語氣抱怨我：這樣子還怎麼走得了？朋友告訴我說曉波非常擔憂我的處境，怕我繼續待在上海會不安全……當我終於忍不住在網上向曉波傾訴委屈郁闷時，曉波耐心地開導我，勸我盡量忍耐，盡可能爭取成行，否則很多朋友前期付出的努力就都白費了。終於我在警車的「護送」下，在父母的不捨而又慶幸中——他們不必再擔心女兒會淪為「國家的囚徒」了——離開了故國。原以為只是離開一兩年，原以為這不過是一次短暫的告別，孰料世事無常，這一去，我就此失去了至愛的母親，我也失去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導師、朋友和兄長般的曉波。

此後不到一年，曉波為〈零八憲章〉再度入獄。儘管我們聯名簽署了〈我們和劉曉波不可分割〉公開信，儘管我也到香港「中聯辦」門前舉牌要求回國與您「同罪」，然而真正承受最多苦難的卻是您和霞姐，我們誰也替代不了、分擔不了分毫！我只能在遙遠的異域，在失眠的夜裏牽掛、思念著您和霞姐。

先生的受難也成就了您的榮耀，在奧斯陸，我和朋友們悲喜交集！見證和分享了您的榮耀。悲的是您在替我們所有的人受難，連您的愛人霞姐也在諾獎宣佈之後被與世隔絕；喜的是國際社會看到了您的貢獻，給予了中國人權民主事業前所未有的關注和激勵。

2013年歲末，在反覆權衡、計劃之後，我決定繞道越南肉身「翻牆」回國，並在2014年元旦後成功從越南進入雲南，回到我的父母之邦。彼時，曉波已在牢裏度過五年多，十一年的刑期將近過半。雖然我對先生能提前跨出煉獄幾乎不抱希望，但此前我從不懷疑您會扛過這十一年，會歸來與我們相聚！我期待著我們早日的重逢。

然而現實竟是這般殘酷！得知先生患病的消息，我如遭雷擊！那幾日，我神思恍惚，寢食難安。在一次次失眠的夜裏，打開網絡追蹤瀋陽「中國醫科大附屬一院」官方網站的每日病情通報和網上或真或假的消息傳聞，不覺淚流滿面！此前與先生僅有的短短數面之緣和網絡交流，也不斷地在眼前閃回。我想起九年前我去國前夕在北京與先生的最後一次相見，記憶中先生一直是那樣樂觀、堅定、生命力頑強！難道這竟成我們最後一面？先生在被捕前和我最後一次網絡聊天中，還建議我與瑞典邀請方協商，看能否將我在瑞典的訪問期延長半年，這樣我可以避過20周年的「敏感期」再回國，或許阻力會小些，我回國以後的日子也會好過些。您總是設身處地為朋友著想，可如今得知您正在生死邊緣，我卻做不了任何事！

在您的病況被公諸於世十天後，我終於不顧有關部門的勸阻，在一個周末悄悄去了瀋陽，雖然明知無望見到您，可這是我唯一能為您做的了。那個凌晨，我在北國您所在的城市的旅店裏醒來，想著先生就在離我不過數百米遠的一所醫院裏，正輾轉於病床承受著病痛的折磨，我卻思念無從寄，惟有淚沾巾！悲傷如潮水般瞬間吞沒了我！

手捧為您精心挑選的祈祝平安美好的百合花，卻無法送到您手中！我在中醫大附屬一院徘徊彷徨，預料之中的「查無此人」，我把手機裏曉波和霞姐的照片給人看，在所有可能的地方打聽有沒有人見過你們，卻終一無所獲。

我感覺曉波的生命正在一點一點地流逝！曉波，你在哪裏？你能感應到我來看你嗎？你能感應到外面無數相識和不相識的朋友的牽掛嗎？九年來離你最近的一回，

可是拼盡我全力，還是無法看你一眼……曉波，不要離開我們！還有那麼多未竟的事業等待著你……天空中飄起了細雨，莫非蒼天也在為你傷悲落淚？我心碎地意識到，這是我們今生最後的訣別。

僅僅在我從瀋陽回來後的第四天，便傳來曉波的噩耗。從當局不得不公開您的病情，只不過短暫的三個星期，您的生命就已走到盡頭。我想起民初湯化龍挽宋教仁先生的一幅挽聯：「倘許我作憤激語，謂神州將與先生毅魄俱沉，號哭范巨卿，白馬素車無他赴；便降格就利害觀，何國人忍把萬里長城自壞，從容來君叔，抽刀移筆向誰言。」您與宋教仁先生一樣，是為理想殉身的殉道者。而蒼天何忍？每至歷史的關鍵時刻，都給了中國最差的一種選擇！這片土地難道真的被詛咒了嗎？

曉波走後，我的心沉陷入一個巨大的黑洞！回國數年來，為不驚擾八旬老父，我活得麻木而隱忍，但求「苟全性命於亂世」。然只要有先生在，我的心便存有希望。如今先生竟在全世界眾目睽睽之下，被蓄意謀殺以至無跡可尋！我的悲憤無以復加！您以善意待人，有情有義，不負初心。在一個被「鬥爭」哲學和「敵人」意識浸淫了七十年的國度，您以杜鵑啼血、精衛填海般的勇氣和堅忍，放棄個人追求自由幸福的機會，不惜半生為楚囚，為國人求自由，為民族謀未來。令人無限悲哀的是，卻有那麼多的國人不了解您為何而死，甚至完全不知道您的存在。您「沒有敵人」，卻遭庸碌宵小們四面攻擊。自私顛覆的當權者封殺您打壓您囚禁您扼殺您；被奴化教育蒙蔽心智的「小粉紅」們咒罵您是「賣國賊」；狂妄無知的海內外激進份子、野心家們誹謗您詆毀您。您生命中的最後九年，依然被冰封雪藏，至今幾乎沒有信息傳遞給外界。在您辭世百日後，也幾乎無人能聯繫上您的愛妻霞姐，她被持續隔絕於孤獨的黑暗之中。這個世界虧欠您太多！

「好好活下去！」一位遠在異域多年不能回國的兄長在網線遙遠的另一端叮囑我。是的，我們都應該好好活下去。海德格爾說「向死而生」，死亡是肉體生命的極限，是每個人無法回避的未來。但也正因為死亡的存在，令有限的生命更有意義。多年來先生以「亡靈」的囑托鞭策自己，替代那些倒在血色黎明的亡魂而活，終將自己點燃為火把，以自身對理想的獻祭，驅散塵世間無邊的黑暗，使生命綻放出炫目的光華。如今您已魂歸大海，回到那生命之初的源地。曉波，您安息吧！您已完成塵世的使命。後死者將更奮然前行，繼續走您未竟的路。

曉波，我們愛你！

曉波，想念你！

2017年10月

小喬——本名李劍虹，上海作家，獨立中文筆會獄中作家委員會前協調人、女作家委員會委員、林昭紀念獎得主，2008-2009年為瑞典斯德哥爾摩駐市作家一年半。



# 在深重的黑暗面前

——紀念劉曉波先生

李金芳



沒有什麼比一種暴政更殘忍了，那就是在法律的陰影下，披著司法的色彩去施暴。

——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

一

2017年7月13日，這一天，毫不懂音律的我，第一次聽到《殤》這首大提琴曲，隨著旋律響起的瞬間，我的眼淚肆意地流下，那一夜，我一遍遍反覆輪流播放著《殤》和趙雷的一首《辭行》，整個人被無邊的黑暗包裹得透不過氣，心沉入深深的絕望中，雖處炎炎夏日，卻猶如生活在最嚴寒的季節。因為，那個叫劉曉波的人走了。雖然自6月26日得知劉曉波先生罹患肝癌末期的那一刻起就心生大慟，但我還是沒有預料到他的離開會對我造成如此之影響，最直接的反應是二十天裏體重下降十餘斤。一個人走在路上大腦是空洞的又是繁亂的，眼淚會毫無知覺地流下來，數十年來不管我面臨何等的困厄，都從未有過在如此長時間的絕望和無助裏無法自拔，直到多天後我終於能夠和祖樺先生通上話，我才重新擁有了一個人應該有的正常思維。

其實，我對劉曉波先生並不熟知，更不能記述其精義於萬一。但因著〈零八憲章〉，自認為就與他有了一種精神上的血脈相連，於是這樣的哀慟和思念自然便自靈魂深處發生了。而我們，紀念他的最好方式，莫過於繼續他未竟的民主人權事業，走他沒有走完的路。

二

在實現民主和自由的道路上，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中華民族付出的血淚多。僅本世紀80年代末以學生為主體的全體爭取民主自由的社會運動，因遭到六四血腥鎮壓而使剛剛在十年浩劫中走出來尚未恢復元氣的國家再次陷入滅頂之災。劉曉波先生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放棄了國外優渥的生活而投身於中國的民主事業，數度坐牢終無悔。然而，最終他在最黑暗的時刻卻沒能和我們一起等待黎明的到來。

當下，莫說民間社會處於最低谷，整個社會都已經處於無處不在的監控之下，從日常出行必須要面對的攝像頭，到隨時的身、物查驗，可以說到了無所不及的境地，而全民被禁言更是無以復加。在互聯網時代，網絡高牆越築越高，一般人斷難

翻越。一方面，官方加大意識形態宣揚，一個主義、一個核心、一個思想統領媒體和網絡，使得民間無法獲知真相而廣泛受欺騙蒙蔽；另一方面，各類秦皇治民的惡法頻頻頒出，企圖以此扼制異見言行。一時間，普羅大眾不得不接受著愚民統治，自覺不自覺地放棄了說話和思考的權利。哪怕你無懼壓制甚至不畏失去自由而堅守良知，但凡具啟蒙、稍有思想的文章不是被秒刪就是遭屏蔽，可笑的是就連微信的羣主都需要對羣組內其他成員的發言負有連帶的法律責任，僅僅因為傳播一句話、一張圖片就被以言治罪早已不是個案。當權者處心積慮地想把恐懼植入國民的心腦，並妄圖使之生根。面臨如此的大黑暗，我們該怎麼辦？

劉曉波先生用他的生命為我們詮釋出了最好的答案！

衡量一個國家是否文明的標準之一，就是國民是否擁有自由言說的權利，而社會的進步更離不開獨立媒體的監督，因此才會將記者稱為「無冕之王」。如果一個國家沒有言論自由的空間，媒體不能把真相及時地通報社會，那麼又怎麼可能杜絕「謠言」呢？縱然統治者窮盡一切手段，也不可能讓所有的人都成為失語者。劉曉波先生便是傳播真相，捍衛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先行者之一，而他在〈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中「期待，我將是中國綿綿不絕的文字獄的最後一個受害者，從此之後不再有人因言獲罪」的遺願還沒有實現，現在自由言論的空間日趨狹窄，逼仄到快無法呼吸了。也正因此，才需要我輩付出超乎尋常的努力，拒絕接受謊言，堅持說真話是最起碼的底線。

做為自由戰士，在全民失語的狀態下，我們拒絕暴力和謊言，並恥於與之為伍；我們選擇良知和正義，永遠與被侵害被損害的弱者站在一起；我們避免與同道紛爭，因為我們的信念相通，只有求大同存小異才能擴展我們有限的力量；我們不忘初心，縱然九死終無悔，堅信民主自由終有實現的那一天，因為我們的良知和勇氣，是我們最強有力的武器。中國的民主事業不會有坦途更沒有捷徑，亦沒有一個固定的模式和可以完全照搬的樣板，尤其是接下來我們要面臨的將會是最黑暗期，時間的長短無法估量，民主化的到來取決於多方因素，然而只要我們具備長期堅守的心理準備，不樂觀不悲觀，以一顆平常之心，做好自己最擅長的工作，再暗的夜，倘若有足夠多的星星之火也終將可以照亮整個天空！

### 三

專制的鐵幕之下，沒有人是安全的。異見者先行者如是，普羅大眾如是，權貴們和那些利益既得者們又何嘗不是呢？今天位高權重，明天變為階下囚，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

所以，當你握有生殺大權時，一定要守住你的「一厘米主權」，所謂「一厘米主權」，即是你有把槍口抬高一厘米的權利。那些動輒以「職責所在」為借口的施害者們，請聽一聽這個故事吧。這個真實的故事發生在柏林牆倒塌東西德統一後的柏林法庭上，有四個年輕的前東德守衛軍人面臨宣判。案由是一名叫克利斯的年輕人和他的好友相約偷越柏林牆，希望能夠逃向自由。然而，克利斯被子彈擊中而斷氣，九個月後圍牆被推倒，他成為柏林牆下最後的一名遇難者，而射殺他的東德衛兵英格·亨里奇最終因為殺人罪站在法庭上接受審判。被告的律師辯稱，他們僅僅是服從命令的人，根本沒有選擇的權力，罪不在己。法庭則稱，東德的法律要你殺人，可

是你明知這些逃亡的人是無辜的卻還要殺他，就是有罪。作為警察，不執行上級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無罪的。作為一個心智健全的人，此時此刻，你有把槍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權，這是你應主動承擔的良心義務。於是，柏林法庭判處開槍射殺平民的守衛英格·亨里奇有期徒刑三年零六個月。

如果你只是一個新聞工作者，如果你堅持揭露真相，報導禁區，可能會承擔審查、監控、停職甚至失去自由的風險，「媒體姓黨」使得你無法行使一個新聞工作者正常的工作權利，但你可以做到「我不能夠停止記錄，這是我的最基本的態度。」而真實的記錄也會給未來保存一份完整的歷史，這又何嘗不是公民不服從的一部分呢。

中國的民主事業筆路藍縷，步履維艱，我們付出的代價已經太大，尤其在這萬馬齊喑的時代，我們必將會面臨更嚴峻的考驗，這時候更需要自由戰士們守望相助，拋開派系、圈子之爭，向著共同的大目標努力，這應該也是劉曉波先生「我沒有敵人」的深刻內涵中的一種意思吧。

前路縱然多風雨，有了劉曉波這盞燈塔為我們引路，我們將不會再懼怕黑暗。

2017-11-3

李金芳——河北異議人士，獨立中文筆會女作家委員會委員、林昭紀念獎得主。



# 劉曉波給世界留下了什麼？

謝燕益



劉曉波你是上帝賜予世人的禮物！你出生於一個國家最幽暗、最悖謬的時代，竟以一名教師的身份走進歷史深處！

你的不凡之處在於，以你深知的悲情絕望的人性對抗抽象的烏托邦真理，用一個卑微的血肉之軀對抗這個世界最強大的專制怪獸。你以真實對抗虛妄，到處都是無盡的謊言，你掙扎著要改變什麼？儘管你是絕望的，但是你仍然願意把人性和人道與信仰聯結在一起，儘管這種聯結最初或許由於你高傲的自尊還只是一種被迫和無奈，隨著命運的磨難與逼仄，你的高傲與不凡反而成為你命運的詛咒，儘管你深深知道，生命注定是一場悲劇，你也知道世俗之功無法仰求於上帝，生命與塵世至多只是手段而已，尤其重要的是你的這一信仰並非功利得失的計較，不同於你對待世俗生活的態度，對於信仰的苛刻與冷峻恰恰反映出你對上帝的真誠與虔敬。你的一貫的懷疑精神正體現了你的誠實，你從來無法自欺。你的人世精神、勇擔人道使命的救世情懷乃至犧牲，正是你的信仰狀態的映照，你的誠實終究無法讓你背叛自己。向善的普世價值的信仰情懷，它之所以有價值就是值得像你那樣的人為之犧牲，信仰之所以成為信仰就是讓人不顧一切，即使注定了厄運的結果，仍坦然面對，這是一種必要的代價。你選擇你的信仰，更根本的可能不是你的這一信仰具有的功利導向，因信而得救，為義犧牲而彼岸光明，出於獎賞和懲罰的原因而作出的選擇，更主要可能還是你所信仰的內容本身讓你感受到的道德感，一種真實的愛、至善、

慈悲的召喚，它可能符合人的某種規定性，它是絕對的、無條件的，讓人信服，不因外在因素而改變，這必然與人道使命產生某種聯繫！當你決定踏出這一步時，可能意味著要為此付出一生的代價乃至犧牲生命，歷史最終將如何演繹誰也無法預料，這直接關乎你的信仰了，你被逼迫、被熬煎，向善的普世價值信仰是無條件的絕對的，它不僅超越了世俗的一切功利得失，也注定要超越彼岸的一切利害得失，這個假設沒有人可以給你答案僅管它出於赤誠，沒有任何人、任何歷史給你證明，甚至可能沒有人理解你、理會你，你注定是孤獨的、絕望的，這到底是否會是人的一種虛妄和僭越而應受到相應的責罰呢？你也永遠無法知曉。這注定是一場生命的孤旅和冒險，你的面前是整個世界，假如你對你的信仰篤定不移放下一切之時，你才沒有痛苦。

你用康德式的理性執拗來回應上帝救贖的使命，沒有敵人超越於塵世之上，在這個世間你始終倡導和平民主之路！

你僅僅因為愛自由要有尊嚴的活著，卻最終沒能走出監禁！

你是一個異常敏銳和深刻的人，沒有敵人不僅僅意味著要消解仇恨，而且還說明你深深知道拿你當敵人的根本不配做你的對手，試想一個充滿智慧和愛的人怎麼會把一羣野獸看作仇敵？當你在專制的法庭上講，你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毀掉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你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這段話是把你當作敵人的人根本就無法聽懂的。你想用自己的犧牲喚醒人性最終卻也無法實現。

你不僅僅是一個理想主義政治家，你更主要是一位悲世憫人的人道主義思想家。

你本可以選擇做學問或認真選擇一條信仰之路，可是你並不甘心那樣一種方式，你最終還是做出了一個抉擇走向政治抵抗之路，這或許更能體現一種信仰的選擇、殉道的精神。你可能認為只有行動、承擔、受難、救贖才是你的真道，才是貫徹信仰的最好方式。

如果說過去沒有多少人能懂你，今天的人們已經開始普遍覺醒了，當你離開的時候這片土地萌動起來，由於你作為這片土地的一份子，你的不凡與深刻，你的奮鬥與生命給了這個衰竭絕望的民族一個希望！

你說過的話現在就已產生了回響，你說美從終極意義上來說是悲劇性的（大意）。當你轉身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你什麼也沒留下，只留下了一個悲劇、一份揮之不去的哀傷！但你知道那一定是美的美到了極致！你用你的生命詮釋了美，的確如你說的那樣美得悲壯。你說你是悲觀主義者，你知道假如沒有上帝，生命的存在是沒有意義的，任何世間的功利都不過是一場虛空，而生命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我們在這個世間為自己和我們彼此之間造就一種美，哪怕是悲壯的美，哪怕只是曇花一現，那個瞬間也足以鑄就永恆。而你恰恰是學習文藝美學專業的，你終於把你的政治理想、你和劉霞女士患難與共的愛情以及整個生命造就成為世間一朵凄美悲壯的奇花！

**謝燕益**——北京人權律師，2015年「709事件」被捕律師之一，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被關押，2017年獲取保候審釋放。

# 劉曉波與大海一起托起明天的太陽

王玉民

我是〈零八憲章〉第五批簽署人，簽署時是用的曾用名：王裕民、大連。自 2009 年起因為簽署〈零八憲章〉，我就被「國保」記錄在案，多次被喝茶，所有通訊設備包括電腦全部被監聽至今。

2009 年，劉曉波被一審宣判的那天，我寫了以下文字。曉波你不孤獨——耶穌與你同在，民眾與你同行，天意、民心與你在一起。

2009 年 12 月 25 日是聖誕日，兩千多年前的今天耶穌誕生，兩千多年後的今天，劉曉波——中華民族的驕傲和自豪，中華民族自己的昂山素姬和納爾遜·曼德拉在正義、抗爭、苦難、不屈的刻刀下塑成。中國聖誕日中的故事和歷史，伴著你的景行，增添了悲壯而燦爛、濃墨重彩的一筆。

曉波你不孤獨，無論你在京城還是在天邊，你都是人們心目中向著自由民主之路前進的不倒旗幟；不論你在民間還是在牢房，你都是人們抬頭遠望指引人們通向美好未來的不滅燈塔。

你在為整個民族受難，全民族在為你祈禱。

曉波你不孤獨——人民，廣大民眾的子孫後代，中華民族以及中華民族的苦難而悲壯的歷史不會把你忘記。

曉波你不孤獨，你知道，法庭內雖然只有你一個人，但審判席上的法官為什麼發抖嗎？因為他分明看到，在你身後站立著成千上萬覺醒、憤怒的民眾。他不能不想到，今天的審判必定要報以不遠將來的「因為審判的審判」；你知道，法庭外為什麼軍警密佈、戒備森嚴嗎？因為他們非常清楚地懂得，成千上萬不畏強權的中華兒女與你同行。他們這樣做是因為他們知道，他們對未來的恐懼只能用今天的恐怖來掩飾和壯膽。

在百花廣場可以燒死布魯諾，但無論如何也燒不死人類追求、堅守真理的信念和勇氣。真理的真金在烈火中愈發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布魯諾的精神永遠感動和激勵著世人勇敢前進，推動著地球不斷地運轉。

一個民族，她的精英有多大的道德擔當和勇氣，這個民族就有多大的光明和幸福。無論怎樣，腳下的路都是自己走的。中國乃至世界的歷史證明，當一個民族的邪惡、野蠻戰勝正義、文明的時候，這個民族就要註定下一次地獄。日耳曼民族是這樣，大和魂民族是這樣，俄羅斯和中國也是這樣。所以為了我們自己，為了我們的子孫後代，為了我們的民族，中華民族的每一個人都要責無旁貸、有所擔當、負起責任、盡自己的所能共同把我們深愛著的民族和祖國推向美好未來。

對你受刑十一年，有些好心人說：判一天都過重，別說十一年。而我們更要說：

一天也不該判，判一天中共就有罪。

.....

昨日是劉曉波去世的頭七——7月19日晚8點，全世界嚮往自由、民主、憲政，與劉曉波有共同價值觀和理想的人們祭奠劉曉波時，我在大連星海灣廣場海域拍攝的照片。但從昨日起，我的微博等聯絡信息全部被掐斷，我祭奠劉曉波的圖片也不能在互聯網發出。

我只得今天發給你們，希望讓世人看到民眾對劉曉波的懷念、哀思和尊敬。我也想用我的行動表明、讓大家知道，大連並不是一座死城。



照片配文如下：鎖鏈·空椅子·光明。魔鬼們絕對想到了如果把他埋葬在泥土裏，他一定會是一粒種子。但魔鬼們絕對沒想到，你們把他淹沒在大海裏，他一定會與大海一起托起明天的太陽。

2017年7月20日



# 輓歌篇



# 給劉曉波的輓歌

廖亦武

他死了，這又能改變什麼  
陽光明亮，阿爾卑斯山巔的殘雪在遠方  
如閃爍的魚鱗，他的骨灰被拋向閃爍的大海  
如魚鱗，我們對他的追憶  
也魚鱗般漸行漸遠麼？  
這又能改變什麼，他死了

一本被撕毀的書  
而愛人，是受傷的書籤  
滑落床頭。她注視著他  
她想撲上去喊：「你不要死！親愛的，我不要你死，上帝啊！」  
但她只能默默注視  
如滑落的書籤注視書被撕毀，一頁又一頁

全世界都看著他被謀殺  
囚籠環繞著白衣鬼魂  
這個曾經死也不離開中國的讀書人  
這個四次坐牢的思想犯  
如今說死也要死在西方。聽見了嗎，人們  
如果你聾了，至少還有嘴  
如果你啞了，至少還在看  
如果你瞎了——瞎子會憤怒嗎  
十幾億中國瞎子會憤怒嗎  
這又能改變什麼，他死了

我還在等待他起飛的消息  
成片的鳥在風中哀鳴，那個深夜  
花瓣在落，草在長，妻子和女兒在酣睡  
我是一個幽靈在黑暗中徘徊。他漸漸近了  
身影如彗星劃過天際  
去天堂的航班，有八九六四嗎  
他鬆開妻子的手，叮囑她好好活下去。那是多年以前  
他在天安門，坦克轟鳴，一陣陣槍聲

孩子們成羣結隊倒下，靈魂爬起來  
與他告別。他們叮囑他要活下去  
為了大屠殺的亡靈而好好活下去

這又能改變什麼，他死了  
被共產黨釘在十字架，永恆如耶穌  
在虐殺中復活  
我還在等待他起飛的消息  
等待他寫完最後的情書  
他送妻子到萬里之外，然後埋骨異鄉  
我們會經常去看他。當夜幕低垂  
往事如河流掠過樹梢

但一切都碎了，他沒有自由  
生死，骨灰，愛，都沒有自由  
全世界眼睜睜看著一個高尚的人  
如一本出色的書，被緩緩撕毀  
沒有誰能阻止這無知的暴行  
可誰都希望能阻止！  
這又能改變什麼，親愛的上帝  
他死了

2017年8月11日凌晨

**廖亦武**——僑居德國的中國流亡作家、詩人，獨立中文筆會前理事、榮譽理事，德國書業和平獎等國際獎項得主。



# 再生：致劉曉波

## 唯色

一條河  
在黑暗中的一條無始無終的河……  
如在暗流洶湧但表面靜默的河流上  
你經年不見的形像漸漸明晰：似乎只剩下骨頭  
似乎這嶙峋的骨頭也會發聲  
除了聾的或佯裝聾的——空心人、偽善者、劊子手  
——充耳不聞  
你寧折不彎的骨頭，卻比依然翕動的雙唇  
更響亮地發聲  
更永恆  
而我佇立著，雙手合十  
如遙望見在這過於靜默的河流上  
你漂向彼岸  
向死而生

2017年7月13日的北京深夜

原載 RFA

**唯色**——北京藏人詩人、作家，藏名全稱茨仁唯色（Tsering Woeser），漢名程文薩，獨立中文筆會林昭紀念獎、國際婦女傳媒基金會新聞勇氣獎、美國國務院國際婦女勇氣獎等諸多國際獎得主。



# 好兄長，為什麼要去死呢？

——仿《劉曉波：親愛的，我的小狗死了

——給小手指》

杜導斌



好兄長，你怎麼就死了  
連招呼也不打一個  
就死在專制的恐懼裏  
死在精於算計的監獄中

你喊我導斌的聲音猶在耳邊  
你是我面臨歧路時看到背影的先行者  
你給予我的掌聲和歡笑  
深深地刻印在我腦海中

那個下午，冷不丁看到你病危的消息  
馬上就想買張機票  
到沈陽病床邊去看你  
摟住你，溫暖你病弱的身子

這念頭只有零點一秒鐘  
就被鐵拳擊碎  
我最親愛的親切的親密的好兄長死了  
我連在遺體前低頭祈禱都不行

你的肝被浸了蛇毒的陰謀吞蝕  
你自由的思想被送進火爐焚燒  
曾經是結巴卻結實的兄長  
被撒在太平洋冰冷的海水中

我最親愛的親切的親密的好兄長死了  
連招呼都不打一個就從此永別  
面對這陰險殘酷的世界  
我還是不相信這會是真的

還沒兌現見上一面的心願，你為什麼要去死  
哪裏不好去，為什麼要回國  
這是個虎狼橫行之地  
什麼罪惡都會發生，你怎麼不相信呢

2017.11.14 詩成，淚流滿面。2017.12.16 修改定稿

**杜導斌**——湖北著名網絡作家，獨立中文筆會理事、獄中作家獎得主，曾因網絡文章被加以「煽動顛覆國家罪」監禁三年。

# 悼曉波（外一首）

徐琳

原以為，十一年  
不過是彈指一揮間  
對於偉大的修行者  
那只是一個小小的考驗  
但魔鬼們更清楚  
它們的末日已不遠  
你不用坐滿十一年  
就能夠邁出牢監  
於是早就暗下黑手

要阻止你雄風再現  
你終究抵不住殘害  
在修行的第八個年頭  
化作了聖賢  
你說你沒有敵人  
那是因為  
你崇高的思想境界裏  
容不下一絲雜念

2017.7.14



## 我該如何挽救——致劉曉波

該走的時候  
你偏不走  
硬要在這片土地上  
栽種自由  
縱然被以無端的罪名  
打入牢囚  
依然創造出  
那一份不朽

不該走的時候  
你卻要走了  
潛心培育的果實  
就快要成熟  
縱然你毅力超凡

終究熬不過百般躑躅  
你說你沒有敵人  
他們卻不肯罷休

我該如何  
把你挽救  
我千里迢迢而來  
卻抓不住你的手  
我該如何  
把你挽救  
用我的熱血  
還是震天的怒吼？

2017.7.11

徐琳——廣東建築師，網絡作家，歌詞作者，獨立中文筆會會員；因與他人合作創作維權歌曲，於2017年9月26日以「涉嫌尋釁滋事」被拘留至今。

# 名字離去之後的井

——紀念一位遠去的詩人

子抗

殉道者的名字躺著離去  
騰出一間沒有窗戶的房間  
一間頂部開敞的房間  
一口看不到底的井

沒有人聽說過井裏的名字  
如果二十歲沒聽見過  
就再也聽不見，也聽不懂  
那是震耳欲聾的靜音

那個沒有敵人的人走了  
那個被當作敵人的人走了  
他已經化成煙，飄出井口  
不用再為那個名字擔心

他成功地從太平洋非法越境  
到達那把空的椅子  
井底會出現下一個名字  
連一把椅子也沒有的人

2017-7-14

子抗——廣東詩人，獨立中文筆會會員。



# 中國的路標（外一首）

——致劉曉波會友

李詠勝

**題記：**本來此詩是由於2008年劉曉波因言獲罪而寫下的，但今天，由於劉曉波正以蘇格拉底的受難方式——「為民主的內傷而伏法」時，卻受到了不民主的致命痛擊：「被晚期肝癌」。故此，我與他同為獨立中文筆會會友，豈能不為他的蒙冤受難而長歌當哭，又豈能不為他的道成肉身而額手謳歌呢！於是，特將此舊作稍作修改，以彰顯我對他由衷的崇高敬意。雖然此時的我，正處於與他同病相憐狀態之中。

雪夜一般地  
矗立在光明與黑暗的交界處  
用雪夜一般的身軀  
雪夜一般的語言  
把幾千年的黑暗  
只身擋在後面  
光明  
在你的眼前延伸著延伸著  
黃土地  
在你的腳下緊緊沾連



李詠勝（中）和蔡楚（右）

也許你的形像，真是夠冷漠的  
無論對什麼樣的過客  
都一樣  
板著一張無情無義的臉好似你的冷漠  
是由於太多太多的恨  
豢養出來的  
但其實呢，它卻是  
你步入內心沒有敵人之境時  
閃耀出來的光輝  
因而，堅守住它  
就是價值連國的价值

於是，你就這樣  
冷漠地站立在自己的位置上以身為旗  
以骨為林  
指引著中國  
走向憲政民主的方向  
於是，你就這樣  
冷漠地站立在自己的位置上  
和珠峰一樣  
和太陽一樣  
冷漠地表達出  
你對這片熱土的大愛無疆

# 我們植叫劉曉波的樹

陽春三月  
是植樹的好時節  
幾千年來中國人  
把善良的種子  
種進龜裂的土地  
夢想會有「包青天」  
再生轉世  
殊不知率土之濱  
長出的都是貪官污吏

明天又是陽春三月  
我們植樹去  
只是不再種植迷信  
也不再種植幻想  
而是把民主、自由的理念

和著人性的尊嚴  
一塊兒種植下去  
再用寬容之心呵護  
讓它長成一片防護林  
而後，把權力的腐敗和任性  
擋在後面  
而後讓民主、法治和人權  
在人人心中  
習慣成自然  
而後成為陽光  
成為空氣  
成為糧食  
成為一種誰也離不開的生存方式

原載《北京之春》2009年3月號  
改於2017.7.1

**李詠勝**——四川詩人、編輯、編劇，獨立中文筆會會員，2017年10月4日病逝。

# 追憶篇



# 劉曉波把激進煎熬成溫和

蘇曉康



從「中國要當三百年殖民地」，到「我沒有敵人」，此間距離多少、又如何丈量？這既是從文化到政治的距離，從尼采到甘地的距離，也是從叛逆、狂妄、目空一切，到自省、謙卑、甘下地獄的距離。

劉曉波因「文化激進」而備受批評，又因「政治溫和」而同樣備受指責，受「兩面夾擊」如是者，在中國又曾有誰？

從六四清晨在大軍環伺的槍口下帶出廣場抗議學生，到身繫牢獄贏得諾貝爾和平獎，劉曉波二十年換了一個人，雖依舊桀驁不馴，但他已然有了一副溫和心腸。

## 「文化熱」尾聲的黑馬

大約八八年夏秋之交，我與劉東合作構思《五四》電視片大綱，他是李澤厚的博士生，為「師道尊嚴」而下戰書給劉曉波，約在社科院研究生院禮堂辯論。我未前去觀戰，事後聽說雙方打了個平手，但坊間說法是兩人皆稍微口吃，論戰因此而精彩。這可算是八十年代「文化熱」的尾聲花絮，而以「黑馬」之稱鵲起，劉曉波幾乎就是一個「憤青」的始作俑者。

歷盡變窮、地蠻天荒之後的八十年代，「文化」忽然風靡起來，各路神仙皆不免「語不驚人死不休」，據稱《河殤》對此「集大成」，鞭笞傳統，謳歌西化，驚動海內外。未料劉曉波竟嗤之以鼻，他說：

「《河殤》在解說詞和畫面的背後，蘊含了中國人幾千年的虛榮心，它不是徹底承認中國落伍。比如一開始的舞龍場面，拍得激昂，很有力量，如果我拍的話，我會拍出中國人如何的萎縮，軟弱和『操蛋』，而不加一句解說。但《河殤》潛在的意思還是在說中國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中國人百分之九十九的萎靡狀態和那些畫面表現的精神狀態差得太遠了。我在〈新時期文學的危機〉一文中，曾指出中國人從肉體到精神統統陽痿！」

港臺及歐美的中國學者曾一致指出《河殤》文化上的激進傾向，但劉曉波更激進：

「我承認我對中國文化的研究，最後走投無路，如果你把問題歸結為政治腐敗，再及文化腐敗，就會問：為什麼孔子的思想能統治中國這麼多年，至今陰魂不散？我沒法回答。我說過可能與人種有關。我絕不認為中國的落伍是幾個昏君造成的，而是每個人造成的，因為制度是人創造的，中國的所有悲劇，都是中國人自編自導自演和自我欣賞的，不要埋怨別人……」

以上兩段文字，皆引自 1988 年 11 月香港《解放月報》（開放雜誌前身）主編金鐘對他的專訪，那堪稱驚世駭俗的一席談，其狂妄姿態，令雄歎悲放的《河殤》相形見绌，其中最著名的，便是他的名句「中國需要殖民地三百年——假如中國八十年代只許選幾句經典之語，絕對不能少了這一句。」

劉曉波的「黑馬」身影，帶有尼采、福柯、薩特這一路的叛逆底色，雖然他是後來坐牢才開始讀尼采，「第一次讀福柯是 1994 年，他的《癲狂與文明》和《規訓與懲罰》動人心魄，就連很少看理論書的妻子，也在我的朗讀中進入了凝神狀態」，而他的閱讀毋寧也在清理自己的偏激。照余英時梳理的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化脈絡，其間最為激昂的身影是譚嗣同，他一只腳還站在坍塌的傳統廢墟裏。在他身後，反傳統的後代們，是連傳統的邊都沾不上了，支持意識唯有來自西方，劉曉波之醉心福柯（批判權力），於此可見一斑。

「文化」熱到八八年底已經熱不去了，或者說「熱」出了政治瘡疾，否則劉曉波定會有更驚世的文化豪舉。不過「文化」的退場，恰好將已經熱身而躍躍欲試的文學博士劉曉波，送進另一個沙場，他在那裏竟一發不可收拾，幾度生死……。

### 飛蛾撲火，火中取栗

米涅的《法國革命史》認為，一個專制恰好是在它最願意改革的時候，引發了革命。這頗可以拿來映照 1989 年的中國。不過中國當時還有另一個特點：大眾最不恐懼的時候，恰好是知識份子最謹慎萎靡之際，那大概是厭倦革命、畏懼政治、希冀和平演變的一種綜合癥。風雲驟起於首都最龐大的一個政治空間，那裏曾是各種革命妖魔狂舞之地，飄蕩著醉人的死魂靈。學生們使性子要跟共產黨死磕，「長鬍子」的知識界卻整體是個「政治唐氏綜合癥」（先天愚型兒），在旁邊又哄又勸，就是不肯跟娃兒們「躺在一條戰壕裏」。這當口兒，劉曉波飛蛾撲火似的從紐約趕回北京，二話不說就「躺」進學生堆裏去了，雖然他遭到「起哄」「作秀」的痛罵——這麼一個簡單的動作，當時整個「精英」階層做不出來，可見被毛澤東「運動羣眾」整怕了的文人，也幹不來「民主」。

劉曉波沒有「精英」身段還在其次，他懂得向學生運動謀求一個平等的「資格」，

這個資格使得他十幾天後，得以在野戰軍濫施坦克機槍，沿西長安街一路殺來圍住廣場後，在那肅殺的黎明中，說服幾千學生接受他跟「殺戮機器」的談判，隨他撤出廣場。

這是八九學運期間無數次談判中唯一成功的一次。劉曉波不僅火中取栗地救出已然迷狂的學生，也替鄧小平楊尚昆避免了在他們那座「英雄紀念碑」底下施行一次大屠殺。這一善舉，照中國話說，是大積陰德，大概也值半個「諾貝爾和平獎」吧。

當時沒人給劉曉波記這個功德，中共反而逮捕他——此人化解廣場殺戮於千鈞一髮之間，一定要借他的嘴巴來告訴全世界，北京沒有殺人。我不知道劉曉波是否可以寧死不從，但他真的沒有看見廣場殺人，「血流成河」在西長安街上，他該怎麼說？他借了他的嘴巴給屠殺者，由此受難者不饒恕他，由此他懺悔不已。然而，歷史暫時做不出裁判的這樁公案，徹底翻轉了劉曉波。他的狂妄從此一路折損下去，謙和於是乘虛而入。

他那張嘴巴也習慣了左右開弓，出了監獄就「獨白」，痛罵他救過的學生——「1976年之後，共產主義信仰所強加於中國人的道德秩序的坍塌所導致的全面道德崩潰，也表現在八九抗議運動時期的沸騰的天安門廣場，令人難以忍受的髒亂就是最好的示範。革命了，造反了，絕食了，就可以不要最起碼的道德規範了……廣場上的每一平方米的空間都有垃圾，……廣場上的另一大特點就是驚人的浪費……有的學生真的認為自己參加了絕食，全世界的人都欠他點什麼……我恨這些學生，也恨我自己……活該！誰讓我想沽名釣譽呢。寫到此，我感到手中的筆在發抖。」（《末日倖存者的獨白》）

### 與受難者相守

劉曉波的「道德憤怒」，遭來了世人對他更大的「道德指控」。他總是憑直覺罵人，動作也總是太離譜。在中國人的判斷裏，直到今天對他還是只用一把「道德尺度」。因此，中國不僅知識界是「政治弱智」，社會大眾也是「道德幼稚」。

劉曉波只會一種謙卑：面對亡靈。那亡靈只有十七歲。十七歲是一個象徵。象徵著死去的無辜、活著的懦弱、權力的暴虐。

我沒有資格和勇氣  
 奉著一束鮮花和一首詩  
 走到十七歲的微笑前  
 儘管我知道  
 十七歲沒有任何抱怨  
 ……  
 超越了年齡  
 超越了死亡  
 十七歲  
 已經永恆。」  
 （〈給十七歲〉長詩節錄）

〈給十七歲〉叫人第一次看到一個謙卑的劉曉波。1991年他出獄後去看望丁子霖夫婦，「既作為學生，又作為身背負罪感的晚輩」，他一見蔣捷連的骨灰盒，「就扭身告退出外，半個小時後，他手捧一束鮮花來到連兒靈前，一下子就哭倒在地……」。1999年除夕，他第二次出獄後又去拜訪丁蔣二人，得到一份一百五十五名死難者的《尋訪實錄》，劉「一進家門，連口水都沒顧得上喝，就迫不急待地翻開〈見證屠殺尋找正義〉讀起來，從讀第一頁開始，我的眼睛就濕了。我是在淚水中念給劉霞聽的，幾乎每讀一小段都要因哽咽而中斷，我已記不清中斷了多少次，每一次中斷時的沉默都有死一樣的寂靜，都能聽到亡靈們在地下發出的冤哭，那麼微弱、那麼無助、那麼撕心裂肺。」（〈來自墳墓的震撼〉）

中國言論箝制、資訊封閉，即便產生一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其業績和成長背景的資料，也必定付之闕如。描繪劉曉波的文字很少，其中丁子霖蔣培坤的〈我們與劉曉波的相識、相知與相交〉，是極難得的一文，寫出了有血有肉的一個劉曉波。

我發現，在他們筆下，反傳統激烈得幾無二人的這位「黑馬」，其實為人蠻傳統，他對丁蔣口口聲聲「二老」，他也很在乎那些亡靈們大多數都還是孩子，他懺悔「我這十年來，時時被負罪感所困擾。在秦城監獄我出賣了亡靈們的血，寫了悔罪書。」這種人道心靈，在中國便是「老人所老，幼人所幼」，而人命比天大，更是很西方的。

他一次次的坐牢，死也不肯出國流亡，與其說是要陪伴那些受難的母親們，不如說是要陪伴亡靈；而他為此付出的代價，實不足為外人道也。〈零八憲章〉發表前，劉曉波常在 Skype 上和我聊天，有一次他講了一件剛發生的事情：他所居住地段的派出所，經常無端騷擾、搜查甚至拘禁他，但他還是儘量跟那個所長交朋友，雖然此人很無賴，最近故意來尋釁，帶了幾個大漢，劈頭蓋臉就毆打他，又押回派出所關押了十幾個小時，劉曉波回家後氣憤難忍要上告，這個所長又跑到家裏來給他下跪求饒。這個細節講的是折磨（皮肉和心理），我也聽出來一種地獄裏的凌辱氣氛。監獄並不能折磨劉曉波，他會在那裏面跟福柯、薩特遨遊，出了監獄他反而要受煎熬，因為他面對了亡靈。難怪他一聽到獲獎消息，會脫口而出：「這個獎首先是給六四亡靈的。」

### 劉曉波的成熟

劉曉波被判重刑後，高瑜介紹說：「曉波自辯中有這樣一句話：『二十年來，支持我、給我力量的是劉霞的愛。』捷克駐華使館的女公使聽到後感動得哭了。劉曉波法庭陳述得以表述的最後一句話是：『希望我是中國最後一個因言獲罪的人。』」。

這一幕，讓我聯想到哈維爾在獄中寫給妻子的第十三封信：「親愛的奧爾嘉：我現在還沉浸在你昨天來看望的回憶中。和往常一樣，這對我是一劑強心劑，或者如牢裏說的，『一筒』（指監獄給犯人打藥）。但這次你肯定覺得我多少有點心不在焉，有些尷尬和惶惑……實際上我的內心很沉靜。你所說的一切我都仔細聽了，我對你講的一切都很感興趣。你說的每句話我都記住了，而且事後在心裏回味了好久……」。

曉波被捕一年的那些日子裏，官方一直在尋找判決他的最佳時機，外界也猜測紛紜。我很受不了這樣的一種等待，有點覺得被污濁政治所戲弄，於是找出一本書來讀，以蕩滌內心的難過，這本書就是《獄中書——致妻子奧爾嘉》。我讀著這本書，

也嘗試找感覺給曉波和劉霞寫點什麼。

曉波陳述的最後那句話，再一次讓我感覺到他的成熟——雖然二十年來我一直可以點點滴滴地感知這匹「黑馬」的成熟，但這一次是震撼性的。私下裏我對朋友說，曉波有自我犧牲的傾向，一直有當一個譚嗣同的衝動，我是不贊成的，我實在很不願意他去坐牢，他是這些年極少有的成熟了異議份子，各方面都成熟了，卻要白白地去坐牢，外面卻無成熟的領袖，亂哄哄的，潰不成軍；我也很痛惜劉霞，那麼好的一個姑娘……。

我見證曉波的成熟，只是通過文字。我編輯他的文章，眼看著他的汪洋恣意漸漸消退，冰潔堅韌的邏輯力量和理性精神，也漸漸昇華起來，那是這二十年裏國內知識界一派賣弄、掉書袋風氣中，一股罕見的涓涓清流。曉波從來不缺自信，他就是太自信了，睨視羣小的那股勁兒總也克制不住。他是從看不起學術界，走向看不起政界的，可是跟無恥文人打交道，完全不同於跟無恥政客打交道，那還是個不管身後洪水滔天的政權。

相反，他走向政治，又是出於一種敬畏，他敬畏「六四」死難者和「天安門母親」——我這樣猜測。說到敬畏，就帶出另一種東西：恐懼。曉波寫過一篇文章〈超越始於恐懼〉，承認恐懼，並進一步論證人類為了擺脫恐懼，才去超越的，沒有恐懼，人類就只能平庸。那篇文字很短，卻試圖闡明一個很艱深的問題。

中華民族自「六四」後真是被恐懼魔住了。這也不奇怪，經歷過餓死四千萬人的「人相食」式的大饑荒、歷時十年全民廝殺的文革，還有更早的鎮反、肅反、反右、「四清」等等，這個民族早就嚇破了膽，而長安街鎮壓（坦克、達姆彈）還是前三十年沒有露過面的殺手鐮，當然具有震懾作用。如今這個「喪魂失魄」的民族什麼都有了，就是沒有「膽」。這一點，正是劉曉波存在的歷史意義。那塊土地上中國快十四億人了，不能只出楊振寧、錢學森、余秋雨，現在出了劉曉波這麼個「有種的」，也算這個民族有救了。你瞧他說得又是那麼藐視一切：

「我更欣賞虛幻信仰崩潰後的絕處逢生，欣賞那種面對廢墟的樂觀抗爭。」

這毋寧是對近二十年他自身姿態的描述。極具張力的是，這一次他的狂狷，卻走了一條最溫和保守的非暴力抗爭路線。他不顧一切的反對激進、流血。他也在深仇大恨瀰漫的一個社會中，很費力地劃出所謂「灰色地帶」，希望預留出跟體制對話的空間。他跟張祖樺一起，就像林培瑞教授所解讀的，採用最普世的語言，如捷克〈七七憲章〉、法國大革命〈人權宣言〉、《美國憲法》、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甚至八零年代初臺灣「美麗島」黨外人士理念等等，撰寫發表了一個屬於全人類的〈零八憲章〉。

然而，政治現實的嚴酷，和民間的愚鈍，乃至國際間的勢利，卻讓曉波承受了代價最大的後果，中國稚嫩的溫和幼苗著實被嘲諷，而這個國度已經激進並暴力迴圈了百年；甚至挪威仗義執言，以「諾貝爾和平」精神褒獎了他，經濟強大的中國也對這個北歐小國狂施報復。在劉曉波個案上，人類精神赤裸裸地被物質力量所羞辱，這也是可以載入史冊的！

國事已荒涼，民族在鼾睡，而且還在夢裏咬牙切齒。今天不論是「〇〇後」還是「QQ羣」，鮮有幾人還知道劉曉波這個人了。中國歷史斷鏈，記憶破碎，屢試不

爽，又豈止這一次？這個文明難以積累精神遺產，卻能輕易創造令世界驚豔的物欲奇跡。相比之下，劉曉波的思想，是太前衛了一點，由此加諸於他的折磨，首先不是牢獄之苦，而是精神寂寞。在未來和道義上，曉波早已戰勝了中共；但是他並未贏得世俗大眾（fight the crowd），因此他在「民主政治」上輸了這一局。這是他的宿命。中國政治尚在前現代，玩的還是叢林法則，他贏的機率本來就是零。

但是，我們回眸往昔，僅只短促的半個世紀裏，中國的殺戮、饑餓、整肅，完全發生在國際視野之外，又有多少先驅者屍骨無存，姓名湮沒；即便是曾經驚世駭俗，名震宇內的先覺者，如劉賓雁、方勵之等，甚至近年才「考古」出來的烈女林昭，又何曾為國際社會所知，榮獲過什麼讚譽？乃至中國人再三地呼喚「中國的薩哈羅夫」。在這個意義上，曉波又是幸運的。他第一次將中國人的抗爭，提升到了「普世記憶」（universal memory）的層次。他哪來的寂寞呢？他比他的前輩們少付了太多的代價，而他所肩負的責任也前所未有的。他還年輕。

### 桂冠還是十字架？

諾貝爾和平獎據說是「天王級」。中國的八零後們獲悉很興奮，但他們不知道劉曉波是誰，「他一定是個好黨員、好幹部、為人民做實事的好領導」（《時代》週刊）；海內外也有不小的反對聲音——以劉曉波的巨大爭議性，對他沒有疑義反而不正常了。

我不敢預期劉曉波獲獎對中國現實政治能有多少觸動。中國人的驚喜帶有很大的豔羨成分，甚至還會參雜「民族自豪感」，卻很少有人真懂奧斯陸的意思。這個情勢，反而叫得主背負了沉重的榮譽債。

劉曉波還在牢裏，已經承荷了國際社會與中國民間的巨大期望，他能做什麼呢？國際層面比較複雜，此處無法深論，反正西方還得跟中國做生意，投資也暫時沒有更好的去處。中國自身則困境已深，政治惡臭，人心塌散，積極的有組織力量在哪裡？

從諾貝爾和平獎的單純視角去看，中共二十年的高增長、高腐敗、高壓制，不期然地打壓出一位「長期非暴力抗爭」（諾獎公告）的和平獎得主；與此同時，民間抗暴運動伴以強烈的造反意識，已呈星火燎原之勢，而漸進、溫和、對話的非暴力理念，也快速地被人們棄之敝屣。據公安部的數據，1993 年全國抗議事件是八千七百起，到 2008 年已增至十二萬起。此暴漲的情勢，一方面使中共「維穩」的財政支出與國防開支不相上下，另一方面則使民間從期盼「陳勝吳廣」，轉而直接呼喚「辛亥革命」，而凡是主張「和平轉型」的人，一概被斥為「非暴力合作派」、「保共改良派」，在此社會氛圍下出籠的〈零八憲章〉倍受攻擊，被扣上「投降主義思想路線」的帽子。劉曉波榮膺大獎之際，也面臨了更艱難的使命。

丁子霖曾勸劉曉波搞研究著書立說，少寫「惹人生厭」的時評，他答之曰「我回不到過去了」，又戲稱要為劉霞攢下一筆稿費，萬一再坐牢的話。其實他想靠網路時評，在中國播撒一點理性、中道、非暴力的思想種子。經歷了天安門屠殺後的悲涼歲月，目睹了母親們喪子的刻骨哀痛，劉曉波不僅滌淨了自己的傲慢心態和激進情緒，也從學理上釐清了漸進、和平轉型對中國社會整體利益的合理性。他沒有白讀博士，哲學的底子幫他很乾淨通俗地講他的理念，雖然一時尚曲高和寡。

在一定意義上，2010 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早在 1989 年春北京的沸騰廣場、血沃

長街就應驗了。天安門學子滿腔報國之心，被機槍坦克碾碎之際，啟動了共產主義陣營大坍塌的骨牌效應，「八九」一代卻抱憾飲恨至今，終於劉曉波代表著他們的理想和叛逆，登上諾貝爾的殿堂；再深一層說，推選劉曉波的，也不是現世的人們，而是倒在長安街上的亡靈們，他們要讓這位前「黑馬」代表他們，來告訴這個世界，殺人不是政治，只是獸行；反殺回去，又在重複獸行。中國要爭取講道理的那一天。

**蘇曉康**——旅美華裔作家，前《民主中國》月刊主編。



# 我期待一場盛大的告別

## ——我的校友劉曉波百日祭

艾曉明

—

這篇文章如此難寫，我已經推遲了很久。但推遲並不輕鬆，每天我都在想，假如能夠不寫，我就放下了這個負擔。但沒有寫下一點文字，我覺得對不起曉波，有很多的負疚感。

日子尋常，那些焦灼、酷熱的等待和炎夏一起退去。你的骨灰沉入大海，匯入冰洋；到哪里去找那個沉墜的陶罐，從而發現你何時開始被肝癌的軌跡？智利導演帕特里克·古茲曼拍過一部紀錄片，從海邊打撈的一顆珍珠鈕扣，尋訪出政治迫害失蹤者當年被獨裁者飛機拋屍入海的秘史；而你的死亡終旅，表面上並無秘密。十幾天裏醫院每日發佈一個囚犯的危情通報，這破天荒的臨終關懷真誠又詭異。隨著你的生死掙扎，我們的記憶、責任和悲情被調度，終於再度窒息於合攏的鐵幕裏。

我們被迫習慣於苟活，活在恥辱中，活在笑話中，活在被強姦、被通姦或順姦的過程中。當異見者被隔絕，只有穩控專班或者不穿警服的便衣客服經常與之言笑晏晏，那就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癥見效的時刻。強姦變成順姦，變成同謀共犯，施害和受害共存於無是非原則的禮節寬待中，這種恥辱深深地刻入我們的生命。我說我們也許不確切，但至少不會是我一個人的獨特經歷。

我怎能無愧地寫下你的名字，甚至呼出你的名字？我不配。猶如幾個月前境外的友人所斥責：當他被監禁，已經監禁了接近九年，你們這些所謂的朋友在哪里？問得好，我們，第一批在零八憲章上簽名的好幾百人，在哪里？做鳥獸散了嗎？



## 二

你是我的校友，但我們幾乎也是熟悉的陌生人。

1985年春天，我到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攻讀博士學位，我的專業是中國現代文學。從外省來到北京，那時的我，循規蹈矩，算個好學生。我的師兄王富仁教授已是導師組成員，我們共同師承李何林先生。那是人們用極左和自由化評斷是非的年代，在自由思潮激蕩的的校園，常有各種名師講座。學生們擠滿教室，站在座位中間的臺階上，圍在教室外的窗旁聽富仁兄激情洋溢的魯迅研究。

那時你已經是中文系的留校教師，你研讀的博士專業是文藝學。我們之間少有交集，但你的名聲如日中天。那時我一點也不理解你為什麼會挑戰當時的學術權威李澤厚或劉再復，我以為我的專業在現代歷史，不想也沒有能力介入到當代文壇火熱的紛爭。

我們只有一次交談，是在1985年深圳的比較文學會期間。與會的年輕人晚上在咖啡廳跳舞，交流去沙頭角買絲襪的資訊。我偶然和你同桌就餐，你說你去坐了過山車，好刺激。

這點閑篇兒在你的生活中實在是無足輕重的細微末節，也足以說明我們的交往多麼稀少。你在校園裏有自己的家，我們這些來自外省的研究生住十二樓，我們努力吸取京城的開放空氣，騎著自行車在校內外圖書館奔走，到新街口的電影資料館看外國片，親耳聆聽名師指點，感覺到身處學術中心的優越，享受自由的特權。北京真是一座讓人來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我們先後畢業，我也留在北京任教；不久就是那個沸騰的夏天。某個下午，我去找富仁兄，得知他帶著被子去了廣場。他或許是想勸學生返校，或許是為對抗大軍進城。對此，我的記憶已經模糊。戒嚴令已下，成千上萬的人接連數日上街抗命。我參加了遊行，攝像機鏡頭在我們隊伍前面不斷閃燈。隔日，我騎著自行車去廣場，想找大師兄王富仁，人流洶湧，根本無法靠近紀念碑。那時我不知道你正在走向自己的命運，你就在廣場中心。

後來是屠殺、抓捕和大清洗，你成了罪惡黑手。那些日子過去很久，我們在抗辯和妥協的夾縫中倖存下來。我沒有看過你在電視上的證言，那些日子，我們內心的憤怒和悲哀被一再壓抑。我們等待，嘲笑，覺得這一切的倒退如此不真實：怎麼可以這樣？現實如此無理，不可信。但沒有逃亡、去國的人們，努力在政治清洗中生存下來；不想失去已有的東西：教職、工作，所有賴以生存的條件。

然後在九十年代的某日下午，我在校園宿舍的樓道裏和你擦身而過。此時你已經從第一次囚禁中獲釋，你去我們學校一位同樣有廣場經歷的教師家吃飯。我猛然認出你，就打了聲招呼：啊，曉波，你好。僅此而已，我轉身回家，生活中未有一絲漣漪。

就是這樣，北京上百萬人上街，無數的知識份子、無數名家學者教授藝術家、各大中央級機構……在風暴後沉默下來，讓生活繼續。

## 三

那時的我，從未想到我們可以是如此的朋友，在你生命的最後時刻，僅有四位

校友站出來呼籲：讓劉曉波自由！

我們和你有著共同的求學紐帶，我們以此表明情誼相依，生死不絕。百年老校，你的校友堪稱千千萬萬；在你彌留之際，卻只有我們寥寥四人向所有校友呼籲。我們中我和郭於華都是大學教授，文濤曾是新聞記者，我們全都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為了不給另一位在職教授帶來麻煩，這裏暫時略去名字）。

在回憶中，我和你開始走近，是在離校、離京多年以後。可能是在 2008 年，我們都用 Skype；看到對方線上，我們互通問候。我給你寄了我的紀錄片：《太石村》、《中原紀事》等。有一次我們還語音通話了，記得你問過我一個問題，你說：你怎麼能承受那麼多痛苦？

這句話真是我要問你的問題。在你去世以後，我讀到你的一些時評、你的獄中詩篇。我覺得，你那樣謙卑、堅韌和認真地履行了思想者的道德責任：把一個民族、一場社會變革的艱難痛苦扛起。你完全不像八十年代那個張揚跋扈、桀驁不馴的青年了。

作為拍片的人，何嘗真的承擔了多少痛苦。我們只是痛苦的旁觀者或者拾穗人，激起共鳴的是媒介的力量。這種媒介傳達出被訪人的喜怒哀樂，我們僭取了屬於他們的榮譽。

把你我距離拉近的不僅是互聯網，更重要的是社會運動的興起和觀念變革。以前的我，從未覺得政治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猶如王小波在回憶中說過，我們的家訓是不學文科。

不學文科，意思是遠離政治。我們的父輩在五十年代之後的政治運動中屢受打擊，他們希望傳承的教訓就是逃避。我們的政治權利從童年家教中就被抹除了。記得童年時小學裏也要發展民兵，要解放臺灣。老師們在飯桌上高談闊論參加民兵，練習射擊。我對作為小學副校長的父親說，我也想打槍；父親怒喝一聲：關你屁事！

父親希望我們兒女接受階級歧視，遠離政治異議。遠離的做法就是緊跟黨走，但這不免成為一個悖論，因為黨和發動政治鬥爭密不可分。經過文革、平反冤假錯案，我們長大成人，學會了懷疑和與政治保持距離。好不容易回到個人立場，我從沒意識到在獨立學術的外衣下也隱藏著自動放棄政治責任。要到多年以後，我才會去反思，這種政治冷漠癥同時也是權利意識殘疾，有違作為知識份子的道義良知。父輩的教訓——與政治保持距離，固然可能倖存於難；但讓渡公民與政治權利無法讓我們擺脫政治難民的命運。

我在你的有關回憶和詩篇中，看到我們父輩共同的背影。也許你的家庭要更幸運一些（或亦更不幸）？你那樣義無反顧地投入到政治運動，必有一顆赤子之心。好吧，這個可以被黑成「野心」，你自己也對此多有苛責；可是，有心會比在大悲劇中不動聲色更壞嗎？在政治高危的現實中投入社會運動，得有多少對公義和公眾的信賴，這可不正是理想主義嗎？

而那時的我，還記得文革中的集體狂熱，對政治和社會行動多少有點出自個人主義的抵觸。這可能還受到我正在熱讀的昆德拉小說的影響，我沒有努力進入廣場政治。但是，如果機緣湊巧，誰又能保證一定不會被裹挾捲入呢？現在想來，更有效的阻力其實是來自恐懼。我身邊好多成年人，在表達了正義感後，順勢而退，不

會走到更激進的一步。我們內心深處有一個強大的糾結：我們不相信軍隊會殺人/我們相信軍隊一定會殺人。不相信，是合於意識形態教育的表述；相信，則是經驗的回聲。我們無法依賴理性，又無法回避經驗；二者之間，我去了廣場，想找到我們的學生，我想勸阻他們：趕快回校，別再堅持。

如果事情發生在今天？我會怎麼做？像你一樣，站在廣場學生中間，和軍隊交涉，把幾千學生帶出廣場？像後來被抓被打的北京義民，堵軍車，搶救傷患？像千里迢迢直奔金水河下的義士，以二十年牢獄的代價張貼：五千年專制到此告一段落，個人崇拜從今可以休矣？或者，像天安門母親運動中的親人們撫靈長哭，哀痛至死？

應該是回到源頭，讓這一切都不必發生：沒有專制和個人崇拜，轉向民主和開放社會，讓為人父母者再也不必傳授不學文科、不問政治的家訓，讓孩子們擺脫政治冷漠的殘疾，而天然地享有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

#### 四

我 1994 年離開北京，此前我們曾在樓道上擦肩而過。2008 年秋，也許是 9 月間，我們終於見面交談。在北京海澱一個普通的餐館，你還約了張祖樺、余杰，印象中還有莫少平律師。這是我們一生中惟一的一次堪稱交談的見面，誰能想到，這也是最後一次！

那時我們已經在 Skype 上傳閱過〈零八憲章〉，我看到憲章草稿，記得還對有關措辭提過修改建議。那幾年已經有很多有關政治權利的簽名，我們更早的政治參與，則始於 2003 年為孫志剛遇害案的呼籲。政府決定廢除收容遣送制度，激勵了我們想像公民運動的樂觀前景。

那些年，我在南方教學，拍片；你在北方寫作，探討社會轉型。你以你犀利的文風，進入有關中國政改、人權和憲政民主路徑的討論。你對體制內的異見知識份子抱有很多希望，你一點也沒有抱怨命運不公：你被監禁數年，失去一切保障；而你的同學、校友平步升入體制內的優異階層，頂有學科帶頭人、教授博導等耀眼桂冠。當然，你所遭遇的黑暗和敵意，最終是會降臨到這些人身上的；但在那幾年，共同的理想讓我們同道而行。

2008 年 12 月國際人權日，〈零八憲章〉公開了。我和其他三百多人一起簽署了這份文書，但它成為你十一年牢獄之災的原因，卻是我不曾料及。你失去自由。這件事變成一樁政治要案，眾多連署人遭遇調查訊問；但沒有人比你失去得更多。在一份公開聲明中，有一百六十五位憲章簽署人聯名表示：我們願與劉曉波共同承擔責任；我也參與了簽名。再過一年，你被判刑十一年。次年，你獲諾貝爾和平獎。你在遼寧錦州服刑，再沒有消息傳出。

2009 年 4 月 1 日或者是 2 日，我和崔衛平等友人一起和劉霞見面。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你的妻，在場的還有莫少平和劉荻等（以及在旁監視的便衣）。衛平和莫律師帶給劉霞有關在捷克出席獲獎儀式的消息，當年三月布拉格舉行的「四海一家」國際影展上，捷克前總統哈維爾親自頒獎，獎給劉曉波以及全體零八憲章簽署羣體。劉霞那天腿有小恙，她說是頭一日和廖亦武喝酒，被他熊抱起來旋轉不慎扭傷。回程中，我和衛平、劉荻一路，便衣一直跟著我們在地鐵轉線。

我曾和劉霞說，曉波服刑期間，我每年來採訪你一次好嗎？劉霞莞爾一笑說：好。她的語音溫婉，眼神堅定直率。可是，自 2010 年後，我再也沒能見她一面。直到兩年後一個冬日，我看到徐友漁、胡佳衝破重圍去探訪的錄影。劉霞滿面驚恐，判若兩人。

這是你和你的愛侶，為我們所有人承擔的犧牲。

朋友曾相互允諾，每年陪著劉霞去大連；我們曾言之鑿鑿，共同承擔責任。結果呢？不說我們，就說我自己吧，就像在地震中看見巨大建築物下被壓倒的難童，徒勞哀痛，掀不動那重負，無法分擔你為我們擔負的漫長刑期。

## 五

何況你不是停止呼吸的難童，你有那麼豐富的內心世界和感受力。你已經被囚禁到第九年，就在你病危的最後幾天，你的文筆依然能夠自由舒展。看到你為劉霞作品所寫的序言手稿，猶如看到一座冰雕，晶瑩、精粹。即使是在監控探頭的嚴密注視下，你的愛戀落筆之處，力透紙背，如歌如泣。囚禁這樣的心靈，這是多麼殘忍的犯罪；而這還不是在中世紀！

在被刻意放出的生活視頻裏，我看到你身著囚服，你在跑步，動作機械；你在掃雪，你接受體檢。我惟獨沒有看到你在收取書籍、你在閱讀和寫作的畫面。如果可以送書給你，獄中的時光會好過很多吧。到現在我們誰也不知道，你這九年怎樣熬過漫漫長夜，有沒有留下什麼記錄。如果有的話，你的筆記是否交還到劉霞手裏。

和你相比，從你最後一次失去自由的那一天到去世，三千多個日日夜夜，我們作為自由人過的每一天怎能不算是幸福呢？不是說沒有打壓和挫敗，沒有人繼續失去自由，被監禁，被噤聲。而是說，把外面的生活比作無形的監獄，多少是誇大其詞的。三千多個日夜裏，我們有了微信、whatsapp、人人美劇……我們多少還可以閱讀、創作，與朋友圈分享；可以探親旅行，健身淘寶，美衣美食……好多時候，我們哪里能分擔獄中人的疾苦？我們在無奈中選擇無視，少了一個那就是少了。諾貝爾和平獎當夜的歡呼真真是曇花一現，在此地。

我的校友，我無法呼出你的名字，為自己在你的處境上的無所作為和無能為力。而你在裏面，又是如何想像外面的世界呢？你一定知道你擁有巨大的道義支持，但那輝煌的獎項並沒能為你縮短一天刑期。而我們作為連署人，之所以還能享有自由；這全是因為你的擔當而成。想到你，我就想到魯迅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一文中所說的：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你曾在給友人廖亦武的信中說：這麼多年的大悲劇，我們仍然沒有一個道義巨人，類似哈維爾。為了所有人都有自私的權利，必須有一個道義巨人無私地犧牲。為了爭取到一個「消極自由」（不受權力的任意強制），必須有一種積極抗爭的意志。歷史沒有必然，一個殉難者的出現就會徹底改變一個民族的靈魂，提升人的精神品質。

在我心目中，你成就了這個民族所缺乏的道義巨人的形象。在你之前，有林昭、黃立眾、遇羅克等，與你同時，有唐荊陵、陳雲飛、劉賢斌等……但我們的靈魂因

此改變了嗎？這是我們如今必須對自己提出的拷問。

## 六

我們，我和我的朋友們會記住 2017 年這個焦灼的 7 月。我到後來才明白，那顆子彈早已瞄準了你的心臟，它只是被精準地控制了速度。子彈在它的軌道上緩慢地劃出它的弧線，從 6 月 26 日消息傳出到 7 月 13 日你生命的終點，彈頭在空中飛行了十八天。

而在這十八個日日夜夜，我們像吃錯了藥一樣回到了二十九年前的那種理性和感情的分裂：老虎必吃人/老虎不吃人。我寫了那篇公開信：站出來吶喊，讓劉曉波自由！我們幻想神話出現，我想變成巫婆，擁有最神奇的飛行掃帚去穿越。你和你的愛侶你的親人，你們飛行到自由的彼岸，在盛大的歡迎儀式上，你看到你的榮光你釋然你留下給世界的遺願。

我因此一次又一次畫出天堂鳥的模樣，桔黃色和藍白條的花葉是你們在病房裏相偎相依的顏色。天堂鳥展翅欲飛，刻不容緩。如今這些畫只是送給了廣東海祭的參與者，紀念他們以被監禁的代價換來的表達瞬間。

那些天你在病榻上被圍困，確有你的朋友千里而至，踐行曾經的諾言。從得知消息，到你的骨灰離開瀋陽馳向大連，每天都有人在找你。在病區禁地、在醫院門口有獻給你的花束……你的骨灰被撒入大海後，你的朋友竟有人沿海葬船行駛方向遊出一個多小時，到你骨灰陶罐沉落處祭奠。

我記得，在得知你取保就醫卻無法探視的消息時，被限制自由的前大律師浦志強發過一條消息，他想對你說：朋友們都在。以上提及的各種努力，是在證明著：曉波，你的朋友們還不能說都做鳥獸散了，他們在離你病房最近骨灰最近的地方和你心心相印。就算睽隔千里，在那些天裏你的重要超過我們所有的至親。何況，還有更多的年輕人，從未見過亦再無機會親見你的飛揚神采，卻在用隱語轉發你的消息你的詩文，為你在朋友圈點燃蠟燭。

轉眼就是百日了，在這一百年裏，你的形象比以往所有時日都更突顯。儘管你的名字還有劉霞，就仿佛被殉葬了一樣沒有聲音；但我們知道你的精神在，她也在。我們這些因你受益的人，還將繼續討論你的選擇你的理想，我們在思考如何把自己的道義責任擔當起來。

我期待一場盛大的告別，它配得上你的犧牲和你帶給這個民族的榮耀。我期待可以在陽光下擁抱劉霞，親口對她說致敬和感謝。我期待這場告別不僅是對你，同時是對你身後無數亡靈、對被共產極權奪去生命的幾千萬同胞，對所有那些生者來不及告別無法告別死無葬身之地者，我期待有如山如海的白玫瑰彌補他們應得的哀思和憶念。

曉波，魂兮歸來！

2017 年 10 月曉波百日祭

**艾曉明**——文學博士，廣州中山大學退休教授，婦女和公共問題學者，獨立紀錄片制作人，西蒙·德·波娃獎、獨立中文筆會林昭紀念獎等多項獎得主。

# 深切惦念危在旦夕的劉曉波

江棋生



6月26日下午，微信上傳來「劉曉波肝癌晚期保外就醫」的消息。難以相信或不願置信的我，隨即翻牆上《民主中國》網站，卻一眼就見到了一模一樣、令人震驚和揪心的消息！這個消息是尚寶軍律師捅出來的，於是我馬上給他發微信：寶軍好，曉波太不幸了！請代我問候劉霞。寶軍回覆道：江老師好，消息太糟了！有機會一定轉達。

「曉波太不幸了！」包含兩個意思：一是他竟然如此不幸地得了可怕的肝癌！二是他得了肝癌，竟然更為不幸地沒被及早發現和接受治療！！

6月27日早晨，宣文發來〈緊急呼籲：還劉曉波徹底自由〉（徵求意見稿）。我提了兩條修改意見後，當即簽了名。那天中午時分，我到達車公莊重陽大酒樓後，在謝小玲女士主持、有鮑彤、蔣彥永、吳青、查建國等人參加的「老人會」上，我對曉波的病情表達了極度的擔憂，對他的病情被拖到十分危重才被保外就醫，進行了毫不客氣的譴責。

誰都能理解，好端端的一個大活人，被當局關在冤獄中與世隔絕八年半之後，突然傳出生命旅程已經進入最後倒計時的特大壞消息，人們，特別是與他相識相知的朋友，怎麼能不發聲、不質疑、不呼籲呢？6月26日那天，陳平、查建國、何德普、黃大地、趙誠、張先玲和傅國湧先後委託我在〈緊急呼籲〉上簽了名。自6月26日到現在，全球的每一個角落，不分膚色，不分民族，都發出了普世的人道之聲，都在籲請中國當局：尊重和滿足劉曉波本人最後的意願，放他到德國或美國接受治療。

然而，當局會放曉波嗎？6月29日下午，有香港記者近距離地當面向習近平喊話，問他什麼時候釋放劉曉波，而習不作回應。此事發生後幾個小時，一位香港朋友在微信上問我：習近平會放劉曉波嗎？我回答道：我估計習不會放曉波，除非特朗普出狠招。在我看來，習近平不放劉曉波，其最主要的原因是：不能讓已經被消音八年多的劉曉波，在世界上作最後的自由發聲。因為，曉波的最後發聲必將是一次政治核爆炸，它必將造成巨大的全球轟動和衝擊效應，並在中國和世界史上留下悲壯瑰麗、不可磨滅的一頁——這是習萬萬不願看到的。

自6月29日到如今，美國總統特朗普不僅沒有出狠招，甚至連真正說得上的硬招都沒有。在這樣讓人無語的綏靖姿態下，習近平怎麼會考慮放人？習現在是拿定主意，就是不放人。無論你對他曉之以理、動之以情也好，給他戴高帽誇說能「成為世界級領袖」也好，或痛罵他「毫無人道」也好，他是一概不答理。依我看，不要說冷拒劉曉波出國沒商量，就是連曉波還能在病榻上通過手機對外發出「其言也善」的聲音，他都決不會允許。

官方前些日子播出了一些令我不忍卒視的鏡頭：時隔八年半，當初住在離我家僅數百米之遙、常常邀我去打羽毛球的活力四射的曉波，已然病魔纏身、形銷骨立、時日無多！而八年半之前的曉波，正和朋友們一道，夜以繼日地敲定〈零八憲章〉最後文本和馬不停蹄地徵集國人簽名。在做這件現在看來是他一生中最後一件大事的時候，他清楚自己面臨又一次牢獄之災的極高風險。當時，曉波曾好幾次對我說：棋生啊，明年是六四20周年，我得作好長期坐牢的準備了。不過，咱們現在搞這個〈零八憲章〉，也得準備被抓啊。2008年12月8日下午5時許，曉波在Skype呼我，隨後問我：棋生，你那兒警察上崗了嗎？我這兒來了不少。我回答他：今天上午我這兒沒有，不知現在有沒有，待會我出去看一下。在這次通話6個小時後，他被北京市公安局國保總隊從家中抓走。2009年12月25日，曉波被當局重判，刑期長達十一年。雖然自那以後，我和曉波之間再無音訊可通，但我堅定地相信，曉波是一定會把牢底坐穿的。而且，我也一直懷揣一個個人的心願，期待見到2020年6月22日跨出冤獄的曉波後，當面告訴他：我讀他在法庭上的「自我辯護」，高度共鳴，痛快得很；但是，我讀他在法庭上的「最後陳述」，則有股驚扭勁一直跑不掉。我甚至有個打算，揪住這一條，和他磕上一個月。

不過，我怎麼揪、怎麼磕，也決不會給他扣上「民運花瓶」、可能是昆德拉式「合作派」、即將被共產黨「派出監獄」的「和諧大使」等帽子。正如在2008年12月〈零八憲章〉發佈的時候，我決不會同意有人指控〈零八憲章〉的「出籠」是中共的「陰謀」一樣。所有上述帽子和指控，身陷囹圄的曉波都不知道——如今，也完全沒有必要知道了。如今，在生命力分分秒秒都在快速流失的曉波面前，在普世價值的忠誠殉道者曉波面前，在憲政民主理念的不屈殉難者曉波面前，這些帽子和指控——統統告吹了。

自6月26日始我一直深切惦念的曉波，已然危在旦夕。今天醫院發佈的病情通告，令人心碎，我已讀不下去。我明白，在他生前，我已不能見他最後一面，不能告訴他：他入獄前悉力推出的〈零八憲章〉，已有三十五批國人相繼簽署。我現在的心願是，要到瀋陽送他最後一程。昨天傍晚，朋友們不得不痛楚地議及曉波的事。很快，亶文向曉波家屬轉告了我的五點初步意見：1、家屬堅定地提出請若干朋友參

加曉波遺體告別儀式的要求。2、建議由蔣宣文和莫之許草擬朋友們名單，由家屬圈定。3、名單一經確定，馬上由家屬交給當局。4、與此同時，名單上的朋友各自與國保交涉，表明意願；甚至可以提出讓國保一起去。5、朋友們要送的花圈、花籃由已在瀋陽的家屬代辦。

我的送別願望，順天理，合人道。如果有誰還要阻撓我實現這個起碼的願望，我不把他當成敵人，還能當成啥？

2017年7月12日於北京家中

**江棋生**——北京作家、學者，獨立中文筆會前副會長；曾參加1989年學運，任北京市高校學生對話代表團常委、中國人民大學學生自治會常委，六四屠殺後被關押五個月，1999-2003年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受刑四年。



北京延慶下營村丁子霖的鄉下農家小院（2007年6月16日）

（左起）江棋生、蔣培坤、張祖樺、莫少平、趙先生、  
包遵信、丁子霖、楊建利、劉曉波

# 曉波，今夜為你點一支煙

巫一毛



我和劉曉波相識在 2006 年。當時曉波是獨立中文筆會會長，我是候補理事兼財務秘書。到 2007 年底，筆會換屆，他做理事，我做副會長。他在中國，我在美國，我們經常通過電郵和網絡電話聯繫。

一開始，我們只是談些會務。漸漸地，我們成了無話不談的摯友。我有什麼煩心的事，公事私事，都喜歡找他說。

曉波幾乎每天悶在家裏，晨昏顛倒地過著軟禁的日子，寫文章、看電視、打電話。

有一陣子，我失業後心境極差。美國的白天是中國的夜晚，我倆經常在網上碰面。我就絮絮叨叨地跟他訴苦。他總是那麼耐心地聽，有點結巴地慢慢替我出主意。

有一陣子，我的孩子們因為青春期的反叛鬧事，我氣得簡直要發瘋。曉波就告訴我心中不能陪伴自己唯一的兒子的痛苦，讓我珍惜和孩子們在一起的時光。

我在美國生活了二十多年，用中文寫的文章，很怕遣詞造句不合時宜。每寫完一篇，總是先發給曉波，讓他幫我看有沒有「洋涇浜」的問題。我的自傳《暴風雨中一羽毛——動亂中失去的童年》的中文版，就是他一字一句幫我修改的。

曉波一天可以寫出幾千上萬字的好文，我經常是他的第一個讀者。我對他的文章提不出什麼修改建議。但他因為打字太快，時有誤差，我就專門給他挑錯別字。

曉波在軟禁中多虧有劉霞相伴，不然更不知道有多難了。曉波喜歡抽煙，我有次說他，「不要再抽煙，你不怕死，替劉霞想想，多活幾年麼。」

「怕啥呢？」電話那邊，傳來曉波笑呵呵的回應，「她跟我一起抽。」

我哈哈大笑著說：「我服了你們。見面時，我也陪你抽一支煙。」

有時候，因為我在寫文章，更多的時候是怕打攪曉波寫文章，我就在網絡電話上掛著，不出聲。我靜靜地聽他敲擊電腦鍵盤、劃火柴、抽煙、喝茶，似乎他就在對面坐著，心裏有一種莫名的安寧祥和。

有一天，他特別高興地告訴我，「我媳婦兒今天做的紅燒魚，太好吃了。」

我說，「讓我饞得要掉口水了。」

他說，「什麼時候你來北京，讓我媳婦兒做給你吃。」

2009年初，曉波因〈零八憲章〉「被失蹤」後幾個月，有位朋友去北京。我想了想，請他給曉波捎條香煙吧。我反對抽煙，但囚禁生活對他身體的摧殘，肯定比抽煙更厲害。何況，這只不過是我的一點心意，一份思念，他可能根本收不到呢。到店裏買香煙時，我傻了眼，那麼多的品牌選擇，我根本就不知道曉波喜歡抽哪種煙。小時候替爸爸買香煙時，記得他只是囑咐，「買一毛四的大鐵橋牌的，不要買兩毛八的東海牌的。」看了半天，最後我挑了一條最貴的，希望他抽到的話能喜歡。

今天早上驚聞曉波去世的噩耗。

曉波，你最放心不下的，大概就是劉霞了。我期盼著，在不久的將來，能吃到她做的紅燒魚。

曉波，因為你的緣故，新浪微博上，凡蠟燭皆屏蔽。

曉波，今夜就讓我為你點一只煙，獻上我的心祭。

2017年7月13日星期四

**巫一毛**——旅美華裔作家，獨立中文筆會前副會長。

# 未盡的征途

## ——追憶曉波

莫之許



曉波離開我們已經一個月了，悲痛和憤怒漸漸平息，思念卻一如往昔，此時，寫下一點文字，或許，既能讓思念永駐，也能讓心情更加平復吧。

### 傳說中的劉曉波

在認識曉波之前，已經知道他的名字 14 年之久。

1986 年 9 月，我剛剛就學於廈門大學，很快的，我們宿舍樓有了第一個女生宿舍，與我們電腦系土裏吧唧的男生相比，國際金融專業的女生大多來自北京上海這樣的大都市，視野和交往也更為廣闊。在一次聚會中，就有一名女生拿出複印的一疊紙，向

我們介紹，這是來自北京、當下最為火爆的「黑馬」講演。如今回想，這應該就是曉波痛罵當代中國文學的快論，只是，當時的我，對於文化熱並不明究竟，也看不懂這篇演講究竟好在哪里，痛快在哪里，又先鋒在哪里，倒是記住了「劉曉波」的名字，和「黑馬」這個綽號。

轉眼就是 1989 年 6 月 2 日，從收音機裏再次聽到了劉曉波等四君子的名字，此後數十小時，就是難以言喻的震驚、悲痛、憤怒、無力，連同劉曉波等人的名字，一道被深深地印入了記憶。再後來，在廣播裏或報刊裏，也曾聽到或看到過批判「黑手」的文章，以及他因有「立功表現」而被釋放的消息，不過，在被審查，接著又畢業求生的動盪歲月中，在人生因參與學運而驟然改變的壓抑、苦悶的青春年代裏，這些東西一閃而過，並未留下什麼印跡，也並不清楚，當時的曉波，正在繼續致力於推動人權事業、追求歷史正義，並因此在監禁中進進出出。

值得一提的是，1990 年春夏之交，偶然在摯友海仔的宿舍裏發現了一本《形而上學的迷霧》，作為毫無人文基礎的工科生，居然堅持看完了這本幾百頁的厚書，當然是沖著「劉曉波」這三個字。書中的內容，我幾乎無法看懂，只能朦朦朧朧地意識到，這是對黨國意識形態進行理論上的批判。

半年後，因認識了毛喻原和王康先生，我從此開始了讀書、觀察、思考當代中國問題的長路，但是，閱讀《形而上學的迷霧》的體驗，既羨慕曉波能夠運用理論武器批判黨國意識形態，又因不求甚解而倍感智力挫敗，也在一定程度上點燃了我的求知欲，刺激著我向他們看齊（當時另外一本刺激過我的作品，是流亡海外的蘇曉康先生的《烏托邦祭》）。

1980年代的啟蒙自由化思潮，是1989年學潮的直接推動力。我這個年紀的學生，儘管並無自覺，總歸是被曉波這一代人所影響的，這一點，在經歷了六四鎮壓之後，更是無比清晰。記得也是在1990年的春天，某一天早上宿醉醒來，也不知道哪根筋錯了，隨手抄起了下鋪同學的一本《五人詩選》，隨意翻看著，打頭的幾篇北島詩歌，其實早就讀過，但當時既不明所指，也無甚印象，然而，在那一個早上，一個經歷過六四鎮壓衝擊的青年學生，如受電擊一般，突然間看懂了北島詩歌中的每一個字：

告訴你吧，  
世界，  
我一不一相一信一  
縱使你腳下有一千名挑戰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這不正是一名與體制開始徹底決裂，開始從曾經的盲信中走出來的青年的心聲嗎？

曉波、蘇曉康和北島這一代人對於極權體制的反思成果，正是我這一代認知和思考的起點。而對於極權體制的共同立場，尤其是對堅決譴責極權體制在六四鎮壓中所暴露出來的無底線暴虐，也是我和曉波這一代所共有的認知，在這個意義上，傳說中的「黑馬」和「黑手」劉曉波，早就與自己有著不可分割的精神聯繫了。

### 我的朋友劉曉波

1998年初，我再次來到北京，這一次，是在《戰略與管理》做編輯，並開始與1989年後殘留的自由化知識羣體和異議圈子有了很多的接觸，因為稿件的關係，與何家棟先生和陳子明先生的接觸更多。而當時的曉波，尚在大連勞教營中。

2000年前後，網路熱度持續高升，bbs 猶如突然冒出來的言論自由飛地，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人，其中，一些自由化知識份子，麇集到了「世紀沙龍」網站上。經過一段時間的匿名交流、交鋒之後，逐漸相互露出了真身，並開始線下約見、約飯，這年冬的某一天，當我應約到了網友 snoopy（崔衛平）家中之後，赫然發現另外一位客人，正是聞名多年的「黑馬」和「黑手」劉曉波。

崔衛平是我們共同的朋友，在她的家中，氣氛從一開始就很隨意，儘管我與曉波的年紀、經歷都相差甚遠，但是，正如前面所說過的，我們既有著對那一個日子的共同銘記，有著對專政體制相同的根本立場，而此前近十年的讀書思考中，我也主要從八十年代以來的啟蒙自由化思潮的成果中吸收營養，讀過了那一代人幾乎所有的著作乃至文章，因此，我與曉波不僅具有相似的價值觀，也有著重疊的知識譜系，並不需要對太多的「暗號」，飯桌上的氣氛就很融洽，話語交流中的默契已然建立，很容易地就將彼此認做了同道。

不過，儘管在內心裏，我多少將曉波看作老師一輩，但在稱謂上，卻從來沒有叫過「曉波老師」，而一直以「曉波」、「老莫（兒）」互稱。曾經傳說中的「黑馬」、「黑手」劉曉波，也成為了「我的朋友劉曉波」。

### 同道中人劉曉波

2000 前後的中國，有著雙重的面向：當局依舊維持 1989 年以來的高壓政策，對於各種社會異動毫不容情：鎮壓法輪功、重判中國民主黨羣體、新青年學會案件等等，此起彼伏，而在另一方面，因為市場化的深入，以及加入 WTO 和申辦奧運成功，深刻的經濟和社會轉型正在展開，民眾對於時代進程普遍具有更多樂觀的期待。

此時的劉曉波，或者說整個泛異議反對羣體，其實都受到這兩個方向的牽引：面對依然堅持專政統治的黨國體制，需要堅守異議反對的傳承，堅持民間主體性，強調「未來的自由中國在民間」，同時，六四鎮壓的慘痛記憶仍在隱隱作痛，還要與「天安門母親」羣體一道，追求歷史正義的實現，所有這一切，都在促使曉波與其同道堅持異議立場，堅守道義價值，追求歷史正義。

而在另一個方向上，曉波也深知，歷史正義和道義價值的實現，離不開根本的體制轉型，而這就需要更為廣泛的社會動力，在曉波看來，為此，就要跟上經濟和社會的深刻轉型，努力與更廣泛的社會羣體形成聯繫，將異議羣體所堅持的立場與道義，和正在浮現的新興社會力量相結合，並最終促成包括當局本身在內的自由民主轉型。

曉波本人的異議政論寫作，他共同發起創立「獨立中文筆會」作為自由寫作者的組織，參與接管《民主中國》網站作為異議言論平臺，展現了曉波和泛異議反對羣體在前一個方向上的努力，而持續的網路簽名，聲援並參與維權運動，直到最後撰寫並組織〈零八憲章〉簽名，則體現了曉波和泛異議羣體試圖把握時代進程、聯絡更廣泛社會羣體，進而通過「官民互動」推動轉型的用心。

這一時期的我，正在網路上大拍板磚，參與著《戰略與管理》的編輯工作，也曾出任過某報社的評論部主任，社會身份上屬於新興的媒體和網路言論人士，而由於 1989 年的經歷，在我內心裏的某個角落，尋求歷史正義的那團火焰，也從來未曾熄滅，內在地持有異議反對的立場。也因此，當時的我，無意中跨越了曉波和泛異議羣體所努力的兩個方向，也因此與曉波有著廣泛重疊的興趣和話題，擁有著好幾個共同的圈子，交往也逐漸密切了起來。

2005 年春，我搬家到了西城區車公莊，曉波夫婦住在花園橋附近，距離的拉近，更加密切了交往，同時，在奧運前的相對寬鬆氣氛下，曉波也有了更多的行動自由，得以與更廣泛的羣體交際，社交活動愈發頻繁，在我這邊的網路和媒體人聚會中，我會嘗試邀請曉波的參與，而作為 89 學生的我，也常被曉波邀請到相對異議性質的一些聚會中。

當然，我們也有輕鬆的時光，郝建和崔衛平會帶我們去山溝裏郊遊，貝志誠、王小山和我，則常常陪伴曉波夫婦品嚐紅酒，忠忠店裏的紅炮臺（一種泡酒），也時常在等待我們的光顧！

「no wine untasted」，在整體上依舊壓抑的時代氛圍裏，我們有著自己暫時躲避

的小天地，聽曉波談他喜愛的詩歌、小說和電影，不無得意地回顧 1980 年代他的黃金年代。

### 被潛移默化的我

或許是明白異議道路的艱辛，以及因此而來的難以持續，對於我們這些八九學生，曉波並不希望我們走上異議之路，而是建議我們先有合適的工作和相應的社會角色，尤其是獨立的經濟能力，「該買房買房，該買車買車」，類似的話我聽他對人說過多次，對我，他也曾半開玩笑地說：「老莫（兒），你就好好做書，能像今天這樣，有錢請我吃飯，就行。」

因此，在他入獄之前這麼多年的交往中，曉波對我的影響更多是一種潛移默化，甚至，很長時間以來，我都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轉變中，曉波對我曾有多大的影響，內心多少有點自大的我，也總是更傾向於將這些轉變看作是自己的主動選擇。但如今回想起來，並非如此。

首先，我加入獨立中文作家筆會，完全是因為曉波，說起來，這裏還有一個故事：

2004 年 10 月 30 日，獨立中文作家筆會第二屆自由寫作獎頒獎典禮在北京郊區舉行，由於事先邀請了許多人士，可以預計，這將是一次盛大的聚會，頭一天，曉波也給我發來短信，邀請我參加，然而，第二天，因為要參加北京泡網隊的足球賽，我並沒有去，表面上，我很以踢球這個理由為正當，但我也多少明白，不去參加，更多是因為回避，是不想介入到異議圈中去的心理。

或許是內心愧疚的緣故吧，踢完球之後，我給曉波打去電話，邀請他參與我們一幫關天網友的餐聚，我知道，這是他樂於參加的活動。由於地點在甘露園的竹樓餐廳，相距頒獎典禮舉辦地相當遙遠，曉波來的時候已經很晚了，我至今仍記得他從車上下來的第一句話：「老莫（兒），我跑這麼遠，你就請我到這三十六元一副烤鴨的地兒吃飯啊？」

這個取笑的梗，連同我逃避參加頒獎典禮，在此後的許多飯局中，常被曉波拿出來「活躍氣氛」，讓我很是尷尬，於是，在一次飯局中，當曉波又一次打趣這個事情的時候，我決定，為了不讓曉波繼續提這個事情，我還不如乾脆加入獨立作家中文筆會呢！

其次，我的異議寫作，其實也是曉波推動開始的。

儘管加入了筆會，相比老廖、祖樺、棋生、余杰、王怡、世存、野渡……這些當時與曉波一起共事的朋友來說，我只是個旁觀者。同時，作為寫作者，我基本沒有寫作過所謂敏感文章，除了在《南方都市報》等媒體寫些時評，更滿足於在網上放言無忌，做一個「網路名磚」，洋洋自得於「中文互聯網唯一以跟帖成名的人物」。

直到 2006 年 7 月，因為參與陳光誠先生的開庭，我與高智晟等一些朋友去了趟臨沂，回來後，在 msn 上與曉波談論此事，相互交流之下，曉波鼓勵我寫出來，最後，由曉波親自編輯，以「記一次快樂的旅遊」為題，發表在了《民主中國》之上。結尾處的一段，也是最出彩的一段，其實正是曉波的手筆：

由義正詞嚴的鎮壓到滑稽可笑的恫嚇，大概既是末日獨裁的無奈，也是民間抗

爭的無奈。不必懷疑滑稽戲的終將收場，但收場的方式仍然喜劇，套用著名詩人愛略特的名句——末日獨裁的坍塌，不是「轟」的一聲，而是「噓」的一聲。

這是我第一篇正式發表於異議平臺上的文章，巧合的是，發表這篇文章的另外一名編輯，正是流亡海外的蘇曉康先生，可以說從那時開始，從成為筆會會員到異議寫作者，我開始了不自覺地向異議者的轉變。

最後，我的被敏感，也是因為曉波。

2007年六四前，在一次聚會中，曉波向我約稿寫一篇六四祭文。6月2號深夜，由於我在網上發起「都市穿越：由北大到天安門廣場」行為藝術，被國保捉將局裏去，隨後被遣送回老家。由於沒有經驗，剛被抓時，手機並沒有來得及關機，而被警察所掌握，恰在此時，作為夜貓子的曉波，發來「祭文寫好沒有」的短信，從此，作為獨立中文筆會會員、曉波朋友，我被列入北京國保的監控對象，而根據種種跡象判斷，我是被當作曉波的身邊人而被重點監控的，因為，監控我的正是針對六四羣體和筆會羣體的國保，在與這些國保的長期周旋中，雙方所談及最多的，也就是曉波、六四和筆會。

### 繼續未盡的征途

接著就是曉波的被抓被判，我因比較多地參與呼籲、聲援，自覺地參與筆會選舉，等等，而更加不可逆地漸行漸遠，回想當初，如果沒有曉波，我會加入獨立中文筆會嗎？如果沒有曉波，我何時才會寫出第一篇異議文章？如果沒有曉波，我會因此被北京國保重點監控，從而更加不可逆地朝向異議者轉變嗎？而如果沒有曉波的被抓被判帶來的後續，今天的我又將是怎樣的狀態？

回想2000年冬的第一次見面，我都記不得曾經談過些什麼，如今想來，卻可能是我一生最為重要的一個日子，儘管曉波從不曾主動地推動我做什麼事情，但沒有與曉波的交往，後來的一切應該都不會發生，實際上，曉波對我的影響並不是通過直接的推動，而是通過其存在本身，曉波的存在於我，既是榜樣，又是標杆，同樣從那一個日子走來，既然有人如劉曉波可以做一百，為什麼我就不能做分之一？

從得知黑馬之名到今天，整三十一年過去了，跨越了我的青春、成年、壯年，直到今天的向死而生，直到曉波的永別，我才暮然發現，在自己的一生中，曉波所曾給予的影響如此巨大，如此不可替代，卻又如此彌足珍惜。

如今，曉波已經永遠離開了我們，而曉波和我，以及其他更多同道所堅持的道義價值、所追尋的歷史正義，所努力推動的自由民主轉型，看上去卻依然是那麼遙不可及，但是，正如曉波用他的九死未悔所展現的那樣，追尋正義的征程往往會超越個體的生涯，重要的不一定是結果，「人是註定要死亡的，肯定如此。但是即使毀滅，也要在與死亡的抗拒之中毀滅」，或許，在追尋正義的征程上，我們都應該像曉波那樣，像傳說中的西西弗斯那樣，不計結果地努力、付出，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2017年8月12日寫於嵐山

莫之許——北京作家，獨立中文筆會前理事。

# 劉曉波、我和筆會

齊家貞



在悉尼頒獎會上朗讀劉曉波獲獎感言

—

1987年8月底我人到澳洲，心，依然恐懼著大陸時的恐懼，直到2005年1月下旬到澳洲十七年半之後，我才拋棄恐懼冒出頭來，說我想說的話，做我想做的事。從此，站起來做人。

獨立中文筆會進入我的生活，正當其時。

2005年11月下旬，蔡詠梅和余杰等知名人士出席悉尼舉辦的「亞太作家圓桌會議」後，到墨爾本阿木家做客。通過他倆的生動介紹，我們意外驚喜地聽說有個包括大陸與海外作家在內的獨立中文筆會，劉曉波是創辦人之一，並且時任會長。大家十分興奮，有找到了「家」的感覺，五個墨爾本寫作者當場拍板參加，除了我，另外四人阿木、阿森、老戴維和子軒都是「大姑娘上轎第一遭」，首次屬於一個組織。接著，著名寫手、中英文俱佳的陳標也參加進來。後來，又有幾位作家先後入會。

我們有了「家」，我們有劉曉波當家，我們熱愛這個家。加入筆會後，劉曉波一直很關心鼓勵我，他給我不少具體而微的幫助。

我們數次在 Skype 電話上聊，他總是壓低嗓門，生怕影響劉霞的睡眠。我們談家常談寫作，我告訴他我的十年牢獄之災，我的《自由神的眼淚》和即將完成的《紅

狗》。

曉波談吐隨和自然，沒有架子，我感受到他的友好與誠意。

2007年9月，曉波委託我代表他去悉尼接受新西蘭亞太人權基金會的頒獎，並在會上朗讀他的獲獎感言。墨爾本會員老戴維、阿木和我，好朋友 Tom，四人開車十小時前往參加頒獎典禮。大家深感代他領獎不僅是我們的光榮，也是對我們的鞭策。

劉曉波聲明所獲獎金全部捐給「天安門母親」。

他在題為《勇氣并不必然代表良知》的獲獎感言裏說：「今天，當我接受這個以『良知勇氣』命名的獎項，與其說倍感榮耀，不如說深感內疚。」「所以，如果這個獎代表著一種榮譽，那麼這個榮譽也僅僅是通過我而敬獻給亡靈的祭奠。」「反抗獨裁並不意味著反抗者就自動變成聖人，抵制邪惡也并不總是正義對抗邪惡，有時很可能就是以惡抗惡，」「獨裁政權的反抗者都不缺少勇氣，但勇氣並不能等同於責任，正如道義倫理並不能代替責任倫理一樣。換言之，良知的踐行，不僅需要敢於反抗的勇氣，更需要公共參與的理性和責任，」「堅韌和清醒，理性和責任，信心和樂觀，遠比一時的熱血沸騰更加珍貴。」「只有以謙卑之心仰望在天之靈，我才知道活下來的責任之厚重；只有堅韌地抗拒恐怖、謊言和收買，才能多少承擔起倖存者的責任。」

筆會會員簡昭惠評價曉波的獲獎感言：「我很喜歡劉曉波的致辭。很喜歡一個『能夠透視英雄迷思的英雄』。的確，『革命』除了勇氣之外，更需要重視責任與倫理。我一直不相信有人能用卑鄙的手段追求正當的目的。」「我是一個相信真理的尋覓者，但不信那些宣稱已經找到真理的人。『革命』不是追求『英雄的舞台』，更不是為了替自己累積威望和權力。在成熟的公民社會，其實是并不需要『意見領袖』和『革命領導人』的。」

獨立中文筆會裏對我影響最大的人是劉曉波。

劉曉波很早就鼓勵我參加筆會理事競選，這種事我做夢也不曾想過，我誠惶誠恐接受了他的建議。網絡知識我知之甚少，曉波教我如何進入筆會社區，按照他說的首先要爭取會員們對我的了解，我開始試著在社區發言。2007年我成為候補理事進入理事會，我告訴曉波我很感動想哭，他回信說這是你自己努力的結果。我後來一直是理事，擔任過組織秘書，兩次副會長，至今已在理事會裏服務十年。

我愛獨立中文筆會。愛，就是付出，而非拿取。

和我一樣，墨爾本的會員們深感自豪，大家尊崇筆會捍衛言論自由的宗旨各盡其能，我們在澳洲異軍突起強悍有力。幾年裏，同心同德羣策羣力搞了好些別開生面的活動，包括與法輪功合辦的「余杰、王怡演講會」，余杰講《拆除中國的靖國神社——毛澤東紀念堂》，王怡說：「國內現在的維權運動興起了，而海外華人的維權運動還沒開展」；龍應台《華人世界的理解和誤解》的演講，接待了來自大陸、台灣，還有香港、越南、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新加坡等地近三百五十名華人聽眾，盛況空前，是我們「不可複製的頂峰」；「戴晴演講會」《被「和平解放」了的北平——從一幅「橫聯」說起》；「文革四十週年討論會」放映胡杰的紀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反右五十週年，與中國傳記作家葉永烈面對面座談會等等。

筆會名聲鵲起，一提到獨立中文筆會，墨爾本人便肅然起敬，會員們個個臉上

有光。我們舉辦的活動，幾乎每次都是座無虛席，主講人大膽創新獨特自主的演講，聽眾們反響熱烈，正反觀點尖銳交鋒據理力爭互不相讓，主賓互動熱氣蒸騰。那時，我們幾乎可算是獨立中文筆會墨爾本分會了。

在曉波會長及其他理事和會員們的支持鼓勵幫助下，我代表筆會參加了一些活動，比如斐濟的文學會議，我爭取到了發言機會，在發言中我告訴大家，揭露中共的黑暗，是因為我們追求光明，之後寫了會議報導；我數次去香港參加亞太作家及筆會舉辦的會議，即興發言強調作家應有社會良知與使命感；我去非洲塞內加爾參加國際筆會年會，寫了兩篇報導，其中一篇是《支持非洲婦女就是支持我們自己》。

特別是 2012 年 4 月，我去英國參加倫敦書展。在那裏，我與會長廖天琪和居住英國的會員張樸一起秘密帶進「匕首投槍」——標語，在中共暴發戶花大錢租用的幾百人的盛大演講會上，與其他「遊擊隊員」們一起舉起中英文「要言論自由」、「停止文字獄」、「釋放劉曉波和一切獄中作家」的標語，幾十張標語像春天的鮮花在田野上怒放。一場如此崇高光榮，沒有真槍實彈但硝煙瀰漫的思想自由之戰啊！

這個在海外躲得嚴嚴實實當了十七年半驚弓之鳥、駝鳥的齊家貞突然看到，原來人的眼睛是可以這樣觀察世間萬事萬物的，原來人的頭腦不該被動接受灌輸而要獨立運作轉動，原來人們的思維應該沖破禁錮深入禁區探索答案拿出自己異峰突起驚世駭俗見解的，原來作為至高無上的人，不可以像我這樣「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共產黨」。要顛倒過來，獨裁政黨獨裁政權應該怕人民！

誠然，現在，我有澳大利亞站立在我的身後。可是，不能否定的是如下的事實。

沒有筆會劉曉波、鄭義等創始人、首屆主席劉賓雁和許多默默無聞為筆會奉獻的人，這些標杆式的思想者和燈塔般的勇士文友們，他們的人格魅力和實際操作能力，使我大開眼界，並登上一個台階；沒有既溫存又堅韌的各種助力的綜合效應打開了我閉塞的心靈、狹窄的思路，點亮並驅散我認知上的盲點和誤區；沒有筆會特有的條件優勢使我學會了民主 ABC，勇敢地追尋言論自由；沒有筆會的培養鼓勵與支撐，推舉我參與如此眾多激動人心錘煉意志增長知識的戰鬥，我能像天門大開知識雨露汨汨流進我空無所有的腦袋裏嗎？我能在一場又一場筆會安排我參加的活動裏，像瞎子看見了美景，像聾子聽到了仙樂，把自己從「最奴隸」改邪歸正為「最反叛」嗎？沒有筆會，我能夠不顧一切鼓足勇氣說真話幹實事嗎？我自己會從時刻心驚膽戰的驚弓之鳥和把頭埋進沙堆與外界隔絕的駝鳥，出落成沒有幾根羽毛也膽敢高飛的自由之鳥嗎？

我後來設立的齊氏文化基金會，如果沒有前面這些豐厚的思想鋪墊，沒有這些年參與獨立中文筆會各種實際事務及能力的培養——當然，也包括墨爾本阿木盡心竭力的幫助和簡昭惠等朋友的力挺——沒有土壤就沒有花朵，沒有爹媽就沒有兒女，沒有諸多的恩人，就沒有齊氏文化基金會的誕生。

我們一定要感恩戴德，世界上不存在任何可以忘恩負義的借口。

## 二

1991 年劉曉波出獄後，6 月 1 日在《給十七歲的蔣捷連》詩歌的題記裏寫到：「你擎著旗幟倒下時，僅十七歲。我卻活下來，已經三十六歲。面對你的亡靈，活下來

就是犯罪，給你寫詩更是一種恥辱。活人必須閉嘴，聽墳墓訴說。給你寫詩，我不配。你的十七歲超越所有的語言和人工的造物。」這是曉波對自己「央視作證」宣稱「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人」錯誤的認錯懺悔。他甚至覺得自己「活下來就是犯罪，給你寫詩更是一種恥辱」、「我不配」！

在新西蘭亞太人權基金會「良知勇氣獎」的獲獎感言裏，劉曉波說，「與其說倍感榮耀，不如說深感內疚。愧對那些至今仍然無法瞑目的六四亡靈，特別愧對那些因捨己救人而獻身的亡靈。」看出曉波對自己十幾年前在獄中「認罪悔罪」和「央視作證」的言行耿耿於懷，再一次在公開場合懺悔認錯。

我欣賞勇於承認錯誤過失甚至更加嚴重問題的人，我欣賞有自我拷問、自省、自咎精神的人。因為「人無十全，瓜無滾圓」，在特定的情況下，人性的趨利避害膽怯懦弱常常不請自來，「外部的壓力和內心的掙扎」可能把「我」變成「非我」，作出一些令自己也大吃一驚的錯事來。關鍵是我們要懂得，「否認一次錯誤等於犯了兩次」，知錯認錯悔錯，請求原諒寬恕，求得心安心靜，是犯錯者最好的出路。

我們讚美崇敬一個人，不是因為這個人完美，而是因為這個人承認自己不完美，他不斷洗刷靈魂的污垢清除心底的骯髒使自己乾淨，朝著完美靠近再靠近。

劉曉波對自己「認罪悔罪」和「央視作證」受利用的過錯，深惡痛絕悔恨了一輩子，這種道義與人格達到的高度，不是每個人都能企及。他「渴望用反抗和坐牢來贖罪，來成就我個人的信念、理想和人格」，他渴望通過正義的拷問和坐牢的懲罰贖自己的罪，如此，劉曉波的自我救贖就臨近了。

2008年12月8日，曉波因為參與起草〈零八憲章〉並積極徵集簽名被捕。同年，中共政府刻意選定12月25日聖誕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他有期徒刑十一年。曾經叱吒風雲的「黑馬」當今民主憲政思想的先驅劉曉波，聖誕日在監獄裏重生，他求仁得仁，蓬蓽生輝，活得不再恥辱。

2010年10月8日，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的喜訊傳遍世界。筆會墨爾本會員的電話頻頻傳到鄉下我居住的移動房子裏。第二天，阿木邀請四十幾位友人在他家慶祝，我趕到墨爾本主持。各方人士興奮達於極點，劉曉波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自我犧牲精神，和他「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的大智大愛大勇與共產黨「人人是敵人，個個都仇恨」的思維本質黑白分明地割裂完全徹底地區別，反襯出共產專制的醜惡殘酷與反人性。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是事有所致理有必然。

同年12月10日，獨立中文筆會會長廖天琪、常務秘書張裕和筆會工作人員詠梅、小喬、王進忠等，以及我和澳洲會員阿木、阿森三人結伴，前往挪威奧斯陸出席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人生僅需一次如此莊嚴高雅豪華輝煌的親身經歷，就足之夠矣！中共政府拒絕監獄裏的曉波或者他的家屬前往領獎，諾貝爾頒獎大廳舞台上為諾獎得主曉波放置了一把空椅子，獨立中文筆會則因榮譽會長的缺席（以及後來劉霞長期失去自由）而獲諾獎委員會網開一面的待遇，給了更多的參會名額，使我們獲得今生今世難忘的殊榮。我們飲水思源，深深感謝曉波和他受苦受難的妻子劉霞。

諾貝爾頒獎典禮還安排了一場別開生面充滿人性溫暖的兒童合唱，專為曉波劉霞夫婦決定不要孩子而喜愛孩子演出。2011年2月26日澳洲國慶節，一個鄉村小鎮

邀請我去講話。我首先告訴澳洲人：「我對澳大利亞的愛，不比你們這些出生在澳洲的人少。因為，我在澳洲重生！」我告訴大家諾獎獲獎人劉曉波的故事和劉霞一直被軟禁的遭遇。我還說：「當你們的孩子背著書包蹦蹦跳跳興高采烈上學去的時候，你可能想像不到在中國大陸，政治犯的孩子逃不掉遭受歧視監視與騷擾等不公平的待遇，劉曉波和劉霞因此決定不要孩子。多麼可悲！」

### 三

我們滿懷欣喜期待著榮譽會長劉曉波歸來，我們耐心等候劉曉波刑滿回家重獲自由，在眾望所歸眾目睽睽之中，正式從我們的手上把健康正常完好的獨立中文筆會接過去。

晴天霹靂，我們獨立中文筆會的創會會員、前會長、現榮譽會長劉曉波肝癌不治，於2017年7月13日撒手西去。被共產黨慢性殺害的曉波，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他沒有當年希特勒監獄裏的和平獎得主卡爾·馮·奧西茨基的幸運，1936年11月23日諾貝爾委員會來到病重的奧西茨基獲釋後所住的醫院裏給他授獎。劉曉波成為唯一沒有親自或家人代理領取諾貝爾獎的獲獎人。

正當壯年的劉曉波突然拋下我們走了！

獨立中文筆會全體會員懷抱的劉曉波美夢破滅了，我與會長天琪的美夢破滅了，我的美夢破滅了。我們憤怒，我們悲傷，我們沮喪，我們無力回天。

8月26日上午，墨爾本文學節組織的紀念劉曉波生與死專場上，作為筆會副會長介紹獨立中文筆會及劉曉波時，我告訴大家，「我們全體筆會會員關於劉曉波出獄回來當會長的美夢破滅了，完全破滅了。」有人告訴我聽到這句話她直想哭。

我們哭不回曉波，他才六十一歲，帶著滿腹才學滿腦子思想和民主轉型的理念，帶著自己是「中國綿綿不絕的文字獄的最後一個受害者」的美好願望，帶著「我坐集權制度的有形監獄，親人們坐我為他們建造的無形的心牢」的無限愧疚，帶著對愛深痛巨的妻子劉霞刻骨銘心的愧疚，遠去了，漸行漸遠了。

加入獨立中文筆會時我六十五歲，現在七十七的我，再也撐不下去，心有餘而力不足了。眼前一片茫然，我不知如何是好！

我應該是筆會裏最不年輕的會員了，還有幾百個比我小、小得多的會員們，請你們以雖死猶生的劉曉波的名義，為了監獄裏因言獲罪的同行，為了我們中國同胞的言論自由，無私無畏地站出來，站出來扛起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華人作家人權組織獨立中文筆會的旗幟，她的存在與發展需要我們續盡綿力！

2017年11月3-6日

齊家貞——旅澳華裔作家，獨立中文筆會副會長兼女作家委員會主任。

# 念曉波：告別的日子

蔣亶文



這個夏天，始於悲涼，因為必須面對一場被隔絕的、卻又時時可以被感知的死亡。

這是種煎熬，對垂死之人和所有與之共命運的人來說都是。是的，我說的是劉曉波，一個正在死亡邊緣、等待死亡降臨的人，一個標誌着這個時代的苦難與抗爭的人，一個必將不朽，並會永遠存活於歷史和記憶中的人。

先說記憶吧。我曾經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有過一段文學寫作的經歷，當時曉波對所謂「新時期文學」的批判性解讀，對我產生過巨大的衝擊。這種影響，既關乎於審美，也關乎於對寫作價值本身的認知，從這個意義上說，曉波首先是和我的文學記憶相關。

但是，我印像最深的，卻不是他那些厚重的長文，而是一篇後來幾乎從不被人提及的短文。我至今仍清晰地記得，那文是刊於 1989 年上半年某期《上海文論》雜誌上的，題目叫做〈娼優和犧牲〉。在這篇短文裏，曉波寫了中國知識份子自古以來的兩種命運，要麼為躋身廟堂而諂媚於權力，要麼因獨立與對抗而成為祭品。在讀過那文後不久，曉波就在廣場上宣示了他的選擇。

今天，令我感到錐心之痛的是積三十年的努力，他自己終究沒能掙脫這個宿命，並且這種來自於歷史的威脅，幾乎覆蓋住所有爭取民主與自由的人身上。因此，和曉波相關的記憶更多的還是政治性的表達和勇敢的反對。

勇敢，這詞語本身是閃光的。但這光照射出的其實是更多人的怯懦，包括我。

在有意無意間，我似乎更樂意和他討論文學以及吃喝，現在回想起來我應該是在有意識的想要迴避某種風險。然而，在他身上我看不到一絲的怯懦，可以說中國近三十年的政治反對運動中，劉曉波只要沒有被囚禁，大多時候他都會走在隊伍的最前列。

走在前面的人，總是在以最直接的方式衝擊對方的底線。一寸自由一寸血，正是因為有曉波和如他那樣的前行者的執著和無畏，即使高壓不減，中國的政治反對運動非但沒有被當局壓制下去，反而前赴後繼地發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挑戰，並且在每一次挑戰的進程中，民間的政治主張在不斷的明晰與堅定，無懼於牢獄的人愈來愈多，這一切都注定了專制的歷史必將終結。無可否認，曉波是這一種變化的重要的創造者之一，只是他個人為之承受的代價太大。

還是回到記憶裏來說。由於曉波的行動常受限制，我又不大出門，所以一個居北京、一個住上海，我們來往並不密切，平時大多靠網絡聯繫。我們起初用的是 MSN，後來換成了 Skype，通常是在半夜，他會通過網絡呼我，然後閒聊幾句，這就使得記憶中少有了面對面交流的印象。

現在還能借助記憶追溯的一次徹夜長談，是在 2007 年天冷的時候，當時為了操辦一個頒獎活動，我去了北京，住在他家附近的酒店裏。晚上，曉波來找我，覺得這酒店不錯，就決定把頒獎活動放在這裏舉行，為此我們還特地去實地看了酒店的會議室和餐廳，甚至研究了菜單，計劃了一些細節。

在做這些事的時候，曉波細緻得近乎瑣碎，全沒有早年傳說中的狂放。當時我就想，可能正是這種細緻和周到，使他在具備號召力的同時，也具備了出色的組織能力，而這兩種能力的兼具無疑是罕見的，所以曉波在政治反對陣營中能起領導作用，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了。

記憶中那是一個寒夜，天快亮時曉波才回去，半路上又打電話過來問我，讓我看下他戴的棒球帽是否忘在房間裏了。我看了下，果然那帽子是被他丟到了沙發底下。我問他是否要回來取，他說他已經快到家了，然後嘿嘿一笑，結結巴巴地告訴我，他是走着走着感到頭上冷了，才發現帽子丟了。那麼，好吧，我知道接下來他要約飯局了。

是啊，飯局，為什麼記憶中出現最多的場景都是飯局呢？可是，又有幾場飯局不是在監控之下的呢？生活本身是美的，雖然這美是被禁錮的；相聚當然是快樂的，雖然隨時可能失去自由；時代是黑暗的，雖然我們知道光總是要亮的。這就是曉波所在的歷史，即使歷史的榮耀歸於他，但此刻卻也是他在承受最殘酷的打擊。一念及此，又何以止得住心裏的痛。

死亡比生命更遼闊，無邊無際，一場沒有返程的遠行，每個人都會踏上這條路，並相逢。

2017 年 7 月 8 日

蔣璽文——上海作家，獨立中文筆會前副會長兼自由寫作和文學交流委員會主任。

# 不意一別成永訣

——深切緬懷劉曉波老師

王德邦

一

2017年7月13日上午，當地國保來電查問我動向，我借機向他們明確提出要前往瀋陽探望病危急救中的劉曉波老師。為獲得當局同意，我還表示願意接受他們派員跟隨前往。然而，僅僅幾個小時後，網上傳來曉波老師已去的噩耗。

莫大的悲憤使我決定不惜一切代價要爭取出席曉波老師的告別會。於是我向北京的師友們瞭解曉波老師最後告別會的有關安排事宜，但發現沒有一個師友得到相關資訊，大家只有等待曉波老師家屬或當局的公告通知。

15日，網上居然發出了劉老師被舉行告別儀式及骨灰被撒入大海的圖片。看到這些，我完全不敢相信是真的，進而一遍遍反覆查看有關消息，最後絕望地久久呆坐於電腦前，任憑臉上淚水垂落，口中喃喃自語——難道曉波老師就這樣了結了？難道事情就這樣完了？



二

初識曉波老師是1988年。當年劉老師博士論文——《審美與人的自由》答辯後，引起學界很大轟動。有北師大中文系學生甚至複印了劉老師論文的部分內容在校園中三一八紀念碑前散發與宣講。在那個中國難得的思想學術活躍的年代，一匹文學思想界的「黑馬」躍出，當然贏得眾多青年學子的追捧。記得有一天晚上，我去自習時，路過師大一階梯教室，發現許多學生爬到窗戶上，還有許多擠在教室門口，甚至有不少人就站在教室外草坪上聽。我好奇地前去問一個同學，才知是曉波老師在演講。我也就想努力設法擠進教室看看，但人實在太多，最後還是沒能進入教室，於是只好在窗外牆根下聽。那有些嘈雜的擴音器中傳出一個稍帶口吃但字句宏亮而富有穿透力的聲音，其中洋溢著指點文壇、睥睨天下、傲視羣雄的氣概，給人一種千古文壇捨我其誰之感。事實上，讀劉曉波先生當年的文章，也能強烈感到他那種言詞的犀利、辛辣、離經叛道與不可一世。所以，聽其演講與讀其文章，都給我一種曉波老師是個孤傲不羣而難以接近的人的感覺。後來，爬在窗戶上的一個同學累了，下來休息時，我乘機爬上去探頭遠遠看了眼裏面講臺上坐著的劉曉波先生，由

於相距較遠，又加裏面人實在太多，因此留下的印象並不深。而八九反腐愛國民主運動期間，我在高校對話代表團中活動，而劉老師在天安門前引領抗爭，因此也沒有機會接觸，以致十多年後，再見到時，我都認不出他來。

2002 年秋的一天，任不寐先生到北京出差，住在動物園附近的賓館，電話約我過去一見。我到時發現房間中坐著好幾個人正在圍著一個說話有點口吃者熱烈辯論。任不寐先生上前介紹這個被圍者是劉曉波。當時我有點吃驚，仔細看了看，才模糊地感覺有點似曾相識。於是上去握手說：「劉老師可是我們八十年代大學生的偶像啊。我是北師大 85 級哲學系的。是聽過您講座的學生。」當時劉老師楞了一下，辯論中斷，似乎想問我點什麼，但最終還是什麼也沒有說。

劉老師讀研期間曾教過我們 85 級哲學系認識論後出任教育部部長的袁貴仁先生是室友，因此可能他對我報出 85 哲學系有所觸動，或者想瞭解點什麼。然而，在我與劉老師隨後數年的交往中，卻從來沒有聽他提起過與袁貴仁先生的交往事宜。

記得當天圍著劉曉波先生辯論的人中有萬延海，另外幾個人的名字就不記得了。由於當天我有急事，大家去吃晚飯時，我就先行告退。之後應師友們之約，在參加北京同仁們的聚餐時，又有幸碰到劉老師，於是漸漸熟識起來，感覺劉老師與我上世紀八十年代形成的孤傲不羣印象有很大出入。

2003 年春節前，在一次聚餐時再碰到劉老師，席間談到獨立中文筆會，我表示願意加入筆會，而時任筆會會長的劉曉波老師則當場表示願作我入會的介紹人，這讓我感到曉波老師待人的真誠與平易。

還有一次由鮑遵信先生出面召集在京師友們聚餐。當天由於人較多，雖沒有與劉老師說上幾句話，但那次聚餐中劉老師的一個舉動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當一名服務員來收盤時，有個盤中還剩下幾根青菜，那服務員已經將那個盤子端起準備拿走，只見劉老師趕緊伸手從服務員手中接過那盤子，將盤中剩菜與湯汁一併撥到自己碗中全部吃掉。那種節儉，真讓人感動到吃驚的程度。後來，我多次與劉老師吃飯中，特別留意了一下這個情況，發現曉波老師都保持著此可貴的光碟習慣。

2004 年中秋節前的一天下午，我到劉老師家拜訪。當時我在北京一民辦中學做管理，於是他較詳細地問了一些民辦學校的情況。我因身在民辦學校中，對其中存在的投資者唯錢是從問題深表憂慮。他聽後不無疑惑地問：「民辦學校雖有很多問題，但總比公辦學校要好吧？」對這個問題三言兩語顯然無法說清，我只是說中國專制極權下的民辦學校與民主社會市場經濟下的民辦學校是不一樣的，在某種程度上與教育的本質脫離得更遠。後來，劉老師表示願意在方便時到民辦學校去實地看看。由於我不久就離開了那所民辦學校，原本想請劉老師前往考察的願望也就沒有實現。

2005 年夏，代理陝北油田案律師、我的大學同班同學朱久虎被陝北地方當局拘押後，知識界掀起了營救熱潮，我為此寫了〈風雨維權路——記朱久虎律師的維權歷程〉予以聲援。有一天晚上，我忽然接到曉波老師的電話，他說自己也寫了篇為朱久虎呼籲的文章，其中有些材料引自我的文章，特意告知我一聲。我當時聽到很高興也很驚訝，為劉老師治學著文的嚴謹而深深感動。這也為我以後寫文章樹起了標杆，讓我在任何引用證據材料上都不敢草率。

2007 年 11 月 3 日，中國當代民主導師鮑遵信先生不幸去世後的告別會在北京東

郊殯儀館舉行，當天早上因警方阻擾而使告別儀式無法按時舉行。我趕到時看到劉曉波老師與到場警察交涉無果後那種悲憤落淚的情形，這是我唯一一次親見曉波老師落淚。當然，那是為鮑老去世還遭到如此不公對待的傷感落淚！但誰也沒有想到十幾年後，曉波老師自己離去時的遭遇竟更倍淒慘與不公。

### 三

2008年7月22日晚上，借奧運會嚴控到來前的間隙，著名憲政學者張祖樺老師召集劉曉波、王力雄、唯色、莫少平與我，到著名法學家于浩成先生家附近一酒店聚餐，八十三歲高齡的于老在他女兒陪同下前來飲酒聊天，而曉波老師一如過往地以茶代酒。席間大家合影留念，我與曉波老師合影時，我站到曉波老師後邊，讓曉波老師坐著，結果曉波老師堅決不同意，要求要麼兩人站著，要麼兩人都坐下。此舉動一掃我上世紀八十年代對劉老師性格孤傲的判斷，深深感到曉波老師原來是如此平易近人。

當晚聚餐大家談得熱烈，喝得盡興。但不知何故，我竟有種隱隱的不祥之感，當時我捕捉不到這種不祥究竟來自哪里，反覆思考後感覺好像是張祖樺老師在做入獄前的後事安排。因為當時〈零八憲章〉行將發佈，相關工作已進入緊張運作。說實在的，對於〈零八憲章〉出臺的風險，在我所接觸的人中惟張祖樺老師有最準確而充分的預估，因此他為入獄作好了準備。但局勢詭異的是，最後居然當局沒有將張祖樺老師投入大牢，卻重判了劉曉波老師。如果說當局沒掌握情況，那顯然不是，因為張祖樺老師面對警方都公開聲明自己對〈零八憲章〉負責，但最後當局卻放了張祖樺老師而重判了劉曉波老師，雖然後來有人解讀這是為了逼曉波出國，但當局深知〈零八憲章〉的歷史份量，有意避開政治家張祖樺老師而免於樹起政治強敵，卻將國際聚焦轉向文學家劉曉波而稀釋掉憲章的後續衝擊力，並由此使劉曉波老師在有形的監獄而讓張祖樺老師在無形的監獄中予以控制，這可能也是當局的一大圖謀。當然，劉曉波先生在〈零八憲章〉上所起的作用及其八九之後為中國人權民主的不懈抗爭，使他有足夠的資格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不僅如此，中國還有一批人如天安門母親、張祖樺、劉賢斌、陳西、郭飛雄、高智晟、秦永敏等等，幾十年不懈為推進中國人權民主進步而頑強抗爭者，都配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榮耀。

當晚，聚餐者雖明瞭隨著奧運即將到來的嚴控，會在一段時間無法再見面，但卻萬萬沒有想到，居然與曉波先生自此一別成永訣。

### 四

2008年12月8日晚上，我正在電腦前流覽資訊，忽然接到張祖樺先生、劉曉波先生被警方帶走並被抄家的消息，認識到當局對行將公佈〈零八憲章〉的鎮壓開始了。之後劉曉波先生先被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刑拘，後雖被改為監視居住，但之後又被逮捕，並於2009年12月25日耶誕節被判處十一年重刑。

2009年元月10日晚上，我被北京市國保總隊刑事傳喚並抄家。當時國保餘總隊長在與我談話中講劉曉波老師說了我參與〈零八憲章〉中的一些活動，要我交代有關情況。我當然知道這是國保用曉波之名來誑詐我，但考慮到曉波老師被拘押後一直與外界沒有聯繫，就想乘機設法見見，以瞭解曉波老師的情況。於是就要求國保

讓我與曉波老師當面對質。國保自然也沒有同意。再見曉波老師之願就終沒有實現。當然，在曉波老師開庭判刑當天，我被房山區國保看守在家，無法前往法院。到判刑宣佈後，我曾不無譏諷地對國保說：「你們終於將諾貝爾和平獎給中國人爭來了！」並且直言：「難道你們真能將劉曉波先生關押十一年？」我當時堅信：中國已到了隨時大變的關口，不會再延遲十一年的，所以劉曉波老師必然在刑期不滿中得到釋放。

然而，事實卻是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地過去，中國不僅沒有轉向文明，而且在野蠻倒退中狂奔，而曉波老師在監獄中熬過了九年，眼看就要刑滿出獄，卻忽然於 2017 年 6 月 26 日傳出他罹患肝癌晚期，並隨之很快走完了人生之路。

## 五

我生有幸得識曉波老師，由八十年代認為他傲岸不羣到後來接觸親感他溫和理性而平易近人，期間承載著中華民族千年劇變的劫難對個體生命的改變。誠如曉波老師自己所言「在我已過半百的人生道路上，1989 年 6 月是我生命的重大轉折時刻。」但在這紛紜變幻的外相中，曉波老師有著頑強堅守的不變的本原——我沒有敵人！

對於「我沒有敵人」之論，各界爭議較大。要想真切理解曉波先生此論的深意，還得回望此論出臺與演化的歷程。

1989 年 6 月 2 日，劉曉波在天安門召集侯德健、周舵、高新舉行絕食時，起草的〈六·二絕食宣言〉中提出「我們的基本口號：1·我們沒有敵人！不要讓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們的智慧和中國的民主化進程！」

2009 年 12 月 25 日，劉曉波在北京市中級法院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開庭時作最後陳述——〈我沒有敵人〉，其中再次明確宣示：「我堅守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絕食宣言〉中所表達的信念——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並作出解釋：「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由曉波老師自己的陳述中，可以看到「我沒有敵人」是對自我的要求，是自我的人生準則，而不是對社會現實的描述，更不是否定社會存在民主與良知的敵人，因為他明確看到了「政權的敵意」。所以，當下許多對「我沒有敵人」的爭論都是脫離了曉波本意。

## 六

「我沒有敵人」雖然是曉波老師人生堅守的信條，但它點到了後極權社會的命門，是後極權體制的死穴，具有社會學、政治學與哲學的意義與高度，本質上與東歐轉型期哈維爾、瓦文薩等一批思想家的精神相通，在某種程度甚至可以說就是東歐轉型思想的中國表述。

事實上，後極權社會需要敵人，患有敵人「依賴癥」，因而會持續不斷製造敵人。

因為：後極權社會需要不斷揭批、防止、鎮壓否定無產階級專政的各種意識形態上的「敵人」。如果沒有了這種「敵人」，後極權社會就顯示不出自己意識形態的堅守，而這種立足階級先進與落後鬥爭的「敵我」意識形態，只有不斷尋找鬥爭的

「敵人」，才彰顯其革命性。所以後極權社會在意識形態領域不斷展開反對、清理「敵人」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精神污染、普世價值等等運動。

如果後極權制度不在外塑造起「敵人」，在內尋找各種超越權力控制的勢力定性為「敵對」，就找不到行使制度鎮壓慣性的依據，制度的鎮壓機能就面臨喪失，這會根本危及後極權社會的統治，所以後極權社會需要「敵人」來延續制度。

後極權主義面對合法性問題通過尋找「敵人」陰謀來對民眾恐嚇，對統治集團自身警戒、安撫，從而為延續自身粉飾、壯膽。

既得利益集團為維護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阻止社會改革，社會中那些可能觸及、影響既得利益最大化的改革訴求就被權貴集團（既得利益集團）名之為「敵對勢力」企圖「顛覆國家政權」或「西化」，從而將一個社會改革問題上升到意識形態與政權問題上，由此將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維護變現成政權維護與意識形態捍衛，使社會改革問題政治化，改革路徑分歧「敵對」化，進而實現綁架組織，綁架國家以維護自身利益之目的。這種為維護既得利益而借用「敵人」來救助，在後極權社會是極為普遍而有效的。

後極權主義對「敵人」的需要顯示出其存在的嚴重合法性危機。在外，世界對極權主義的危害已產生普遍的警惕與拒阻，在內，民眾的法制與人權意識日益覺醒，抗爭事件越來越多。由此導致了統治集團的整體性恐慌，而恐慌的直接反應就是對一切質疑與反抗進行嚴酷鎮壓，將一切異己的聲音與行動「消滅於萌芽狀態」，這就需要挖掘「敵人」甚至製造「敵人」，通過對敵人的發現與鎮壓來達到恐嚇民間與凝聚自身之目的。所以「樹敵」也成為後極權社會賴以存在的一大支柱。為填充虛空的合法性，後極權體制努力尋求社會「敵人」普遍化、暴力化。在這種強烈需要「敵人」救濟情況下，後極權主義向前邁進到主動製造「敵人」上。從某種意義而言，極權主義與人類為敵就是在製造敵人。極權主義將人類在資源有限條件下的競爭上升到理論的意識形態的高度，從意識形態高度宣判了「敵人」的滅亡與「我方」的勝利，使相互競爭變成「我方」消滅「敵方」的歷史、道義責任與使命。在這種使命下，「敵人」成為一種制度性依賴。

在後極權社會需要敵人、依賴敵人而存續的情況下，「我沒有敵人」豈不正好痛擊到了極權毒蛇的七寸，是對極權體制的釜底抽薪，因而具有現實與理論層面的價值。就此而論，中共當局重判劉曉波正是被「我沒有敵人」打到痛處的反噬。

劉曉波先生永垂不朽！

2017年10月21日，劉曉波離世百日紀

**王德邦**——北京作家，獨立中文筆會會員；1989年學運時是北京師範大學哲學系學生，高校對話代表團北師大代表，北師大學生自治會理論宣傳部負責人之一。

# 回憶劉曉波操持的一次葬禮

溫克堅

2003年我和劉曉波熟識以後，我每次去北京，和他吃飯就是必不可少的一個安排，而他有其他飯局的時候，也會經常喊我一起去，這樣一來二往，先後認識了很多師友，其中就包括包遵信先生。

八十年代包遵信先生主編的《走向未來》叢書，是當年啟蒙潮流的重要部分，對那個年代處在高中時代的我們而言，讀起來有點似懂非懂，但在各種思想熱潮席卷之下，我們也囫圇吞棗的看了不少這類書籍，可以說，正是包遵信先生那代人的共同努力，八十年代社會氛圍有點自由氣息，也給我們後來對民主和自由的追求鋪上了一層底色。

多年以後，當我有機會見到包先生的時候，他已經鋒芒淡去，變成一個步履蹣跚的老先生，曉波和包先生淵源深厚，曉波繫獄時候，包先生也四處奔走，對劉霞照顧頗多，因此曉波夫婦和包先生感情深厚，他們親切的稱呼包先生為「包包」。

被牢獄折磨後包先生健康一直沒有完全恢復，醫生明確建議他不能再喝酒。不過包先生有點貪杯，在飯局裏，他必須徵得劉霞的同意，才能小小的抿一口。

2007年10月，包先生健康惡化多次住院，曉波夫婦都陪同在側。10月28日，包先生終於不幸仙逝。

我從新聞裏看到包先生去世的消息，和曉波通話時，他語帶哽咽的確實了。第二天，我飛去北京，希望能在葬禮安排方面幫點忙，同時和朋友們一起送別包先生。

曉波是包遵信葬禮安排的實際主導者，葬禮安排牽涉方方面面，事務繁瑣，十分辛苦。曉波除了和家屬商議協調殯儀館墓地等事項外，還要修訂包先生的訃告，同時安排人記錄各界朋友發來的唁電，曉波讓余世存、薛野等人負責撰寫挽聯，我在邊上打點下手，偶爾跑個腿。

挽聯寫好後，要一張張鋪整齊，卷好再送到殯儀館。最後彙總挽聯很多，需要一個大箱子才能裝進去，但我們當時工作場地沒有箱子，我提出我去找個箱子，曉波說我不熟悉，他自己親自出去，不到半個小時，他拿回了一個大號紙板箱子，我



們把那些挽聯全部放進去了。我一直沒問曉波是如何那麼快速的搞到那個箱子的。

到了殯儀館後，我們把一些重要的挽聯懸掛在告別儀式大廳四周的牆壁上，這個工作主要是馬少方和我做的。一開始，我們把膠水塗在挽聯背面，然後爬上梯子，把挽聯粘貼在室內牆壁頂上頂，然後懸掛下來。但那個季節，北京十分乾燥，或許當時膠水質量也不給力，開門關門帶動的空氣震蕩，會把一些挽聯給拉扯下來。後來，馬少方找到了一些圖釘，他把圖釘定在挽聯的邊角上加以強化固定，我則在邊上幫扶著梯子。

包先生遺體告別儀式開始前那個凌晨，我們很早就到了現場，曉波再次仔細的查看了花圈擺放，確保挽聯和名字不會被遮蔽，同時也再次核對了挽聯和之前記錄，確保沒有遺漏。

當然，所有這一切活動，都是在北京政治警察監視之下進行的，我們知道，當時數名殯儀館員工就是北京政治警察臨時裝扮的。對包先生的葬禮安排，或許出於對死者為大的傳統的敬畏，一開始政治警察並沒有干涉，但隨著後來參與悼念人員規模的不斷擴大，他們開始有些驚恐，態度就越來越惡劣，裝扮成殯儀館員工的政治警察也幾次故意刁難，一度引起曉波震怒，幾乎要和現場維持秩序的警察發生衝突。

對曉波和包先生家屬來說，安排這次葬禮並沒有任何政治動機，但由於包先生的影響力以及對歷史記憶的共同感受，這次葬禮成為很多年以來北京自由派知識份子的一次大聚聚，先後到場的有三百多人，石扉客當時不無傷感的形容，這是一次從廣場到陵墓的政治場景的轉換。包括趙達功在內的很多外地前來悼念的朋友，參加完儀式之後就被匆忙趕過來的本地政治警察帶回了。不久浙江政治警察也電話我，讓我盡快離開北京。

我後來寫了一篇悼念包先生的文章〈薪盡火傳——告別包遵信先生〉。印象中，馬少方後來也寫過一篇文章，第一句就是「那一天，風如刀割」……

關於包先生葬禮和劉曉波前前後後的忙碌，我見證的只是非常小的部分。但這些部分卻反映了外界未必熟悉的劉曉波的一面。他做事考慮周全，嚴謹細緻，盡心盡力。事實上，他在擔任獨立中文筆會會長和理事期間，主持《民主中國》雜誌，推動〈零八憲章〉運動等等過程中，都展示了這種人格特質，這些人格特質，連同他深厚淵博的智識和強大的政治意志力，使得他成為中國民主化進程中的一座豐碑。

多年之後，我怎麼也沒有想到並且依舊難以接受的是，曉波會以這種方式突然離開我們。因此，每每我要提筆寫點文字，回憶曉波的時候，就會陷入一種巨大的傷痛和茫然，不知如何講述那些往事。我明白我必須走出這些內心創傷，我希望將來能在一個更合適的環境裏來回憶和曉波的所有交往，來描述他巨大的感召力，以及他帶給我知識和人生歷程上的影響。

**溫克堅**——浙江作家、學者，獨立中文筆會會員。

# 雙重噩耗，無以復加

王金波

我跟劉曉波第一次見面是在 2007 年 7 月，他和一些朋友為剛出獄的高洪明接風。那次聚餐一共有九人，還有江棋生、李海、楊寬興、莫之許、薛野、劉荻。吃飯期間楊寬興給我們八人拍了些照片，留下我跟劉曉波的唯一合影。後來我跟劉曉波又見過幾次，不過不多，總共大約五次。其中一次是 2008 年 2 月 23 日，我在萬聖書園聽阿城講座，講座結束後劉曉波、楊寬興、溫克堅也到了，而且正好碰到從英國來的馬建。最後一次聯繫是 2008 年 11 月 10 日，我在 Skype 上請他幫我修改一篇文章，兩天後我返回山東老家陪護父親看病，12 月底回北京時他已被抓。



順時針：劉曉波、莫之許、李海、劉荻、王金波、薛野、江棋生、高洪明（楊寬興攝影）

這不到一年半的時間裏，有三個月的時間我跟劉曉波有著較為頻繁的聯繫，經常在 Skype 上留言和語音。這段時間的交往，讓我深切感受到劉曉波在跟別人接觸時那種深入骨髓的人格平等意識，明白了他為什麼在那麼多的圈子有好朋友。而且，我親眼看到他為剛入獄的胡佳聯繫簽名呼籲，為城鄉戶籍二元制下受歧視的「農民工」呼籲，為「三一二事件」後遭受嚴厲打壓的藏人呼籲。2008 年 3 月 29 日我被北京的市局、分局、派出所三級警方聯合傳喚後，被迫減少了跟劉曉波的接觸。但我沒感到劉曉波因此對我不滿和疏遠，相反，他還積極幫我申請「雅虎人權基金」資助，並明確對我說：「這個錢就是給你這種人的，你獲得這個資助天經地義。」

我跟劉霞第一次見面，是在一個飯局，她和劉曉波都在。此後我跟她聯繫很少。2010 年 2 月我開始跟劉霞接觸較多，直到八個月後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其中感受最深的近距離觀察劉曉波劉霞的愛情，是我和劉荻、莫之許、王仲夏陪劉霞去錦州探監那次，以至於我在記錄這次探監經歷的文章的開頭把王仲夏的感嘆作為題記：「越是接近劉霞一家，越是看不見民主，滿眼是壯麗到令人窒息的愛情。」

我和妻子 2008 年領結婚證，2009 年婚禮先後在我老家和她老家舉行，惟獨沒在我們平時生活的城市北京舉行。其實我原有在北京舉行婚禮的計劃，並打算請劉曉波主持。2010 年我和劉霞說起這個遺憾，劉霞說等將來劉曉波出來了再補上吧。

2010 年 10 月 6 日，劉霞跟我單獨見了一面，談及兩天後的諾貝爾和平獎。她說，不管能否得獎，都可能會有記者採訪，如果她能見到記者，當然好辦，如果她無法見到記者，最好有人代她出面表達對記者的感謝。她讓我回家想想誰合適。晚上回家後，我左思右想找不到合適人選，因為我跟他們夫婦接觸有限，對他們的人際交往圈子不熟。後來在推特上看到莫之許準備從四川飛回北京，就向劉霞推薦莫之許。劉霞同意了。於是我約莫之許次日見面。7 日晚上，剛飛回北京的莫之許跟我見面，我把情況告訴他，他非常高興，和我約好次日下午在劉霞家小區門前見面。

2010 年 10 月 8 日下午，我和莫之許、劉荻、李海、王仲夏、杜冠宇、張賈龍等人在玉淵潭南路九號院門口見證了那個歷史性時刻。當天晚上劉霞與外界失去聯繫。10 月 10 日我發表《感動與激勵——寫在曉波獲獎之後》。晚上劉霞的推特賬號開始發言。全世界都在關注劉霞的動向，所以大家都在猜這是她本人發的還是被盜號了。我想辦法跟劉霞直接通話，證實是她本人發的，並代她公佈劉曉波對獲獎的反應：「曉波對霞姐說，這個獎首先是給六四亡靈的。曉波哭了。」

我跟劉霞的直接聯繫持續到 10 月 18 日，此後完全中斷。

我史無前例地被上崗，持續了六十二天。隨著頒獎典禮的臨近，對我妻子的監控也達到匪夷所思的程度，僅僅因她曾出國留學並一直持有有效護照。

2012 年 12 月 6 日美聯社報導對劉霞的突擊採訪，劉霞那委屈哭泣的鏡頭深深定格在了我的腦海。幾天後分局國保找我，我說現在已經證實劉霞一直被你們非法拘禁，你們沒法否認了吧？國保說你怎麼知道那個報導是真的？我說這好辦，你帶我去劉霞家看看如何？國保不接我話茬。

2012 年 12 月 28 日晚上，在為劉曉波五十七歲生日而舉行的聚餐之後，我和徐友漁、郝建、胡佳、劉荻等人去了劉霞家。遠遠看到劉霞在窗口，我喊道：「霞姐，我是王金波！」劉霞高興而又有節制地做了回應。徐友漁等人突破保安防線衝了上去，我則留下纏住保安，直到徐友漁等人下來。雖然我沒上樓見到劉霞，不過不後悔。這是繼二十二天之前美聯社記者突訪劉霞之後的一個新突破。現在想來，那晚的行動很刺激，因為事先沒想到那麼做。至今，一聽到河南話，那個保安驚慌失措地搖著頭、無知而又露怯地聲稱「劉霞？不行不行」的視覺和聽覺的雙重記憶就會浮現在我的眼前和耳畔。

2014 年初劉霞的電話開通以後，我跟她又可以直接聯繫了。這年 11 月我回山東老家陪護父親看病，此後有段時間沒給劉霞打電話。有次有事給她打電話，她問：「你回老家陪你父親住院了？」我說是。後來聽說她父親也病重，於是每次打電話都彼此問「你父親怎樣了」。不過我給她打電話次數並不多，尤其是去年 4 月 1 日她的生日以後，直到今年 4 月她母親去世後才打電話安慰她幾句，並告訴她我還在老家陪護父親。

今年 6 月 26 日，我父親去世前三個小時，劉曉波患癌的消息震驚全世界，我的電話、微信不斷接到問詢。那三個小時，我的心情之複雜，至今無法描述，恐怕永

遠也無法描述，這個世界上，大概沒有第二個人能夠體會。

2017年7月13日，劉曉波永遠離開了我們。劉曉波的「頭七」，恰是我父親的「五七」(注)。我父親的「百日」是今年中秋節，劉曉波的父親劉伶則於2011年中秋節去世。

很多人為劉曉波流了淚。不過，我沒為劉曉波流淚。這是因為，我不可能單獨想起劉曉波的去世。劉曉波的患癌和去世，與我父親的去世，對我來說，已交織在一起，不可分割。我已麻木，無以復加。

**註：**在我老家，人死後初期的祭奠儀式(上墳)只有「三日」(死後第三天出殯)、「五七」(不是第三十五天，而是根據死者子女情況、陽宮日和天干地支計算，通常為第二十天左右到三十多天不等。而且，這個日子通常有兩三個，家人可任選其一)、「百日」(第一百天)等，很多地方非常重視的「頭七」、「尾七」在我老家是不存在的。我父親的「五七」有兩個日子，6月29日我選了靠前的那個。

2017年11月3-5日於北京

**王金波**——北京作家，獨立中文筆會副秘書長；曾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受刑四年。

# 最後一個理想主義者

## ——懷念我的師兄劉曉波

王瑋



1983年我在北師大中文系讀研究生，劉曉波早我一年，都住在學二樓。他是大才子，名士風流，率性天然，不拘小節，每天鬍子拉碴，穿著拖鞋大褲衩，去食堂打飯，到鍋爐房提開水。夏天光著大膀子在水房衝涼。說話口吃但嗓門特大。校園裏流傳著他的各種故事。其中一個說，他坐公共汽車，看見路上一個女郎，他追過去，鄭重其事對她說：對不起打擾你。你太美了。特立獨行，真率如此。

1985年的一天，他告訴我，說李澤厚明天來，邀我去參加他和李的辯論會。那時候李澤厚如日中天，是

學子們的崇拜偶像。我很激動，把好朋友大河隔著一個北京城叫來一起聽。來了才得知李澤厚沒有來，只派來他的一個學生。辯論在曉波的宿舍裏進行，七、八個人。劉曉波滔滔不絕，大批李澤厚，說李的書不但漏洞百出，而且觀念陳舊，他的挖掘中國傳統精華的思路對中國社會發展貽害非淺。我聽得瞠目結舌，心想，幸虧李澤厚沒來，否則如何下臺。那是我第一次對這個口吃而善辯的學兄刮目相看。

1986年，他畢業留校，我去了社科院一個雜誌社。那幾年社會思潮風起雲湧，知識界既興奮活躍又膚淺追風。9月，社科院文學所舉辦了一個關於新時期文學十年的大型研討會，邀請各路高手聚會京西。我在旅館走廊上碰見曉波。久別重逢，分外高興。我們正說話，文學研究所所長劉再復走過，說你就是劉曉波呀，文章寫得真好。當晚劉再復主持一個非正式的討論會，大家自由發言，爭相讚美新時期文學成就。這時劉曉波站起來，帶著東北口音，結巴著，說你們都說這十年中國文學怎麼怎麼好，我覺得就是狗屎。全場靜默，大家面面相覷。後面十五分鐘，劉曉波歷數當代文學弊端，論證為什麼那些尋根派現代派都是狗屎。旁若無人，語驚四座。第二天深圳青年報用頭版刊登了對劉曉波的大幅採訪，題目是〈危機——中國文壇的危機〉。這是劉曉波第一次進入全國媒體，引起廣泛關注，被稱為一匹黑馬，脫穎而出。

兩個月以後，他的著名的〈與李澤厚對話〉文章發表，引起轟動。文章全面批判了李澤厚的以儒學理性本質論建立起來的理論體系，提倡感性個性回歸生命，反抗傳統，全盤西化。李澤厚在中國學術界的霸主地位受到挑戰。他對整個知識份子羣體的批評，也異常尖銳，引起了官方注意。1987年，當時的文化部長王蒙點名批評劉曉波，稱社會主義大學不能培養自己的掘墓人，威脅要開除曉波的學籍（當時他正在讀博）。在隨後開始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被作為典型批判，文章和書都遭查禁。但劉曉波在青年學子中聲名遠播，1987年劉曉波做博士論文答辯，成為校園的一大新聞。我當時不在北京，未能恭逢其盛，據說由於參加的人太多，答辯委員會臨時把答辯改在容納四百人的階梯教室進行。人頭攢動，水泄不通，教育部長專門派人來監聽，創了北師大（也許是中國大學）的一個記錄。他的博士論文《審美和人的自由》，獲得委員會高度評價，全票通過。

1989年，曉波四君子在廣場絕食，成為運動領袖。我也一直在廣場，是曉波的foot soldier。6月1日夜，我和社科院的幾個同事反覆商議，認為軍隊已經進京，情況危在旦夕，需要從長計議，有必要撤回校園。那天半夜，我們決定去找廣場領袖談話，試圖說服他們。高自聯的總部帳篷支在紀念碑底下，需要檢查證件通過層層關卡。我說我們是社科院的，要找劉曉波。學生們都肅然起敬，領我們進去。到最後一道崗哨，說裏面在開會，不能見。隔著帳篷，我能聽見劉曉波的大嗓門在說話。左等右等，沒個結束，我們只好放棄。這是最後一次聽到曉波的聲音。

我們幾個社科院同事，堅持到六四最後一刻撤離廣場。我後來才知道，是劉曉波與軍人談判，達成協議，廣場裏的人得以和平撤出。曉波救了我 and 上千學生的命，避免了天安門廣場上的流血。今天回想，對中國對歷史，這個廣場上最後的妥協，是福還是禍？

劉曉波是中國知識份子中的另類。早年特立獨行，狂放不羈，電光霹靂般做鐵屋裏的吶喊。投身政治後，思想一如既往地深刻前瞻，而情懷變得深廣，胸襟變得開闊，性格變得老練，理論愈趨成熟，是罕見的集思想家和活動家於一身的克里斯馬式領袖人物。他的赤誠和膽識，腳踏實地的踐履態度，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犧牲精神，敢為天下先的不屈不撓的品質，無私無畏的人格魅力，在中國當代人物中無出其右。諾獎得主，當之無愧。假以時日，可以成為中國的甘地、曼德拉、昂山素姬。天禍中國，流年不利，一代偉人，英年早逝。神州陸沉，長夜漫漫，民主無期，水深火熱，哀哉痛哉。

逝者無情，生者有愧。曉波走好。

2017.7.14 聖地亞哥

王瑋——旅美華裔詩人、作家，語言學碩士，大學中文講師。

# 我見過他三次

韓三洲



昨天，天很悶熱，熱得人喘不過氣來。晚上躲在家裏空調下閑著翻看手機微信，突然看到他（劉曉波）死亡的消息。不一會兒，微信上都是哀悼懷念的刷屏信息，又過了一會兒，天色忽然大變，狂風大作，驟雨突至，還夾帶著電閃雷鳴。我不是所謂的唯物主義者，莫非這就是古人所講的天人感應，是天在哭麼？再一會兒，風停雨歇，悶熱依舊，黑夜更黑……

我見過他三次，還照了不少照片，可惜去年初更換電腦時，硬盤被人不慎格式化，幾千張照片及其文字都丟失了。所幸的是，在一個小 U 盤裏，還殘存著幾張照片，也多虧了這幾張照片，可以準確地印證見過他三次的時間。我不敢依傍名人，更不敢妄言「我的朋友胡適之」。我只是見過他三次，一個結結巴巴、靠文章起家、小我四歲的書生。

在此之前，聽說過他的很多傳奇，還在地攤上買過批判他的書，好像是批判「黑馬」什麼什麼的；地攤還見過他的一本油印論文，居然沒買，至今都很後悔。之所以對他有點感興趣，是因為我也是個結巴穀子，曾想到他一個口吃患者，不知是如何與人交往的，又是如何通過博士論文答辯的，而且還獲得那麼大的文學理論成就！

第一次見他，是獨立中文作家筆會給章詒和頒發自由寫作獎的那一天，照片上

的時間是 2004 年 10 月 30 日，在延慶大山深處的一個村莊。

我坐在大巴上，好像與焦國標同座，快開車的時候，他最後上來了，結結巴巴地與人打招呼，國標問我此人是誰，我說和我一樣結巴，肯定是他了。

那天，見到了很多人，除去章詒和，印象深的有浦志強、盧躍剛、朱健國，我還用我的第一個數碼相機，給他們照了相，而且自認為照得很不錯。還有那個寫底層社會的廖亦武先生，帶來一把長簫在吹，全場肅靜，哀婉動人。這張照片就是在簫聲中拍攝的，可以看到他的眼眶中閃爍著的淚水，現在，輪到我們為他掉淚了。

第二次見他，是 2005 年的 4 月 23 日，如果不是保留著唯一的這張圖片，我把這次見他記憶成第三次了。

記得那天是郝建老師開車，帶著我家老人，與他和崔衛平、不鏽鋼老鼠我們一起來昌平一個山窪乾涸的河道聊天，當時照了很多照片，老天有眼，還給我留下一張。當時他說了很多，有一個多小時，內容全不記得了，只記得一段話，他說姜文的禁片《鬼子來了》拍得很好，裏面有兩口子做愛的鏡頭，女人拍打著身上的男人說，「別歇著，別歇著！」把底層女性對性愛的渴求與直白，描述的十分真切。

第三次見他，是一星期後的 4 月 30 日，在地壇公園的東門一家飯店，飯店名字忘記了。我家老人請飯，來了有二三十人，除了他與高瑜，子明夫婦，秦暉夫婦，記得還見到了《八十年代訪談錄》的作者查建英，很高很瘦，見到了于浩成老人，胖胖的，很和善。我給他們一一照了相，還和他合影留念，可惜照片也都被格式化了，不過，老天有眼，居然留下了他與高瑜的一張合影。不過那天人多，沒顧得上聽他的高見宏論。

第二年即 2006 年的 10 月，我家老人去世。又過兩年，得聞憲章的事情，他再入囚籠；再以後，重刑入獄。接著，子明、曹思源先後去世，這一次，又輪上他了——就在昨天晚間，他在獄中離開了他所稱的一個「沒有敵人」的世界。

一個寫了一篇主張非暴力和平憲政的文章，居然被囚禁至死，這該是一個怎樣殘酷的世道啊！我雖為庸醫，毫無建樹，但也有點醫學預知，所以一聽到他患病的消息，就知道他的生命將不久於人世了。其間讀書，恰好看到于右任的一副挽聯，借鑒其意，也寫一副挽聯，謹獻給坎坷不平、命運多舛的他：

譽滿天下謗滿天下追求理想憲政踐行〇八憲政  
名起文章禍起文章幾度身繫囹圄終至人死囹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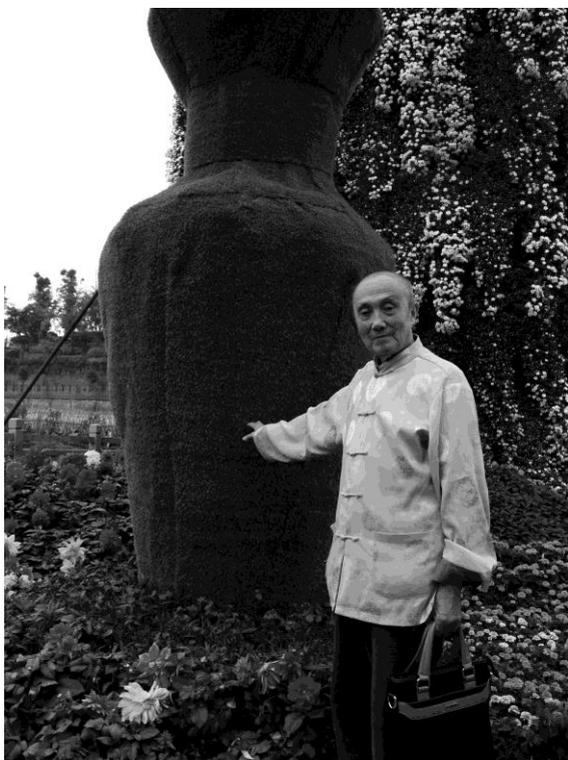
2017 年 7 月 14 日

韓三洲——北京作家，退休醫生。

# 沉重的記憶，永遠的懷念

——為劉曉波博士逝世百日而作

嚴家偉



有位詩人曾寫道「有的人活著，但他已死了；有的人死了，但他還活著」。劉曉波顯然屬於後者。他雖被極權專制當局迫害致死，迄今已一百天，按中國民俗，10月22日是他的「百期」。但他卻永遠還活在一切盼望中國實行民主憲政的仁人志士和公民們的心裏，所以曉波肯定還活著。而中國還有句話叫「死諸葛能退生仲達」，死了的諸葛亮的遺像還嚇得活著的司馬懿魂飛魄散慌忙退兵。而今大陸當局對一切紀念劉曉波，甚至在海邊遙祭曉波的民眾也恨得要死，怕得要命而予以抓捕關押。比當年司馬懿的狼狽樣有過之而無不及。由此可見曉波也還活在這些作惡者的心裏，使他們不時感到膽戰心驚。更有甚者，還有在海外為天朝效勞的文人，也趕在曉波逝世「頭七」之後，無端捏

造事實聲稱，牛年馬月台灣曾有報紙揭露劉曉波是「強奸犯」。並稱網上名人曹XX看見過該報內容。結果第二天曹先生便嚴詞辟謠稱並無此事。如此等等，無一不證明劉曉波不僅活在熱愛民主自由人們的心中，也還活在那些極力想維護極權專制的既得利益者之流的心裏，是他們心中揮之不去的惡夢。

筆者今年已年逾八旬，是1957年毛澤東製造「反右」政治大災難的倖存者。雖不敢妄稱是曉波的知己，卻與他有過幾度短短地接觸。所謂「管中窺豹」，而略知這位正直、優秀學者的一「斑」。於是在他辭世「百期」之日，將這段文字寫在下面，願與讀者分享。

那是在2007年的春天，本人才剛剛接觸到電腦與網絡。不好意思，就像曹雪芹先生筆下的劉姥姥走進大觀園似的，盡在出「洋相」。不過本人從來就有那麼個毛病，越是不懂的越好奇，越想去探個究竟。同時本人自幼就有個愛舞文弄墨的壞習慣，為此成了「右派」，蹲了大牢，差點把命都搭了進去，但幾十年過去了仍屢「教」不

改。此時，我當年坐牢時的一位朋友黃先生從北京來四川，我們品茗閑談時，黃先生興致勃勃地談起了海外的自由媒體電子刊物如今已是名符其實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盛況。並不無得意地出示了他一篇發表在海外自由媒體上的文章，更引起我極大的興趣。於是我傾囊中所有去買了一台二手電腦，便開始了這網上自由撰稿的生涯。

當時就連我老伴、子女都認為我是吃撐了沒事幹。一個年過七十的人了，還去搞什麼寫作，瘋了不是？我則不管別人的嘲笑譏諷，我行我素地幹了起來。不過根據我在大陸投稿的經驗，一個不見經傳的無名小卒的作品往往很不易進入編輯的「法眼」，海外媒體是否如此，我更不得而知。於是我向友人、山東某大學教師 L 君請教。L 君早已是網上自由撰稿人了，於是熱情地向我介紹了兩個人，叫我把作品寄給他們。一個是《民主論壇》主編洪哲勝先生，另一個就是劉曉波博士。這裏順便說一句，洪主編後來對我進行了不少的指教與幫助，因與本文無關，故按下不表。這裏就只談曉波吧。

2007年3月底，我向劉曉波先生寄去了我的一篇作品題為〈搬巨石記〉。說的是「文革」結束後各地相繼折除了許多遍地濫建的毛澤東塑像。我當時是監獄裏的一名「就業員」，當派我們去拆除獄中一座毛塑像時，我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老實說我當時不大指望劉曉波會把我的作品當回事，只好很客氣地稱他「劉老師」，請他斧正示教。可是不到48小時就收到了他的 E-mail 函，尤其是其熱情、謙虛出乎我意料之外，信全文如下：

嚴老：嚴先生：

我是晚輩，請直呼我曉波最好。

你的文章已經推薦給幾個刊物，請靜等回音。

希望您多寫您本人的右派經歷。你們這些右派，每個人的經歷都是一部大書。

曉波上 07 年 4 月 1 日

於是我回他一信，大意是說，論年齡我確實比你蠢長近二十載。但「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在為文述著上你才應是「師」。我今後就稱你小劉老師吧！

幾天以後，又收到他一信。

嚴老：

此文很好，將由「民主中國」首發，謝謝！

請在民主中國發出之前，不要再投他刊，也不要自己上網。

在境外刊物中，民主中國的稿費算高的，每季度結算一次。

希望多看到這樣的稿子。

晚生再次拜首。

曉波（07 年 4 月 5 日）

剛過了一天，又收到他一信：

嚴先生：

民主中國決定採用這篇稿子，但希望把題目改的更直接一點，叫做「右派們在

獄中砸碎毛澤東塑像」。

你看如何？

曉波上

對於我這樣一個無名小卒的作品，他不僅熱情推薦，而且為了一個標題，都在反復加以推敲，實在讓人感動。於是我回信說：

小劉老師：謝謝您的熱心幫助。題目也改得好。但有一點，當時參加拆除的人，並非全是右派。既有其他政治犯還有刑事犯，是不是改為〈「階級敵人」在獄中砸了毛的神像〉，或〈我們在獄中砸了毛的神像〉？您再推敲一下最後由您決定。再次謝了，此問

安好 嚴家偉敬上

最後，《民主中國》（當時的責任編輯是蔡楚先生）於當年 4 月用〈「階級敵人」在獄中砸了毛的神像〉為題刊發了拙文。以後，他又把我寫的〈「政治瘋子」李景孝之死〉和〈讓謊言見鬼去吧〉相繼推薦發表在《民主中國》上。並先後向我介紹了蔡楚、陳奎德、楊莉藜、一平、張偉國等諸位海外媒體人及《觀察》、《議報》、《人與人權》等媒體的情況，提供了他們的 E-mail 郵箱。我與曉波先生連「萍水相逢」都說不上，而且他自己都還生活在非常困難的環境中，卻如此對我進行幫助，用一句成語，真是一片「古道熱腸」的感人真情。所以到後來我真不好意思再去麻煩人家了。我們四川有句俗話「師父帶入門，修練在各人」，曉波先生是我在網上撰稿帶我「入門」的師父，「入門」後就該自己去「修練」了。

這中間還出現過一個小插曲，07 年的一天，一位「不速之客」的郵件，突然躡入我的郵箱，發件人是：「p\_knowledge」<p\_knowledge@126.com>。

一行大字為：此郵件已被監控。

為了不給人家多惹麻煩，除了逢節日問候他一下外，便很少再與曉波先生去信了。

2008 年秋，我去北京訪友旅遊，路過成都時，幾位「五七右友」在公園喝茶、吃飯，算是人家給我「接風」。幾位朋友知道我要去京，便說務必想法去見見劉曉波先生。「右友」朱國幹先生更出示了曉波先生寫給他的親筆信，詞謙意懇稱朱國幹先生為前輩，希望他們一定要把「反右運動」的許多珍貴史料保存下來。所以朱國幹先生又親筆寫了一信，托我務必當面交給曉波先生。其實我心裏對曉波先生也早已是「久欲一識韓荊州」了。

來到北京以後，雖然奧運會早已是曲終人散了，但那根「對敵鬥爭」的弦還是繃得緊緊的。10 月 2 號那天我到天安門前轉了一圈，只見警車遍地，警察如林，三步一崗，五步一哨，一個個虎視眈眈，好像遊客中有無數個本拉登或人體炸彈似的。老夫這把年紀了，就因為手上提了一個塑料袋，裏面放著我的幾篇詩詞，文章，幾張名片，一個小照相機。總重量最多一斤，包呈扁平形，並非脹鼓鼓，一眼就可從外觀上斷定裏面不可能有定時炸彈，或楊佳先生的快刀。然而卻引起了一位「人民」警察的「革命警惕」，他走過來以不容商量的口吻，要檢查我這個小提包。我很客氣地請他出示搜查證。卻遭到他蠻橫地拒絕。聲稱「這裏是天安門廣場，我們奉命行

事，不需要出示什麼搜查證」。而且未經我同意便粗暴地打開了我的提包。因此也使我大開眼界，原來在天安門廣場是可以不依法隨意搜查人的！

我回來把這事向朋友們一講，朋友便勸我：「你還想去見劉曉波呢，謹防人未見著先上了警車。此人和余杰是當局視為最危險的兩個人，不抓他們是做樣子給外國人看，表示中國還有人權」。我也覺得朋友的話不無道理，必須採取點「策略」，否則又會惹得我們的「人民」警察不高興。於是我去找到了我的另一位朋友，一位研究歷史的學者 Z 君。通過 Z 君的幫忙幾經周折才於 08 年 10 月 20 日傍晚，與 Z 君先乘地鐵到公主墳，出站後再「打的」去一家餐廳，約好曉波在那裏見面。一路上 Z 君告訴我「近來曉波特忙，今天好不容易才抽出點時間，咱們盡量長話短說，他真的很忙」。我說「我也沒有什麼大的事，只不過就是敬仰他，想見他一面。而且也是家鄉幾位右派老人托我問候致意而已」。

當我們來到餐廳時，看見有個高大的人拿著手機正在門口張望，我在網絡上看見過他的照片，一高興止不住對 Z 君大聲說「嗨！那不是劉曉波呀」？Z 君連忙制止我說「你嚷什麼」？我才一下醒悟過來，這「敏感詞」怎麼能大聲喊呢？

人們常說「文如其人」，曉波文筆的漂亮那是沒得說的，但他談吐並不十分流利甚至還有點口吃。不過他的質樸、謙遜和待人的真誠，一接觸到他，就可深深地感染著你。當我向他轉達成都「右派」老人對他的問候並遞上朱國幹先生的問候信時，Z 君在旁打趣著說「哎呀，你看成都右派老人都把你當成包公了」。曉波說「我一無權，二無勢，一介窮書生，只有筆一枝，什麼『公』也不是」。我說「我們中國紹興的毛筆有『金不換』之稱，曉波君的這枝筆就是除了真理與正義，萬金也換不了的」。他聽了連忙說「晚生何德何能，不敢當，不敢當」！

這時我們發現一個中年男子，既不像餐館工作人員，也不像顧客，就在我們附近轉來轉去。他既不招呼服務員，服務員也不搭理他。中國的一些事，人人都心裏明白，就是不能去說破。何況我們就是聚一聚，道一聲仰慕與問候，真是無事不可對人言，你想聽，就聽好了。不過我當天也感覺得到，曉波好像心事重重，所以餐聚也只有個把小時就結束了。現在回想起來他肯定是在為〈零八憲章〉最後定稿操著心，但他對此一個字也未提及，這是可以理解的。

當我看著他高大的身影慢慢消失在黑夜中時，我心裏既在為他的平安祝福，同時也在心裏十分肯定地認為，這個人將來肯定會成為一個歷史人物。而我此時的心情，就像一位北師大的學生說的那樣：「我為劉曉波感到驕傲和自豪」！這位學生這樣講，是因為劉曉波是他的校友，而我這樣講，是因為劉曉波與我既可算是朋友，也是指引我走上大聲為中國民主轉型而發聲之路的老師和領路人！

**嚴家偉**——四川作家，勞改隊退休「就業員」，1957 年「反右運動」後以「反革命罪」受刑十五年。

# 瀋陽行簡記

丁家喜



丁家喜（右）

丁家喜律師與其他幾位公民在 7 月 11 號下午 4 點左右，我們到中國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西側的一個路口，穿著劉曉波的頭像衫，拍了一組照片，表達對劉曉波先生的關心和支持（橫幅文字為「曉波好」、「曉波挺住」、「自由才能救曉波」）。本來想去中山廣場，但一看到廣場上的毛澤東像，歐陽經華先生堅決不去。他說：「我以這樣的老鄉為恥。」

我計劃在 7 月 13 日上午開車回北京，但在 7 點一刻被攔截。隨後我被四名不明身份的人帶往瀋陽市公安局辦案接待中心，被非法囚禁在詢問室直到至 7 月 15 日上午 10 點。在這段時間，無人穿警服，無人出示證件，無人出示手續，無人說明案由。聽他們聊天得知，他們在執行公安部的維穩處置程式，這是我聽到的又一新的違法

程式。

7月13號上午8點到12點，下午8點到12點兩次被詢問。我明確告訴他們，我不會回答他們的任何詢問，也不會在任何筆錄上簽字，我所做的一切都已經在網上公開，他們可以去調查，或者隨意羅織罪名、濫用刑罰。但我相信自己的行為合情合理，不違法不犯罪，我的朋友們也一樣。

他們問，你為什麼把照片發給外媒，這不是打老大的臉嗎？他們給我看了香港週刊的截圖，這份刊物引用了我推特上的圖片。他們問，這圖片得賣多少錢啊？我現在正式給公安部門提個建議，請所有公安單位和每名警員都上推特吧，佈下天羅地網，確保第一時間獲得資訊，別讓肥水留了外人田。我聲明，引用我發佈的資訊，一律免費。

有個看管我的人屬羊。我說，劉曉波屬羊，我屬羊，你也屬羊，都差一輪；還有二十六歲的羊，十四歲的羊，兩歲的羊；一個自由民主法治的中國，劉曉波這只羊是看不到了，但我們這些羊一定能看到；如果我們努力，很快就能看到。他問，三十年後能看到嗎？我回答，一定能看到，或許三年，或許十年，但絕對用不了三十年。

15號上午10點，我被移交給北京來的四個人。其中一人告訴我，劉曉波已經在13號晚上去世。隨後我被帶到赤峰。16號上午我被告知，劉曉波遺體已於15日火化，骨灰撒向大海。之前和朋友聊天時，我預判不會放劉曉波出國治病，骨灰會撒到大海，家屬會感謝，原因就是：他們企圖控制一切，當然，是在這片土地上控制一切。

歐陽經華先生是40後，孫大壯先生是50後，我是60後，王霞妹子是70後，李明兄弟是80後，不同年齡的人，看似偶然更是必然地站到一起，表達對劉曉波先生的敬佩和關心。我們都有相同的追求：自由民主和法治。中國這片土地上，還有無數這樣的朋友，走到一起的人一定會越來越多，終將形成不可阻擋的力量。

今天是劉曉波先生頭七，很多地方很多人以多種方式在紀念他。我相信，很多人的想法會和我一樣，紀念他的最好方式就是一起努力改變中國。

他付出生命代價努力追求的目標是，一個自由民主法治的中國，我們也願意以同樣的努力去追求。只有在一個自由民主法治的中國，他的所有付出才能得到真正的紀念和應有的評價。

2017年7月19日

**丁家喜**——北京異議人士，工學碩士，前工程師、律師，新公民運動主要成員，2013-2016年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受刑三年六個月。

# 述評篇



# 劉曉波和他的政治主張

鮑彤

1986 年底安徽、南京、上海、北京的學生運動期間，我知道了劉曉波的名字，沒見過面。2007 以前劉曉波找過我兩次，兩次都被警察阻攔，不讓進來，他只好回去。我同劉曉波熟悉起來，是 2007 和 2008 年的事，我們很快成為好朋友。

劉曉波的專業是文藝理論，在學校裏研究過杜勃羅留波夫、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一派的學說，但是他不滿足。



他喜歡自由自在地生活，喜歡交友、聊天。就性情而論，他不是政治人。同他聊天，平民瑣事，天南海北，古往今來，幾乎不涉及政治。順便提一筆，我們喝茶聊天時，總有人在邊上聽著。

熟悉以後，我們每月必喝一次茶聚聚。因為種種原因，並不是每次都能聚成。他知道我每天在玉淵潭公園打太極拳，有事還到公園來找我。2008 年有一次，他到公園來，說幾個朋友在起草〈零八憲章〉，希望一起商量。自此，我們見面就不僅每月一次了。

〈零八憲章〉不是劉曉波一個人起草的，是他主持，大家一起商量。他很註意聽各種意見，對不同意見，他聽得特別仔細。他也爭論，但不固執，擇善而從。怎麼能夠讓更多的人認同，他就贊成怎麼寫。

劉曉波性格很溫和，不走極端，不主觀，不偏激。後來的那篇〈我沒有敵人〉，確確實實反映了他的為人和主張。

起草〈零八憲章〉的時候，他也徵求我的意見，但是我的意見很簡單，只有一句話：越簡單越明白越溫和越好。除此以外，我沒有別的意見。幾個朋友一起商量，忙忙碌碌，他最忙。

劉曉波聰明，知道做事情一定要合法，這樣，參加的人會多，阻力會少。〈零八憲章〉裏面所寫的內容，幾乎統統都是憲法上講了的。我們只是要求認真落實執行，沒有別的新的東西。在正常情況下，本來全部是當局可以接受而沒有理由拒絕的。

比方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老百姓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新聞自由、集會結社自由、遊行示威自由，統統都是明文載入憲法的，都是政府應該保障的事情，沒有什麼「顛覆」的東西。

當時估計到，有兩個問題可能是比較難於被接受。一個是「軍隊國家化」，還有一個是「聯邦制」。這兩個問題本來也考慮過是不是不說，但是共同的結論是為了愛國，非說不可，這是我們愛國者的責任所在，不能苟且。

軍隊如果不國家化，難道可以私有化、黨派化、軍閥化嗎？不應該啊。國防軍天經地義必須國家化。軍隊國家化是 1937 年一直到 1946 年毛澤東周恩來一貫的主張，不應該動搖。

聯邦制是民主制度的基礎。中國這麼大，如果不實行聯邦制，那麼就是中央集權。從秦始皇開始，一切主觀主義都是和中央集權聯繫在一起的。所以聯邦制實際上是治理大國的對癥良方。美國的成功經驗證明，如果沒有聯邦制，如果沒有地方自治，民有民治民享勢必落空。中共歷史上就主張過聯省自治，這是綱領性的東西，是共產黨老祖宗的主張。毛澤東在湖南時甚至提到湖南要獨立，那就偏激得沒有分寸了。聯邦制和四分五裂壓根不是一回事，美國是聯邦制，誰能把她四分五裂？

劉曉波走的這條路是一條深思熟慮的路：一切立足於合法、和平，非暴力；溫和而不偏激，有根有據，有現實的法律根據，也有歷史文獻的依據。

當時大家都比較樂觀，因為據說中國要搞「和諧社會」。已經有了憲法，儘管不完善，但是裏面有好東西，落實好東西，應該阻力會比較小，贊成的人會比較多，應該沒有理由反對。所以大家都比較樂觀，我也很樂觀。

劉霞總是靜靜地聽。她愛笑，笑得極燦爛。但她是個憂鬱的人。她是詩人，畫家，喜歡照相。她的作品的基調是憂鬱和悲傷，悲天憫人看世界。〈零八憲章〉發表以後，當局居然把劉曉波抓起來判刑。我不知道劉霞有沒有什麼預感。我確實沒有這個思想準備。

劉曉波為什麼會被判罪，而且是重罪。愛國有罪，護法有罪，我至今搞不懂。當時清華大學有一個胡鞍鋼教授，他說中共的常委制就是集體總統制，這話在《環球時報》上發表以後，國內從來沒有人批評過，顯然是認真的有共識的。十六大、十七大的時候大概是每個常委各管一攤。逮捕劉曉波時，當時的政法委書記是周永康，所以我只能這樣理解：把劉曉波抓起來判刑是出於腐敗份子周永康的胡作非為。真相到底如何，相信將來會搞清楚。

後來劉曉波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殊榮，這是實至名歸。劉曉波找到了一條阻力最小，理由最充分的道路，他的最終目標是沒有人膽敢公開提出反對的。如果中國真的走上了民主的道路，那麼，不僅是中國人民的福祉，而且全世界將會得到一個負責任的大國。這對人類共同的文明發展可以起絕大的積極作用。

謹以此文紀念偉大的愛國者——劉曉波。

2017 年 7 月 13 日

**鮑彤**——北京作家；前中共中央委員、趙紫陽總書記政治秘書，1989 年因支持趙紫陽，反對當局用武力鎮壓民主運動，以「泄露國家秘密罪」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受刑七年。

# 諾獎有眼 曉波中狀元

沙葉新



## 一、初識劉曉波於上海

2006年11月3號上午，我突然接到曉波的手機短信：「沙兄：好！我今晚到上海，何時有空，見面聊聊。曉波。」接到此信，我深感意外，因為，我從未見過他，也從未用任何方式和他互通音問；還因為此前也有一個北京來的敏感人士要見我，卻給國安阻撓，甚至他要求只在我家社區大門外將禮物交給我我也沒得到允許。曉波的敏感度大大超過此人，他會受阻嗎？會有麻煩嗎？我也沒多想，就立即回信給他：「歡迎你！」

3號晚上曉波到上海，住在衡山路慶餘別墅。翌日上午九時我去見他。我本以為他是個很劍拔弩張的那種人，這是因為他在六四之前的毅然回國以及他那些鋒芒畢露的時政文章給我造成的印象。其實他不是金剛怒目的人，乍一看，他貌不出眾，語不驚人，說話還有點口吃，結結巴巴的反而讓我覺得他很老實，甚至有點笨拙。初次見面，雖不能說一見如故，但我對他頗有好感。

我和他聊了一會兒，便同去看望也住在別墅裏的王元化先生。王元化先生是曉波的博士論文的審讀者，有師生之誼。我本以為有王元化先生這樣的大傘護著，曉波至少在上海期間可以「脫敏」了；其實不然，第二天中午，我和曉波以及上海的一些朋友在我家附近的一家湘菜館吃飯時，仍然有國安尾隨監控。我們一共有九人，在一個包房內；國安有三人，二男一女，坐在緊靠我們包房外的雙排座位上。透過包房的玻璃門窗，雙方都可以清晰地看見對方的一切。

我問曉波，瞧這包房外的架勢，上海比之北京何如？曉波說，上海比北京緊，民主自由的氛圍不及北京，警察也比北京的厲害。於是曉波便說起他十幾年來和北京國安打交道的故事，說得大家哈哈大笑。他說他和在他家樓下監控國安都很熟了，幾乎成了朋友，只要不是他們非執行不可的命令，其他都可以靈活商量，雙方都還可以讓步。比如有一次，有一場國外精彩足球賽的電視直播，樓下的國安是球迷，就打電話給曉波，請求他當天晚上不要出去，不要出事，放他們一個假，讓他們看看足球。曉波就爽快地答應了。

朋們友聽了，都說這種事情絕對不可能發生在上海。我想也正因為如此，上海以後才發生了楊佳殺死六名公安的惡性事件以及上海公安「釣魚」的著名醜聞，兩敗俱傷。

我還想也正因為曉波不把國安當敵人，所以他在獄中才受到某種程度的人道待遇。我相信曉波並沒撒謊，更沒有為中共牢獄的黑暗塗脂抹粉。他說的是他本人在獄中所遇到的真實情況。至於他為什麼能如此，而高智晟卻受到極為殘酷的迫害，原因可能多種多樣，不能一概而論。比如北京和西安兩個地區有所不同，劉曉波和高智晟的影響也有所差別，等等，但曉波一直堅守的「我沒有敵人」的理念也可能是他在獄中境遇較好的原因之一，雖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原因。況且曉波說他在北京監獄受到較好待遇，僅僅說的是他自己，說的是北京的某座監獄，他並未推而廣之，說全國監獄都如此，所有政治犯都如此，所以我們不能苛責曉波。

## 二、劉曉波和零八憲章

2008年11月27日下午3時，深圳的趙達功夫婦來訪。一是探病問候，我當時開刀不久，大病初愈。二是受曉波之托，為〈零八憲章〉初稿的徵求意見和簽名而來。當晚，達功夫婦請我在蓮花南路一家私房菜館吃飯，另有兩位上海朋友。

到了菜館門口，只見一高個中年男子，身著黑皮夾克，拿著手機，一看便是國安。他盯著我望，我也盯著他望，對視甚久。

我們預訂了菜館二樓的一間包房，從窗口朝樓下看，那位國安仍在原地附近邊走動邊打手機。我開玩笑地對達功說，國安滿辛苦的，外面又冷，乾脆請國安上來一起吃飯吧。

達功說，如果在深圳倒有這可能，他和深圳的國安經常接觸，彼此像朋友。一個熟悉的國安曾對達功說：「你寫文章只要不罵深圳就行，隨便你罵別的什麼地方，罵北京、罵上海，我們都不管。我們只是一條狗，不論哪個朝代都會用得著這樣的狗。如果你們今後掌權了，也會用著我們，我們也就是你們的一條狗。」

每到「敏感時期」，國安都會讓達功別離開深圳，外出也不要到北京。有一次還給他一萬元，讓他回河北老家，買點禮物送給他父親。當然達功沒接受，他說這是底線，接受了就是被收買。達功還說這錢是國安專用於他的維穩經費。他還聽說，上海也有專門用於我的維穩經費。

我在上海沒接觸過國安，只是十多年前在我還不太「敏感」、還比較「穩定」的時候，他們的兩任副局長曾先後請我吃過飯，要和我交朋友。但那時他們不叫國安，叫什麼我記不得了。我這一介書生，從昔日的朋友成了如今維穩對象，真令人感慨

系之。

席間，曉波從北京打來電話，向我以及兩位上海朋友徵求對〈零八憲章〉初稿的意見。兩位上海朋友認為憲章的目的不是對抗，而是對話，還認為憲章不要雷同於呼籲書和一般的建言，要成為全民共同的政治主張，因此在內容上不應該針對權力機構太多，而應該著重針對公民社會。我同意兩位上海朋友的意見，只補充了幾句，說憲章要有理性，要有建設性，要有協商的誠意，不要有敵對的情緒。

第二天 11 月 28 號，曉波發來手機短信，很長，他說：「在我和北京的許多朋友的心中，你是犬儒化的上海知識界的異數，你早已退出功利圈，專注於自己的精神世界和良知踐行。我非常信賴你，與你神交已久，希望能夠得到你的支持。」我當然支持，答應在〈零八憲章〉上簽名。

以後曉波還通過「雅虎通」的聊天網站和我再次商討憲章的修改。他很認真，也很謙虛，雖然我提不出什麼有價值的意見。

現在有人否認曉波是憲章起草人執筆人，我不知道起草和執筆的內情，但從他和我的接觸中，至少可以證明他是憲章的重要發起人和組織者，功不可沒。雖然他不在乎其功。他留給我的印象是理性的，他的思想、言論、行為、氣質是溫和的，這和他早期作為文壇黑馬撰寫文論時大不一樣，所以他現在比較容易被各方面所接納，也是作為一位發起人和組織者的重要品質。

### 三、劉曉波和諾貝爾和平獎

2010 年 10 月 8 日北京時間下午 5 點 17 分，我翻牆，上了古狗在香港網站，看到新聞的標題，得知曉波獲得了本屆的諾貝爾和平獎，這在封閉的中國大陸我算是比較早得知這個喜訊的了。我當然高興，為曉波、為國人、也為中國的民主事業高興。

他的獲獎有所爭議，爭議者幾乎都是國內外的中國人，都是和曉波一樣進行過民主活動並有過顯著貢獻的人士。我對他們就像我對曉波，滿懷敬意。所以我不認為他們反對曉波得獎，就是「窩裏鬥」，就是國人劣根性的表現。因為他們和曉波的終極目標一致，只是路徑不同，方法有異，這完全應該在求同存異、互相尊重的基礎上逐步消除分歧，取得大體的一致。

去年我去歐洲，我和海外的民主人士有過某些接觸，我極其敬佩他們毫不妥協的堅守和執著，也非常同情他們長期被拒之國門外、有家不能回的孤寂和憤怒，為此我還流過眼淚。所以我對他們略高的言論調門和稍激的行事的方式，是充分理解的；我想我如果也處在他們目前的境地，也會和他們一樣，甚至有過之。

但諾貝爾和平獎一事，原則重大，不是個人之事，而是有關中國民主事業前途之大局。該獎由評審委員會決定，自然有他們慎重的考慮，和充足的理由。我們應該尊重他們的評選。

我們還應該像運動員那樣，在比賽中，我決不服你，一定要決一高低；但勝負既定，我也一定誠懇地向獲勝者祝賀。所以在決定此獎由曉波獲得之後，我們也應該誠懇地向曉波祝賀，而放棄此前的爭議，甚至要寬容曉波以往的缺點和錯誤。曉波畢竟才年過半百，以後的路還很長，我們期待著他未來的成長。

曉波獲得和平獎，意味著他已經列入歷史。但他能不能創造歷史，我們只能拭目以待。因為中國太大，變數太多，當權者極為強勢，手段也非常狡獪。曉波手中的這桿旗，能撐多久，也很難說。我們不要對曉波期望太多，只要他盡力即可，他是應該知道自已的歷史責任的。中國的路還很長，還需要他、你、我、大家，也許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的上下共同求索。

曉波判刑十一年之時，我寫了一首絕句：

欽犯科刑十一年，  
神州日日有奇冤。  
大牆內外皆牢獄，  
不押這邊即那邊。

曉波獲獎，也不能無詩，口占一絕：

老天總算睜開眼，  
諾獎曉波中狀元。  
歷史將從今日起，  
盼君奮力著新篇。

2010年10月21日上海善作劇樓

**沙葉新**——上海劇作家，獨立中文筆會前副會長，上海人民藝術劇院前院長，中國戲劇文學學會名譽副主席。

# 民主鐵人——悼念曉波

崔衛平

如同一個最脆弱的人那樣睡去了，  
這夜大地上暴雨如注，  
那是他朝向人間不捨的眼淚。  
「我不是你們想像的那個我」

劉曉波 2009 年底沒有能夠在法庭上公開念出的〈最後陳述〉，其中「我沒有敵人」的表述，如他自己所說，最早出現在 1989 年廣場四君子〈六二絕食宣言〉中。很多人都將那份遙遠的歷史宣言忘記了，但是劉曉波自己記得清楚。那份宣言中公佈「我們的基本口號」，第一條便是：「我們沒有敵人！不要讓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們的智慧和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時隔整整二十年，劉曉波再次面臨同樣的絕境，同樣性命攸關的時刻。他再次抓緊時機說出：「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



今天有人嘲笑劉曉波的這個說法，只說明他們沒有處在那樣一種絕境當中——大兵壓境，四周全是陌生的面孔，互相之間能夠看得見眼睛和鼻子，聽得見對方的呼吸，而他的劣勢明擺著，從力量上講他根本不是對手。交出生命，還是重新將它抓牢？於瞬間將被決定。在這種命懸一線的狀態下，他需要找到一個堅實的土地——他要說，你們腳下的土地，也是我能夠站立的；你們頭頂上的天空，也是我能夠享受的。

「我不是你們想像的那個我」，這是卡夫卡在《審判》中小聲而固執傳達出來的。處於無助狀態的囚犯，被控有罪卻不知道自己的罪名，歷經折磨而看不出赦免的希望，人們煞有介事地在他身邊忙碌，跑來跑去，機器根據難以解釋的命令高速運轉，越來越多目擊者出現，迷霧重重當中事情彷彿在邁向一個清晰的結論，而這一切與他本人無關。說到底，他不能理解眼前正在進行的這一切，他拒絕這場遊戲、拒絕在遊戲中他被指定的角色，他要說這一切全是荒謬，這場審判本身是滑稽的。

運用最後僅有的機會，曉波陳詞：「僅僅因為發表不同政見和參加和平民主運動，一名教師就失去了講臺，一個作家就失去了發表的權利，一位公共知識人就失去公

開演講的機會，這，無論之於我個人還是之於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的中國，都是一種悲哀。」或許曉波也想大聲說出——「我不是你們想像的那個敵人」，他有理由這樣說，他歷數全身找不到罪行所在，他也不是為了他的個人利益。這時候，請允許他以自己可能的方式來反擊。比起「我不是敵人」的自我辯解，「我沒有敵人」不是更加有力？反過來，難道一定要讓他說，「對了，我正是你們說的那個敵人」，一定要讓他接受那種莫須有的罪名嗎？

曉波酷愛卡夫卡，他提到閱讀捷克作家《布拉格精神》時，竟一時捨不得閱讀關於卡夫卡的那篇《刀劍在逼近》，說生怕讀完它，這本書也就讀完了。他的妻子劉霞與他分享了同樣的愛好。在一封感謝哈維爾的信中，劉霞寫道：「曉波和我在家裏經常會對我們的荒誕生活說『完全卡夫卡』」。為什麼是卡夫卡？卡夫卡精神是什麼？是隻身一人面對世界，是在任何情況下對於個人的守護。在堅守的個人眼裏，世界是不可理解的。這樣的個人應該不依據外部世界的指令，不依據外部世界看上去的變動而去回應、去配合，甚至不依據外部世界本身的性質（其實它總是在人們的理解當中），而是依據自己的內部指令而採取行動，依據自己生命中的信仰。越是個人的，便越是自由的。

由此，他對於世界的看法，其界樁來自於他自身。他不願意或不允許放進他自己生命中的，他也不願意放進世界當中。假如他生命中本來不具有暴力意向，他便沒有必要根據別人的行為而給自己添加這一項；假如他的生命崇尚自由自主，他便沒有必要因為他人的罪行而沉浸在仇恨當中，仇恨的人仍然是受對方支配的；假如這個人體驗過人生美好事物和美好感情，他便深知一定要讓美好、開放的東西在自己身上生根，而不是任何一種偏狹固執的東西。他的生命朝向愛和光明，而不是恨和黑暗，這是他自己的一個決定，是他自身願意承擔的，每個人的歷史都是由自己寫成。其他人可以選擇與曉波同行，也可以與他平行前進，但沒有必要認為那肯定是他的一個錯誤，一個污點，有待改正或超越。二十年如一日，堅持自己的理念的人，他是毅行者。中國缺少曉波這樣的毅行者，這也是使得他能夠成為中國民主運動的一面旗幟，也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

我與曉波實際接觸很晚，是在1999年他結束勞教出來之後，有些聚會不記得了，朋友發來照片才想起。印象比較深的是幾次郊遊，有一次不知怎麼走到了北郊秦城監獄附近，他與小劉荻一起興致勃勃地尋找自己監所的方位，還拍照留念。還有一次為了什麼事，徐友漁、郝建與我一起「捉拿」他去了劉軍寧的村裏，當面問詢他本人的看法，最後友漁做出結論，曉波私下的看法與我們差不多，這才放他過關。〈零八憲章〉簽名是最後一次見面，2008年11月初，在西直門地鐵附近的一個餐館，友漁、梁文道幾個朋友在場。他突然問我：「官方為什麼一定要『保八』？」一開始我沒有反應過來，它指的是當時官方一定要將GDP維持在八個增長點。我記得曉波最後一個表情，便是這個困惑而執著的鏡頭。

他有兩次認真地對我說，「衛平，八十年代文學界就剩咱們倆」，他大致是說，從八十年代文學界一路走過來，許多熟悉的面孔都離去了。這也是他被判刑十一年時，我要打電話替他找回那些老朋友的原因。2010年警察問我「怎麼認識的劉曉波？」我回答，「我們同一個專業」。我們都是中文系77級的，他在吉林大學，我在南京大學，在本科讀書期間，我們始終伴隨著濃厚的歷史反省的社會氛圍。拋棄此前你死

我活的階級鬥爭學說，回到人性和寬容，是那個時期的社會共識，曉波在〈六二絕食宣言〉和〈最後陳述〉都特別提到過。研究生時期我們讀的是同樣專業——「文藝學」中的「西方文論」方向。1988年擔任曉波博士論文答辯導師的蔣培坤老師，1982年春天曾經與我乘同一條船從重慶到南京，我們剛一同參加完一個文藝理論會議。

曉波比我大半歲，文革時同屬小學生，父母不在家，學校停課，過了一段自由自在的生活，前面的歷史負擔比較輕。十多歲時，他也曾作為子女隨父母下放。其餘還有一點可笑的相似，因為家中排行相同，我們的小名相同。他無比可笑在於89年之後他父親去秦城監獄看望他，還是一口一個「小三」，而我自上大學之後父母便不再那樣叫我。最終我們都患了癌癥，那是一種接受試探比接受死亡更加要命的疾病，當然他的情況要糟糕得多。

### 從感性的個人到民主鐵人

曉波八十年代那篇著名的「肇事」文章，有一個在今天看來費解的標題〈感性個人我的選擇——與李澤厚對話〉。什麼是感性？什麼是個人？這是他的起點，也是理解他的起點。

請允許我講一個故事。我曾請一幫好朋友去婁燁家看他的《頤和園》，內容與六四有關，婁燁因該片受罰五年不許拍片。沒想到看完電影後婁燁成了炮轟的對象，大家對於婁燁的影片很不理解，提出的質疑包括為什麼把一場舉世矚目的民主運動，僅僅描述成一場年輕人的青春狂歡？為什麼沒有描寫開槍？如果不是直接描寫大屠殺，那麼這部電影不如不拍！結尾處主人公余紅明明見到了舊日情人，為什麼卻又要離他遠去？接下來輪到婁燁傻眼了，他誠懇地回應道，我始終在閱讀各位老師的書，謝謝你們的著作陪伴我成長，但是沒有想到等我把老師們的想法消化之後拍成電影，老師們卻不認識了（大意）。他求救般的看著我，希望我能夠給一個說法。我對於兩邊都有理解，試圖解釋道：「個人」、「個人主義」這些東西，對在場的老師們來說，更多也許是書本上的理念，作為社會進步或歷史進步的方向而提出來的。但對於婁燁和他影片中的主人公來說，個人則是血肉，是以身試法，是單身滾地雷、是不斷拷問和抵達個人的極限，甚至是不惜以粉碎自身為代價，挑戰世俗，來尋找真實的自我和建立個人的界限。這部影片便是關於這樣一種感性的個人，以可見的生命在這個世界上印證了那個單數的個人。放在那樣一個時間點上，要允許這樣的個人，以她們自己的方式經歷六四。

劉曉波首先便是這樣一個感性的個人，這對他的學者朋友來說是不太熟悉的。這裏涉及到八十年代中後期北京的某種精神氛圍。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之後，即使是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也不能夠吸引年輕的人們，人們願意朝向與正統意識形態相反的方向走去。恰逢此時西方現代派文藝在中國傳播，尼采、薩特、克爾愷郭爾、弗洛伊德，卡夫卡、存在主義、荒誕派戲劇等成了青年人新的標配，尤其在藝術圈、詩歌圈中出現了那樣一種「實驗性個人」。他/她們憤世嫉俗，挑戰常規，一定要顯示自己是不受約束的。傳說中曉波的那些「狂放不羈」的舉動，口出狂言，睥睨天下，應該在這個意義上加以理解。通過一種甚至是誇張的行為，他要表現獨一無二的自我，與他人拉開距離。

最近我們一位共同的老朋友、詩人簡寧寫短文說，他 1986 年 10 月第一次見曉波，是他在一個小型會議含淚背誦《透明的紅蘿蔔》片斷。曉波狂批當時從文學理論到創作的知名人士，但實際上有一個人他喜歡，那就是莫言。莫言這部早期小說的確顯示了不同尋常的刺目感性。簡寧回憶，曉波作為「黑馬」殺出的那個會議，散會之後他繼續不依不饒。吃飯時東道主依照慣例按長幼尊卑讓大家入座，曉波當場發飆，嚎啕大哭退席，說「這樣一個會議，吃飯還要遵從等級制」，他的舉動立即迷住了在場的年輕人。有人跟著他一起在眾目睽睽之下離開，去另外的朋友家吃餃子，飯桌上他又跟年輕詩人吹噓起自己如何吸大麻。當時我身處先鋒詩歌圈內，見到諸如此類的事情比較多，能理解但不喜歡。

所幸這匹「黑馬」沒有闖到我們家來，倒是劉霞大約在 1987 年來過，她那時剛剛在《北京文學》上發表了一篇先鋒小說。目前旅德的詩人廖亦武先生那會兒是我家的常客，憑他那套「行頭」，我們樓開電梯的阿姨無需詢問就直接摳了我家的樓層。當時就是那樣一種氛圍，讓情感和想像力獲得肉身的存在，屬於克爾愷郭爾學說中的審美階段——為感覺、衝動和情感所支配，沉溺於感性的享樂生活。在關於六四的懺悔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中，曉波寫到對於前妻的愧疚，認為自己曾經放蕩不羈的生活給她帶來巨大的傷害，應該就是指的這段時間。在他那篇惹風波的博士論文《審美與人的自由》裏，他無限制地推崇無意識直覺，他把自己的行為也弄得像是沒有經過大腦無意識發生的。所謂「無意識」在社會運動中有一個相應的辭匯，叫做「自發性」，他始終保持著這樣一種自發性。

感性個人的召喚，幫助曉波建立起一種生命的完整性和飽滿性。不僅是生命感受和藝術感受的豐滿深厚，而且是一個人感性和理性的平衡，一個人他的身體和思想的一致，他的言詞和行為的合一。如果他的思想抵達一個地方，那麼他的身體也要去往這個地方。他不能忍受身體與頭腦的分離，不能光是坐而論道，而要起而行之。在曉波的個人氣質中，占主導地位的仍然是一個知識份子，智性的活動令他感到真正的快樂，他的那些驚世駭俗的舉動背後始終有「理念」的參與，而他比一個知識份子真正多出來的，就是他的這種行動能力。你不是想要自由嗎？那麼就自由地行動吧。你不是想要尊嚴嗎？那麼就要捨棄一些東西，做得像一個尊嚴的人那樣。不少人提到前後有「兩個劉曉波」，我倒是覺得若不是前面一個「感性個人的劉曉波」，斷斷不會出現後來「行動的劉曉波」。作為一個行動者，他的起點是在八十年代更早時候就已經奠定了，那是他的性格，也是他的命運，是他這個人貫穿始終的東西。

天安門絕食時，他們打出的標語為「我們絕食！我們抗議！我們呼籲！我們懺悔！」第四條便是針對長期以來知識份子在行動方面的軟骨癥。2001 年曉波撰文〈自由的力量在於踐行〉，結尾處大聲疾呼：「如果自由只是言說而不必踐行，那麼自由便不是道義，遑論力量！」

哈維爾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叫做〈故事與極權主義〉，指出當時捷克斯洛伐克社會裏，因為千篇一律的高壓，人們動彈不得，只有忍受氣喘病的慢性折磨，不能把自己的生活變成一個個鮮明生動的故事。反倒是在監獄裏，發現許多生龍活虎的人。哈維爾本人跌宕起伏、充滿傳奇的一生便是如此。回顧劉曉波的一生，不是「坎坷」這樣的傳統辭匯能夠概括的，他與哈維爾一樣也是充滿了各種奇異的故事。或許在一般中國人眼裏，曉波所經歷的更像「事故」，是一連串的失事，一連串的翻船，一

連串的亮起紅燈。極權主義嚴絲合縫的鏈條，在他這兒一而再、再而三地「掉鏈子了」。在我們的朋友當中，沒有比他的奇特人生更加能夠揭示極權主義本質和我們自身的處境——衝突不可避免。在這個意義上，反對極權主義的鬥爭之一，是把自己的生活弄成一系列能夠講述出來的「事蹟」。

應該說，作為一個學者或思想者，曉波並沒有表現出很強的話題設置能力，但是他始終以血肉之軀，去印證他所抱定的真理；以看得見的行動，踐行他心中的理念。這使得他不斷衝擊這個政權的底線，以自己的行為來拓展社會空間和公民行動的邊界。1989年絕食是為了「在廣場上宣傳我的政治主張，使之深入人心、擴大影響」，後被冠以「黑手」關押秦城，1991年1月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受審，因帶領學生和平撤離免予刑事處分。1995年他起草和發起兩次重要簽名〈反腐敗建議書——致八屆人大三次全會〉及〈汲取血的教訓推進民主與法治進程——「六四」六周年呼籲書〉，被北京市公安局以「監視居住」的形式單獨關押在北京郊區數月。1996年因與人發表關於臺灣、西藏問題意見〈雙十宣言〉，以「擾亂社會秩序」的罪名被勞動教養三年。2008年因零八憲章以「煽動顛覆國家」的罪名被判處十一年重刑，關押至死。

在中國這種殘酷的監獄條件下，一個人坐一次牢便已十分不易，他這些年反復進進出出，包括日常生活中數不清的騷擾、無處不在的監視，行動遭受嚴格限制，始終不折不撓，他應該贏得一個「民主鐵人」的稱號。

在以行動印證理想方面，劉曉波的名字完全能夠與哈維爾、曼德拉、甘地、昂山素姬相匹配。

### 被愛馴服

人們經常談到曉波的率性而為，他是一個很「真」的人嗎？如果是，那麼應該說至有兩種「真人」，一種是樸實的真，不需要做出什麼努力他就是真實的，他也不懂得在乎別人怎麼看自己；另一種是求真，求真的過程仍然是雕琢的過程，一個人可以通過自覺改進而接近真實，或者在同時出現的種種雜念中尋找出那個最真實的加以彰顯。曉波屬於後者。他不斷地求真，然而這個求真的過程，很可能也是失真的過程：當一個人要顯示自己是真實的，那麼他就偏離了真實。當他作出種種誇張的舉動，沉浸於一種戲劇性表演時，他應該知道自己是失真的，然而他努力把這種失真弄得像是真的一樣。這就產生一個虛空，他要進一步去尋找那個剛剛丟失的真實。

這麼說，想表明曉波擁有強烈的反思精神，他會給自己照鏡子，他心裏有一面小鼓不停地提醒和矯正自己，把那些走形的、走樣的改回來。正如胡平先生所說：「曉波有不少弱點，但是我知道他具有一種美好的品質：曉波有嚴格的反省精神，他對自己有極高的要求，並且願意為此而不斷努力。」這個人因此而具有一種生長性和開放性，也擁有一種特殊的人格魅力。在我看來，倒是有「外」與「內」的兩個劉曉波，一個劉曉波在前面舞臺上，聚光燈下不免要塗一些油彩，行為看上去有一點滑稽；同時還有一個後臺的劉曉波，密切註視前臺的那一個，審視他、嘲笑他、給他喝倒彩和施加壓力。

曉波寫於1993年的這本六四懺悔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以挑剔乃至苛刻的

立場描繪了六四廣場上的一些負面行為，同時也以更加殘酷犀利的筆調剖析了他本人，引起許多爭議，最近我才讀了它。其中具體的細節應該有許多可商榷的地方，包括對於這場運動本身的認識也許片面（實際上他 99 年出來之後做了大幅度調整，對於受難者犧牲者謙卑恭敬之至），但是不管怎麼說，該書擁有一種巨大的心理上的真實，令人震撼，為中文世界所少見。它應該是曉波匆忙混亂的一生中最為沉靜、內斂、深刻、緊湊的文字，不應該因為其表面上的缺陷而被埋沒。

這本小書貫穿著這樣一種自責：他還活著，而有人死去；他作為「六四名人」而活著，而普通人死去。「那個隻身張開雙臂攔坦克的小夥子呢？你們的血是否白流了？你們的勇敢、良知和獻身精神是否在被戲弄？苦難會為某些人換來美名，犧牲會成為某些人撈取功名利祿的稻草，全民族的悲哀也許僅僅滋養了幾個膽小鬼和騙子，而我正是其中的一名。」在普通人的生命面前，他低下了桀驁不馴的頭。六四開槍的確讓我們這些人意識到一個簡單的真理：擊穿別人身體的子彈，同樣能夠擊穿我們的腦袋。

在高牆裏寫《悔過書》，是很難避免的事。在高壓之下說話不算數，任何人都可以此作為解脫，曉波卻為此痛徹於心。他設想了種種可能與不可能，來來回回審視自己。假如悔過沒有發生呢？而即使是堅持不悔過，那麼其原因也不是「為了良心尊重真實、保護良知、堅持正義，而是為了我的公共形象、社會名譽和長遠的功利。」然而，這個所謂「公共形象」本身，實際上並不完全屬於他本人，而是官方幫助下弄出來的，與官方製造的幻覺和謊言有關。當他們執意尋找不存在的敵人，同時也製造了「英雄」，因此這個英雄實際上是摻假的：「如果共產黨稍稍聰明點，當代中國就不會有持不同政見者的英雄。共產黨的愚蠢、不寬容和說謊虛構了、捏造了許多英雄，這些虛假的英雄是共產黨謊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共產黨在欺騙自己的同時也欺騙了公眾。滑稽的是，那些英雄的良好自我感覺也是被共產黨的謊言所迷惑的結果。」我始終關心蘇聯東歐持異見者對於自身的瞭解，從未見過這麼深刻的見解——在揭穿官方謊言的同時，也揭露了英雄的空洞，自身的空洞，他把自己從戲劇性舞臺上英雄的位置上徹底拉了下來。

使得他性情發生令人矚目的根本改變，是他的愛人劉霞。劉霞是一奇女子，寫詩、攝影、繪畫、嗜書，吃很少的食物，瘦得能飄起來，卻蘊含巨大精神能量。實際上他倆於 1996 年春節就結婚了，雙方父母見了面，但那時候曉波沒有戶口沒法領結婚證。這年下半年 1996 年曉波開始勞教，為了合法地探視，在律師的幫助下他們補辦了結婚證，在勞教所共同吃了一頓午飯，算再次舉行婚禮。劉霞每月一趟去背上大包沉重的書籍。這三年曉波再一次沉浸於大量閱讀，哈耶克、哈貝馬斯、海德格爾、陀思妥耶夫斯基、德沃金、朋霍費爾、聖·奧古斯丁等，也再一次從事精美語言的運用——他在獄中寫給劉霞幾十首詩，是他語言能力的再度昇華，於其中他的情感和人格而得到再度淬煉。早些年他過著一種詩人般狂放不羈的生活，然而真正運用語言成為詩人，卻是在身體被囚禁之日，他寫得比許多詩人還要好。許多年之後，當他的那些快速時評被人們忘記，應該是他的詩句被人們記起的時刻。

其中有兩首詩提到了英國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呼嘯山莊》的作者。這本小說在他倆的關係中有著重要位置，曉波寫到新婚當晚他給劉霞朗讀過。在很大程度上，曉波和劉霞正像是書中的兩位主里夫和凱瑟琳，屬於荒野的一模一樣兩個靈魂，激

情而粗礪。「我便是希刺克里夫」，凱瑟琳在絕望中呼號道，「他比我更像我自己」。這樣的兩個人在一起，不僅是互相依偎，而且也是互相砥礪，互相剝去偽裝，一步步逼近更深的真實，最後的得到真實應該如同死亡一樣不可更改。勞教一年之後，曉波仍然寫出這樣激情有力的句子：「荒野上裸露的激情/不需要花環的裝飾/夜晚的寧靜足以抒情/那麼狂暴的風/使破碎的影子相互嘶咬/艾米莉教會了我們——/沒有灰燼的語言/便無從與死亡交談」。

劉霞是一位極其認真的創作者，惜墨如金，她有一次對我說，她花費了一年時間僅僅「寫了四句詩」，何等執著的精神！她很少出門，曉波在外面的聚會她一般不參加，她有自己豐富的天地。如果說現代藝術家分兩種，一種是放縱者，一種是苦行者，劉霞屬於後者。卡夫卡般的氣質深入了她的骨髓，僅僅是她捍衛個人，保持個人的真實，就用盡了她全部的力氣。曉波被時代的巨浪拋起，轉眼又沉到浪穀的深處，而劉霞始終保持不動聲色，對於喧鬧有一種本能的抵制。能夠讀到劉霞最早寫給曉波的詩，時間標在1989年6月2日，即四君子宣佈絕食的那一天「我沒有來得及與你說上一句話，/你成了新聞人物……只好躲到人羣外面/抽支煙/望著天」。在一首叫做〈錯位〉的詩中，她寫道：「在毫無防備脆弱時刻/一出沒有彩排的戲上演了……任何戲裝和脂粉/難以將我偽裝/曲終人散/我和我並肩站在臺上/一個淚流滿面/一個放聲大笑」。她甚至寫了一首叫做〈空椅子〉的詩歌，一語成讖，像一個女先知：「空椅子空椅子/如此之多的空椅子/在世界各處/梵高畫中的空椅子格外誘人」（8/1989）

她不需求得外界的認同，遠離喧嘩與騷動，個性上應該比曉波更真實、更徹底，像是曉波的另一個自我，他自我的最裏層，他因而對她表示了最大的敬意：「你總是出現在/如此高絕的時刻/讓我仰視且暈旋/雙腳無力攀登/目光充滿畏懼」。這首寫作日期為「1996.12.28」，即曉波在勞教所度過的第一個生日。在這批詩中他多次表示只願意與她在一起，哪怕暫時對這個世界關上大門：「拋開虛擬的殉難/我渴望躺在你的腳下/這是除了與死亡糾纏的/唯一義務/也是心如明鏡時/持久的幸福。」（〈渴望逃離——給妻〉，12/8/1999）。「外面的世界很光亮很絢爛/光亮得讓我恐懼/絢爛得使我厭倦/我的目光只哀情於/你的黑暗——/單純而不可分割」（〈我是你的終身囚徒〉，1/1/1997）。劉霞是他生命中有關真實的定海神針。

他倆的這種關係，讓我想起〈小王子〉的故事裏說的「馴服」，被愛馴服。狐狸對小王子提到了馴服。小王子問：「什麼叫馴服呢？」狐狸回答，馴服就是「建立聯繫」。不僅是通過出生，而且是通過愛的馴服，一個人才能夠成為一個獨一無二的人。「馴服」就是生命的一種開放性，通過這種開放和對話，兩個人從根部將生命緊緊結合在一起，就是曉波說的：「是誰甘願背負起我的罪惡/是被我感動的女人嗎/是你呀！我憑泥土認出是你……你是被我塑造/也塑造我的女人。」（2/1997）

中國有句古話「一物降一物」，有朋友表示對曉波被劉霞「降伏」，感到驚訝和不理解。曉波有福了，這位試圖馴化統治者、馴化權力的人，首先得到一位女性的馴化，將他本人身上兇猛刺耳的東西制服。一個人難免對於自己有著許多恨意和敵意，愛拔除了它們。

親愛的，該起身了

通往深淵的橋就要坍塌

以你的炸裂咬住我的意志  
 懷疑從西西佛斯的石頭開始  
 信仰從你丟掉家門的鑰匙開始  
 我把全部的惶恐和仇恨  
 交給你，只交給你一人  
 讓我的頭再一次  
 高貴地昂起，直到  
 最黑的時刻降臨

〈以你的炸裂……——給霞〉1997、1、2

## 民主政治是化敵為友

「我沒有敵人」，是發出一個強烈的呼籲，提供一種新的政治文化，創造一種新的政治空間。

在極權條件下，政治是難的。政治的出現，要滿足一個基本條件，那就是暴力的結束。政治是在強制性暴力結束的地方開始的。在以暴力維持社會（「維穩」）的地方，不存在政治空間。人與人的政治關係是一種平等的、互相尊重的關係，用〈零八憲章〉的話來說，在中國這僅僅寫在字面上。政治的重要途徑之一是言詞，是不同背景、不同利益人們之間的互相商談，是通過對話、協商，讓種種分歧得到呈現和整合。這個國家遍地因言獲罪，看上去不存在政治的途徑和前景。如果一定要這樣說，那麼也不存在法治和追求法治的、平等的和追求平等的以及民主的和追求民主的前景。然而這樣看問題，依然是「大一統」的思維。

實際上，很有可能，在某些特定的條件下，出現了某些縫隙，存在某個可能的臨時空間，仿佛曇花一現。它能存活多長時間，是否有生長的可能性，取決於人們對它的辨識和呵護。當然，這個臨時空間也不會是從天而降，也是多方面力量長期積累的結果，它昭示另外一些可能性，是發生轉變的酵母，它所帶來的意義也不止於一時一地，而是可以灌注到其他場合和行為中去。當然，這些空間本身也是不一樣的，不同人們的努力令事情有著不同的面貌和形狀，每個不同的起點都是值得尊重的。

有說八九之後曉波的思想從激進轉為溫和，表面上看起來仿佛如此。但我要指出，這裏應該存在一個誤會。1989年前的曉波，主要是從事文化批評，追求審美解放，那是可以天馬行空，獨來獨往，一人說話一人負責；然而如果是涉入政治，那麼境況則大不相同。可以說，曉波自從涉入政治，即使在1989年，他就是溫和的。所謂溫和，並不意味著認同官方立場，站在官方一邊，而是指自身所採取的途徑是溫和務實的。在1989年的某個時刻，便存在這樣一個臨時的、也是溫和的政治空間，曉波一腳踏了進去，成了他日後政治活動的一個起點。

與曉波一起在廣場絕食的周舵先生回憶道，1989年5月13日這一天，是他邀請劉曉波參加了統戰部的一個會議。實際上這天統戰部有兩個會議，先是在上午，由統戰部副部長陶斯亮主持，一會兒部長閻明復從另一個會場也過來了。會議主題是期望到場的周舵、鄭也夫、章立凡等人能夠勸說學生，在戈爾巴喬夫訪問中國的時候讓出天安門廣場，免得黨內改革派被動和遭遇整肅。下午周舵他們出去分頭找人，

周舵找到了曉波，希望曉波能找到烏爾開希來統戰部參加座談，曉波本人也接受了邀請。晚上 7 點半統戰部第二次開會，各路學生代表也都前往，甚至還有官方共青團學生代表，閻明復本人主持會議。這是一個政治性質的會議，是一個臨時搭建的政治空間，這樣的時刻非常之少。

一邊是閻明復等開明官方，一邊是絕食學生，曉波、鄧正來等一幹年輕大學教師所扮演的，用周舵的話來說，他們是作為「中間人」，試圖讓兩邊產生對話、溝通和理解。與此前那個憤世嫉俗、與社會勢不兩立的詩人相比，曉波的身份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加進了其他內涵。

曉波在回憶錄中也提到是周舵喊他來開會並有發言。他的發言首先批評了官方「四·二六」社論的錯誤，眼下政府必須承認學生自治會的合法性。接下來，他呼籲學生們必須學會「妥協、讓步、寬容」。他提到了學生中存在的「敵人意識」：「……敵人意識和死要面子會破壞已經出現的相互理解的氣氛。學生如果不妥協、不讓步，就會逐漸失去黨內和政府內的開明派的支持和同情。學生運動不應該捲入黨內派系之爭，但必須爭取社會各界的廣泛支持，特別是來自黨內的支持。」（《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他講完之後，閻明復笑他「不要講得太透明，點到為止」。14 日臨晨兩點多鐘，曉波跳上一輛平板車廣場上發表演講，呼籲學生在戈爾巴喬夫抵達時要理性，也批評有學生打斷官方代表講話：「這不是民主，而是仇恨」。聽眾中有人高喊「懦夫，滾下去！」「黑馬怎麼變成綿羊了。」當時曉波得到的這個批評，與後來他們組織廣場和平撤離時，有人罵他們是「懦夫」、「膽小鬼」、「學賊」是一致的。今天因為「沒有敵人」而罵曉波的人，與當年這些人們，屬於同一個「神聖家族」。

曉波感到委屈，難道千里迢迢從美國回來，就是為了聽學生的噓聲、喝倒彩？然而，即使挨罵，他也沒有覺得有「回歸」的需要。他清楚地自己是什麼和要什麼。接下來 5 月 15 日，他拒絕了由一些著名作家、學者弄出一個知識界簽名（拒絕修改簽名文本的邀請），原因是他看來，這份東西仍然運用黨化的意識形態語言（「解放以來」、「勞動人民」、「人民萬歲」），表明這些人與舊體制仍有著許多自覺和不自覺的聯繫。而曉波已經完成了獨立個人的洗禮，他是自由身。這種自由表現為——雖然身在體制，其思想和立場可以超出體制；並且既然是自由的，便可以超出任何一方。實際上不排除，有人即使身在體制之外，其思想卻是體制式的。周舵對紫玲在六四凌晨早些時候廣場大喇叭裏喊：「頭可斷、血可流，人民廣場不可丟」送去了嘲諷，他後來寫道：「什麼『人民廣場』！立刻讓我聯想起『人民幣』、『人民銀行』、『人民郵電』！什麼『不可丟』，丟了又能怎樣！全是共產黨電影小說裏學來的一套。」

很有可能，「我們沒有敵人」的表述，是曉波與周舵共同提出的。曉波稱〈六二絕食宣言〉「基本內容是我和周舵共同商量的」，侯德健也做了補充。他說了是由他本人執筆，但是並沒有對其中觀點作出細分。周舵在回憶中提到絕食由曉波提出，而他答應曉波絕食的邀請是有條件的：「一定要發表一篇宣言，說明我們的目的不是去煽動，是勸和，並且要借此宣傳一種沒有敵人的新的政治文化；我還提了兩個口號，『我們沒有敵人』，『中國的進步人人有責』」。周舵也說了「我擬了一個提綱，曉波執筆寫的」。周舵私心裏還存有他若去絕食，可以防止曉波作出其他瘋狂的事情。曉波當時的妻子聽說周舵也去絕食，頓時鬆了一口氣，覺得萬一有事也只有周舵說得動他。可以說，一旦步入政治空間，人與人之間也同樣存在互相馴服的關係，即

建立深刻的、既自我承擔又互相承擔的聯繫，當年的曉波與周舵便是這樣。

有件事情也可以澄清一下。一些西方媒體和作者都把曉波寫成了最後在廣場上與戒嚴部隊談判者，其實不是，前往談判的是侯德健與周舵兩個人，他們三個人的回憶錄（曉波、周舵和侯德健）都是這麼寫的。周舵說，是他提議撤離廣場和去找戒嚴部隊談判的，最後他們四人一致作出決定，包括派誰前往，都是經過集體同意的。曉波後來動情地寫下目睹兩位談判者前往時自己的心情：「望著他倆一階階走下紀念碑的背影，我的心一陣陣揪痛，我不知道他倆這一去能否活著或完整地回來」。留下的曉波繼續緊張地處理有可能流落在廣場上的武器，親自在紀念碑欄杆上砸爛一把半自動步槍，震得他虎口和雙臂發麻。此前他與周舵、侯德健一起，已經成功勸說幾名市民放棄從被阻攔的坦克上弄來的一挺重機槍。很難想像如果這些槍支一旦開火，會遭致多麼強烈的打擊，多少學生和市民會更多地喪生。實際上為什麼這些槍支會流到民間，也是一個謎，以後的歷史學家或可以解釋。2008年12月曉波被捕前兩天接受郝建訪問時，對著鏡頭說自己當年砸槍的行為具有象徵性含義——「非暴力」。

提到這些細節不是為了弱化曉波在天安門廣場上的意義，相反，正是為了突出他可貴的政治品質。若是坐牢可以一個人去，若是犧牲也是一個一個的，但是政治不是一個人弄出來的，政治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同命運、共呼吸，是需要搭建平臺，盡可能把平臺做大，釋放更多人的意見，符合更多人的利益，在這個時刻，則是他們能夠把四雙手搭在一起，做成人橋，讓更多的生命安全通過。一旦是他們共同的決定和行動，他們每一個人就都貢獻了同樣的力量，沒有誰比誰更重要。曉波的自我克制顯得特別寶貴。實際上他最初反對撤離和談判，但是用他在回憶錄中的話來說，最終是因為尊重「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原則。在政治行動中能夠聽從別人的意見，比個人的天馬行空更重要。

政治不是個人寫作，原創的歸屬權沒有那麼重要。誰認同了某個道理，他就擁有了這個道理，然後以自身為起點去實踐。誰擁有實踐，誰才擁有政治。當年波蘭在團結工會之前成立的「保衛工人委員會」（KOR）便是這個策略，誰認同 KOR 的理念，誰就是 KOR 的人，可以就地自主地發展 KOR，以 KOR 的名義工作。能夠從原有的有限平臺上，通過自己的加入，新接出一塊來，將這個平臺做大，這個人的工作就有了政治意義。從這個角度看過去，簽名無疑是一件政治行為，是邀請更多的人到同一個平臺上共同發聲，拓展話語平臺也是拓展政治平臺。曉波 95 年、96 年再三進去，都是做文本，弄簽名。有人攻擊他無非是「上書」，對體制仍然抱有幻想，實乃混淆是非，胡攪蠻纏，不值一駁，官方都比這些人清楚。從曉波再三陷入圜牆的遭遇當中，也可以看出他這種努力的意義——在分而治之的管制下，不同身份的公民們能夠走到一起，就是最大的政治。

〈零八憲章〉可以在這個意義上得到理解，它是話語的平臺也是政治的平臺。儘管憲章本身的文本並不完善，我此前甚至說過它並沒有什麼新的想法，而是若干年來不同的人在這裏或者那裏說過的「陳詞濫調」，但即使是「陳詞濫調」，它們並沒有放在同一個平臺上集中呈現過。我同意〈零八憲章〉的英文翻譯林培瑞教授的觀點，他指出此前關於中國的政治前景只是體制內「更自由」還是「更保守」之間的兩種選擇，然而〈零八憲章〉在這之外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第三個選項。

甚至〈零八憲章〉的文本也不是曉波起草的，而是別人，他後來才加入了這項工作。但是一旦他投身其中，便以巨大的熱情在工作。他穿越整個北京城，當面找了許多人來簽名，不厭其煩地解釋它的意義，成功地說服了許多人，贏得了他們的支持。他還寫了許多 email，也是再三解釋，包括一些年輕人，他不惜一再放低身段。最初三百零三個簽名，也就曉波能夠拿到，想不出第二個人能夠做到。能夠將體制內外、不同行業和不同時期的反對人士整合到同一個平臺上，保留他們的差異，發出共同的聲音，今後十年或者十五年內看不出有人能夠像他那樣。這也是這麼多年曉波積累起來的政治資產，他的犧牲、他的學識、他包容的人品，使得他獲得了廣泛的人脈。他從制度中跌落出來，但是重新把自己做成了堅韌的紐帶，在另一個平臺上把不同人們結合到一起。從最初特立獨行的審美解放，他走向了腳踏實地的政治解放。

如果要問曉波的精神遺產是什麼？最為獨特的便是這份政治遺產，是政治言說和政治行動。〈零八憲章〉首先是一個政治文本，而不是道德文本。就像曉波獲獎，諾獎委員會主席那年強調，這是一個政治的獎項，而不是道德獎項。當然，在極權條件下，道德勇氣永遠是重要的和寶貴的，堅忍不拔的行動能力是最需要的，曉波身上便體現了這種百折不撓的精神，然而他同時還有寶貴的政治意識，致力於搭建新的政治平臺，打造新的政治空間，拓展公民社會，在反對派內部尤其與社會的各種力量展開對話和建立聯繫。零八憲章是否還有意義？這個問題應該問問我們每一個簽署者，它取決於我們每個簽署人後來和當下的工作。如果我們能夠發揚它的精神，依據它的精神進行工作，那麼它就是有意義的。只有通過我們持續不斷的努力才能令它成為遺產。

關於「我沒有敵人」一說，國際社會成功地接收到了它的資訊，而一些聲稱他的聲稱他的「戰友」卻始終在這點阻擊他，甚至嘲笑他。他們願意抗他的大旗，卻想要閹割他的思想，急於想要超越他。與他生前一樣，即使是在身後，曉波也不能不是腹背受敵的。他在獲得巨大榮譽之後失去自由，他留下來的巨大責任，需要我們來承擔。我們只能在沒有政治的環境下提倡政治，沒有民主的條件下催生民主，沒有法治的境遇中力爭推動法治。除此之外，我們還能做什麼呢？

民主不是沒有敵人，而是化敵為友，像曉波始終做的那樣。

在那本六四回憶錄中，曉波嘲笑包括自己在內的六四人物，是走下「十字架的英雄」，這一次他沒有從十字架上下來，而是被釘死了十字架上。他的離開，再一次把我們帶到那個終極問題：人到底活著是為了什麼？到底如何才能活出生命的意義？如何把我們分散的生活集中起來，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曉波安息！

原載《端傳媒》

崔衛平——訪美學者，北京電影學院退休教授，獨立中文筆會林昭紀念獎得主。

# 劉曉波與他的時代

## 《不自由國度的自由人》自序

余杰



劉曉波去世了。我生命中最寶貴的一部分也隨之而逝。

2017年7月13日晚上，我在唐山書店舉辦《拆下肋骨當火炬》的新書發表會。我最後分享的一句話是，「拆下肋骨當火炬」這個蘇格拉底和顧準都使用過的典故，也是劉曉波一生的實踐，劉曉波就是拆下肋骨當火炬，照亮六四屠殺之後漆黑的中國。說到這裏，我心中隱約有不祥的感覺。

會議剛結束，我打開手機，巨大的打擊像石頭一樣砸過來，「曉波已經去了」，那是我最不願看到的一行字，我險些暈倒在唐山書店的樓梯邊，扶著牆才站住，一時間淚流滿面，恍若在夢中。

以殺人來維繫的政權再次殺人，多殺一個人對他們來說並不特別困難。接下來的幾天，局勢一天比一天險惡。並沒有因為曉波的死亡，共產黨就恢復了一絲自信。共產黨不僅害怕活著的劉曉波，也害怕死了的劉曉波。他們不顧劉霞的強烈反對，強行立即將劉曉波的遺體火化，不允許骨灰下葬在故土，匆匆實行了所謂的「海葬」。

當局安排劉曉波的大哥劉曉光在一場精心導演的新聞發佈會上露面，如木偶般說了一番「感謝黨感謝政府的人道主義安排，非常完美，非常周到」之類的鬼話。劉曉光還說自己是家中的大哥，家中的事情由自己說了算。他真是個法盲，劉曉波的事情難道不該由他的妻子劉霞說了算嗎？一個已經跟劉曉波斷絕關係將近三十年的陌生人，一個一度企圖瓜分劉曉波的諾獎獎金、得知劉曉波已經捐出獎金而無比失望並被劉霞極度鄙視的小官僚，有什麼資格取代劉霞第一親屬的位置？難怪魯迅說，人最大的敵人或許是他的家人。宣稱沒有敵人的曉波，會料到他的大哥有這場可恥的表演嗎？劉曉波與劉曉光之間，除了血緣上的相同之外，再沒有別的相似之處。

劉曉波不是周恩來和鄧小平——周恩來和鄧小平是自己選擇「海葬」的方式，

他們的骨灰污染了大海。他們都是殺人如麻的屠夫，他們不敢下葬在土地上，他們害怕被後人鞭屍，他們更不願像毛澤東那樣成為一塊被風乾的「老臘肉」。

劉曉波「被肝癌」和「被海葬」了。這個「新納粹」或「超納粹」政權殘害劉曉波的生命乃至毀滅了他的遺體。以他們掌控的亙古未有的暴力機器而言，這樣做易如反掌。在此一事件中，共產黨果然無比信奉唯物主義——他們對劉曉波實行「挫骨揚灰」政策。只有當劉曉波在物理意義上「屍骨無存」了，讓友人和後人連追悼和紀念的地方都找不到了，接下來就是無邊無際的遺忘了，那樣共產黨才能真正安心。

當年，親人爲在文革中被殘害的林昭留下了一塊小小的墓地，那塊墓地就像是一道一直在汨汨淌血的傷口，人們絡繹不絕地前去祭拜和憑弔。當局不得不在墓地旁邊的樹上安裝攝像頭，並安排警察日夜巡邏，以恐嚇來自全國各地的林昭精神的仰慕者。這一次，當局吸取了教訓，他們防患於未然：沒有墳墓的劉曉波不會像有墳墓的林昭那樣，繼續成為黨國的大麻煩了。

然而，信奉唯物主義的共產黨絕對想像不到精神力量、思想力量有多大。劉曉波活在他的文字中，他的文字是不可戰勝、無法消滅的。這些文字中蘊藏著自由的密碼，如同鑰匙，如同解藥，如同翅膀，可以幫助那些迷路的人回家，酣睡的人甦醒，沉淪的人飛翔。每一個字都是一粒麥子：麥子落到地上，死了，又結出許多籽粒來；文字印刷在書上，書是焚燒不盡的。由劉曉波的文字匯集而成的每一本書都是一束強烈的光，讓在黑暗中跳舞的老鼠驚恐萬分地逃遁。

對劉曉波這樣的寫作者而言，文字的功能，不是娛樂，乃是拯救，自我拯救和啓發他者自救並行不悖。我就是被劉曉波的文字所拯救的讀者之一。若不是劉曉波的文字，我怎能脫離中國人數千年來過的那種陰溝中的卑賤生活呢？若不是劉曉波的文字，我怎能毅然決然地拋棄自欺欺人的帝國儒學，「赤身裸體，走向上帝」呢？

第一次讀到劉曉波的文字，是在六四屠殺之後的肅殺氛圍中。還在四川唸中學的我，無法忍耐教導主任在政治學習的時間段裏對「民運黑手」的咒罵，偶然在新華書店買到一本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劉曉波其人其事》，藍色封面，還有一個跟劉曉波本人惟妙惟肖的剪影。那是一本官方御用學者竭盡侮辱之能事批判劉曉波的文集，但編輯煞費苦心地在後面附錄了多篇劉曉波「最反動」的文章，包括宣揚「三百年殖民地」那篇。我讀得如醉如癡，在上面劃滿密密麻麻的符號。本來想劃出重要的句子，卻發現每一句都是警句。這本書珍藏在我美東新家的書房，我帶著它穿越太平洋和美洲大陸，它已內化爲我精神結構之一部分。

第一次接到劉曉波的電話，是1999年滴水成冰的冬天。有一天，我正在應邀去大學演講的路上，突然接到一通陌生的電話，對方結結巴巴地自我介紹說是「我、我是劉曉波」，然後確認我是余杰，立即滔滔不絕地對我進行批評，一口氣講了幾乎半小時。原來，1996年至1999年，在劉曉波第三次入獄期間，劉霞買了一本我在1998年出版的處女作《火與冰》送入獄中，希望劉曉波讀了之後會有「後繼有人」之感。沒有想到，劉曉波卻從中發現不少青春自戀、投機取巧的部分，毫不客氣地在第一次通話中對我從頭批評到尾。我心裏想，他還真是「文壇黑馬」，沒有絲毫的客氣委婉，率真得讓一般人受不了。

第一次跟劉曉波見面，是在友人周忠陵（我們昵稱「忠忠」）家中。那一次的交談，我們發現彼此對許多人與事的看法極為相似，也就是後來余英時先生引述陳寅恪的話「氣類相近」。我們兩個口吃者遇到一起，更顯得口吃加劇，讓劉霞在一旁竊笑說，「聽兩個結巴談話太累了」，她便掉頭過去跟我妻子聊了起來——這一聊，她們倒倆成了比我跟劉曉波更快熱絡起來的「閨蜜」。忠忠家有一位四川保姆，做得一首好川菜，那天的那道辣子雞珍堪稱一絕。我記得曉波大口吃菜，大口喝可樂，大快朵頤，無拘無束。我很喜歡跟曉波一起吃飯，他的胃口很好，帶動同桌的人也胃口大開，跟他搶著吃。那一次的見面，開啓了我與劉曉波在此後十年間亦師亦友的親密關係，直至 2008 年 12 月 8 日劉曉波被捕。

若不是劉曉波的影響與引導，我不會在追求自由的路上走這麼遠，這是一條光榮荊棘路，也是一條少有人走的路。

在絕大多數中國人都選擇像草一樣生活，歪歪斜斜、一吹就倒的時代，劉曉波堅持像樹一樣筆直地站立，因而成為時代的標杆。從「六四」到「零八」再到「一七」，他飛蛾撲火，再飛蛾撲火，最終焚而不毀。

這個時代，不是靠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和習近平這些面目猙獰的「巨嬰」來定義，而是靠劉曉波這樣形容枯槁的先知來定義。若沒有劉曉波，這個時代的中國將宛如聖經中的索多瑪城那樣污穢不堪；而有了劉曉波，這個時代的中國暫時被上帝從毀滅的名單中刪掉，劉曉波為中國贏得了一段認罪悔改的緩衝時間——至於中國是否真的會認罪悔改，那就不是劉曉波的事情了。

活著，並且站立，似乎這是兩難的選擇。在這個彎曲背謬的時代，活著就意味著駝背，活著就意味著下跪，活著就意味著閉目，活著就意味著塞聽。劉曉波卻選擇為那些六四死難的學生而活，他認為自己不配稱為死難者的老師，因為孩子們死去了，老師卻倖存下來，這是何其巨大的恥辱。失去恥辱感的知識界從此麻木不仁、與狼共舞，劉曉波卻懷著一種贖罪般的心態開始了後半生矢志不渝的抗爭。有人將抗爭當作奪取權力或道德高地的手段，劉曉波卻將抗爭當作一件再平凡不過的職業和志業。

在北京的那些年裏，我和妻子有好幾次跟劉曉波、劉霞一起去郊遊。在警察如影隨形的監控中，我們總是能找到斑斑點點的光陰的縫隙。每當劉曉波和劉霞看到荒郊野外的樹木，都會發出由衷的感歎：多美！劉霞很喜歡畫樹，尤其是那種掙扎著要想騰飛的樹，從土地奔向天空的樹。而劉曉波喜歡欣賞劉霞畫的每一幅樹，到了愛不釋手的地步。

有一次我們去他們家作客，在狹小的客廳裏面，劉曉波滿頭大汗地將劉霞的畫一幅幅搬出來向我們展示。平日豪爽如女俠的劉霞，那一次會略帶羞澀地对曉波說：「又不是你的畫，幹嗎那麼顯擺？」而聽到我們讚美劉霞的畫，曉波比聽到我們對他的文章的讚美還要開心，像孩子一樣琅琅地笑了。

多年以後的 2014 年，我流亡美國之後的第三年，劉霞的哥哥到美國來找我。我問他，在長期軟禁中的劉霞有什麼需要，他說，劉霞特別叮囑說，希望為她拍攝一些美國的樹木。作為畫家的劉霞，長期以來失去了外出寫生的自由，只能根據照片畫畫。

於是，我帶著劉霞的哥哥去了美東最大的國家公園仙來多，在美不勝收的藍嶺驅車並徒步數小時之久，拍攝到了很多高聳入雲的參天大樹。在這個自由的國度，不僅人自由，連樹也如此自由，不會有龔自珍〈病梅館記〉中寫到的那種「病梅」。劉曉波是美國的熱愛者，若他能在這座森林裏面健步如飛，如果他能在這些高聳入雲的大樹下歌唱，那將多麼幸福。

不知道劉霞後來有沒有根據這些照片畫出新的作品，不知道劉霞有沒有機會將她新畫的樹拍成照片帶給獄中的曉波看？

聖經中說，愛神，愛人如己，愛是最大的誡命。劉曉波沒有受洗，但他比絕大多數號稱基督徒的人更好地履行了這道最大的誡命。

我願意在此分享一段我與妻子生命中的幽暗旅途，若沒有曉波的陪伴與安慰，我們真的不知道如何走出死蔭的幽谷。

2007年初，妻子懷孕了，我和妻子一起滿懷喜悅與期盼，守候著寧馨兒在母腹中成長。那時，妻子在一家外企工作，還要在方舟教會中參與很多的服事，忙得不可開交。

突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當我們去醫院執行孕婦例行的體檢時，醫生告訴我們，嬰孩已經在子宮中停止生長發育了。我們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再三追問醫生。醫生解釋說，子宮中的是一個需要立即動手術取掉的、還沒有胎兒雛形的死嬰。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醫生說，他也無法解釋，這些年來這種情況的發生率越來越高，也許跟北京的環境污染有關。

動完手術之後，妻子坐在輪椅上被推出手術室，臉色蒼白，神色茫然。我們回到家中，抱頭痛哭。妻子受洗之後，一直在教會忠心服事，為什麼這樣悲慘的經歷會降臨在她的身上呢？我們懇切地禱告，上帝始終沒有給我們明確的答案，但上帝派遣了一位天使來到我們身邊。

就在那幾天，曉波打電話約我們吃飯，我們不便在電話中告訴他實情，勉強應約出席了。細心的曉波發現我們情緒低落，便詢問發生了什麼事情。妻子含淚向曉波和劉霞講述了我們失去孩子的事情。

曉波神情凝重地聽我們傾訴完一切，向我們講述了他也失去了孩子的痛苦經歷，雖然不是同一個性質的「失去」；六四之後，曉波被捕入獄，婚姻破裂。九十年代初，他的前妻帶著他們惟一的兒子劉陶遠赴美國，離開這一傷心之地。後來，他跟兒子失去了聯繫，他等於是失去了兒子。或許，前妻不願讓孩子在成長過程中蒙受父親作為「國家敵人」的陰影，要讓孩子成為一名單純而快樂的美國人。（曉波去世前後，劉陶亦未現身，這是何等痛楚的父子關係。）

那天，一向笑聲不斷的曉波神情凝重地說，他以這種方式失去了孩子，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隱痛，但這也是從事人權活動可能付出的巨大代價。曉波又說，你們一定很快就會有孩子，上帝肯定會給你們一個更好的孩子。他還不是基督徒，卻像牧師一樣安慰我們。

然後，曉波從他常常背的那個帆布書包裏掏出厚厚的一疊錢，對我說：「這是我剛剛拿到的一筆稿費，你去給劉敏買一些營養品和幾件漂亮衣服。這麼好的女孩跟著你受苦了。這個圈子裏面，好多人因為對不住妻子，讓妻子受苦，自己還不以為

然，最後導致婚姻失敗。你一定不要重蹈覆轍。」

我們沒有收下曉波的這筆錢，因為我們知道曉波完全靠稿費生活也很不容易；但我們吃完飯離開時，妻子已破涕而笑，我也暗暗對自己說，一定要學習曉波珍惜和守護劉霞的做法。

這就是曉波的愛人如己，曉波就是上帝派遣到我們身邊的天使。第二年，我們的兒子光光誕生了，上帝賜予我們一個又健康又敬虔又聰明的後代。孩子剛滿月的那一天，曉波和劉霞趕到我們家中，帶來了一份最好的禮物：劉霞畫的一幅黑色的水仙花。劉霞對妻子說，這朵花就是你，也是我，是我們這些嫁給「國家的敵人」的可憐而堅韌的女子。

再後來，曉波四度入獄，劉霞去探監的時候，帶去一張我妻子和孩子的照片，隔著玻璃給曉波看。她不能提我的名字，這是秘密警察給她的「特別規定」，她只能對曉波說，看，劉敏和她的孩子。探監歸來，劉霞給妻子打電話說，曉波看到那張照片，凝視了足足一分鐘，露出欣慰的笑顏。

對於我和妻子來說，曉波和劉霞是超越了血緣關係的親人。曉波如同我的父兄一般，我知道，無論遇到多大的災難與挫敗，曉波都是那個惟一能幫助我的人。

如今，沒有人能幫我了。

記憶是甜蜜的，也是苦楚的，所以人類學會了遺忘。

曉波入獄並成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卻又成為史上最不為人所知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他的存在本身讓世界感到無比尷尬：他在獄中，劉霞在軟禁中，而世界無能為力。人們假裝他不存在。

挪威政府在遭遇中國多年的經濟制裁之後，不得不為這件由諾獎委員會決定、跟政府無關的事情，向中國當局私下致歉，其高層官員才被允許訪問中國。中國似乎又回到了乾隆大帝時代「萬國來朝」的盛世，誰敢為了一介匹夫劉曉波而得罪中國呢？在歷屆不同類別的諾獎得主呼籲中共釋放劉曉波的連署信上，從來不曾出現奧巴馬的簽名，即便在其卸任美國總統之後。當美國國會將通過將中共駐華府使館前面的那條街道命名為「劉曉波路」的決議案之時，作為總統的奧巴馬威脅說他將否決之。同樣是諾獎得主，品質相差何止千里之遠。

關於曉波，人們只知道他是八九民運的知識份子領袖，只知道他是〈零八憲章〉的重要起草者和組織者。然而，作為思想家和「精神界戰士」的曉波，卻鮮為人知。

曉波去世之後，那些曾經百般辱罵他的「反共達人」，不知是良心發現，還是企圖消費他，紛紛以一種「我的朋友劉曉波」的姿態，喋喋不休地言說昔日跟曉波的「戰鬥情誼」。

這還不算最糟糕的情形。

曉波去世之後第二天，曉波朋友圈中的一員、同樣也是異議作家的莫之許在臉書上給我發來一條訊息，說一幫知識份子以「自由曉波工作組」的名義起草了一篇曉波的悼詞，想徵求我的意見。

我看了之後覺得甚不滿意。首先，末尾有兩段充滿酸腐之氣的古文，像是來自皇家的誥命。曉波以全盤否定兩千年中國專制文化傳統而成為知識界的「黑馬」，

若是他地下有知，斷然不能接受這種腐儒的紀念方式。

其次，我建議寫入對於曉波而言雖然不無爭議卻是其重要的思想貢獻：中國要民主開化需經歷三百年殖民地；統一即奴役；人權高於主權；住民有自決權；既反對政府殺人，也反對民間的楊佳式的報復殺人等等。我認為，若沒有這些部分，所呈現的就不是完整而真實的曉波。

莫之許深以我的意見為然。然而，他跟該文本的執筆者或「決策者」們討論了許久，他們最終不能接受我的建議，說是要「避免爭議」。

曉波的一生就是充滿爭議的一生，如何能避免爭議呢？曉波被官方所虐殺，挫骨揚灰；同時，他也被所謂的民間或「同道」所扭曲，所改寫，他們賦予他的「高大全」形象恰恰是他最不想要的。曉波一生都以鄉願和虛偽為唾棄的對象，沒有想到最終仍然遭到鄉願和虛偽的同胞對其精神遺產的塗塗抹抹、刪刪改改。

從某種程度上說，劉曉波堪稱「被背叛的先知」。

作為曉波的密友之一，在 1999 年到 2008 年之間，我跟曉波即便說不上朝夕相處，至少在共同參與的每一項人權活動中「心有戚戚焉」。我覺得自己有責任向世人呈現一個比一般媒體的報導更鮮活的、更充滿人性的曉波，以及他那徹底的、決斷的、「劉曉波化」的思想特質。

在那段將近十年的時間裏面，我跟曉波有超過五百次以上的會面，單獨談話也有數十次至多，在曉波滔滔不絕地言說時，我做了不少筆記，也在日記中有詳盡記錄。我與曉波之間通過有上百封長長短短的電子郵件，既有討論公共事件，也有分享私人生活，甚至有為筆會事務的激烈爭論。這些材料成為我寫作《劉曉波傳》時有血有肉的原始資料。但《劉曉波傳》並未全部涵蓋這筆寶貴的素材。

2008 年，曉波第四次入獄之後，我受劉霞的委託，為曉波編輯了一本文集《大國沉淪》，次年該文集在臺灣出版，成為迄今為止最暢銷的劉曉波文集。曉波幾乎是「以一人敵一國」的勇氣，對抗「大國掘起」的官方論述，將「大國沉淪」的真相呈現在世人面前，讓中共當局每年高達數百億的「大外宣」戰略落敗。

2010 年，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之後，作為他的「同案犯」，我亦遭受中共政權的非法軟禁、黑頭套綁架、酷刑折磨幾乎致死，然後流亡美國。我在美國重新安置家園和書桌，立即著手編輯十卷本的劉曉波文集。劉曉波已有多本著述結集出版，但流散在各類網站上並未編輯出版的文字仍有數百萬字之多。我計劃每年編輯出版兩卷，五年累計完成十卷，那時，曉波就刑滿出獄了，這十卷本的文集將是我給他最好的禮物。

然而，這一願望隨著曉波的突然離去而落空了。傷心欲絕之後，我仍要堅持完成這項浩大而艱鉅的工程。

與此同時，在過去長達十五年的時間裏，在我撰寫的各類文字中，有數十字萬字跟曉波有關。其中，既有對曉波參與的人權活動中若干不為人所知的細節的披露，也有對曉波思想和精神的分析和論述。我想，這部分內容可以幫助世人更多認識曉波，讓曉波的形象從模糊變得清晰起來。當然，我眼中的曉波，或者經過我的闡釋的曉波，可能也是不完全的，甚至有偏差的，但我至少提供了「視角之一」，而曉波正是在眾人「眾聲喧嘩」的回憶和闡釋中「向死而生」。

陶淵明說，「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人的冷漠、隔絕和遺忘，是人不可克服的罪性的一部分。曉波去世之時，全球媒體集中報導，全球政要紛紛發表聲明，但此後將無可避免地走向冷寂，人們照樣到北京去「恭喜發財」。這就是無比冷酷的現實。

然而，曉波不會在意這些。他在地中海熾熱的陽光下，以慣有的大步流星向我們走來，跟我們擁抱在一起。

我相信，在未來中國民主化的歷程中，曉波的精神和思想，必將如劉霞送給我們的那幅黑色水仙花般驕傲地綻放。曉波以這樣的方式始終在場。

只要愛和公義不滅，曉波就永遠活在愛他的人的心中。

2017年7月15日至16日，臺灣解嚴三十年紀念日前後，由宜蘭至臺北、臺北至臺中之旅途中

余杰——僑居美國的中國流亡作家，獨立中文筆會前副會長（會長劉曉波）。

# 劉曉波和他的無敵論

## 金鐘

結束疲憊不堪的香港之行，回到紐約接到的第一通電話，就是：曉波走了。那正是我在飛機上的時候。在香港，朋友們估計他的生命不出幾天。一旦這個時刻來到，還是讓我悲痛不已。看到當局竟然在一天多，辦完後事，撒掉骨灰，完全不給曉波的朋友一點告別的機會，如臨大敵。網上的憤怒已如大海的波濤，衝向中共冷酷的宮牆。有透露說，北京高層早有決策，不讓曉波活著出獄。今天，他們取得維穩的一大成就。可是，美國媒體仍然不解地問：「他們怕什麼？」

### 公安部高幹的仇恨心理

外人不了解中國政治有「死人壓活人」的習俗。1989 學潮不就是利用胡耀邦之死而肇始的嗎？八九噩夢已經在年輕一代中被遺忘，但是在江胡習的這條權力鏈結上絕對沒有遺忘。二十八年來，他們維穩的第一目標就是絕不允許天安門廣場有任何非官方的民眾集會。而劉曉波不僅是六四的代表人物之一，更是擁有諾貝爾和平獎榮譽的國際名人，中南海的緊張可想而知，曉波命將「死無葬身之地」。事實證明，我們曾經想像曉波可以有六十五歲出獄之日，是多麼地一廂情願。

近讀著名維權律師高智晟回憶錄。發現這本生動描述他在獄中飽受酷刑的書中，有一段令人驚悚的記錄。在劉曉波獲諾貝爾獎後，公安部一位局長于泓源找高智晟談話。于說，「現在告訴你，今年諾貝爾和平獎給了劉曉波。給了又怎樣？還是得乖乖待在牢裏。要我們放人，我們怕嗎？諾貝爾和平獎算個屁！都在嚷嚷呢，共產黨的監獄就敢關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他警告高智晟：不要再執迷不悟，天上不會掉下餡餅，掉下來也不屬於你。「我把話說明了：共產黨如果明天滅亡，我今天晚上一定會弄死你。我心裏就專惦記著這事，一看共產黨要完蛋了，我要為共產黨做的最後一件事就是幹掉你。」——這段赤裸裸的話真像為曉波之死作的註解。事實上，中共高層及其專政部門在六四事件和蘇東巨變後，最專注的事之一，就是搞掉民間有影響力的領袖人物。為此，他們深謀遠慮而不擇手段。劉曉波無疑是天字第一號。

### 無敵論的深刻內涵

他們為了什麼？目的是一黨之特權和壟斷的巨大利益。但是，行為的動力，他們還需要精神上的支撐。那就是來自傳統、紀律和洗腦的仇恨。上述于局長就是一個活樣板。高智晟何罪？劉曉波又何罪？他日中國民主化領袖非他們莫屬？〈零八憲章〉十九條是何其浩繁的工程！于局長的一席話，除了「仇恨」二字，別無他解。正如曉波所說，「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能超越個人遭遇來看待國家發展和社會變化，以最大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這段話是他在法庭上的最後陳述〈我沒有敵

人)的基本表述。

今天重溫這份個人自白，我覺得曉波提出這個被稱為「無敵論」的概念，實有他的獨到內涵與苦衷，非常明顯的是來自歷史（毛時代）的教訓，和對未來自由民主中國的前瞻。而憲政民主更無所謂敵我，這是他超越國人的思路之處。他的和平非暴力抗爭思想在六四之前已經形成，有強大的聖雄甘地、曼德拉等非暴力運動的思潮影響，也有對中國二十世紀共產革命的現實思考。實質上，這不單是他個人的政治信仰，也是對當權者的呼籲：他指出是「政權的敵人意識把我推上被告席」，但更深的潛台詞是：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已經使國家血流成河，放下屠刀吧，不要與人民為敵——也許，曉波過高估計中共文革後的緩和趨勢和個人的獄中待遇，但不能否認他的善意和用心良苦。反對運動可以有多種策略探討，柔弱勝剛強，不等於「投降主義」。君不見「仇恨」正是伊斯蘭恐怖主義的特徵？

總之，曉波的無敵論可以概括為：政治上與共產黨動輒以敵我劃線為號召的暴力革命相對立，尤其反對和平時期視人民自由為敵的專政制度；法治上高度尊重依法治國，反對黨治，憲政原則高於一切。社會矛盾由法律解決，只有罪與非罪之別，沒有敵我概念存在餘地。——在這樣的基礎上，共產黨只有棄革命黨的性質，才有其立足的合理性。也才有利於社會真正的和諧穩定。

### 以天下為己任的書生氣質

自從 1988 年冬和曉波相識，做了那篇驚世駭俗的「三百年殖民地」的訪問，到參與 2009 年〈零八憲章〉修改與出版。曉波為《開放》雜誌撰稿達九十九篇……二十年的文字溝通、心靈交織，我感覺他並未表現過政治家的本領，卻有很深的以天下為己任的書生氣質，只是沒有過去士大夫那樣的迂腐而已。他的〈自辯〉詞，也只是力陳「以言治罪」之非。這是千真萬確的。他的才華、膽識，不愧為當代中國主張和平非暴力抗爭的思想家、傑出的反極權主義政論家。作為一位有獨立人格的知識份子，他又具有少見的不斷挑戰自我、否定自我的特質，他的自我期許是「無論做人還是為文，都要活得誠實、負責、有尊嚴。」他不追求臻於完美地走過爭議隨行的六十一年，成就了我們這個沉淪於形而下的時代的獨放異彩的人生。

(2017 年 7 月根據在紐約劉曉波追思會發言整理，11 月 6 日修改)

金鐘——香港開放雜誌創辦人總編輯。



# 劉曉波的樂觀精神從未動搖

李曉蓉



我最後一次在馬里蘭家中與劉曉波通話，是他於 2008 年 12 月在北京被警方拘留的前一天。他想要討論憲政改革宣言〈零八憲章〉終稿中的幾處措辭。他驕傲於自己如何在清晨 5 點現身北京某公園——一名被踢出政府的改革派人士練太極的地方——從那位老人那裏收集到了又一個簽名。

我憂心他和他的朋友們面臨的風險，建議推遲發佈這份文件。「有什麼好擔心的？對我來說最糟糕的結局不過是回去坐牢。但這是值得的：天安門事件過去將近二十年，正義卻依然缺席。我願意付出任何代價，」他平靜地回答。

2004 年，經由一位共同的朋友引薦，我在網上結識了曉波。2005 年，我們和其他幾個人一道，創辦了一個很小的人權團體。我們在幾年間密切合作，尤其是 2008 年的時候，〈零八憲章〉在一個約一百人的圈子裏多次易稿。

北京時間 2008 年 12 月 9 日凌晨 2 點左右，我意識到不太對勁。以往，曉波幾乎不會讓任何在凌晨時分找他進行即時聊天的人撲空，他常常帶著濃重的東北口音還有輕微而又獨特的口吃講自嘲的笑話，讓朋友們欲罷不能。但這一天，顯示他的在線狀態的不同顏色一直在我的屏幕上不斷切換「你還好嗎？你的 Skype 有些奇怪，」我寫道。他突然下線了。我後來才得知，警方當時正在搜查他的電腦。

北京警方拘留了劉曉波，一同被拘的還有他的朋友張祖樺。從前官員變成了異見者的張祖樺，是〈零八憲章〉的組織者之一。兩天內，這份文件被發佈。很快，警方拘留和審訊了數以百計的簽署者，搜查他們的住所，沒收他們的私人物品。

2009年12月，曉波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刑十一年。從1989年，也就是他因為支持天安門抗議者而身陷囹圄那年開始，他進過好幾次監獄。今年5月，他得知自己身患晚期肝癌，被收治入院。事後看來，對他的判決跟死刑沒什麼兩樣。

中國的專制者或許認為，正在服刑的曉波於周四去世，突顯了他們的力量和勝利。但他們旨在把曉波的理念從中國民眾心裏清除的努力並非完全有效。由於政府對媒體的控制，很多中國人或許沒有聽說過劉曉波的名字，但據報道，最近共有三萬四千餘人——多為生活在中國的人士——在一封公開信上簽名，要求當局釋放他，並保障他自行選擇就醫方式和地點的權利。

此外，儘管在習近平主席治下，中國的氛圍近年來變得越來越壓抑，但曉波以愛「超越恐懼」、「以樂觀」和平地爭取自由的願景，仍在鼓舞著新世代民主和人權活動人士。

比起1989年或2008年，現如今有更多中國人正開展規模雖小但卻意義重大的和平抗爭活動，以進一步推進人權保護事業。我遇到過很多為主張保護殘疾人、LGBTQ人士、性暴力受害者權益的非營利性團體工作的大學畢業生。跟我有過合作的一個團體，曾對法律門外漢進行培訓，讓他們得以使用法律的武器把官員告上法庭，保護自己的土地，或者就職業病和工傷尋求賠償。

一名女性在一位受過聯合國婦女權利公約相關培訓的律師幫助下，起訴她所在村子的村幹部，打贏了一場涉及性別歧視的官司。另一位律師向聯合國提起上訴，指控當局任意拘禁他的客戶——後者未經審判便被關進了一座勞改營。官員們告知這位律師，在聯合國對該案進行質詢後，其客戶被釋放。

像他們這樣的中國人，正幫助構建民主的基石。首批簽署〈零八憲章〉的人士當中的一名教師，組織開展了村級選舉監督，並成為了基層選舉法規方面的專家。他的團體已經在網上對數百人進行了關於自由公正的基層選舉的培訓。

劉曉波從未心懷非暴力行動不會被報之以暴力的幻想。一些律師在法庭上向受控於政府的司法體系發起挑戰，試圖讓嚴刑逼供或者把被拘留者關在秘密地點的警方承擔責任，但他們自己也遭到了拘留和折磨。

不過，劉曉波並未讓這種壓迫給他那寵辱不驚的樂觀心態投下陰影。他關於自由是「人性之本，真理之母」的堅定信念，將會繼續引導我們所有人。

原載《紐約時報》中文網

**李曉蓉**——旅美華裔學者、編輯，人權活動家，維權網負責人。

# 劉曉波的抵抗

## ——從民主牆到互聯網

邵江

劉曉波從出生到青少年經歷毛時代集權制度的興衰，獨立思想始於挑戰鄧小平重塑集權制度的民主牆時期。自 1978 年起，劉曉波以文學和美學自我啟明，實踐和堅持批評自由。1989 年，劉曉波放棄在海外安全發展的學術生涯，投身於中國民主運動，實踐公民抵抗。六四屠殺後，劉曉波將每一次牢獄經歷自省為下一次繼續抵抗的起點，揭示集權無所不在對人的塑造和異化，探索何以超越專制迴圈，擺脫人被奴役的狀態。劉曉波的抵抗與民間紙媒出版和互聯網傳播密切相關，他實踐的結社和集會權利旨在建立自主和獨立的民間社區。

劉曉波抵抗之始，是在大規模人禍結束的後毛時代，民主牆的出現導致了中共陷入巨大的合法性危機，鄧小平重塑新集權延續黨天下的政治制度，經濟上融於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對社會的控制採用防微杜的高壓，隨著中國經濟的迅速增長，在全球經濟中的份額比重大幅增加，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全方位投資，這些國家的精英階層與中國的官產學媒航籌交錯、利益交換，共享全球霸權和特權。

在江澤民後期和胡溫時代，再次出獄的劉曉波借助互聯網實踐言論、集會和結社權利，被判十一年徒刑，詩人和他的妻子劉霞也被軟禁。在習近平聲稱打通毛澤東和鄧小平前後三十年的時代，劉曉波是第一位諾貝爾獎得主在全球媒體直播下被中共謀殺、毀屍、並銷毀證據，劉霞的自由被完全剝奪，身心備受摧殘。如何對待劉曉波的遺產、劉霞的命運如何，標記著這個世界的走向。

劉曉波的生命實踐正如漢娜·阿倫特所說「無論面對何種現實，總要坦然地、專心地面對它、抵抗它。」阿倫特所指抵抗的對象是帝國包括納粹帝國以及蘇維埃式的集權。而中共打通的毛鄧集權也正是納粹和蘇聯模式的混合體，其更大的背景是當下帝國主導的全面聚合權力和資本的全球化。劉曉波為這個動盪的世界留下了最重要的抵抗遺產。

### 實踐出版自由和言論自由

從 1970 年代末到 1980 年代初，劉曉波參與《赤子心》文學期刊的寫作和編輯，積累了以雜誌創造公共空間的經驗。他和同道寫作者以文學為起點和支點，認識自我、揭示當下人的生存狀態，探討文學、政治和社會之間的關係。在 1980 年代中期和後期，劉曉波以美學探索和想像深化自我生命的意義，揭示知識人與體制的關係，實踐批判自由，爭取言論自由的空間。

1970 年代末詩刊《赤子心》像當時其他高校的學生文學刊物，可以使用校系的

油印機，刻板油印成刊，定期出版和組織相關活動，形成校園詩人、作家、文學青年的聚集空間。在一些刊物中經常刊載與官方風格不同的繪畫與其作品呼應。這類刊物在高校之間相互郵寄與讀者交流，形成了在中共檢查制度之外的另類文學和話語，並生成公共場域。

1979年，十三個高校的學生文學刊物包括《赤子心》，共同創刊了新的刊物《這一代》。《這一代》以「四五」運動作為一代人的標誌，以反抗專制建構這一代的主體意識。(1)《這一代》實踐跨地域結社，觸犯中共控制社會最主要的禁忌，壓制隨著而來，導致這份季刊幾乎腹死胎中，由於武漢大學辦刊學生的堅持，首期終於以殘缺版出刊和傳播，這是民主牆時期跨地域結社的一次重要嘗試，對後來跨地域的中華全國民刊協會和其他的跨地域民間組織或網路都有重要借鑒意義。

高校學生自辦出版物與同時代的校外民主牆相呼應，形成可移動的活版印刷刊物。各地的民主牆更像是一本巨型雜誌，匯集高校學生、城市工人、知識人所辦雜誌和其他社會階層張貼的大字報，提供了社會各階層的交流，共振互動的公共平臺，直接挑戰和繞過檢查制度，成為民間自主集會的聚集地。各地民主牆作為連接點，構成了跨地域結社和集會的空間。

1979年底，中共全面鎮壓各地民主牆，高校也開始轉入地方人大代表競選，將民主牆的可移動民刊轉變成為獨立參選刊物。校園外民主牆參與者繼續出版地下和半地下民刊，加之香港雜誌和《中國之春》等海外刊物在大陸流傳，可移動的民間出版和多管道傳播成為民間交流的主要公共場域。

1980年，中共開始整肅文藝界。許多文學刊物對寒冬的隱喻，在更被禁錮中尋找自由表達，與被整肅的作品如〈將軍，不能這樣做〉和〈太陽與人〉之間言說共振。《赤子心》的表達形式愈趨多樣，其中劉曉波的作品更集中探索獨立人格和自我擔當。(2)

中共三十年執政製造不間斷的災難，官方意識形態已經千瘡百孔，集權宣傳的調試鐘擺從壟斷釋義的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到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之間搖擺。中共為應變其意識形態的破產將一些流行的傷痕文學轉化為宣傳樣本，尋找知識界的合作。這類宣傳模式通過解說苦難，回避災難與中共制度的關係，將個人親情和倫理移情於專制，沉醉於苦難中的幻覺激情，將集權抽象為對母親的矯情，祖國成為濫情的尋根之源，懷舊和矯情成為浪漫容納暴政的溫床，製造了熱愛祖國與忠誠集權不可分割的幻象。

這種宣傳配合「清除精神污染」，鎖禁知識人緊箍咒並與實施更系統的檢查制度結合，成為中共在鎮壓民主牆以後，以現代化的宣傳、合作、檢查、和鎮壓結合控制社會的主要手段。而同期的美學、文學、哲學、物理學、新聞界和出版業等領域的有識之士反擊和解構這種專制現代化的緊縮圍剿，不斷突圍。

對比1957年上半年的美學討論，1980年代中期的美學討論直接從中共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中突圍。這時的知識界更主動拒絕接受中共1950年代模式的思想改造，擴大挑戰官方設限範圍，使官方的檢查制度漏洞百出。美學的討論也可以通過官方或半官方的管道的傳播延伸到到各地的大學和都市的工廠，美學和文學通過紙媒的轉播以及討論會轉換為與政治相關的討論場域。這些討論獲得了更廣泛的社會

閱讀和回應。

劉曉波在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召開「新時期十年文學討論會」的發言〈新時期文學面臨危機〉，從學界的討論直接在《深圳青年報》出版。這類非主流的言說通過其他不同形式的複製和傳播，利用官方、半官方管道，形成灰色空間，廣泛討論和多種解讀文學、美學和政治、傳統文化和現代化的關係、知識人的角色和批評自由，對幾代人在集權下的解魅和去味產生了重要影響。

1986 年是劉曉波公共演講文學和美學最為頻繁的一年。這一年末，他受到邀請到北大發表了關於美學和文學的演講。在問答期間，不同意劉曉波的學生對他大喊，「劉曉波，我想揍你！」劉曉波大聲回應：「上來……讓我們辯論，我不贊成你所說的，但我捍衛你說話的權利」。場內從初始間歇的噓聲和譁然，到喝彩和掌聲。

1980 年代形成的評論空間，多途徑複製和傳播途徑。對掌控話語者的反抗，實踐批判的自由，這與五四新文化運動也有相似性。劉曉波的博士論文深化他前期辦刊、創作和公共言說，通過文學和美學對自由的追尋、空間的想像、路徑的抵抗，雕刻生命的意義。(3) 而他的博士論文答辯將狹窄的學術議題轉成公共議題，答辯會的討論延伸到對人之當下處境的討論。

1988 年到 1989 年 4 月，劉曉波在海外遊學，他在《解放月報》等境外報刊發表更直接清晰言說中國當下制度和如何反抗。「民族劣根性，諸如「愚忠」、「羣體至上」、「平均主義」、「民族主義」等等。但是，就中國的現實而言，所有這些都可以歸結為這樣一點：即不能從專制主義的內部來尋找否定專制主義的力量。」(4)

### 創造結社和集會空間

劉曉波回國參與了 1989 年民主運動，在北師大、廣場和廣播車講演，戒嚴後組織和參與四君子絕食。當戒嚴部隊在北京街頭屠殺和平示威者後，四君子和許多參與者在天安門廣場堅持非暴力抵抗，戒嚴部隊包圍了廣場後並準備使用任何手段、不惜任何代價定時清場時，四君子與軍隊談判，勸說廣場數千名抗議者撤離。

六四屠殺後，劉曉波被關押二十個月。1991 年，劉曉波出獄後，被大學開除，他的作品被封，生存和抵抗的空間被大幅度壓縮。隨後的二十多年，劉曉波為海外十幾個刊物撰稿並出版書籍，參與創立境內網上論壇和境外網上刊物，聯通了內外抵抗空間。

劉曉波第一次出獄後，短暫訪問海外，這是他在六四以後唯一一次可以在海外旅行，以後被禁止出國旅行。自 1990 年初，在鄧小平的防微杜漸消滅於萌芽中的維穩體系下，對一個實踐言論自由和批評自由，堅持留在極權統治下抗爭的戰士而言，最大的挑戰是如何繼續在這種集權統治下，再創各種不同的空間，而空間的創造和擴張依賴於實踐集會、結社和言論權利。

蔣培坤是劉曉波博士論文的答辯老師，也是天安門母親的創始人。劉曉波第一次出獄後，丁子霖和其他天安門母親成員尋訪和調查六四死難者是劉曉波懺悔、反省、再尋抵抗路徑的起點。這個階段，劉曉波參與的異議羣體發言看似上書，實際是對社會發言，也是一種擴大網路的方式。

八九後，民間聚集空間被大幅限制，民間的聚會場所經常改在旅店、飯館、朋

友住所或公園。

劉曉波參加的聚會我也去過幾次，最長一次是劉曉波和周舵 1993 年最後一次去國後轉輾回到北京，通宵暢談，談他們在海外見聞，評論不能在大陸出版的書籍。最後一次會面是 1996 年 8 月底在深圳的飯店，劉曉波提議每人講一個笑話，一位講到鄧小平、江澤民和李鵬坐同一輛車，路遇一個丁字路口，鄧小平指示打左燈向右轉。劉曉波評論中共左右通吃。另一個笑話是雷根、戈爾巴喬夫和鄧小平給上帝打電話，詢問上帝何時他們各自的國家可以實現民主。(5) 劉曉波當時對這條笑話沒有評論。聚會結束後，劉曉波問我當地是否有可以言說並行動的人，於是有了與王希哲在廣州蘭圃見面和聯名發表的〈雙十宣言〉。宣言發表，隨即劉曉波被拘留而後被判勞教三年，王希哲被迫流亡。這是六四後到〈零八憲章〉之間劉曉波坐牢最長的一次，劉霞一次次乘坐「集中營的那列火車」……

1999 年，劉曉波再次回到大監獄後，更多的社會問題彰顯，社會分層也更明顯，知識界也更加分裂。劉曉波以匿名方式和王朔的對談《美人贈我蒙汗藥》是在更為冷漠的消費環境，借助灰色管道出版的書籍。這種空間已經不像 1980 年代，言說轉瞬即逝，很難形成對公共議題持續討論。從不避席畏聞文字獄的劉曉波，以他的政治評論開闢新的空間，他的時事評論，將集權體制利益集團、虛幻盛世和民間抵抗記錄於筆下，傳播網上，轉為公共議題。

劉曉波的言論只能通過網路發表，不像八十年代觀點對立學者之間面對面的交流和辯論。在紙媒到互聯網轉換時期，反對黨和地下雜誌、有批評意識的學者刊物、從官方空間突圍的媒體、新生成的灰色空間、獨立社區、獨立媒體，在多數時間未形成廣泛的討論旋即被壓制或消滅。獨立民間社會成長依賴與連接不同的抵抗以及使用不同形式的突圍。劉曉波批評當權者的專制，支持與自己觀點不同的其他民間人士爭取權利。(6) 這是他連接碎片化社會階層和族羣的軌跡。

劉曉波看似驚世駭俗言論，實際承繼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一些學者的主張，如他主張中國需要實行類似香港的三百年殖民地。提供以他者為模式擺脫中國長期專制和中華帝國法西斯化的方案。新文化運動中全盤西化和劉曉波的這類言說可以是一種互文解讀改變迴圈專制制度和變革社會的方案。魯迅對這類言論評價頗為中肯：「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裏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願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如從自主抵抗角度辨析劉曉波的這類觀點，應從被壓迫者何以被壓迫，壓迫制度的來源和如何運作，如何通過被壓迫者的自我教育，實踐自主抵抗。

劉曉波三百年殖民是對中國人的專制千年坐穩奴隸的民族主義的反抗，從外部借力。但是當下的問題是，中華集權帝國和其他強大帝國霸權操控全球資本，共謀分贓。以資本和實力政治主導全球化的模式不變，民主國家不能消除制度中的特權、人民不能有效和直接參與重要的公共事務，強大集權國家的統治利益集團與目前民主體制中的特權和精英階層進一步合作，當下民主制度被集權制度將逐步演化，距離進一步民主化愈行愈遠。

自主抵抗不是借西山老虎打東山老虎，或反其道而行之，借東山老虎打西山老

虎，而是在全球範圍內把所有老虎關進籠子，否則人類只能繼續在不同類型的野蠻和強肉弱食之間跋涉，寄希望於各種權力者，被壓迫者並不能根本改變自己被奴役的命運。本雅明揭示自甘於奴役和統治者的關係：「寄與勝利者。一切統治者都是他們之前的征服者的後裔。因而寄與勝利者的移情總是一成不變地使統治者受益。」因此命運自主和擺脫奴役的抵抗，只能是既抵抗集權又反抗帝國。

最值得重視的是劉曉波的博士論文最後一章提出擺脫人被奴役的無望——「即使徒勞，也要抗爭」<sup>2000</sup>年之後，對林昭抵抗的回顧成為民間自主抵抗的重要資源。劉曉波以林昭的抵抗為借鑒，實踐當下抵抗，建立民間社會抵抗的主體，依靠民間自主和自覺的努力，改變政權和政治。<sup>(7)</sup>如同林昭的抵抗，劉曉波將自己不斷放入直面強權，在反抗中檢驗自己，在抗爭中反省，這是劉曉波和所有以生命抗爭人士對這個時代的啟明。

劉曉波參與創建了獨立中文筆會，實踐的結社自由也擴展了大陸言論自由的公共空間。筆會的成立行使結社、集會和言論權利，這是一次更大範圍跨地域的抵抗。劉曉波參與救援獄中作家、反對文字獄以及對中國獨立作家的支持，實踐言論自由和人道主義，建立了跨國界和不同代際共同抵抗的模式。

劉曉波參與的〈零八憲章〉初始是一個有一定程度的開放平臺，以不同層面的政治主張連接碎片化的社會羣體和不同民族，對〈零八憲章〉的討論和批評也體現民間社會的活力和多元。〈零八憲章〉的傳播也體現民間出版多樣性和可移動的特點，這些特點是共同抵抗集權、保持民間社會自主最重要的持久動能。中共恐懼劉曉波徵集〈零八憲章〉簽名，更懼怕中國民間社會滾雪球式實踐集會和結社權利，以及中國民間抵抗與全球抗爭結合——埋葬集權和帝國。

### 精神家園

劉曉波與劉霞的詩文和友人的通信，探索和建構自己的精神家園。在被監禁時，劉曉波的閱讀、思考、寫作和言說是他留給這個時代最重要的抵抗遺產。劉曉波與劉霞的書信往來是在專制現代化中，人抵抗異化，如何生存和抗爭，實踐審美生命和心靈超越禁錮。

抵抗極權不僅僅是持不同政見者，而更是持不同生活見解者，創造超越與集權制度加諸禁錮或潛移默化的影響，創造尊嚴的生活方式、能獨立思考和行動。

劉曉波在獄中最後八年在牢獄中不停自省和反抗。劉曉波和劉霞建立的精神家園，詩歌、攝影和家書，是直面強權，抵抗野蠻，實踐的自由和美學。被軟禁的詩人和攝影家劉霞和劉曉波共同創造了「崖山霞波浩無涯」的精神家園。劉曉波堅守抵抗，黑暗中點燃自己，向死而在。

#### 註釋：

- (1) 《這一代》發刊詞：「真的，很難設想，如果沒有『四五』這一天，我們的子孫後代談起這一代，將會說：「他們交了白卷！『一張代表恥辱的白卷，遮掩了這一代人堅毅的面容…」
- (2) 劉曉波：〈心事〉、〈我願〉：「即使有一千條大多，我還是願走小路，那裏清靜」

「把我塑造成一只小船…永遠在海上。」「我願做一顆流星，把剎那光明，寫滿沒有光明的天空…」《赤子心》第六期

- (3) 劉曉波：《從審美走向自由》
- (4) 劉曉波：〈混世魔王毛澤東〉
- (5) 鄧小平、江澤民和李鵬坐在同一輛車內，路遇一個丁字路口，李鵬說向左轉，江澤民說向右轉，兩人爭執不下請示鄧小平，鄧小平說打左燈向右轉。另一個政治笑話：雷根、戈爾巴喬夫和鄧小平商量好一起給上帝打電話問各自的國家何時可以實現民主，上帝說美國需要五十年，雷根說希望我可以看到那一天。輪到戈爾巴喬夫，上帝說蘇聯需要一百年，戈爾巴喬夫哭了，「沒有希望活到那一天了」。鄧小平剛提出了問題，上帝哭了。
- (6) 劉曉波：〈中國毛派挑戰現政權的悖論〉
- (7) 劉曉波：〈通過改變社會來改變政權〉

**邵江**——旅英中國流亡學者，政治學博士，人權活動家，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1989年學運時是北京大學數學系學生，任北京高校學生自治會常委，六四屠殺後被關押了一年半。



# 劉曉波是香港人的英雄

蔡詠梅

我認識曉波十幾年，但沒有見過他本人。最初是因為他為《開放》雜誌寫稿，我是《開放》的編輯。我們經常通電話，談稿件、談時事政局，很談得來，後來他當獨立中文筆會會長介紹我加入筆會，有了更多的工作接觸和朋友間的交談。但我的發言不是談我個人對曉波的感受，是借此機會向大家介紹一下香港人（當然不能把親中共的人算上，是指民主派和普通市民）對劉曉波的深厚感情，對他的思想的理解，以及他被捕之後堅持不懈的聲援。

大家知道，劉曉波的言論中有兩點是有很大爭議的，一是中國須經三百年殖民地之說，罵他的主要來自親中共的左派和民族主義者。一是他的「我沒有敵人」主張，罵他的卻來自相反的反共（右邊）一方。但在香港，除了親中共左派，劉曉波是沒有敵人的，甚至沒有批評者。即或現在宣稱要與中國完全切割的一些極端本土主義者對劉曉波也是肯定的，因為他們欣賞劉曉波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對當時為英國殖民地香港的認同，不是他們討厭的「大中華膠」。

劉曉波這個三百年殖民地之說，主要是指中國的現代化轉型因為傳統的包袱，將會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需要漫長的普世價值的啟蒙，只不過當年比較像文學憤青的劉曉波用了一個文學的語言來表述，而且是一種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誇張表述。前香港《文匯報》副總編輯程翔不久前寫了一篇文章，特別就曉波發表此論時中國大陸的文化思想界那種急於擺脫傳統束縛邁向未來的時代背景做了說明，指出劉曉波的論點沒有錯。

劉曉波的「我沒有敵人」在海外民運圈子中引起很多批評，但自劉曉波被捕後，在香港的朋友交談中、網絡言論和公開講話中，我還沒有看到有人持批評的立場，相反在香港民主派中，這種表述還獲得很大敬意，他們認為這種「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是人類一種最高的精神境界，一位後半生在監獄和監視中，在政治迫害中度過的人，一個最有資格去仇恨的人，可以達到此境界，是非常了不起。香港一個常用激進抗爭手段的民主派政黨「社民聯」的一位活躍成員唐婉青（長毛梁國雄的助理）有次聚會時碰見她身穿印有曉波頭像和「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文字的T恤，她對我說，劉曉波沒有敵人的精神真是太偉大了。香港一位天主教神父在劉曉波追思會上甚至說劉曉波是上帝派來的聖者。

人說全世界最反共的地方是香港，中共也稱香港變成了反共基地，但香港人自己明白，他們是在安全的地方反共，無論他們言論和行動多激烈，他們只是廣義的「口炮黨」，而且人身是安全的。港人更知道在中共治下從事反對運動的風險有多大，李旺陽和劉曉波為此付出的慘重代價完全震撼了他們。而另他們更震撼的是，兩位烈士都是明知其風險仍義無反顧。劉曉波終年六十一歲，但其後半生二十八年完全

投身這場風險極大的反對運動，期間四進監獄，坐牢近十四年，沒有坐牢的日子，也是在監視、跟蹤和騷擾下生活。

我這裏順便要提一下，在互聯網通訊技術還不是很普及的九十年代，在中國從事反對運動不但危險甚至很孤獨。因我是新聞工作者加上劉曉波為開放雜誌寫稿，對劉曉波九十年代在中國被消音，被社會排斥，作品無法發表，許多朋友不敢接近，只能和少數處境相同的異議人士抱團取暖的孤立冷清狀況，我略知一些。那個時候，曉波他們這些異議人士生活可以說非常潦倒，但曉波耐得住寂寞，不怕被冷淡孤立，挺過來了。

而且最重要的他是可以選擇不這樣生活。1989年他身在美國買了單程票回國，飛蛾撲火。1993年他出國短期訪問，可以一去不返，但他不顧友人勸告再次毅然回國。在他後半生漫長歲月，當局一直給他壓力欲迫使他流亡海外，他完全不為所動。香港反對運動人士好多都佩服劉曉波和李旺陽一樣是一條硬漢。

香港最出名的街頭抗議人士梁國雄有兩個偶像，他常把印有這兩人頭像的 T 恤穿在身上，一是格瓦拉，另一就是劉曉波。

第二我要談的是，香港人對劉曉波、劉霞始終支持不懈，當全世界都忘記劉曉波的時候，只有香港人仍然堅持為他呼籲。



劉曉波被捕後港人對他的聲援一波又一波。2009年聖誕節劉曉波判重刑，消息傳來，香港人極度震驚，香港多個團體立即前往中聯辦（中央政府駐香港辦事處）抗議，抗議人士甚至因太過憤怒衝進了中聯辦，與警察發生衝突。當晚還有年輕人

在中聯辦外焚燒中共黨旗，有女孩子悲憤大叫說，這是一個殺人政權。其後香港二十一位簽署過零八憲章的年輕人以「自首」方式，自縛雙手，背插「罪，簽署零八憲章」的紙牌，通過羅湖橋前往中國境內抗議，但還未越過邊界線，其中幾人竟然被中共邊警衝過來帶走。受劉曉波判重刑的刺激，民主派發起的香港元旦日遊行罕有的以中聯辦為目的地，並有三萬人參加。

在劉曉波後來坐牢的日子，香港人不但繼續呼籲釋放劉曉波，即使全世界似乎都遺忘了獄中的劉曉波，當港人仍然不懈地聲援他，並十分關注一直被軟禁的劉霞，發動多項有關行動，如為劉霞公開慶祝生日，行為藝術撐劉霞，以及十位港人（包括三位女士）當眾落發剃光頭要求還劉霞自由等。去年 12 月的國際人權日，支聯會發起一人一相要求釋放劉曉波，並在今年 4 月 1 日劉霞生日這一天，支聯會在香港鬧市銅鑼灣時代廣場公開為劉霞祝賀生日，用這些照片砌出一張劉曉波與劉霞的合照。

曉波患絕癥消息傳出後，香港人感到震驚和悲痛，立刻到中聯辦抗議，並在酷熱的天氣中在中聯辦外日夜接力靜坐，強烈要求中共讓劉曉波帶著妻子出國救治。曉波不治，當局將曉波遺體挫骨揚灰灑向大海，港人身著黑衣，舉著燭光，冒著不時落下的驟雨，含著淚水默默地從金鐘走向中聯辦門前的劉曉波祭壇。然後頭七之夜，在香港維多利亞港旁的添馬公園，為劉曉波舉行追思會。身在他們之中，我強烈地感受到普通香港人對劉曉波悲劇命運的極度悲憤。

劉曉波是香港人的英雄，香港人將永遠懷念他。

本文是作者寫給 7 月 30 日劉曉波追思及研討會的書面發言，還附有很多圖片。

**蔡詠梅**——香港作家，《開放》雜誌前編輯，獨立中文筆會女作家委員會協調人。

# 路上的囚徒——紀念曉波

野渡



曉波逝去已過百天。這一百天來，無時無刻不想為他寫點東西，提起筆卻又無話可說。世間沒有天堂，在血寫的現實下，語言是如此的無力，既不能讓逝者的靈魂稍感安慰，亦不能讓生者醒覺奮起。

然而，終歸還是要說些什麼。

他的聲音，他的名字已在這片國土上成為敏感詞而消失，他的肉體亦被消失，不說些什麼，如何面對他生命的犧牲與祭奠。

## 二

與曉波的相識，緣於網絡。

在中國互聯網的早期，我創辦的《民主與自由》網站以被當局封殺四十八次成為一個網絡傳奇。曉波是《民主與自由》網站的忠實網友，他在一篇文章裏說：「自從互聯網進入大陸中國以來，獨立於官方立場的民間網站便應運而生。在民間網站中，盡量避免敏感時政問題、專打擦邊球的自律者多，而堅守信息自由立場的勇者寡。在極少數敢於突破言論封鎖的民間網站中，野渡主持的《民主與自由》無疑是大膽而堅韌的民間網站之一。」

在他 1999 年出獄到 2003 年成為筆會會長之間的那幾年，他在北京是很寂寞的，作為知名異議人士，在當時肅殺的政治氛圍下，他一直被主流的體制知識份子圈所排斥，社交不多，所以有大量時間泡在網絡上，而我所創辦的《民主與自由》以刊

發敏感時政新聞和敏感人士的言論而成為他最喜瀏覽的網站，他註冊了一個叫「水皮蝦妹」（水之皮，即是波；蝦妹，劉霞閩名霞妹的諧音）的網名在《民主與自由》上發帖以及和網友交流。在網站屢封屢建中，我與曉波漸漸熟悉，並成為無話不談的朋友。

常想起與曉波一起共渡過的相隔千里以電腦一線相連的每個夜晚。

那時候，他喜歡寫完文章後通過 Skype 朗讀一次給我或者達功聽，在朗讀時他感動到語句有問題就停下來立刻修改，接著再繼續朗讀，那時候他一點也不結巴。因此我是他很多文章的第一「聽者」。

那時候，我們都喜愛足球，而他一提起喜歡的巴塞羅那球隊和梅西，就滔滔不絕。每個有球賽的周末，我們就開著聊天軟件，邊看電視直播邊在電腦上聊天評頭品足。

那時候，他閒適時喜歡說起他所經歷的人和事，說起王朔對他的幫助，說起王小波的往事，臧否人物。

那時候，他無微不至地關心著我的際遇。當我被打壓時，他第一時間撰寫了文章《民間網站守望者野渡》聲援；當我需要資金購房以擺脫被當局驅趕的困境時，他出面多方籌措，使我得以安頓；當我家人住院時，他第一時間致電慰問；即使在他失去自由前，他還擔心著我的生活，交代其他朋友盡可能想辦法給我找更多提高收入的途徑。

我常想起我們第一次見面的那個冬日。當我按響他的門鈴時，他迫不及待地從樓上三步並作兩步趕下來開門，然後伸出雙手擁抱的場景。想起那個晚上我們在他家客廳暢聊至凌晨六點，直到我迷迷糊糊地在沙發上入睡，醒來時看到他已細心給我蓋上了棉被，準備好了飯菜，那一刻直到現在的溫暖。

在他被捕前幾天，我們還在聊著入冬後的北京太冷，他計劃和劉霞南下廣東避寒。我已經在安排著他到來時的行程。

沒想到，那是永遠不會實現的行程。

他走了，我失了一個朋友，一個老師，一個兄長。

這種痛，是靈魂的抽搐。

### 三

在曉波患癌消息傳來前幾天，和曉波的一些朋友相聚，因為計算著他已經繫獄八年，離獲得自由的時間已不足三年，我們還熱切討論著他出來後，面對今時今日政治天花板越降越低的中國，他應如何才能彌補失去的十一年時間，觀察和適應上這對異議者更殘酷的時代。但沒想到比他失去自由更殘酷的事情已降臨到他頭上。

八年間，無數次在夢中還見到他，而希望同樣與夢一樣不絕，覺著還有三年，就可以再聽到他熟悉的結巴聲音，聽著熟悉的國罵口頭禪，一如昨日，在電腦的 Skype 上，談論著巴薩隊那水銀瀉地的華麗攻擊，談論著中國民間空間的生長。八年了，我們所喜愛的梅西仍然是球場上的國王，但風霜悄然染上的發鬢已在宣告他的時代漸漸邁向終結；八年了，期待漸進、溫和推動社會轉型的中國民間早已夢碎鐵幕。歲月就這樣無情地改變著世間，改變著人心。

## 四

這八年的時間，中國從後極權時代走向了新極權，江胡時代掙扎成長起來的自由空間被全面清場的鐵拳碾碎。八年前，無數人為民間空間的增長而激動，渴望更多的自由，期盼著社會的漸進轉型，曉波的「我沒有敵人」代表著的就是那個時代的希望與夢想。但事實上，以對〈零八憲章〉的圍剿和對曉波的判刑已然顯示著這個政權的剛性和強硬，同時也預示著一個恐怖時代的到來，但是〈零八憲章〉那麼大範圍的傳播和影響卻只抓捕曉波一人，及其後來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光環，沉浸在喜悅的自由陣營忽視了極權猙獰的獠牙已越來越近。

以對曉波和〈零八憲章〉羣體的圍剿為標誌，重新加強社會控制為主要手段的新極權主義成為政權唯一的姿態。限制了社會自我組織與發育，控制社會個體對政權的挑戰，迫害人權成為常態，而曉波夫婦所付出的代價是這些受難者中所受最殘酷的。他們夫婦的遭遇是這中國正在向黑暗沉淪的鐵證。

而這一切，是在獄中信息完全被堵塞的曉波所不知道的，他甚至不知道他所摯愛的妻子所經受的磨難，這完全和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極權時他在獄中的遭遇大相逕庭。那時的他可以和所熾熱相愛著的劉霞在獄中結婚，而在新極權治下的今天，他卻只能被癌癥，妻子被抑郁癥，生而不自由，死亦不能自由。

## 五

但他的靈魂是自由的。所有在曉波生命後期認識他的人都驚訝於他的溫和、寬容、謙卑，與八十年代狂飆突進的文壇黑馬截然相反。這寬容的精神來自於生命的沉澱，來自於劉霞愛情的溫潤，更是對自由的不懈追求的必然。

前期的激進與後期的寬容在他身上奇妙地合為一體，這是長河劈山開路然後融入海洋的浩瀚胸懷，而沒有激烈為自由而抗爭過的寬容則只不過是死水一潭。

所以，他不但是言說者，更是行動者，這在中國當代知識份子裏是絕無僅有的。他以文章入木三分地揭露「盛世中國」皮囊下的荒謬與可笑，他從不認為黨國有一絲一毫改良的可能性，相反，他認為「未來自由中國在民間」，是民間主體性的首創者，為此他不但以筆為旗，鼓勵抗爭，更身體力行。他參與創辦和發展獨立中文筆會，不是為了辦成作家的「Party」，而是要構建民間政治反對的人際網絡，事實上在中國互聯網早期的網絡異議表達運動裏，由他發起的各種網絡簽名乃至〈零八憲章〉的簽署，這個網絡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

## 六

在他被捕前一個月，我們倆聊起共同的一個朋友劉路在美國申請政治避難的事。

他問我如何看，我說：「我尊重每個人的選擇，但是我絕對不會離開這個國家，我的信念一直是：這是我的祖國，我要讓它自由。」

然後我反問他會如何選擇出國的事。他說他要出國，只有一個可能性，就是中國實現了民主自由，他才會帶著劉霞周遊列國去，好好彌補這麼多年對她的虧欠。

他選擇了這條荊棘路，他對得起這個國、朋友、同道、道義，但是他唯一虧欠的就是劉霞。

他得到諾獎後，每每媒體傳來他以出國換來自由的報導，我總是嗤之以鼻，因為我清楚他那天所對我說的話語背後選擇的堅定。

而在他生命的最後，他要求和劉霞一起出國治病。他的一生，不是在獄中就是走在向獄中的路上，他為這個對不起他的國家做的已太多太多。他最後只想以違背他信念的努力，來為他虧欠的至愛換取不再受苦的自由。

## 七

他為自由而戰三十年，為生命自由、國家自由向死而生的奮戰，必成為中國自由戰士彌足珍貴的精神源泉，他思想的光影比生命更綿長。

作為朋友，我銘記著 2010 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音樂會上 Sivert Hoyem 所唱的《路上的囚徒》(Prisoner of the road)，想著所有與他有關的記憶，淚水流敞在臉上，流敞在所有的日子上。

**野渡**——廣東作家、編輯，獨立中文筆會前副秘書長兼網絡工作委員會協調人。

# 作為人類精神事件的劉曉波之死

滕彪



劉曉波（右三）與滕彪（左）等中國著名人權律師（2006年1月2日，北京）

## 一

我知道劉曉波的名字的時候，他已經被中共定為1989年「反革命暴亂」的幕後黑手。最初了解他的言論和思想，竟然是從官方的宣傳材料裏看到的只言片語。那場「反革命暴亂」，後來叫「動亂」，再後來叫「政治風波」，再後來就成敏感詞了。「劉曉波」成了禁區，他的肉身一次又一次地消失於鐵牆之內，他的文字被重重阻擋在紅牆之外。他的思想和抗爭精神，則艱難地衝破牢籠，激勵著一小撮不識時務的反叛者。

作為山溝裏長大的七零後，沒機會領略這位八十年代「文壇黑馬」的驚世駭俗。我在1996年大陸民間悄悄傳播的紀錄片《天安門》裏，才第一次才看到講話口吃的劉曉波。那一年年初，他剛從半年多的監禁裏出來，不到年末，又被判了三年勞教。

1999年他勞教期滿的時候，中國已經有了互聯網，也有了防火牆。劉曉波當然是當局最不希望人們檢索到的名字之一。願意和他交往的人也不多，認識他的人們親切地叫他劉磕巴。這大概是專制體制下反抗者必然的孤獨命運：肉身被囚禁摧殘，言論被禁止傳播，日常生活被騷擾，而犬儒的民眾也避之唯恐不及。

2004年的某一天，我在一個飯局上第一次見到劉曉波，那時候民間「維權運動」剛剛興起，他對維權運動非常關注，陸續寫了很多文章評論維權事件和維權人物。新青年學案、太石村、陳光誠、黑磚窯、楊佳案，幾乎每一個重要的熱點案件，都能看到他那犀利的評論文字。從那以後一直到他2008年底入獄之前，我們常在一起

喝酒、聊天、參加民主活動。我也把維權律師高智晟、李和平等人介紹給劉曉波、張祖樺等人，「維權人士」和「民運人士」的界限，在那個時候已經慢慢開始淡化。我在 2008 年 3 月份第一次被綁架關押，他也特意撰文《黑暗權力的顛狂——有感於滕彪被綁架》，聲討當局肆意踐踏人權。

劉曉波給我看了《零八憲章》的草稿，我也當面向他提了我的建議。當時我看的版本有 20 條「基本主張」，我說太多了，重點不突出，十條就夠了。後來正式公布的版本有十九條。《零八憲章》以自由人權為核心，以建立民主憲政為目標，反映了中國民間運動對中國政治未來方向的基本共識，是中國民間發出的一个歷史性政治文本。零八憲章運動是七十年代末期以來民主運動、維權運動積累的民間力量的一次集中展現，把 1989 年後的民間自由化運動推向一個新的高度。

北京市一中院對劉曉波的刑事判決書裏提到了我的名字，我還專門發表了一篇《關於我的證言的證言》，提到：「我提出了修改意見，比如去掉環境保護、社會保障等內容，減少條目，重點放在人權法治和政治構架上。我的意思是，你們抓曉波而不抓我就沒道理，不只他一人參與起草；我也願意承擔與零八憲章有關的法律責任。……劉曉波如果犯了罪，我就是「共犯」。作為零八憲章的首批聯署人，如果你們認定零八憲章有罪，我要求承擔同樣的罪責。如果簽署和傳播零八憲章構成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我也簽署了，也傳播了，而且還會繼續傳播。我要求分擔劉曉波先生的苦難，因為這等於分享他的光榮。站在你們的被告席上，住在你們的監獄裏，不是我的恥辱。」

因為簽署零八憲章，我被任教的中國政法大學停課。但劉曉波被判刑十一年，付出了極大代價，但是在 2017 年 7 月份之前，沒有人知道——包括劉曉波自己——他為此付出的，是生命的代價。

## 二、

劉曉波為什麼重要？在中國的自由鬥士和民主抗爭者中，劉曉波是不可替代的：

1、思想的成熟與深刻。他是文藝學博士出身的文壇黑馬，身兼學者、作家、詩人、教師，從事文藝、美學、文化批評自然駕輕就熟；他本是無拘無束的率性詩人和特立獨行的先鋒作家，但是政治現實使他又成為異議人士、民主運動人士、政治評論家、人權活動家、良心犯，在獄裏獄外，他非常勤奮地閱讀、寫作，豐富自己的知識儲備和理論武器，逐漸把自己磨成一個成熟的思想者。從他的文章裏可以看到，他不限於道德說教、倫理判斷和美學分析，而是吸收和運用了政治學、哲學、法學、史學、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學科的知識，並以富有他個人特色的有感染力的文字體現出來。他的文章犀利、理性、穩健並滲透著深沉的人性關懷，成為他最重要的抗爭武器。他對民主、民族主義、自由主義、人性、人權都有深刻的理解，並且充滿自我批判精神和自省精神。所有這些，都是難得的重要品質。

2、徹底的反專制。和很多自由知識分子不同，他對專制、極權的批判是徹底的，不僅是在理論層面，而且在政治、人性、審美、實踐等方面，全方位顛覆專制主義。不抱幻想、不打折扣，不怕失去說話平台、不怕丟工作、不怕坐牢。而有些人因為認識水平而未能徹底與中共專制政權決裂，也有些人因為利益、或者因為恐懼，多少要進行自我審查。

3、極大的勇氣和長期的堅持。他曾有過軟弱、妥協，但經過反省之後他沒有退縮，痛定思痛之後得到了精神的升華。他兩次放棄在國外庇護的機會，毅然回國。一次又一次的軟禁、失蹤、抄家、勞教、判刑，長期地被騷擾、被孤立、被誤解，都沒有使他放棄抗爭。他越戰越勇，沒有什麼敏感會議他不敢組織和參加，沒有什麼話題和人物他不敢評論。總書記、一黨制、腐敗、天安門、良心犯、法輪功、西藏、新疆、民族主義，他都秉筆直書，對黑暗力量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批判，對弱者、受難者則予以熱切關注呼喚。有些抗爭人因為各種原因而退卻、流亡，有些人因為恐懼、絕望而放棄，甚至有個別人因為利誘而投靠專制，但劉曉波一直在堅守。

4、廣泛的人脈。年紀輕輕就名滿全國、參與八九民主運動、主辦獨立中文筆會、在一次又一次的抗爭活動中，劉曉波在體制內外都積累了廣泛的人脈。他成為一個重要的橋梁和節點，連接著黨內改革派、自由知識分子、獨立作家、政治犯、屠殺受難者家屬、民主活動家、維權律師、訪民、草根 NGO、企業家、大學教授、年輕學生等等。劉曉波雖然不是零八憲章主筆，但卻因此被判刑十一年，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在當局不知不覺的情況下，發起了這封要求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憲章，並且征集到全國三百零三名著名知識分子、民主人士和維權人士作為發起人。這不能不引起中共當局的極大恐慌。

5、國際的廣泛認可 劉曉波 1990 年起就獲得了眾多國際人權獎項 得到媒體、人權組織和一些西方政府的關注。2010 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之後，更加得到了全世界的報道、關注和尊重，他的傳記、文集被翻譯成多種語言，成為最知名的中國民主鬥士。

6、豐富的經驗、卓越的行動力和領導力。1980 年代以來，劉曉波已從一個桀驁不馴、狂放不羈的知識界黑馬，變成一個成熟、自律、甘於寂寞、不斷自我犧牲的自由勇士。長期的抗爭生涯、牢獄的磨難和殘酷的現實，使劉曉波獲得了豐富的政治智慧、鬥爭經驗，成為一個有卓越行動力的民主運動領導者。

中國的一些民主人士和政治反對者或許符合上述六點中的兩、三點或者四、五點，但同時符合上述所有這些方面的，除了劉曉波外，很難想到其他人。在這個意義上，劉曉波幾乎是不可替代的，他被迫害而死，是中國自由民主事業的極大損失。善良的人們曾經期待，從十一年黑牢走出來的劉曉波，將在中國的政治轉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劉曉波沒有等到那一天；更準確地說，中共心懷恐懼地、蓄意地不讓劉曉波等到那一天。

### 三、

和柏林牆倒塌、911 事件、藏人自焚、敘利亞難民等事件一樣，在我看來，劉曉波之死是 1989 年之後世界史上最重要的精神事件之一。

1989 天安門屠殺之後，中共血跡未干，西方各民主國家就紛紛向中共拋出橄欖枝，迫不及待地用鮮花、紅地毯來迎接獨裁者和劊子手。貿易和人權脫鉤，中共被允許進入世貿組織，允許舉辦奧運會、世博會，並一次又一次地被選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中共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國際上扮演越來越蠻橫、越有挑釁性的角色，甚至想要取代美國和西方成為一些重要議題的全球領袖。

西方對中共低眉順眼，不敢推動中國民主化，甚至不敢在人權問題上嚴厲批評

中國政府。學者、研究機構、媒體、出版社、商業機構紛紛採取自我審查、為了能夠維持與中國的關係或者為了進入中國市場。一些公司甚至配合中共作惡，幫助中共開發審查軟件，或者把客戶信息提交給中共國安。西方對中共專制政權長期採取綏靖政策，已經造成一些惡果、造成對西方自由民主價值的破壞和威脅。隨手就能舉出很多例子：跨境綁架活動人士、威脅學術自由的孔子學院、網絡攻擊、滲透自由媒體、國際賄賂、試圖操控民主選舉、幫助親共人士打入西方政界、收買電影院線、推銷「具有中國特色的人權」概念、阻止境外藏人言論和示威自由、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監控留學生言論，等等等等。但西方很少有觀察家和政治家對這一問題的嚴重性給予足夠的重視。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專制國家，劉曉波是第一個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中國公民，他很顯然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象徵。對這樣一個聖徒式的受難者，一個推動人類自由民主事業的英雄，國際社會對他的關注和聲援雖然不少，但遠遠不夠；而中共對這些聲援和關注置若罔聞，甚至嗤之以鼻，並且變本加厲地長期嚴密軟禁劉曉波的妻子劉霞。國際社會眼睜睜地看著劉曉波被判重刑、被監禁、被肝癌，直到死的那一刻仍然無法得到自由。人們往往拿劉曉波和在納粹集中營中獲得和平獎的德國記者和作家卡爾·馮·奧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相比，但奧西茨基是在被正式釋放一年半後死於醫院；劉曉波至死仍被嚴密監禁，是至今唯一死於囚禁中的諾貝爾獎得主。甚至在劉曉波死後，骨灰被強行撒入大海，死無葬身之地；甚至在劉曉波死後，中共當局繼續使劉霞處於軟禁和失蹤狀態。

劉曉波之死是一場全球直播的「事先張揚的謀殺案」。西方民主國家沒有強烈的意願去幫助劉曉波獲得自由，就在劉曉波去世的那段時間，西方領袖們仍在和中共黨魁們杯觥交錯，簽下一個又一個訂單；即使口頭表達了一些要求，也沒有什麼切實可行的壓力；全世界的人們只能無奈地在中共的傲慢和跋扈中看著劉曉波被虐殺，看著劉霞被失蹤，看著更多的良心犯被逮捕、被監禁、受酷刑。

劉曉波之死，也是一個巨大的痛苦象徵，象徵著崛起的中共專制政權對人類正義和良心的極大嘲諷，象徵著西方對華綏靖政策的惡果和未來更大的威脅。在這個意義上，人們將越來越體會到劉曉波的死亡，乃是冷戰結束之後人類精神史上的一個令人震撼的事件。

**滕彪**——旅美中國人權律師、學者，法學博士，獨立中文筆會獄中作家委員會法律顧問，前中國政法大學講師。

# 致敬劉曉波！

趙常青



趙常青（右）和許志永慶賀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

6月26日下午，通過網路瞭解到已經服刑八年的劉曉波先生因患晚期肝癌而住院，緊接著，遼寧省監獄管理局在自己的網站掛出劉曉波因病而保外就醫的新聞。該新聞說：「遼寧省錦州監獄服刑人員劉曉波，近期被診斷患有肝癌。近日，遼寧省監獄管理局依法批准劉曉波保外就醫，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已組成由八位國內知名腫瘤專家參加的醫療救治小組，制定了治療方案，劉曉波正在按醫療方案接受治療。」稍晚一些時候，網路見到劉曉波的妻子劉霞女士在手機視頻中哭著說：「不能動手術、不能放療、不能化療……」這些呼嘯而至的新聞一時間震驚了海內外各界人士，良心人士如鮑彤、高瑜、高智晟、艾曉明、周舵、胡佳、楊建利、王丹等紛紛行動起來呼籲中國政府「還劉曉波徹底自由」、允許他出國治病。

和大多數民主人士一樣，當我聽到曉波罹患肝癌晚期的悲聞時，我的內心也是非常沉重的——沉重得有一種艱於呼吸的感覺。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自大學時代以來我便對曉波先生充滿一種發自內心的敬意。曉波在諸多方面對我的青年時代是有很大影響的，因為閱讀《中國現代思想史論》、《批判哲學的批判》等書，使得李澤厚先生曾經在我的心靈聖殿佔有絕對主導的地位，但在讀過《審美與人的自由》、《選擇的批判》等曉波的著作後，使得李澤厚的王者地位在我心中開始崩塌。曉波對李澤厚美學思想的批判和顛覆，對感性和酒神精神的歌頌讚美無不宣示著對「自

由」的歌頌和嚮往。讀曉波的前述著作給人一種非常青春、非常激情和澎湃的生命體驗，既有一種堂吉珂德式的勇敢無畏，也有《浮士德》式的跨越和征服。

當然，曉波對我個人的影響主要還不是其審美思想對我的影響，而是他毅然決然的從學術象牙塔走向民主廣場的奮鬥和犧牲。1988年6月曉波在北師大榮獲文學博士學位後，曾應邀前往奧斯陸大學、夏威夷大學以及哥倫比亞大學作訪問學者，應該說他作為一個學者的市場前景將是非常廣闊的。但是，曉波並不是一個安分於學術象牙塔的學者，他的心中還有一種更高更神聖的使命，那就是對現實的關懷和悲憫。他對於這個國家的制度性悲劇有一種刻骨銘心的理解和感受，而變革這種制度，使中國社會走向民主並由此而賦予十億同胞以人類應有的權利、尊嚴和自由早已成為他百年人生的最大主題。正是在此心靈背景下，1989年4月，當學生羣體因胡耀邦去世而發生全國性民主運動時，他斷然中止在哥倫比亞大學的訪學計劃，提前回國，並一頭紮進天安門廣場，全身心地投入和指導學生民主運動，最終他被作為操縱學生運動的「黑手」送進秦城監獄。此後，曉波的人生和命運就已經非常緊密的和中國民主事業結合在一起了，並先後為此付出非常慘重的代價，他不僅失去非常美好的工作，不僅經常性被監視居住，而且因為持不同政見和批評政府，曾於九十年代後期被勞教三年。2009年12月，因為〈零八憲章〉的起草和連署問題，曉波又被有司以「煽動罪」重處有期徒刑十一年，並剝奪政治權利兩年……

由此可見，曉波先生不僅是一位出色的文藝理論家和政治理論家，而且更重要的他是一位傑出的中國民主事業的踐行者和實幹家，他不但誠實的提出自己的民主理論和思想，而且忠實的踐行自己的理論和思想，並因此而多次入獄，這種勇於實踐和勇於犧牲的操守和風範深深地感染著我，不僅贏得了我永久的敬意，也深深地激勵著我向著同一個方向勇敢的前進！

正是因為這種發自內心的敬意，當2009年6月23號曉波先生被當局正式逮捕後，我於6月29號在《博訊》發出〈我們每一個簽署人都是劉曉波〉的文章（註：《博訊》刊出時編輯將我原來的標題〈我們每一個簽署人都是劉曉波〉改為〈我是零八憲章的起草者、修訂者〉），在這篇文章中我對執政當局逮捕劉曉波的行徑表示了強烈譴責，而且因為我本人也參與了〈零八憲章〉的局部起草修訂工作並首批簽名，因此我公佈了自己的電話，表示願意與曉波承擔同樣的命運，同時呼籲所有的憲章簽署人「自請入獄」，承擔起自己應該承擔的那份責任。同年7月1號，《民主中國》刊發本人致中共中央緊急呼籲書，要求執政黨立即無條件釋放劉曉波，「還劉曉波先生以國家公民的全部權利和自由」。儘管這些文字並不具有實質性意義，但本人對曉波的尊敬和關心還是由此可見一斑。

曉波因〈零八憲章〉而獲重刑的事件在國際社會引起巨大關注和反響，海內外很多知名人士如尊者達賴喇嘛、捷克前總統哈維爾和南非大主教圖圖等人開始聯名推薦曉波作為2010年度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對於中國民主事業來說，這是一個應該去努力爭取的好事。但是在海外卻有伍凡等20位「作家、異議人士」於2010年元月初給諾貝爾和平獎評委會和哈維爾等人發出公開信，認為曉波不僅有嚴重的歷史問題、不僅在法庭上「粉飾美化現政權」，而且具有「共特嫌疑」，因此反對將和平獎授予曉波。我認為在曉波被重判十一年而入獄的情況下，對他進行這樣的指責是很沒有道理的。於是2010年3月中旬我在《民主中國》發表〈為劉曉波辯護〉一

文，系統的批評了伍凡等人對劉曉波的四項指控，並呼籲將 2010 年度和平獎頒給劉曉波。同年 9 月我還在北京聯絡了許志永、滕彪、范亞峰等數十人公開簽名支持將和平獎頒發給獄中的曉波——感謝上帝，當年 10 月 8 日挪威諾獎評委會宣佈將和平獎頒發給曉波，儘管我和屠夫、王荔蘇大姐因為集會慶祝曉波得獎而被行政拘留，但我們發自內心是高興的，這個獎既是國際社會對曉波數十年付出和犧牲的表彰和致敬，也是對中國民主事業正義性的國際承認。曉波因此而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中國民主轉型事業的象徵性符號，他的存在對於我們的理想追尋和現實奮鬥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但是——

但是如今，曉波先生竟然被病魔擊倒了。根據本人數次入獄的經驗，在監獄中能夠保外就醫的人基本都有過硬的關係和家庭背景，要麼「富」用金錢開路，要麼「貴」用官場關係解決。真正底層服刑人員是很難有機會「保外就醫」的，既就是有個別「保外」，也已經是病入膏肓、難以生命再造了。而對於被判刑入獄的民主人士而言，「保外就醫」就更加困難。如因「煽顛」被判刑入獄的浙江作家張建紅（又名「力虹」）先生早在 2007 年就檢查出身患重病，其家屬先後多次申請為力虹保外就醫都遭到當局拒絕。直到 2010 年 6 月，力虹已全身癱瘓，不能說話和自主呼吸，靠呼吸機和輸液維持生命，才被允許保外就醫，但此時已經無法挽救生命了，幾個月後力虹先生便惆悵離世。如今，同樣的命運再次被複製到曉波先生身上，雖然當局已經為他保外就醫，但從劉霞「不能手術、不能放療、不能化療」的哭訴中，曉波陷入肝癌晚期的傳聞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對此，本人深表憤慨，儘管網路有關曉波是被監獄當局「慢性謀殺」的資訊有待證明，但執政當局在曉波患病問題上確實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毫無疑問，在曉波罹患肝癌的早期就應該讓曉波保外就醫。但執政集團的權力傲慢和對基本人道的蔑視——甚至巴不得曉波早些死亡的陰暗心理使得他們寧願曉波在獄內忍受肝癌的煎熬，聽任疾病惡性發展，也不讓曉波早點保外就醫。以至於今天曉波的病情被拖向幾乎無法挽回的深淵……

從 6 月 26 日曉波身患重病消息被披露到現在的一星期，國際社會也高度重視，美國新任駐華大使愛德華、美國國會、法國政府、德國政府、一百五十四位諾貝爾獎獲得者都紛紛公開呼籲中國政府儘早放行劉曉波出國治病，挪威諾獎評委會還公開邀請曉波去挪威領取「和平獎」。遺憾的是，截止目前，中國政府無論是對於來自華人社會的呼籲還是非華人社會的呼籲依然無動於衷、置若罔聞，執政黨領導人在香港機場面對記者的相關提問竟然不做任何回應——這是必須批評的！也是必須譴責的！本人認為，曉波先生作為享譽海內外的和平獎得主，數十年來，為中國社會的民主轉型可謂殫精竭慮、鞠躬盡瘁，他所宣導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爭路徑，他「沒有敵人」的善意胸懷，他所高揚的以「自由、人權、平等、民主、共和、憲政」為基本理念的〈零八憲章〉，無不正確地為中國社會的大轉型指引了一條代價最小、最健康、最可取的路徑。這條路徑不僅對於中國人民是最安全的，而且對於執政黨來說也是最安全的，它可以有效避免人民革命對於執政黨和官僚權貴集團的報復性懲罰和毀滅性掃蕩，它可以使執政黨在日益對立的社會危機中實現安全的軟著陸，就如八九十年代的國民黨在臺灣曾經做到的那樣。正因此，執政黨寡頭統治集團應該能夠看到劉曉波先生的善意和光輝，應該看到劉曉波先生為消融中國社會大危機所做的巨大努力。在當前經濟發展停滯不前、反腐敗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下，

儘快考慮曉波先生所宣導的和平轉型道路和民主憲政道路。

當然這個轉型並不是本文關注的重點，作為對曉波先生深懷敬意的國家公民，我呼籲執政黨和中央政府誠懇聽取來自民間和國際社會的意見和建議，迅速安排曉波先生及其夫人劉霞女士一起前往美國或德國治病，以此彰顯中國政府「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憲法承諾。本人相信曉波先生去往美國會得到更為積極和有效的治療，這是挽回曉波生命的最佳選擇。如果拒絕出國救治方案，執意將曉波先生留在國內治療，也請迅速組織肝臟移植手術，我相信中國現有的醫療技術和相關資源是足以成功實施曉波先生的肝臟移植手術的。通過及時的搶救治療努力挽回曉波先生的生命，從而也挽回一點執政黨和中國政府的顏面和榮譽，並讓人民在執政黨和中央政府身上重新撿回一些希望和信心。

最後，我想說的是，諾貝爾和平獎自 1901 年首次頒發以來，共有 104 位知名人士獲得該項殊榮，幾乎所有獲獎者如馬丁·路德·金、勃蘭特、薩哈羅夫、德蕾莎修女、瓦文薩、圖圖主教、金大中、尊者達賴喇嘛、昂山素姬、戈爾巴喬夫、曼德拉等等不僅受到所在國家人民的高度尊敬，而且受到全人類的普遍尊敬，無論生前還是死後，這些和平獎得主為人類正義事業所作的貢獻都將是全人類的財富。同樣，劉曉波先生為解決中國現存制度的困境、為中國社會的和平轉型所做的努力和犧牲不僅僅贏得了海內外華人民士的普遍尊敬，他也贏得了全世界愛好民主正義的人民的尊敬。劉曉波正在成為中國民主人權事業的象徵性符號——未來，無論他生他死，劉曉波先生及其主要作品〈零八憲章〉都將是中華民族驕傲於人類的光榮！

2017-7-2 於北平

**趙常青**——陝西異議人士，社會活動家，獨立中文筆會會員，新公民運動成員；自 1989 年以來，先後五次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等被關押或判刑，共約十一年。

# 我為什麼追隨劉曉波先生

魯揚

劉曉波先生是我最崇敬的人，也是我的精神導師——是我走上自由民主思想道路的引路人。

我本是個詩歌寫作愛好者，偶然的機會讀到曉波先生一篇文章（當時我年少，不知道他就是所謂的「六四黑手」），令我又驚又喜。驚的是中國作家裏面，還有人這樣寫作——竟然敢說真話。喜的是，這位作家就在國內。當時我就在心裏喊出：像劉曉波那樣寫作！

於是我通過各種途徑，狂熱搜集曉波先生的作品。現在我可以吹牛一句：當今世界，我是收集曉波先生作品最多最全的人！我發現，目前網上包括國外網站流傳的《劉曉波電子文集》大都是我當年編輯整理的。2006至2009四年時間裏，我每周都會抽出一個晚上，給向我索要《曉波電子文集》的朋友們發送電子郵件。

最滿足我的虛榮心，至今提起仍使我感到自得的是，曉波先生曾親自來信向我要他的作品。他要的是自己的早期作品，他沒有這部分作品的電子版，問我這裏有麼。曉波夫人劉霞老師也曾通過獨立作家王金波先生，向我要曉波先生的電子版文集。

我炫耀這些，是想告訴朋友們，我是十足的「曉波迷」，是曉波先生狂熱的崇拜者。當時曉波先生還沒獲得「諾獎」，不算「出名」，我為什麼對他如此痴迷呢？

作為一個想成為作家，並在人類思想領域有「野心」的人，我閱讀和研究了大量偉人和聖賢的著作。我發現能夠流存於世，名揚千古的思想，不外乎三種：大愛、大慈、大仁。

耶穌的大愛，讓億萬人眾苦苦追隨。佛陀的大慈，千百年來普照東西南北。我們山東人孔丘——孔子的大仁，使他數百年之後，重又「復活」——創下影響整個東方世界的中華文明。

通過閱讀劉曉波，研究其思想，我發現：劉曉波是集大愛、大慈、大仁於一身的思想家。這裏我可以調侃一句：劉曉波就是當今中國的「大聖人」。下面我引劉曉波先生的一段話，大家就會理解，我為什麼不再追究那些在濟南圍毆我的老人——

「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劉曉波：我沒有敵人——我最後的陳述》）

朋友們知道，我不僅事後聲明不追究那些圍毆我的老人，而且在被毆時，我雙手緊緊後背，任由他們毆打。我這種堅定的「打死也不還手」的「非暴力」不抵抗信念，也是緣自劉曉波先生的大愛、大慈、大仁思想的影響。

看下面〈零八憲章〉簽署後，曉波先生入獄不幾天，我發表於海外的一篇文章：

眾所周知，劉曉波先生是一位長期以來堅持以和平理性的原則，致力於推動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等基本人權在中國的實現的獨立作家，又是一位反對任何形式的暴力，主張以和平的方式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的自由思想家。

作為一位獨立作家，他總是在第一時間內對國內發生的重大事件發出自己的聲音。他的聲音總是本著一個中國知識份子的良知，對人們進行提醒和勸戒。很多時候他不顧一些人對他名譽的詆毀及惡毒的人身攻擊，堅持發出自己與眾不同的聲音。

比如今年五月四川大地震發生後，很多人把此次大災看成是對中共暴政的一次懲罰，而在網上發出一些「幸災樂禍」的言論。劉曉波先生立即發帖：《劉曉波：大災之中，任何幸災樂禍都是可恥的！2008-5-14》。

在楊佳暴力事件發生後，面對中國社會日益嚴重的暴戾之氣和自由思想界一些人對楊佳殺警的狂熱支持，他又寫下：《劉曉波：楊佳式暴力復仇僅僅是「原始正義」，2008-9-1》。

作為一位高瞻遠矚的自由思想家，他的發言和著述不是站在某一幫派的立場，更不是為哪個「政治團體」和「民運組織」服務，而是站在人類的高度，國家和民族進步的立場上來發話的。然而，現在，就是這樣一位堅持反對任何暴力，以和平方式維護中國人的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和寫作自由的寫作者失去自由——因「罪」



而被刑事拘留。我們要問一句，到底是誰在犯罪？（《魯揚：抗議北京警方刑事拘留自由思想家劉曉波先生》）

講到這裏，相信朋友們已經明白被毆時我不動手，事後又原諒圍毆者的原因了。如果當初我的夢想是成為曉波先生那樣的作家，那麼現在我的理想是成為曉波先生那種心存大愛、大慈、大仁——反對任何形式的暴力，主張以和平的方式推進中國民主化進程的自由思想家！

**魯揚**——山東詩人、作家，獨立中文筆會會員。

# 劉曉波走了

李南央

今天是提筆寫「跟進」的日子，「自由亞洲電台」剛剛確認了劉曉波先生去世的噩耗，打開電腦，穹宇間已播散著如濤似湧的哀思。劉曉波走了，在他的身後掀起了呼喚中國民主的滔天巨浪。

我開始真正地崇敬劉曉波並不始於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那天，而是後來從「美國之音」的節目中聽到他曾經說過：「中國應該做三百年的殖民地」而遭人詬病的那一刻。他的形像在我心中陡然變得高大——若有一天他能像曼德拉一樣走出牢獄成為國家的領導者，我將信賴他。也許，正是劉曉波先生在眾多中國人心中逐漸形成的這種地位，五年來，共產黨的總書記習近平動用了舉國上下的宣傳機器，聲情並茂地歌頌習大大、習核心、習思想……卻連望其項背都做不到，讓習和他管制的共產黨妒恨、恐懼，哪怕劉曉波垂危的生命已經發不出聲音，也不敢給他一分一秒的自由。

德國記者、作家，反法西斯和平戰士卡爾·馮·奧西茨基於1933年被納粹德國囚禁於集中營，1935年在獄中獲諾貝爾和平獎，納粹當局不允許他前往挪威領獎。兩年後，他在蓋世太保的監視下在柏林的一家醫院去逝。6月26日劉曉波患肝癌晚期的消息傳出後，台灣呼籲，香港呼籲，中國大陸數以千計萬計的人權人士和普通百姓呼籲，歐盟呼籲，美國國會呼籲，一百五十四位諾貝爾獲獎者呼籲……：讓劉曉波按照自己的意願出國醫病，給他以自由。習近平面對這所有、所有的呼籲作出的回答是：我與德國納粹同道，你們奈我何？

一介書生劉曉波，面對強大的專權寧折不彎，那是氣節：「一國之尊」習近平絕不通融的「男兒氣概」是愚蠢、是蠻橫，是冒天下之大不韙！7月13日，習近平和他的黨終於「成就」了劉曉波，奠定了他第二位被囚禁致死，未能領取諾貝爾獎得主的歷史地位；在中國這片盛產奴才、奴性的土地上，豎立起一座棲身於世界英雄之林的豐碑。

《李銳口述往事》「我的延安經歷」一章中有這樣兩段：

「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前，對自己人的整肅搞了不止一次，大的有蘇區的肅反、打AB團等，共殺了十萬人，直到延安的審幹、搶救運動，各根據地的反托派，小的無數，真是太可怕了。這些問題至今沒有結論。1980年蕭克曾經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應該對打AB團，富田事變做個結論，清算一下。後來組織部由陳野蘋牽頭負責，結論都搞得差不太多了，王震起來反對，又放下來，不了了之。」

「現在，一二·九參加共產黨的我們這一代，差不多都要死光了，我們是等不到真正、徹底地搞清楚那場搶救運動來龍去脈的一天了。但是對延安的整風、搶救運動做出個定性的歷史決議，根據至今公開出版的當年那些當事人的回憶錄，以及兩

岸目前公開的檔案，材料應該是足夠了。將共產黨第一代領導人，對一二·九參加革命的一代知識份子欠下的這筆賬繼續欠下去，對我們是無所謂了，但是對黨的新的一代領導人，是個考驗，看他們是不是有這個勇氣，做出個『第三次歷史決議』，包括清算『六四』風波，以史為鑒知興替呵！

作為一名中共的老黨員，李銳期盼著「黨的新的一代領導人」拿出勇氣，經受考驗，清算黨在歷史上所犯的一系列錯誤。他從江澤民盼到胡錦濤，從胡錦濤盼到習近平，不但沒能盼到共產黨對錯誤的清算，連自己那點兒在江、胡時代可以「上書」，被稱為「老人特殊民主」的權力也被剝奪了。鮑彤先生對我說過，「胡耀邦的反思是從頭『平反冤假錯案』——從文革上推到打 AB 團，共產黨歷史上的一切冤假錯案都要予以平反。趙紫陽的反思是根本否定階級鬥爭哲學，他認為共產黨的基本理論『階級鬥爭』錯了」。共產黨從黨內殺到黨外，從建黨初期立足未穩直殺到執政政權六十七年之後，這種殺戮根本就不是它犯的什麼「錯誤」，而是它在基本理論指導下的實踐的必然。鮑彤先生還說：「《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一篇的第一句『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說明了一切。在這個黨的眼裏是沒有人的，只有敵人和朋友。敵人不是人，對待他們要像『秋風掃落葉一樣』；朋友也不是人，是工具，要當奴才，要聽話。一旦有了獨立的思考，不聽使喚了，那就成為敵人，就必須鬥，且殘酷無情地鬥。」

1949 年共產黨執政後，我親身經歷了毛澤東的「十億人不鬥成嗎？」是如何地把中國變成無時無刻地製造仇恨，製造敵人，沒完沒了地鬥來鬥去的渾濁、邪惡，黑暗的社會。共產黨的「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教化出心理陰暗的幾代人。2009 年 12 月 23 日，劉曉波在一審法庭上所作的陳述：「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警察，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中國這片被共產黨污染了半個世紀的土壤上，破土而出了一株「愛」的嫩芽。她呼喚著人性，將愛的清馨沁入被敵人意識毒化了的中國人的心靈，點燃了人文復興的希望之火。

整理、編輯《李銳口述往事》一書，讓我知道了我的爺爺擁護並積極支持了孫中山先生以暴力的革命推翻滿清王朝的辛亥革命；讓我知道了我的父親在以暴力的革命推翻「蔣家王朝」的共產黨隊伍中一生的歷程。這兩場革命都沒有把中國帶出王朝輪替的怪圈。我爺爺那輩人，讓黃龍旗換成了青天白日旗；我父親的這一代在 1949 年將青天白日旗換成了五星紅旗。那以後，曾經存在於晚清和民國，由自己個兒掏錢開辦的報館歸政府包了圓兒；近三十年進入「現代化」後，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上好不容易長出了一棵私資的獨苗苗——《炎黃春秋》，在去年的這個時候被「抄了家」。白茫茫大地又落得個「真乾淨」。這一切都讓我信服於劉曉波的「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才是改變中國現狀的正確思維。本文的開篇我說了，劉曉波以「中國應該做三百年的殖民地」一語贏得了我這張選票。這是因為他不但指出了中國的出路在於和平理性地與專治的政權抗爭，還看到了此路的坎坷和漫長。他認識到中國這個被皇權，被共產黨的革命毒化了幾千年的古老國家，須由幾代、乃至十幾代人的努力來培植現代文明社會之民主、自由、憲政的土壤。非如此，在政府中供職的公務人員不能具備自由、平等、人權這些普世理念；非如此，中國人走不出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認知盲區，膺服於以程序的公正取

代只爭朝夕地追求正義；從而形成民主、共和、憲政制度基本架構的社會基礎。只有到了那個時候，執掌公權力的人才會自然地將手中的權力視為服務於民的工具，中國人才能普遍地將自己視為公民，時時警惕和對抗公權力對自己私利的侵害，形成公權與私權互為犄角的態勢，保持社會在各種思維和理念間搖擺著向前穩步推進。

我重溫了劉曉波因之獲罪的〈零八憲章〉，它是這樣開篇的：「今年是中國立憲百年，〈世界人權宣言〉公佈六十周年，『民主牆』誕生三十周年，中國政府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十周年。在經歷了長期的人權災難和艱難曲折的抗爭歷程之後，覺醒的中國公民日漸清楚地認識到，自由、平等、人權是人類共同的普世價值；民主、共和、憲政是現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構。抽離了這些普世價值和基本政制架構的『現代化』，是剝奪人的權利、腐蝕人性、摧毀人的尊嚴的災難過程。」劉曉波用自己的生命明義了這開宗之言。他的死，讓我更加看清了中國被抽離了普世價值和應有基本制度架構的所謂「現代化」之路，是一條萬劫不復的災難之路。我不知道別人會如何，但知道自己會因為劉曉波的離去而加倍堅韌，更執著地一篇篇書寫我的「跟進」。他留在世間的「愛」，會一直溫暖著我，鼓勵著我，為中國的憲政開張竭盡自己的綿薄之力。

我在上一篇「跟進」中告知讀者，5月底收到了北京市第三中級法院的第十二次延審通知，但是忘記提請讀者記住我案合議庭成員的名字，他們是審判長：賈志剛，代理審判員：董巍，代理審判員：陳金濤。真希望身著法袍，卻幹著為黨把大門的活計的這幾位先生，當清夜曉波在天之靈俯瞰著他們的時候，會捫心自唾：「呸，我幹的叫個什麼事兒！」

原載《爭鳴》2017年九月號，標題為〈李南央狀告海關案「跟進38：劉曉波走了」〉  
**李南央**——僑居美國的中國學者、作家，父親李銳曾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



# 永遠的豐碑——劉曉波

潘永忠



潘永忠（右三）

今年7月13日，劉曉波悲愴離世，他的一腔熱血，他的絢爛生命，在人間消失，連最後的墓塋也未被留下……

當一個人離開這個世界，卻依然活在世人的心裏，這便是永生。劉曉波的精神，劉曉波的靈魂，在一代人的心裏留下了永遠的豐碑，這是一個時代的豐碑。

## 從輿論碰撞中認識劉曉波

我並未見過劉曉波，未與他有過電話交談，也不曾有過書信和郵件的來往，對感覺器官表像來說，我對劉曉波沒有認知。

與許多人一樣，我是從媒體上，從輿論中，逐漸認識劉曉波的。我所知道的劉曉波，是與上世紀的「八九民運」連在一起的，當時的「廣場四君子」劉曉波、侯德建、高新、周舵如雷貫耳。劉曉波似乎注定屬於風口浪尖上的人物。

記得「八九」後，劉曉波在中國官方中央電視台上作證：未見中共軍隊在天安門廣場上殺人。1992年，他的《末日幸存者的獨白》在台灣出版。該書對其作證天安門廣場上沒有死人進行懺悔，同時又做自我辯護，引起海外民運界的嚴詞批評。1993年初，劉曉波出訪澳大利亞和美國，並發表〈我們被我們的「正義」擊倒〉，對

「八九民運」進行批判性反省，引起海內外異議人士很大的爭議。

記得在 93 年 8 月，周舵來德國訪問，在我家住了幾天，我們的話題自然也涉及劉曉波。周先生客觀地談論了關於劉曉波「廣場上未見殺人」之爭議。具體談論內容，我已經淡忘了，只記得有這麼兩層意思：一、清場時曉波確實沒有見到打死人，這是事實，尊重歷史，記述歷史，首先要如實講述事實。二、對「八九民運」進行批判性反省很正常，沒有反省，沒有總結，中國的民主化運動是不會成長，不會成熟的。坦白而言，我對劉曉波的最初認知，僅僅是從中國民主運動的一名鬥士開始。

### 「沒有敵人」說引起的風波

2010 年初，傳出劉曉波的〈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再度掀起了軒然大波，一時間海外的民運圈中，不少人口誅筆伐，大加批判。坦白地說，我對「沒有敵人」說，一點也沒有吃驚的感覺。我第一次聽到「沒有敵人」說，是在 2009 年達賴喇嘛的一次演講中。

2009 年 8 月，我參加了在日內瓦舉行的「尋找共識」——國際漢藏民間對話會議。達賴喇嘛在演講時提及中共領導人，沒有直呼胡溫的名字，而是稱胡錦濤先生、溫家寶先生。我們知道中共政府的宣傳機器一直對達賴喇嘛進行妖魔化的宣傳，將他醜化成國家分裂分子，稱他是「披著羊皮的狼」。藏人對胡錦濤普遍積怨積憤很深，他從 1988 年西藏騷亂後，開始擔任自治區黨委書記，後來成為總書記和國家主席。達賴喇嘛說，佛經中沒有敵人一說，他們是我們的對手，而不是敵人。以仁以真去面對天下人，去愛護天下人，這就是佛教的境界。我雖然了解佛教一向維護仁愛、慈善賢良，但雙方態度反差如此之大，還是令我納悶的。

我能接受劉曉波的「沒有敵人」說，真的是從達賴喇嘛那裏獲得了養料和影響，我的感悟是，大智大慧者，往往是心平氣和，以禮待人，以德報人，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劉曉波應該已經達到了這樣的境界，他的《審美與人的自由》，研究的就是人性生命的完美境界。

### 「沒有敵人」點亮未來世界

其實，我對「沒有敵人」說，還有其它的一些思考。

戰爭與屠殺，貫穿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每一個階段，「敵人」的概念，始終是環繞在人類社會上空的幽靈。中共的鬥爭學說，進一步提升和加強了人世間的敵對情緒和矛盾。毛澤東提出「階級鬥爭理論」，把人類社會的互相殘殺、屠戮推到極致。1949 年至 1979 年的三十年中，中國的非正常死亡數達到了四千萬之多，這幾乎是人類社會史上的之最，始終面對沒完沒了的樹立新「敵人」，沒完沒了的新一輪鎮壓和殘殺……

劉曉波倡導了《零八憲章》，強調依法治國，樹立憲法的權威，未來民主社會必然取締「階級敵人」的概念，憲法在一國法律體系和法律制度中居於核心、基礎和最高的地位，一切法律法規都必須以憲法為依據，以憲法為準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公民應該遵紀守法，這樣的社會至多會出現「違法者」，而不會出現敵人。

我生活在德國近三十年了，從未聽人談論過誰是「敵人」。有人著文說：「如果每個公民、每個政治家心中牢固樹立了『我沒有敵人』的思想，其政治生活中才有

了公平的競爭！真正的民主國家中，其公民和政治家們相互之間沒有誰是誰的『敵人』。」

有人堅持敵人說，我覺得也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事，這些人依然生活在鬥爭學說裏，沉浸在人類社會熱戰和「冷戰」的慣性中，但我深信，未來人類社會會逐漸消除「敵人」的概念，只會有違反聯合國憲章，危害人類罪，違反人權罪，違反憲法者等。

台灣社會轉型也體現了「沒有敵人」的思想，國民黨與民進黨從「敵人」轉變成政治對手，進行公平競爭，開放黨禁、報禁，使台灣社會與國際民主社會接軌，步入了現代政治文明的階段。

對大陸民運人士來說，「沒有敵人」的思想，不會影響我們堅持反對中共的獨裁統治，反對中共的踐踏人權，也不會影響我們推動中國的民主運動，推動中國的憲政法制建設。

### 社會轉型的「鑰匙」

回首近二十年來，不少國家的社會轉型，都有開啟變革的一把「鑰匙」，即：要麼是歷史事件，要麼是世界級民主人物。比如：開啟匈牙利社會轉型的鑰匙是「匈牙利納吉事件」；開啟韓國社會轉型的鑰匙是「光州事件」；開啟台灣社會轉型的鑰匙是「二二八事件」；開啟緬甸社會轉型的鑰匙是一個人物，昂山素姬女士；開啟波蘭社會轉型的鑰匙是萊赫·瓦文薩（Lech Wałęsa）；開啟南非社會轉型的鑰匙是納爾遜·羅利赫拉赫拉·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開啟捷克社會轉型的鑰匙是瓦茨拉夫·哈維爾（捷克語：Václav Havel）等。

曼德拉是南非著名的反種族隔離革命家、政治家和慈善家，亦被廣泛視作南非的國父。曼德拉領導反種族隔離運動時，南非法院曾判處他「密謀推翻政府」等罪名，曼德拉前後共服刑二十六年半。昂山素姬是緬甸的政治家，她長期堅持推動緬甸的政治民主運動，遭遇了長期的監禁生活。哈維爾是捷克的作家及劇作家，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天鵝絨革命的思想家之一。

這些國家的社會轉型經驗，是牢牢地抓緊了這把鑰匙，堅持宣傳，讓真理和真相傳播到整個社會，當社會上的大多數人能認知社會憲政民主，距離社會變革就不再遙遠。

中國也同樣具備這樣的變革「鑰匙」，一把是「六四」事件；一把是人物「劉曉波」。所以，宣傳劉曉波，傳播劉曉波精神是中國民主運動不可或缺的主要內容之一。

### 廖天琪把我帶進了劉曉波的世界

在近幾年來的德國民運活動中，廖天琪幾乎把所有的項目活動，均與劉曉波的符號緊密相連，這裏我記述了最近一年的一些人與事，可見一斑。

2016年12月10日人權日，廖天琪帶領我們參加了柏林中國使館前舉行的為劉曉波吶喊的示威抗議活動，該活動由坎姆普市萊茵馬斯職業學校（Rhein-Maas Berufskolleg Kempen）教師、牧師庫訥先生組織，他率領了三百多位學生，從坎姆普趕到四百公里之外的柏林，在寒冷天氣中舉牌站在中國大使館門前抗議，聲援劉曉

波。庫訥牧師與廖天琪達成默契，只要劉曉波在獄中一天，這樣的抗議聲援便不會終止。

2017年5月25日德國的基督教節，宗教慶祝活動在柏林舉行。美國前總統奧巴馬與德國總理默克爾並肩站在柏林市中心的勃蘭登堡大門前向公眾發表演講，與公眾就新教會的代表性及宗教的社會作用進行了討論。廖天琪帶領德國民運朋友，參加了庫訥牧師在柏林哥倫比亞戲院舉辦的電子音樂祈禱活動，主題是：為劉曉波吶喊。廖天琪還講述了劉曉波、劉霞夫婦的故事。

2017年6月3日，廖天琪與我們德國民運朋友來到了法蘭克福的中國領事館門前，向大樓裏的中共官員直接喊話，譴責中國政府對劉曉波的長期迫害。

2017年7月5日，廖天琪帶領德國民運朋友赴柏林動物園，針對習近平與默克爾的「熊貓外交」，舉行了「救援劉曉波，不要『熊貓外交』」的示威抗議活動。

2017年7月7日，G20高峰會議在漢堡舉行，廖天琪與我們德國民運朋友，還有來自歐洲各國的民運朋友一起，在漢堡舉行了盛大的示威抗議活動，為劉曉波吶喊聲援。

2017年7月15日，庫訥牧師與廖天琪一起主持了肯彭市托馬斯教堂舉行的劉曉波追悼會。這一天，《零八憲章》倡導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遺體，在沈陽被焚化，被海葬了，骨灰撒向了大海。同日傍晚，太陽徐徐西下，灑落在德國肯彭市中世紀高聳城樓上的余暉，漸漸退去，似乎是在依依難舍的道別，我的內心一陣荒蕪，有一種「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的惆悵……肯彭市托馬斯教堂的鐘聲在雲霄間回蕩，這鐘聲為曉波的英靈敲響，久久的，悠悠的，似乎在雲天中召喚著，呼喊著，曉波啊，你在何方？你能聽到嗎？你的在天之靈有無感知？

2017年8月22-27日，廖天琪、廖亦武致函科隆市長「抵制科隆中國節，緊急呼吁救援劉霞」，8月22日，我們組織了科隆大教堂前的示威抗議活動。

2017年8月28-30日，廖天琪帶領獨立中文筆會的代表參加在瑞典馬爾默市舉行的「四筆會平台國際會議——尋求共識空間：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主持了開幕式和頒獎典禮——頒發了筆會2016年「劉曉波寫作勇氣獎」和「2017年劉曉波紀念獎」，並作為閉幕式演講者之一，重點仍是對劉曉波精神的繼承和對劉霞的救援。

2017年9月18-22日，廖天琪代表獨立中文筆會參加烏克蘭舉辦的第八十三屆國際筆會代表大會，在會上的主題發言內容還是劉曉波的故事，還是劉霞的故事。

2017年10月23-24日，中國民運波茨坦會議，廖天琪的話題依然是劉曉波。

2017年11月2日，廖天琪應歐盟議員黑嘎·特呂裴（Helga Trupel）之邀，赴德國不來梅（Bremen）歐盟辦公處做中國人權報告，報告的主題還是離不開劉曉波。

2017年11月12-15日，廖天琪出席加泰隆尼亞筆會的活動，並榮獲加泰隆尼亞筆會2017年度「自由之聲獎」，在梅諾卡（Menorca）和巴塞羅那（Barcelona）兩地的筆會公開演講中談話的主題之一還是劉曉波。

近幾年來，在我身邊發生的一些故事中，廖天琪堅持不懈地一路奔波，一路活動，一路講述劉曉波故事，一路宣傳劉曉波精神，使我慢慢感悟到了內中道理。

世人都知道耶穌的故事，但耶穌從出生到三十歲左右前的故事幾乎很少有人提

及。耶穌只是傳道三年半，就被猶太祭司該亞法控告，被羅馬官府本丟·彼拉多總督判處死刑，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其實，當年的耶穌故事很少有人知曉，他當年的知名度，應該還不如今天的劉曉波。但是耶穌用生命之燭點亮了人世間愛人的精神，點亮了人類光明之火炬，經過了二千年的傳播，才有了人類今天偉大的基督教文化，有了今天絢麗燦爛的歐洲文化和西方文明。

廖天琪的執著和堅持，讓我感受到了一種不屈的精神，一種異曲同工的哲理。劉曉波用生命之燭點亮了中國人的覺醒——憲政民主才能救中國，我們有責任把這一燭火高高舉起，傳遍至世界每一個角落。推動中國民主化運動的主要內容之一，就是頌揚劉曉波精神，傳播劉曉波思想。

### 讓劉曉波的生命燭光永存

裴多菲的「生命誠可貴」的詩句，由劉曉波為自由犧牲可貴生命所體現。

劉曉波一生信奉普世價值，進行著和平理性的抗爭，推動國家的憲政民主，追求社會的公正公平，〈零八憲章〉是劉曉波與中國民主知識界的對憲政民主追求的宣言書和英雄樂章，它宣傳著自由、人權、平等、共和、民主、憲政思想，是為中國的民主派提出政治主張的重要政治文獻。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但劉曉波將生命融化在對憲政民主的追求上，2017年7月13日，劉曉波走了，他用生命燭光點亮了世間，成就了劉曉波來世間的理想，他的英靈不朽，精神長存！永遠活在世人的記憶中，成為中國民主事業的燈塔，成為世人心裏的一座豐碑，永遠的豐碑！

**潘永忠**——旅德華裔作家、記者、出版人，獨立中文筆會會員，民主中國陣線秘書長。

# 思考篇



# 談劉曉波事件

余英時



劉曉波得肝癌大概已經到了晚期，所以共產黨把他從監獄裏放到醫院，但是還是有看守看得很緊。我們在國外的只看到劉霞去跟他問病的一個鏡頭。不過看出劉曉波非常消瘦。所以我想他這個病已經相當嚴重了。劉曉波之所以在關了多少年之後得了肝癌，我想跟共產黨對他在監牢裏對他的壓力和種種欺壓有關係。他的心情非常壞，因為癌癥往往跟心情有關。雖然劉曉波只判了十一年，事實上等於判了死刑。共產黨不會讓他在監牢裏過好日子的。繼而久之，不是心臟病就是其他的病，就是癌癥。現在癌癥到了晚期，那是非常難辦的事情。共產黨對他還是有非常多的限制，第一不會早放他，還是等於關在監牢裏。不過從監牢換成醫院。

可見共產黨的心狠手辣。劉曉波事件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全世界的反應。我所看到歐洲的反應，有日本的反應，還有美國許多不同的人的反應，幾乎都是一致的，認為劉曉波應該放出來，應該讓他到美國來治病。而且美國國務院跟官方都直接或間接地表示希望把劉曉波接出來治病。共產黨對這一點是把握得很緊的，絕不肯讓劉曉波因為病的關係，就放鬆對他的懲罰。所以出國之事是絕對不可能的。

當然國際壓力也很大，比如德國一個團體就非常支持劉曉波。現在習近平要去德國開會，我想他也會遇到很尷尬的事情，但是共產黨心狠手辣是一向的基本的原則。它不會因此就有點好心腸出來，是不可能的。所以劉曉波的命運事實上已經決

定了。不過因為壓力的關係好像最近有一種放鬆的口吻。不是放他出來，說外國專家如果願意到中國來幫他治病中國也讓他去，這一點是最起碼的東西。如果你不讓外國專家到中國去給他治病，那就證明你是一定要把他整死。他們為了避免更大的罪名就想辦法來緩衝一下。不過外國的醫生怎麼去？誰來負擔這個經費都不知道。而劉曉波既不能出來也不能到諾貝爾獎委員會去領他的獎金，如果他領獎金他就有錢可以自己治病，如果不能出來獎金也拿不到，那他就要完全靠大家捐款呀或者怎麼樣的。但是捐款也不一定能夠實現。因為可能共產黨不允許外面的任何錢到他那裏，一切還是要控制在共產黨手上。所以我們從劉曉波的事件對中共至少看得更明白了。

有許多人總是以為習近平可以緩衝一點。現在他已經拿到最高領袖的地位了。跟毛澤東相距不遠了，應該可以寬大一點，事實上完全不是如此。主要原因就是習近平對自己掌握的權力還是沒有很大的信心。最明顯的就是郭文貴在美國一連串的廣播，說他將來要召開十九大的會議對他造成很大的威脅。這裏面郭文貴基本上雖然是以王岐山、傅政華為報復的對象，可是慢慢的也要涉及主席的地位，找誰來接手？如果王岐山不能接受十九大以後的常委，那誰來接替他？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劉曉波事件不是很簡單的，因為我的許多國內的朋友也給我打過電話，他們說雖然官方從來沒有任何報道，報紙上不可能刊登他的病情，但是私下大家都知道，要封也封不了多少。常常傳說還是很多，同情的也是相當不少。所以說長期以來被共產黨壓得大家幾乎都不知道劉曉波是什麼人了，可是這個事情不是官方鎮壓就能把人整死的。劉曉波的名字跟他的所作所為，跟他向往的東西也無非是憲法，是人權，是基本自由民主體制與法治這一類人人都要的東西，所以劉曉波在我所知道的知識界人士中，是有非常崇高地位的。而且他現在才六十一歲，看這樣子，也許活不過一年或兩年，如果他死掉了，當然是令人非常惋惜，可是另外一方面他在歷史上的不朽的盛名是一定會傳下去的。

說老實話，今天的黨主席將來在歷史上的地位跟劉曉波一比，我想會有很大的對照性，一個是正面的，一個是負面的多，所以我覺得劉曉波事件不應該只從眼前看，從生死上看。生死現在對他已經不重要了，他能夠對這個極權的挑戰已經到了歷史上不朽的地位。以後寫共產黨統治幾十年的歷史一定要提到劉曉波的，而且是越來越正面的。跟過去反右運動中，和的林昭一樣，林昭是北大的女學生，因為反抗極權政權最後被槍斃了。現在大家又開始對她注意，林昭的墓地在蘇州常有人去祭拜，我們常常聽到關於林昭的報道。而劉曉波的影響遠遠超過林昭，而且他又得了諾貝爾和平獎，是中國唯一一個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竟然在監牢裏現在已經八九年了，而且又到了死亡的階段，所以我想劉曉波事件反應中共政權的本質是再清楚不過了。

我覺得共產黨愚笨愚蠢可以說是到了極高的程度，沒有人再能蠢過這件事情了。我覺得把劉曉波放出來或者讓他在有病的情況下鬆一鬆。對共產黨在世界上的名聲會好得多，人家覺得它還有點人道的意思，這樣看來是一點人道都沒有了。所以對於劉曉波來講已經無所損失，他能完成的他能達到的已經到了一個最高峰了。有這樣的人在中國出現就表示中國的知識界還沒有完全投向共產黨，儘管現在被壓得很厲害，國內沒有人敢公開如何，可是私下的抗議還是會有的。在這種情況之下共產

黨還能堅持對於劉曉波施展全面的鎮壓，對他消息的全面封鎖也可見共產黨對自己的政權的穩定性始終沒有信心。我覺得共產黨最大的問題就是知道它現在有所有的權力，以及幾百萬的軍隊，有幾百萬的警察可以鎮壓一切，但是在人心中沒有真正的合法性，許多人就是為了生活不能不跟著走，但是沒有人心裏擁護這個政權的，當然擁護它的人也會有很多，不過這些人我們能看到的都是一些五毛黨，此外就是有錢人，因為共產黨的政權現在已經變成大資產階級專政了。

在每個大城市每一個地方包括香港在內都是如此。習近平到香港這件事情也可以反映出他對自己政權的恐懼，所以香港泛民主人士都不敢見面，都沒有談話，說話是以解放軍為後盾向香港老百姓示威。老百姓並沒有被他征服。我昨天還打電話給香港的朋友，他們覺得習近平的到來不但沒有增加香港一半人對於北京政權的好感，反而覺得更是可怕。在這個情況之下，我覺得劉曉波事件更值得注意了。因為香港在反抗習近平抗議的時候，打的旗號我在電視上看到的第一條就是釋放劉曉波，所以劉曉波已經深入人心，到了這樣的地步，他跟香港無關，可是香港人第一件事情想到的就是要釋放劉曉波，作為香港人能接受中共政權的條件之一。這裏就可以看出劉曉波三個字的份量之重。所以共產黨如果堅持這樣下去真是到了一個眾叛親離的狀態，沒有人心裏會服它。表面上只能接受它的暴力統治，但是這個暴力統治能維持多久，是天曉得的事情，所以我覺得我們今後註視劉曉波不是他個人生死問題。就我能看到的狀態劉曉波的生命不會很長久了，是不是能救過來是很成問題的。事實上就算能救過來，共產黨絕對不會讓他自由的。劉曉波不是以後在活動上還能發生什麼作用，但他的〈零八憲章〉轟動一時，這個事情已經過去了，他不可能發動什麼運動了，因為他已經被看得緊緊的，所以從社會政治活動方面講劉曉波的工作已經結束了。就他個人他的道德跟政治最高成就上講也到了頂點了，無所遺憾了，但遺憾的是他活在一個政權之下，這個政權是中國古往今來所沒有的殘暴的政權，這是值得整個中國人痛心的地方。

原載 RFA

**余英時**——美國華裔思想史學家、漢學家，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哲學會院士。

# 喪鐘為誰而鳴

——悼念劉曉波

胡平



## 一、喪鐘為誰而鳴？

這是一個悲哀的時刻：2017年7月13日下午5點35分，劉曉波因肝癌延誤治療病逝於中國瀋陽。全世界眼睜睜地看著一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死在中共暴政之手而無可奈何。僅僅是在劉曉波過世之後，西方領導人才在公開講話中提到劉曉波的名字並表示致敬，但他們沒有對把這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囚禁至死的中國政府提出嚴正譴責。在中國，由於當局持續多年的壓制，只有一小批人在為劉曉波哀悼，多數人則不關心或沉默。於是在不少人看來，劉曉波投身的事業只不過是中國主流社會之外的一小股泡沫。

不，不，事情根本不是這樣。我們不要忘記，二十八年前，中國爆發了一場規模空前的和平的民主運動。就在劉曉波從紐約飛回北京的那一天，爆發了四二七大遊行，十里長安街成為人潮與旗幟的海洋，一眼看不到盡頭。八九民運有力地證明了，在中國，自由民主絕不只是極少數異議人士的追求，而是千千萬萬民眾的共同願望，首先是整整一代年輕人的共同願望。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強硬派用超乎世人想像的殘暴手段鎮壓民運，導致了中共統治集團空前的大分裂，激起了國際社會的一致譴責。就在這一年，蘇聯東歐發生巨變，國際共產陣營土崩瓦解，美國成為世界唯一超強，自由民主力量取得了有史以來最輝煌的勝利。在那時，人們普遍相信，

中共專制政權的垮臺指日可待。

然而，二十八年過去了，中共專制政權並沒有垮臺；它站住了，而且變得比以前更強大，尤其是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超出一般人的預料。同樣超出很多人預料的是，中共政權並沒有在深化經濟改革的同時啟動政治改革，它甚至沒有因為經濟上的巨大成功而變得更柔和更寬容，而是變得更蠻橫更霸道，並且在國際事務中也不再韜光養晦，而是變得更高調更咄咄逼人；與此同時，包括美國在內的民主國家卻遭遇到種種麻煩。就在短短的不到三十年的時間裏，我們目睹了整個世界發生了人類歷史上極其罕見的驚人逆轉，專制中國的崛起構成了迄今為止對普世價值的最嚴重的挑戰。

劉曉波在十年前寫道：「我的擔心是，面對當今世界的最大獨裁國家中國，現在的西方人可能再犯一次大錯誤。」劉曉波向國際社會忠告：「國際主流社會必須高度關注的事實是：今日的獨裁中共與自由世界的博弈，已經完全不同於傳統的極權蘇共，中共不再固守意識形態及其軍事的抗對，轉而致力於發展經濟和拋棄意識形態的廣交朋友，既在經濟上進行市場化改革並力求融入全球化，又在政治上固守獨裁體制，全力防止西方的和平演變。君不見，錢包鼓起來的中共政權正在全世界展開金錢外交，它已經變成其他獨裁國家的輸血機，它用經貿利益來分化西方同盟，它用大市場來利誘和要脅西方大資本。而面對經濟實力迅速提升的獨裁大國，如果它的獨裁崛起得不到來自外在的強力制約，繼續對中國的獨裁式崛起採取綏靖主義，就將重蹈歷史覆轍，其結果，不僅是中國人的災難，也將殃及自由民主的全球化進程。所以，要遏制獨裁崛起對世界文明的負面效應，自由世界就必須幫助世界上最大的獨裁國家儘快轉型為自由民主的國家。」

從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叱吒風雲到在瀋陽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的孤獨離世，劉曉波的命運絕不僅僅反映出中國民主的困境，它也是對世界的警報。二十八年前，誰能想像到今天的世界竟變成這般模樣。照這樣的趨勢下去，二十八年後的世界不堪設想。喪鐘為誰而鳴？但願劉曉波之死能成為扭轉的開端。

## 二、劉曉波與零八憲章

現在，一般人都說，劉曉波是因為參與起草〈零八憲章〉而被抓捕被判刑的。嚴格地講，這種說法並不準確。因為它無法解釋，參與起草〈零八憲章〉的人有好幾個，首批簽署者更多達三百餘人，為什麼到頭來只抓了劉曉波一個人，而且判刑那麼重？

前些日子，網上流傳一段劉曉波妻子劉霞在 2009 年 2 月接受北京電影學院教授郝建採訪的視頻，其中劉霞講到，劉曉波「沒有想到」會因為起草〈零八憲章〉而被抓。

有一個細節值得注意。劉霞說 2008 年 12 月 8 日晚上約 11 點有公安敲門，「拿了一個東西，沒有任何罪名的，沒給我，讓曉波在上面簽字。曉波不簽，跟他們吵，曉波說因為你這沒有寫任何涉嫌什麼罪名」。劉霞強調，該份刑事拘留的文件上「沒寫任何東西」。

這個細節很重要。它表明：當局已經抓人了，可是抓人的理由還沒編出來。可見當局是先抓人再找罪名。可見劉曉波這次被抓，並不是因為他參與起草〈零八憲

章》，而是因為他是劉曉波。也就是說，當局早就決定要抓劉曉波了，〈零八憲章〉只是個藉口而已。

不只是劉曉波自己，其他〈零八憲章〉的發起人事先也沒有想到劉曉波會因〈零八憲章〉一事被抓。當時他們以為〈零八憲章〉這件事的風險有限，估計當局不會抓人。另外，〈零八憲章〉既然是好些人共同發起的，如果要抓的話，少說也得抓三五個「主犯」，不會只抓劉曉波一個人。何況，劉曉波不是執筆人，在法律意義上還不能算「首犯」。

只有一個人預見到了後來發生的一切，那就是劉曉波的妻子劉霞。劉霞說：「從我看到〈零八憲章〉那天起，我就告訴他，被抓的人肯定是你，而且就你一個人。而探監的人肯定就是我。」當時劉霞就提醒劉曉波，警察就要來了，曉波不信，還認為劉霞神經過敏。

為什麼大家事前都估計錯了呢？因為我們囿於過去的經驗，認為當局固然從來不是依法辦事，但是它要抓人，那總還是要根據我們做了什麼特定的事，而且總是會根據各個人在這件事中的作用大小而判處或輕或重的刑罰的。殊不知現在情況變了。現在，當局不是根據「事」去抓「人」，而是先定下抓什麼「人」，然後再去隨便找個什麼「事」做理由。後來我們得知，當局制定了一項名叫「拔旗行動」的計劃，對各個領域裏的人權活動的領軍人物一概打壓。也許在 2008 年，這種做法還沒有正式命名列入計劃，但實際上已經在實行了。劉曉波既然是當局心目中民間力量的第一號領軍人物，所以就成為當局抓捕的第一個。這和〈零八憲章〉一事有多嚴重以及劉曉波在其中的作用有多重要沒有太大的關係。

在劉曉波的判決書裏，當局首先列出的「罪行」是劉曉波在境外網站發表的六篇文章，其次才提到〈零八憲章〉。在劉曉波被審判前夕，三百二十八名〈零八憲章〉簽署者發表聲明，表示願意和劉曉波共同承擔責任。聲明說，「如果判處劉曉波先生有罪，也等於判決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罪。我們只有和劉曉波先生共擔刑罰」。這麼多人「自動投案」，當局竟然不予理睬，一個人都沒抓。可見當局之所以抓劉曉波並判處重刑，並不是因為〈零八憲章〉這件事，而是因為劉曉波這個人是當局心目中民間力量的第一號領軍人物。

更能揭示當局「拔旗行動」計劃的莫過於浦志強案件。2014 年 5 月 3 日，十幾個人——其中有學者、維權人士和天安門母親——在北京一處私宅舉行紀念六四座談。第二天，當局以「尋釁滋事罪」抓捕了五位與會者，他們分別是徐友漁、郝建、胡石根、劉荻和浦志強。其後，前四人先後以取保候審的名義釋放，單單扣下了浦志強。按說在這次活動中，浦志強既不是主要聯絡人，又不是東道主，也不是主要發言者，但是到頭來，浦志強卻成為唯一的判罪者，而且他的判決書上居然一個字也沒有提到這次座談會。這就說明，當局早就打定主意要拔掉浦志強這面旗幟，那個座談會只不過是個由頭而已。

### 三、劉曉波的政治遺言

劉曉波在中共嚴密監控下逝世。他甚至不能對公眾留下遺言。好在我們還有劉曉波當年在法庭上的〈最後陳述〉。其中，劉曉波用散文詩的語言，講述了他的夢想、他的期待。

劉曉波說：「我期待我的國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達的土地，在這裏，每一位國民的發言都會得到同等的善待；在這裏，不同的價值、思想、信仰、政見……既相互競爭又和平共處；在這裏，多數的意見和少數的意見都會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別是那些不同於當權者的政見將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護；在這裏，所有的政見都將攤在陽光下接受民眾的選擇，每個國民都能毫無恐懼地發表政見，決不會因發表不同政見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將是中國綿綿不絕的文字獄的最後一個受害者，從此之後不再有人因言獲罪。」

讀劉曉波這段陳述，不禁使人聯想起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說〈我有一個夢想〉。其中，馬丁·路德·金講到：「我夢想有一天，這個國家會站立起來，真正實現其信條的真諦：『我們認為真理是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我夢想有一天，在佐治亞的紅山上，昔日奴隸的兒子將能夠和昔日奴隸主的兒子坐在一起，共敘兄弟情誼。我夢想有一天，甚至連密西西比州這個正義匿跡，壓迫成風，如同沙漠般的地方，也將變成自由和正義的綠洲。我夢想有一天，我的四個孩子將在一個不是以他們的膚色，而是以他們的品格優劣來評價他們的國度裏生活。」

無論是在思想內涵還是在文字表達上，劉曉波的最後陳述都可以和馬丁·路德·金的演說相媲美，甚至還更厚重。未來，它也必將和馬丁·路德·金的演說一樣編入中學生課本，代代相傳。

在〈我的最後陳述〉裏，劉曉波寫道：「表達自由，人權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殺言論自由，踐踏人權，窒息人性，壓抑真理。為踐行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權利，當盡到一個中國公民的社會責任，我的所作所為無罪，即便為此被指控，也無怨言。」

早在大學時代，劉曉波就萌生了在中國爭取言論自由理想，並決心將對言論自由的信念付諸於公開言行。不錯，乍一看去，言論自由很溫和，但是它卻對共產專制具有致命的殺傷力。劉曉波說：「無論於官於民，推動大陸的新聞開放和言論自由，實乃推動中國社會穩定轉型的首要目標，黨禁可以緩開，但開放言禁卻刻不容緩」。可是只要有了言論自由，專制統治就隨之瓦解。劉曉波說：「言禁一開，自由中國必定降臨。」據此，劉曉波提出，民間維權應以爭取言論自由為突破口。

需要說明的是，爭取言論自由，並不要求每個人都毫無畏懼地講出自己的全部觀點。它只要求，每當言論自由遭到侵犯，我們應該挺身而出。

2009年年底，劉曉波被判重刑。北京電影學院崔衛平教授向她的知識界文化界同仁發去詢問，請他們談談對劉曉波案件的看法；有些人沒有回覆，而幾乎所有的回覆者都對劉曉波被判刑表示反對。有些回覆者聲明他對劉曉波的觀點並不贊同，甚至強烈反對，但是明確表示不能接受對劉曉波以言治罪。有的人乾脆引用伏爾泰那句名言——「我堅決反對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我不知道這些人是不是真的反對劉曉波的觀點。或許有些人本來是贊成的，但不敢明說，甚至還要假裝說不贊成，免得給自己惹麻煩。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捍衛了劉曉波的權利，維護了言論自由。

這就是爭取言論自由的秘訣——低風險。因為你並沒有表示你贊成那種危險的「反動觀點」，你甚至還表示和反動言論「劃清了界限」，當局怎麼好整你呢？這點

風險一般人都承受得起，做到這一點很容易也很簡單。而只要有更多的人堅持了這樣一種立場，言論自由就得到捍衛，就接近實現了。

把爭取言論自由當作戰勝極權統治的第一步，繼續為言論自由而抗爭。這就是劉曉波留給我們的政治遺言。

#### 四、從幾件小事看劉曉波的人品

讀到不少懷念劉曉波的文章，其中談到曉波的若干往事，令人感觸良深。

北京的資深民運人士何德普在社交媒體上寫道：2003年11月6日我被法院判八年徒刑，妻子賈建英在回家路上（旁聽完宣判）接到劉曉波電話，請她去他家吃飯。晚飯是劉霞做的，劉曉波陪著賈建英說話。劉曉波被抓捕後，賈建英按照獄中何德普提供的尺碼為劉曉波縫製了一個厚褥子。2000年初許多被判重刑的政治犯家屬都得到過劉曉波的支持。

在何德普的帖子後面，四川的異議人士歐陽懿等好幾個人都跟貼表示，他們也得到過劉曉波極大支持。可惜現在沒法子支持劉曉波。

現居美國的獨立筆會會員蔡楚寫文章回憶劉曉波，提到十二年前的一件事。蔡楚說：「劉曉波於2005年9月19日白天接到筆會會員楊春光的妻子小蔡，從遼寧省盤錦市打來的電話，說楊春光因突發腦溢血，於凌晨三點逝世。因我主持楊春光的文集，對楊春光比較瞭解，曉波上網與我商量怎麼辦。我建議筆會應發佈悼念楊春光先生病逝公告。沒有想到，曉波當天就乘火車去盤錦市楊春光家。由於不熟悉道路，曉波直到深夜才找到楊春光家。曉波對楊春光遺體告別並慰問其家屬後，小蔡表示經濟困難，曉波立即從自己的皮包裏拿出一筆錢，送給小蔡後才匆匆離開。後來，我從美國打電話給小蔡，她告訴我，曉波私人送了她一千元。而曉波從不提此事，這件事顯示了曉波為人的真誠和大氣。」

余志堅先生，是在八九民運期間向天安門城樓的毛澤東畫像潑灑顏料的三君子之一，不久前因病去世。他的妻子鮮桂娥女士得知劉曉波去世的消息後異常悲痛，寫文章悼念。鮮桂娥在文中特別寫到：「我們2006年婚禮時接到他的電話，志堅用尊敬和興奮的聲音和曉波先生交談，而我，快樂得直跳。」

劉曉波堅守國內，和國內的異議人士始終保持密切聯繫。很多遭受迫害的異議人士本來和劉曉波沒什麼來往，甚至連面都沒見過，但劉曉波對他們都親如兄弟，除了把筆會的資源最大限度地為獄中作家們服務，還常常拿出自己的稿費幫助他們。很多因言獲罪者的家屬，如楊子立的妻子、杜導斌的妻子、劉荻的外婆等，都接到過劉曉波慰問的電話或電郵。作家師濤因在海外網站發表文章被判處十年重刑。師濤此前與劉曉波並無直接交往，母親前去探監時，師濤悄悄告訴母親，有事找「波」。可見師濤對劉曉波是何等的信任。

必須強調的是，這種信任不是靠四處宣揚作秀做出來的，而是由許許多多的默默無聞的小事，通過長年累月的積累，經由人們的口口相傳才建立起來的。它最有力地揭示出劉曉波的人品。

上面提到的這些小事，如果不是劉曉波去世，當事人通常都不會寫出來公諸於世。外人一般也就無從知曉。長期以來，有極少數人到處傳播不符合實情乃至於蓄

意編造的故事，攻擊和詆毀劉曉波的人品。這些攻擊和詆毀無疑都是站不住腳的。這一點，只要看看劉曉波所享有的廣闊人脈和巨大信任就清楚了。就以〈零八憲章〉簽名運動為例。我們知道，在〈零八憲章〉首批簽署者三百零三人中，劉曉波一個人聯繫和徵集的簽名就有七十多個，是徵集的最多的。不少人接到劉曉波的徵詢，連憲章文本都沒認真看就答應了。這可不是趕時髦湊熱鬧，因為大家都知道簽署〈零八憲章〉是有政治風險的，是極其嚴肅的大事。他們之所以連憲章文本都沒認真看就答應簽名，就因為他們充分信任劉曉波。

除了〈零八憲章〉簽名運動之外，劉曉波還帶頭發起過多次聯名信呼籲書一類集體行動。劉曉波之所以能成為這些集體行動的主要發起者組織者，除了他思想敏銳、筆頭快之外，那也是因為他有親和力，人脈廣，可信賴。國內的海外的、華人洋人、體制內體制外、老年中年青年、學術界文化界法律界新聞界、民運人士維權人士獨立作家藝術家，很多人都願意和他打交道，願意和他合作。雖然說對劉曉波不滿者也不乏其人，但平心而論，在異議陣營中的頭面人物中，又有幾個——如果有的話——比他更孚眾望、更有人緣呢？這難道不雄辯地證明了劉曉波的人品？這樣的人品難道不值得我們學習和景仰？那些對劉曉波人品的攻擊詆毀無疑是錯誤的，也註定是徒勞的。

### 五、當局是曾打算把劉曉波放逐海外嗎？

我們知道，一直到今年 3 月的那次探監，劉曉波的妻子劉霞才把她得了重度抑鬱癥和心臟病，她的弟弟被判重刑，她的父母相繼過世等事情告訴劉曉波。劉曉波獲悉後非常震撼，為了劉霞的身體，決定同意跟劉霞以及劉霞的弟弟劉輝一道出國。於是劉霞寫信向當局申請，由劉曉波及弟弟劉輝陪伴自己去德國治療。

不少人對此感到很困惑。他們弄不懂，劉曉波怎麼能以妻子需要出國治病為理由，要當局把自己也從監獄中放出來和妻子一道出國，而且還要帶上也是被判重刑的妻弟同行呢？一個仍在獄中服刑的犯人憑什麼會提出這麼高的要求呢？

是的，乍一看去，劉曉波的這個要求太高了，高得超乎常理。但是從劉曉波和劉霞當時的角度，他們提這樣的要求一點也不過份。因為在當時，劉曉波和劉霞都以為，當局是巴不得把劉曉波流放海外的，只要劉曉波願意接受流亡，當局就願意做出讓步。這說明，劉曉波先前確實得到過當局的某種明示或暗示，希望劉曉波能同意以保外就醫的名義送到西方；唯其如此，劉曉波和劉霞才會認為，如果劉曉波同意流亡，那就是對當局的一個大讓步，因而就可以換取當局也作出讓步。早先，我不止一次聽到傳言，說當局願意把劉曉波放逐海外。現在看來，這種傳言是真實的。

在 2008 年劉曉波被捕前最後一次採訪錄影中，劉曉波談到，在 1996-1999 年他被判勞教期間，他本來是有機會免除勞教，離開中國到西方的。劉曉波說：「98 年，克林頓來訪，中國政府找我（劉曉波）談過，以保外就醫的名義送到美國去。我實話實說，如果你們真給我判十年以上，象王丹魏京生那樣，我可能還會考慮。實話實說這個三年，我已經過了一半了，還剩下一年半時間，怎麼我也能挺過去。」

估計當局也聽到了或瞭解到劉曉波的上述思想。也許，這就是為什麼當局要給劉曉波重判十一年。因為當局的目的就是把劉曉波放逐海外。當局以為，如果只判

三五年，劉曉波就會堅持坐牢；如果重判十年以上，劉曉波就會考慮，是不是象王丹、魏京生那樣流亡海外算了。

可是當局打錯了算盤。因為此一時彼一時。1998 年的劉曉波，如果被判刑十年以上，多半會同意接受流亡；但 2008 年的劉曉波，哪怕被判重刑，卻寧肯把牢底坐穿也不接受流亡。

從 1998 年到 2008 年，劉曉波의思想和境界有驚人的提升。2000 年 1 月 13 日，劉曉波在給廖亦武的信裏寫道：「……與其他共產黑幕中的人物相比，我們都稱不上真正的硬漢子。這麼多年的大悲劇，我們仍然沒有一個道義巨人，類似哈維爾。為了所有人都有自私的權利，必須有一個道義巨人無私地犧牲。為了爭取到一個『消極自由』（不受權力的任意強制），必須有一種積極抗爭的意志。歷史沒有必然，一個殉道者的出現就會徹底改變一個民族的靈魂，提升人的精神品質。甘地是偶然，哈維爾是偶然，兩千年前那個生於馬槽的農家孩子更是偶然。人的提升就是靠這些偶然誕生的個人完成的。不能指望大眾的集體良知，只能依靠偉大的個人良知凝聚起懦弱的大眾。特別是我們這個民族，更需要道義巨人，典範的感召力是無窮的，一個符號可以喚起太多的道義資源。」2002 年，劉曉波寫了一篇長文〈中國民間反對派的貧困——六四十三周年祭〉，文中講到，失去自由的昂山素姬寧願把牢底坐穿也決不流亡，為反對派本身的發展和國際社會的支援提供了充分的道義資源和組織資源。劉曉波深以為憾的是，在中國，在六四屠殺的極端恐怖之下，有可能變成民間道義象徵的代表性人物大量逃亡或被迫流亡，歷史本來給予某些人成為這種象徵性人物的機會，但由於他們的這種那種弱點，他們沒能成為這樣的人物，致使中國始終未能產生像薩哈諾夫、哈維爾、瓦文薩、米奇尼克和昂山素姬這樣的足以凝聚民間道義共識的反對派領袖。劉曉波堅定地認為，中國需要這樣的道義典範。這就意味著，早在 2000 年，劉曉波就已經下定決心，如果命運把成為這種道義典範的機會或曰重擔放在他的身上，他一定要盡力承擔。

我們可以推測，當初當局給劉曉波重判十一年，其目的是逼迫劉曉波接受流亡海外。我們還可以推測，當局一定不止一次地向劉曉波透露過他們的這一意圖。只是都遭到劉曉波的拒絕。到後來，當局放棄了這種意圖。當局害怕劉曉波坐穿牢底，活著走出監獄，成為中國的昂山素姬，於是轉而採取了極其惡毒的手段，使劉曉波被肝癌。但劉曉波本人和劉霞都並不知道當局已經改變了做法。今年 3 月劉霞探監，將家中變故和自己的病情如實相告，並轉述了醫生的意見：除非徹底改變環境，否則她的病情不可能緩解。可以想像，這對劉曉波是何等的震撼。十一年的監獄已經坐了九年，劉曉波有足夠的毅力把餘下的兩年坐滿，但是劉霞還能熬得過兩年嗎？還能讓劉霞再熬兩年嗎？在這時，劉曉波和劉霞都還以為當局仍然巴不得把劉曉波放逐海外。於是，劉曉波放下了把牢底坐穿的堅持（已經堅持了九年！），轉而同意陪劉霞出國就醫。這就有了文章一開始講到的事情。然而緊接著，在 5 月份劉曉波被告知肝癌晚期，隨即被保外就醫。這時，劉曉波明確表示他願意和劉霞一到出國治療，死也要死在自由的土地上。可是劉曉波的病情惡化得如此之快，僅僅一個半月，劉曉波就被癌癥奪去了生命。

劉曉波未能成為中國的昂山素姬。劉曉波以自己的方式給我們樹立了一個巨大的道義典範，比之薩哈諾夫、哈維爾和昂山素姬都毫不遜色；而劉曉波的死亡更

使他永遠定格為偉大的殉道者。在《人的條件》一書，漢娜·阿倫特寫道：偉大生命的本質就在於「只在身後留下一個故事，從而只能在生命完結之後開始存在」。「只有在完成自己的一個最高行動之後不再活著的人，才可以一直成為自己的身份和可能的偉大性的無可爭辯的主人」。因為，他已經「從自己所開創的事業的可能的結果和延續之中，撤退到死亡裏面去了」。一般人總是想，當將軍的，能身經百戰而又全身而退，最後在家人環繞下壽終正寢，那該是何等完美的人生！可是當你讀到東漢名將馬援那句名言：「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床上在兒女子手中邪？」你不能不承認，那死於邊野、馬革裹屍還葬的男兒，才是更震鑠的男兒形象。

## 六、聖人劉曉波

劉曉波逝世，不少人寫文章對之稱揚讚頌，還有人提議為劉曉波立碑立像，給街道或廣場命名。於是有人發出警告：不要造神封聖。由於經歷過毛澤東時代的造神運動，這些人對所謂造神封聖格外敏感。不過我要說的是，現在我們對劉曉波的種種頌揚活動，和毛時代的造神運動有根本的不同。

記得在文革之初，針對西方人批評中共搞個人崇拜，毛澤東對來訪的美國記者斯諾說，說我是個人崇拜。你們美國人才是個人崇拜多呢！你們的國都就叫作華盛頓。你們的華盛頓所在的那個地方就叫作哥倫比亞區。毛澤東說：你斯諾沒有人崇拜你，你就高興啦？你們美國每個州長、每個總統、每個部長沒有一批人崇拜他，怎麼混得下去呢？

毛澤東的回應貌似振振有詞，其實不堪一駁。關鍵在於，讓人崇拜是一回事，不讓人不崇拜是另一回事。共產黨的問題，不在於他們過份地稱頌他們的領袖，而在於他們因言治罪，利用手中的權力迫害那些對毛澤東不稱頌、不崇拜的人。鄧小平據說是不搞個人崇拜、甚至反對搞個人崇拜的中共領導人，但是魏京生僅僅是寫了一張大字報批評鄧小平，就被鄧小平抓進大牢。所以，關鍵不在於是否對某人造神封聖，關鍵在於是否保障言論自由，是否禁止因言治罪。

現在，一些人對劉曉波給予極高的評價，並準備為劉曉波建立某種形式的紀念物。在這裏，一點也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把劉曉波是偉人是聖人的觀點用權力強加於人的問題，人們盡可各持己見，見仁見智。在這裏，一點也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否定言論自由，把持異議者定罪，對持異議者迫害的問題。這和共產黨搞的那一套根本是兩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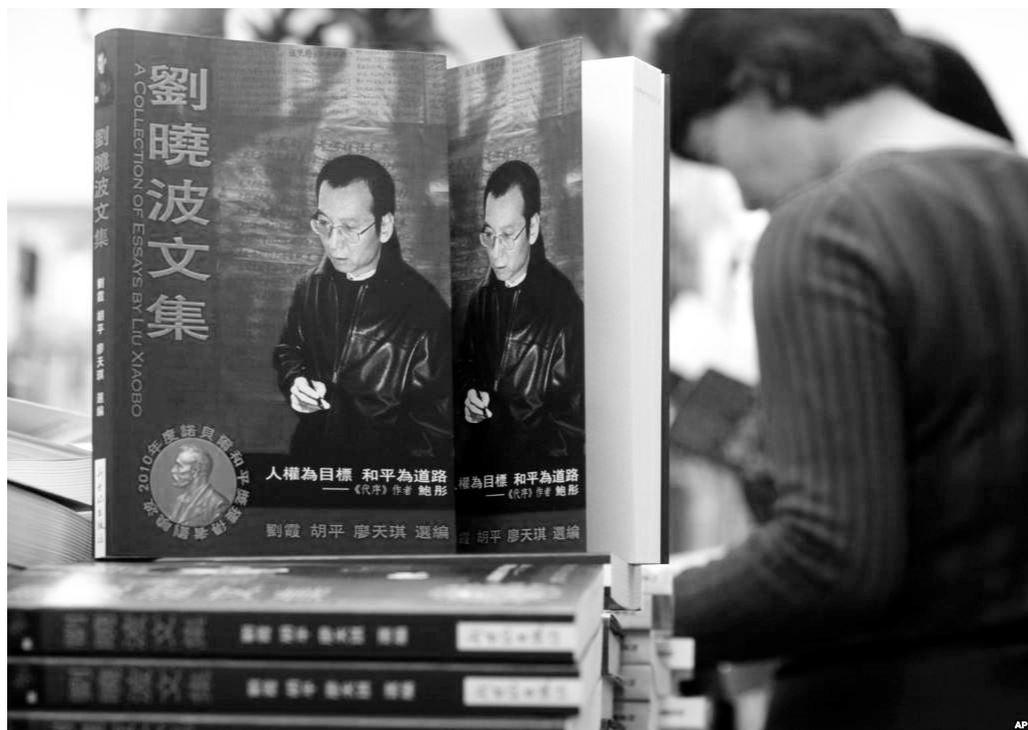
其實，給某些人極高的評價，稱之為聖人。這在東西方都有著悠久的傳統。例如天主教就有封聖的傳統。象聖弗朗西斯、聖安東尼、聖奧古斯丁就是著名的聖人或聖徒。所謂聖人，也不必是一輩子毫無瑕疵、十全十美。例如聖奧古斯丁，年輕時放蕩不羈，毛病很多，中年後才信仰基督教，並過起修道院生活，從此潛心向善，至死不渝。在中國古代，孟子就說「人皆可以為堯舜」。王陽明有句名言：「滿街都是聖人」。這就是說人都有向善的潛質，只要不斷努力，就可以超越平凡，達到聖賢的境界。

在電影《昂山素姬》裏，昂山素姬講過一句話：「聖人，就是不斷努力的罪人。」我以為這話講得很好。在我認識的異議人士中，有不少人品行高潔、意志堅定。在

其中，劉曉波本來未必是最優秀的。但一來是其他人先後都離開了中國流亡海外。在自由社會中，他們最美好的品質得不到充分的彰顯。二來是劉曉波雖然有不少弱點，但他具有嚴格的反省精神。劉曉波的反省決不是只停留在紙面上，而且還付諸實踐。古今中外宣導精神修養的各種流派，大都強調踐行，即按照你的理念去生活，把你的理念變成你的生活方式。只要你遵照理念的要求去堅持過一種不同的生活，那麼，不管你開頭有多少妄想雜念，只要你堅持下去，久而久之，那些東西自然就淡化了，心靈自然就純淨了。二十多年來，曉波堅守國內，通過更堅定的抗爭，更從容的面對苦難，使得自己的精神境界日益進入到更高的層次。

聖人，就是不斷努力的罪人。劉曉波一直堅持，堅持到底，他就是聖人了，不是也是了——這樣都不是，怎樣才能是呢？聖人就是這樣煉成的。沒有人天生完美，完美就體現在對完美的不斷追求。那些終生追求完美的人就是完美的。

**胡平**——旅美中國流亡作家，《北京之春》前主編、榮譽主編，獨立中文筆會榮譽理事。



# 劉曉波爭議原因論

——請以凡人來看為中國繁榮富強  
而殉難的傑出詩人

嚴家祺



劉曉波不是「聖人」，而是一個凡人。許多天安門事件的參與者在「六四」後逃出了中國，我也是其中之一，而劉曉波卻遭到了監禁，並為六四翻案和〈零八憲章〉付出了生命。1993 年後，正是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和劉霞，使劉曉波獲得重生，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當之無愧。

劉曉波被中共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在劉曉波遭受長期迫害而去世的今天，中國和全世界無數人士悼念他、紀念他，但海外圍繞他卻發生了許多爭議。有人宣稱他是「聖人」，有人認為他是一個「投機者」。作為諾貝爾和平獎的獲得者，對他如何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過程，如何全面地評價他，對了解當代中國政治是一件有意義的事。

劉曉波的一生有四件大事，走入公眾視野。一是他在青年時代向美學權威李澤厚挑戰；二是在六四大屠殺前夕，以與眾不同的姿態宣佈絕食；三是創建獨立筆會和《民主中國》網刊；四是因〈零八憲章〉獲得諾貝爾獎並被迫害致死。

## 青年時代向李澤厚挑戰

李澤厚比劉曉波年長二十五歲，是中國著名的哲學家、美學家。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李澤厚出版了《批判哲學的批判》、《美的歷程》、《中國古代、近代、現代思想史論》等作品，影響巨大。在文革前，我就與李澤厚同在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工作。文革開始時，李澤厚三十六歲，當時他夠不上「學術權威」，也不是「造反派」，大體上屬於逍遙派。在河南明港五七幹校，哲學所幾十人住同一大間軍隊營房，每天清查所謂「五一六」反革命集團，所有人都只允許在自己床位前讀毛選和馬列，我當時把馬列當作歷史來讀，而李澤厚不簡單在於，居然在毛選下放一本康德哲學的書，軍宣隊走過他床位前時，他讀毛選，軍宣隊不在時他讀康德。李澤厚的學術成就是他幾十年積累的成果，作為哲學界的同行，當時無人會向李澤厚挑戰。文革後幾年劉賓雁調入哲學所，在外國哲學研究室作翻譯，他對李澤厚也只有欽佩之情。1986年，劉曉波在《中國》七月號上，發表了〈感性 個人 我的選擇——與李澤厚對話〉，向李澤厚提出挑戰。

李澤厚訴諸康德和黑格爾，建立了「理性積澱說」這一美學理論，劉曉波則引證弗洛伊德和薩特，建立了可以稱為「個體突破說」的美學理論。這裏不談這兩種理論的具體內容，我要指出的是，李澤厚長期在訴諸理性的哲學界生活，突然來了一個充滿熱情的、詩人般的美學研究者劉曉波，理性主義的李澤厚怎麼能夠與充滿強烈突破願望的劉曉波進行交手呢？劉曉波在《與李澤厚對話》中說：「在哲學上、美學上，李澤厚皆以社會、理性、本質為本位，我皆以個人、感性、現象為本位；他強調和突出個體主體性，他的目光由『積澱』轉向過去，我的目光由『突破』指向未來。」

## 創造「最偉大的生命之舞」

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是當代中國歷史的轉捩點，也是二十世紀世界共產主義運動走向滅亡的起點。

劉曉波參與天安門事件的方式，可以從《與李澤厚對話》一書中找到答案。劉曉波把「理性積澱」看作「枷鎖」，劉曉波寫道：「理性的枷鎖一旦七零八落，人的面前就是一個全新的、充滿生機的宇宙。狂迷的酒神酩酊大醉，創造著最偉大的生命之舞。」縱覽劉曉波的一生，可以看到，劉曉波首先是一個詩人、作家，他內心深處的人生目標，就是打破「理性積澱的枷鎖」，創造「最偉大的生命之舞」。

在天安門數以百萬計的羣眾運動中，如何為自己創造「最偉大的生命之舞」？劉曉波談到他內心中「兩個我」的衝突時說：「一個我是理智的、清醒的，只想旁觀，不想捲入，因為我崇尚自由的天才的個人，而鄙視大規模的羣眾運動，認為在中國搞大規模的羣眾運動不會有積極的意義。而另一個我是情緒化的，盲目的，急切介入運動的每個環節，想在運動中佔有突出的位置，貪婪地注視著狂熱的人羣，認為如此空前的運動怎麼能不留下劉曉波的痕跡。」

1989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是一場以學生為主體的運動，王丹、吾爾開希、柴玲、封從德、張伯笠、李錄、熊焱、項小吉等因當時參與對話而廣為人知。天安門廣場幾千名大學生的絕食，引起了全中國和全世界的註意，但不可能有一位沒有參加對話的絕食學生會被人們註意。劉曉波對重大歷史事件有超越常人的敏感性，以

一種「為劉曉波留下痕跡」的方式投入他所鄙視的羣眾運動。就像劉曉波向李澤厚挑戰引起美學界注意一樣，劉曉波以「四君子絕食」的方式引起全世界對他的注意，而且劉曉波還以他特有的方式，把「我沒有敵人」這樣的說法寫進〈絕食宣言〉。劉曉波這些與眾不同的作為，就是打破「理性積澱的枷鎖」，創造他「最偉大的生命之舞」。

6月3日晚上10時，張伯笠要我參加「天安門民主大學」開學典禮，我作了演講後，有兩位北京體育學院的學生幫助我離開了當時人山人海的廣場，十一時多回到建國門家中。這時大屠殺已經在復興門外遠處開始。六四大屠殺，不僅殺害了數以千計的無辜民眾，把數以萬計的和平抗議者關進監獄。劉曉波勇敢面對紅色恐怖，遭到了逮捕，我卻在六四上午逃離了北京。

### 學盧梭《懺悔錄》另闢蹊徑

「六四大屠殺」後兩天，劉曉波被拘捕，隨後被中國官方媒體公開指控為操縱學運的「黑手」。6月24日，《北京日報》發表文章〈抓住劉曉波的黑手〉。但劉曉波在壓力下竟在中國官方中央電視臺上作證，說沒有到見解放軍在天安門廣場上殺人。1990年9月，劉曉波被開除公職，於1991年1月在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受審，被判「反革命宣傳煽動罪」，但因說服學生撤離廣場被作為「重大立功表現」而免予刑事處分釋放。出獄後作為自由撰稿人在北京從事寫作，並參與人權活動。1992年，在臺灣出版《末日倖存者的獨白》。該書對他自己作證天安門廣場上沒有死人進行懺悔，同時又做自我辯護。

《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一書是瞭解劉曉波內心世界最重要的一本書，這本書是劉曉波的《懺悔錄》。我覺得劉曉波在寫作這本書時，已經對自己的政治前途喪失信心，他企圖另闢蹊徑，用法國思想家盧梭寫《懺悔錄》的方式，回歸詩人、作家和評論家的生涯，為自己在政治以外開闢一條新路。

《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一書內有許多劉曉波自我中心的「名言」，如劉曉波說：「在每個重大的歷史時刻，參與者都抱著個人的目的來利用歷史的契機，投機的成功者會由此贏得各種榮譽和利益，投機的失敗者將被指責，錯過機會者將悔恨。」「不管別人如何議論，我都堅信，八九抗議運動之機太值得投了，能夠投上此機，確乎上帝有眼，賜福於我，即使被指責為政治投機者，也心地坦然，無怨無悔。」「在內心深處，我相信自己還會一鳴驚人，這是我的本能、天賦和命運。」「我蔑視人羣，視社會為烏合之眾，崇尚天才個人的創造力，終生的目標就是想看看究竟是一個有創造力的孤獨天才強大，還是芸芸眾生強大。」

劉曉波對自己的動機毫不掩飾，像盧梭一般剖析自己內心世界。他一方面揭露和批判中國專制政治的黑暗，另一方面宣稱「我沒有敵人」，劉曉波像給劉霞寫情詩一樣，懷著他所認為的「大愛」宣稱「我沒有敵人」，這完全是一個追求內心自由的浪漫主義的作家的「獨白」。當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後，許多參與中國民主運動而歷盡苦難的人，竟然把劉曉波多年來作為浪漫主義作家的「獨白」，錯當成了中國民主運動的綱領而對劉曉波大加指責。這正是現在對「我沒有敵人」無盡爭論的重要原因。

## 劉曉波的重新振作和轉變

1989 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中劉曉波以及其後他的表現，廣為人知。他出獄後，正是由於他看到天安門母親多年的苦難，在丁子霖、蔣培坤的影響下，在與北京與他一樣的六四受難者的交往中，開始重新振作起來，為六四翻案呼籲，為中國前途寫作。王軍濤說，天安門母親改變了劉曉波，使他從一個「狂人」轉變為為中國民主前途奮鬥的勇敢的戰士。

劉霞對劉曉波的愛，也是促成劉曉波轉變的一個原因。六四後，劉曉波被北京師範大學開除公職，家庭破碎。劉霞進入了劉曉波的生活。1995 年 5 月，劉曉波因與王丹、陳小平、周舵等人起草「六四」六周年的呼籲書而遭到軟禁，後來被處以勞動教養三年，關押在大連。當時，劉霞每月一次從北京坐火車到大連去探望劉曉波。劉霞是當代中國傑出的詩人，她不屑現實的政治，她超越政治，是一個愛情至上主義者，從劉曉波和劉霞兩人的詩，可以看到他們之間純潔的愛和超越政治利害得失的高尚境界。

劉霞在〈風——給曉波〉裏寫道：

你命中註定和風一樣  
 飄飄揚揚  
 在雲中遊戲  
 我曾幻想與你為伴  
 可應該有怎樣的家園  
 才能容納你  
 牆壁會令你窒息  
 你只能是風，而風  
 從不告訴我  
 何時來又何時去  
 風來我睜不開眼睛  
 風去塵埃遍地

1996 年劉曉波在〈承擔——給苦難中的妻子〉裏寫道：

你對我說  
 一切都能承擔  
 你頑固地讓眼睛對著太陽  
 直到失明化為一團火焰  
 火焰把海水全部化為鹽  
 親愛的，讓我隔著黑暗對你說  
 進入墳墓前  
 別忘了用骨灰給我寫信  
 別忘了留下陰間的地址  
 骨碴會劃破信紙  
 寫不出一個完整的字  
 碎裂的筆觸刺痛了你

燒灼中的不眠之夜  
 讓你為自己而驚奇  
 一塊石頭承擔了天地  
 以其堅硬猛擊我的後腦  
 白色的藥片由腦漿製成  
 毒死我們的愛  
 再用這中毒的愛  
 毒死我們自己

1996年，劉曉波和劉霞在大連勞教所中領取了結婚證書，正式成為夫妻，劉霞便以妻子的身分到勞教所探望丈夫。劉曉波勞教期滿獲釋後，兩人在北京定居，劉曉波從事自由寫作。從這時到2008年，是劉曉波劉霞陪在警察和國安監視下，一面為獨立中文筆會、《民主中國》網刊，為天安門事件翻案而努力，一面與劉霞一同追求為超脫現實痛苦的生活。

### 零八憲章的唯一獻身者

〈零八憲章〉是當代中國走向民主的偉大憲章，是有重要歷史意義的文件。國內第一批簽署者有張祖樺、劉曉波、丁子霖、劉軍寧、江棋生、溫克堅、高瑜等三百零三人。國外的第一批簽署者有方勵之、鄭義、王軍濤、楊建利、王丹、蘇曉康、嚴家祺等人。〈零八憲章〉的起草人是曾任「中央國家機關團委書記」的張祖樺。張祖樺在「六四」後受到打擊，離開了中央機關，在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進修法學和憲法理論，研究中國憲政問題，在2005年就已經寫就了後來稱為〈零八憲章〉的幾萬字文稿。艾曉明在2010年4月2日與劉霞在視頻上有一次對話。劉霞說對艾曉明說：「〈零八憲章〉不是曉波起草的。」在劉曉波因〈零八憲章〉被抓時，她在三年前就已經看到〈零八憲章〉「這個東西」了，「從那一刻我的心就一直提溜著」。

為了紀念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發表六十周年，原定2008年12月10日這一天在北京舉行會議，發表〈零八憲章〉。在12月8日這一天，張祖樺和劉曉波同時遭到逮捕。因為胡錦濤在團中央工作時，認識和熟悉張祖樺，張祖樺得到了釋放，而劉曉波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劉曉波因被監禁和參與〈零八憲章〉簽名而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對劉曉波的〈刑事判決書〉中說，「證人張祖樺的證言證明：他與劉曉波於2008年底共同製作完成了〈零八憲章〉，他也徵集了簽名，後劉曉波將〈零八憲章〉發表在境外網站」。對此，張祖樺發表公開聲明說，這根本不是事實。2008年12月8日張祖樺被警方傳喚時，當主審警員問到其他人包括劉曉波是否參與起草〈零八憲章〉時，張祖樺回答「不知道」。他只回答他個人做過的事和相關問題，其他人的事他不會回答。張祖樺說：「12月8日警方同時抓捕我和曉波時，〈零八憲章〉尚未公佈，我怎麼可能指認『劉曉波將〈零八憲章〉發表在境外網站』？」張祖樺雖然是〈零八憲章〉的起草人，但〈零八憲章〉獲得今天全中國和全世界巨大影響與劉曉波、丁子霖密切相關。正是丁子霖希望劉曉波聯繫更多人簽名，〈零八憲章〉才獲得許多人簽名。六四受難者江棋生在回憶劉曉波時說：「在〈零八憲章〉最後定稿的時候，我加上了一句話，就是『取消一黨壟斷執政特權』。這句話我加了以後，曉波很高興，放進去了後來的簽署人都認同了。」

現在一些人說〈零八憲章〉是「向皇帝上書」，江棋生說的好：「〈零八憲章〉不是向皇帝上書，不是向皇帝諫言。〈零八憲章〉是說給全社會聽的，是一個革命性的文本，要促成一黨專制制度向民主憲政轉型的這樣一個革命性的文本。」劉曉波不僅是六四受難者，而且是唯一一位為〈零八憲章〉獻出了生命的人。

在整個人類史上，並不是所有首腦人物都有改造世界的大志，胡錦濤作為一個首腦人物，是一個胸無大志、目光短淺、懦弱無能、欺軟怕硬的人物。胡錦濤視野是卓婭和蘇拉，居然把一個僅僅追求言論自由的作家、詩人劉曉波投入監獄，同時也因劉曉波被監禁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2012年12月，一百三十四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呼籲中國政府「立即釋放劉曉波及其妻子劉霞」，三天後，我寫了一篇〈中華民族復興的四大步驟〉，希望剛剛當選為中共總書記的習近平能夠聽取一百三十四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呼籲，釋放劉曉波。我在文章中說：一百三十四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在三天前呼籲中國政府「立即釋放劉曉波及其妻子劉霞」，是代表了人類的良心發出的呼籲。這些諾貝爾獎獲得者，他們在物理學、化學、經濟學、醫學、文學領域和為促進世界和平，為全人類作出了巨大貢獻，他們無意與關押劉曉波的中國政府過不去，他們是憑人類的良心發出的呼籲，全世界都知道，中國政府定劉曉波的「罪狀」是因為發表了胡溫政權不容的「言論」，是「以言治罪」。從1616年開始，偉大的天文學家、物理學家伽利略因為在自己的著作中宣揚羅馬教會所不容的「哥白尼太陽中心說」，而被羅馬教會認為「違背聖經」，受到宗教裁判所長達二十多年的殘酷迫害。定罪劉曉波與定罪伽利略一樣，都是扼殺人類的自由思想。中國至今沒有一位科學家獲得經濟學、醫學和自然科學的諾貝爾獎，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中國缺乏充分的思想自由，以致在科學領域人們的思想也受到無形的束縛。中國在清王朝滅亡一個世紀後至今走不出「治亂迴圈」，其首要原因，就是到今天的中國，都不容許中國人民用自己的大腦去探索中國政治制度中的弊病，任何對中國政治制度的批評，都被與「顛覆政權」聯繫起來。所以，「以言治罪」的目的是維護中國政治制度的弊端、維護專制。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走向復興必須經過四大步驟，

- 一是獨立自主，
- 二是國家統一，
- 三是改革開放、建立市場經濟，
- 四是建設民主政治。

可以說，孫中山、蔣介石為中國的民主、國家統一、獨立自主作出了巨大努力但沒有完成，而正是毛澤東實現了中國大部分地區的統一，使中國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但毛澤東不能擺脫中國幾千年專制政治的傳統，「反右」和「文革」使他從一個「共和國」的主席變成了中國傳統的專制帝王。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為中國改革開放、為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奠定了基礎。1982年的憲法和鄧小平政治改革的主張，表明他有意識要把中國逐步帶離有終身制帝王的封建王朝，但「六四屠殺」，使他前功盡棄。在中國在走向偉大復興的道路上，仍然有三件事沒有完成，一是實現臺海兩岸的和平統一，二是改變中國經濟中普遍存在的官商勾結、權錢交易現象，使市場經濟建立在財產權受法律保障和市場經濟法制化的基礎上，三是，確立「法治天下」觀念，憲法至上、以法治國，有步驟地進行政治改革，建設民主政治。

劉曉波的一生，不僅是為中國民主化、而且實質上是為中國的繁榮富強奮鬥一生，是為六四翻案和〈零八憲章〉付出了生命的人。

### 劉曉波的負疚和中華民族的悲哀

沒有適用於所有人的規則的政治，是複雜而殘酷的政治。宮廷政治就是這樣的政治。中國皇帝的「非正常死亡」，不僅比例高過一般高危職業，而且「兇手」主要出在宮廷內部，「被殺」的方式有十多種。網路上一篇〈中國最慘的職業——皇帝〉文章說：「中國歷代王朝，包括江山一統的大王朝和偏安一隅的小王朝，一共有帝王六百一十一人，其中，正常死亡的，也就是死於疾病或者衰老的三百三十九人；不得善終的，也就是非正常死亡的二百七十二人。非正常死亡率為百分之四十四，遠高於其他社會羣體。不僅皇帝「非正常死亡率」高，而且，皇室和大臣的「非正常死亡率」也很高。文化大革命〈五一六通知〉後幾天，林彪大談中國歷史上的政變，驚心動魄，使毛澤東對林彪產生了戒心。林彪害怕政變中「被殺」，就選擇了坐飛機出逃的方式。林彪、江青都是「非正常死亡」。胡錦濤膽小如鼠、無所作為，除了性格和能力外，主要是深知中國首腦職業的高危性，為了避免非正常死亡。在人類各種職業中，國王、皇帝、共產黨首腦的「職業」最榮耀，也最悲慘。共產黨首腦人物為追求至高無上的權力而不自知，所以，共產黨首腦人物的家庭大都支離破碎，毛澤東追求獨裁權力，導致江青在他身後被判處無期徒刑、自殺身亡，偉大領袖事實上成了「反革命家屬」。林彪是皇位繼承人，最後的結局是家破人亡、死無葬身之地。

任何事業的成功都彌補不了家庭的失敗，這是全人類的至理名言。然而，劉曉波不知道，在專制政治下，任何特立獨行都不容許，當他為自己創造「最偉大的生命之舞」時，卻給他的妻子、兒子和所有親人帶來了無窮盡的不幸。當然，劉曉波和他親人的不幸的製造者是中國的專制制度，但劉曉波沒有躲避。直到他生命的最後時刻，劉曉波才煥然覺醒，他對前妻陶力，感到「對不起她」，對劉霞「充滿負疚歉意」。劉曉波前妻陶力，他們在中學開始相戀。劉曉波在《末日倖存者的獨白》寫道：「陶力，我的前妻，我兒子劉陶的母親，無論是在我們沒有離婚時，還是在我們離婚時，我都對不起她。除了我放蕩的生活給予她心靈上、身體上的痛苦和絕望之外，我參與八九抗議運動的風風雨雨，也始終令她懸著心；在驚嚇中渡過了我回國後的日日夜夜。」劉曉波又提到：「當我在廣場上和其他女人調情時，更沒有想過她那受過多次傷害的心靈還還在滴血。因此，陶力與我離婚，無論在甚麼時候、甚麼情況下都是理由充足的」、「像我這樣生性放蕩而又貪戀社會功名的人，根本就不配有家庭、不配做一個負責的丈夫和父親，不配得到陶力的愛」、「我從事民權運動，得到了美名。陶力呢？得到的無非痛苦、驚怖、焦慮，而她不但病骨支離，還要勉力撫養孩子，和我離婚，是合理合情的。」

劉曉波曾說：「我有一種強烈的欲望，要在千百個女人的身上發掘不同的美。」直到與劉霞相愛，劉曉波才有改變。他說：「如今，我終於在一個女子身上找到了所有的美。」劉曉波由八十年代的風流浪子，蛻變成專情的丈夫。劉曉波於 2009 年一審時發表的〈我沒有敵人〉文章，表示這二十年來最幸運的經歷，就是得到了妻子劉霞無私的愛。他又寫道：

我在有形的監獄中服刑，  
你在無形的心獄中等待，  
你的愛，  
就是超越高牆、  
穿透鐵窗的陽光，  
扶摸我的每寸皮膚，  
溫暖我的每個細胞，  
讓我始終保有內心的平和、坦蕩與明亮，  
讓獄中的每分鐘都充滿意義。  
而我對你的愛，  
充滿了負疚和歉意，  
有時沉重得讓我腳步蹣跚。

劉霞對劉曉波的爱撼天動地，超越監獄的枷鎖，傳達到對方心中。

有一位長期遭受監禁的、受苦受難的民運人士在劉曉波去世後在網上撰文說，「七年前，劉曉波以欺世盜名的手段，騙取了諾貝爾和平獎」。事實是，劉曉波本人絲毫沒有為自己爭取諾貝爾和平獎的想法。在劉曉波因〈零八憲章〉被捕後，楊建利、李曉蓉等人與哈維爾、達賴喇嘛等諾貝爾獎獲得者聯繫，由哈維爾、達賴喇嘛等人提名，劉曉波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劉曉波「我沒有敵人」與他寫給劉霞的愛情詩一樣，並不是為制訂中國民主革命的「綱領」，而是為成就他自己創造「最偉大的生命之舞」而寫的。2012年12月，當一百三十四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呼籲中國政府「立即釋放劉曉波及其妻子劉霞」，今年六月，全球一百五十四位不同領域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對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發出公開信，要求遵循人道主義原則允許劉曉波和他病弱的妻子劉霞到美國治療。習近平竟然置若罔聞。不是別人，正是中國共產黨背離人類文明的康莊大道而凸顯了充滿人性弱點的劉曉波追求愛情和「大愛」的偉大。

馮友蘭說，人生有四個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賢人」是道德境界的標準，「賢」就是「道德完美」。人在天地境界中生活，則是追求「成聖」。「聖人所做的事無非就是尋常人所做的事，但是他對所做的事有高度理解。」劉曉波不比印度的特蕾莎修女，還沒有「成聖」。劉曉波是一位尋常人，是為追求愛情和「大愛」、為〈零八憲章〉獻出生命的「大寫的人」。共產黨要把中華民族這樣的一個宣佈「我沒有敵人」、崇尚愛的、帶有浪漫主義色彩的詩人，關進監獄並置於死地，這為苦難的中華民族的悲哀之上添加了新的悲哀。正如劉曉波的摯友陳軍所說：「因為劉曉波，我們時代在對良知的守衛上才沒有崩塌。劉曉波對苦難的見證，黑暗中的堅守，以自己的殉道將中華民族的苦難提高到了人類共同記憶的高度，同時也為我們幾代人的共同追求及理想注入了一種更為高尚的精神品質和美。」

寫於 2017-7-27, Washington DC, 本文刊於香港《前哨》雜誌 2017-9-1, 現在發表有個別地方補充改動

**嚴家祺**——旅美中國流亡學者、作家，六四屠殺前任中國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

# 走康有為的路 流譚嗣同的血

王丹



劉曉波去世的消息傳出之後，我迅速在臉書上報告了這個消息，大批的網友留言表示哀悼。其中，有一位網友的留言我想在這裏跟大家分享，他說，劉曉波是「走康有為的路，流譚嗣同的血」。

之所以分享這句話，是因為我認為非常精闢和值得我們深思。說劉曉波「走康有為的路」，當然不是說劉曉波是保皇黨，主張君主立憲，而是說，劉曉波的政治主張和他的基本立場，其實是非常溫和的，正如同當年的康有為一樣。劉曉波從來沒有主張革命，他甚至主張「我沒有敵人」。但是結果，他的結局卻如同當年的譚嗣同一樣的慘烈：為了改革和進步，最終被當局迫害致死。歷史，有的時候真的會重演。

但是，劉曉波之死也告訴了我們一個其實很清晰，但是大家都不願承認的事實，那就是：對於中共來說，即使最溫和的主張，只要是以憲政民主為基礎的，都是不可接受的。不管這樣的主張多麼溫和，不管提出主張的人如何地表達善意，對於中共來說，都是「國家的敵人」，都是必欲置之於死地而後快的。從體制內的前總書記趙紫陽，到體制外的異議人士劉曉波，從來都是如此，毫無例外。

這說明了什麼呢？這說明了，所有那些寄希望於中共會主動引領政治改革的人，所有那些認為只要經濟發展到了一定階段中共就會走向民主的判斷，所有那些對習近平或許會開明專制的期待，都是完全錯誤的，極端幼稚的，甚至可以說是無知的。劉曉波之死，再次證明了這一點。

這一點非常重要，原因在於：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未來的轉型過程是否平順對全世界，對周邊國家，都牽連甚大。作為執政黨的中共，如果願意接納溫和反對派的主張，未來的轉型就有可能是平順的和平轉型；而中共如果連劉曉波這樣溫和的反對派都不能包容，都要迫害到死，那唯一的可能就是斷絕了溫和派之路，在社會上積累仇恨。斷絕可能的改良之路，中國就只有國家和社會之間的對抗，就只有流血的革命。這樣的前景固然不是我輩願意看到的，但是一旦發生，中國內部必將陷入動盪，而內部的動盪必然引發針對外部的效應，直接波及到周圍國家乃至全世界。這，才是劉曉波之死，帶給我們更深層次的思考和擔憂。

劉曉波的慘烈結局，固然是中共毫無人性的迫害所致，但是正如紐約大學法律系教授孔傑榮所指出的，西方國家對於中國的人權問題越來越淡漠，幾乎到了放棄的地步，這樣的縱容和緩靖政策，也難辭其咎。劉曉波之死，必將在國際社會激發起巨大波瀾，要求檢討對華人權政策的呼聲也將取得更大的話語權。

面對一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慘死，再親中的政黨和政客恐怕也只有瞠目結舌，重新思考。換句話說，劉曉波的去世，很可能成為中國崛起的一個轉折點：一向以經濟高速發展的形像在全世界收買人心的中共，未來的很長一段時間，都會背負劉曉波之死的包袱，形像必將大受損傷，其氣焰也會受到重挫。這當然是我們所樂見的事情，但是為此付出的代價是劉曉波的生命，確也是不可承受之重和時代的悲劇。

劉曉波用他的生命，用他最後的一口氣，告訴我們的這個事實——中共，已經成為新納粹集團——希望能夠令全世界深思。

原載 2017 年 7 月 15 日《蘋果日報》

**王丹**——旅美中國流亡學者、作家，語言學博士，《北京之春》社長，華人民主書院主席，獨立中文筆會會員；1989 年學運領袖之一，六四屠殺後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和「陰謀顛覆政府罪」兩次共判十五年徒刑，實際受刑約七年。

# 走上祭壇的劉曉波

## 一平



### 一、為了中國回歸文明

#### 1

那日亦武突然來信，說曉波在獄中病重，肝癌晚期。甚驚，怎麼會呢？曉波生命力很是旺盛，一向元氣十足。我想著他高談的樣子，難以置信。原以為，過幾年他就刑滿釋放了，許多的事情還等著他。

中國需要一位領袖，能凝聚民心，帶領國人重建國家。當初，諾貝爾和平獎授予他，意義也正在此。雖然，中國的希望渺茫，但這畢竟也是個希望。不承想，這微小的希望已成了泡影。

情況越來越不好，新聞發佈了他和劉霞的照片。他瘦弱得很，但眼神和嘴角仍然一派倔強。他清楚自己已經到了最後，但沒有屈服。

曉波要求到國外治療，以曉波的明智，他不會對治療抱有期望，而只是想以最後的生命報答淒苦的妻子，救她離開中國。但是，他未能如願。我想他臨終最痛心的事是許多年來劉霞為他無辜遭難。苦命的劉霞，曉波是她生命的最後期冀，沒了曉波，她還能在中國支撐多久？

曉波最終走了，離消息公佈統共沒多少天。難以置信的是，當局沒讓曉波留下骨灰，而以劉霞的名義，將之撒入大海。我感到出奇的憤怒。太卑鄙了，他們之邪惡永遠超乎人們的想像。誰能想到呢？待一個死者，他們連片粒骨灰也不讓留下。而我們的民族自古敬畏死亡。

他們怕，怕曉波的一片骸骨，恐懼人們對他的紀念，恐懼曉波魂靈的召喚。可是他們還有多少時日呢？他們將文明踐踏得不留一絲遺跡。

悼念、緬懷曉波的消息、文章紛紛揚揚，感謝人們！而我感到一片渺茫，欲言而無言。許多天，那份無奈與哀傷飄然恍惚，那是中國又一抹薄薄希望的破滅。

#### 2

曉波過世後，有關「我沒有敵人」的爭論再起。那些指責或是誤解，或是中國式的簡化政治。在法庭上，面對敵對政權的非法審判，曉波的〈最後陳述〉需要將政治的抗爭提升到文明的終極價值。

2009年12月23日 曉波在一審法庭上宣讀了〈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在此篇陳述中，他就「我沒有敵人」有清晰的闡述。他說「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顯然，他清楚該政權將他視為敵人，但是他願意以愛化解仇恨，不以敵人為敵。曉波還講了，他為什麼不以敵人為敵，「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

非仇恨、非敵意是曉波一向的政治理念與精神信念。「八九」運動中，他5月7日發表的〈我們的要求〉中即表述「中國的民主，必須以消除『敵人意識』為前提」，「一切為爭取民主而奮鬥的人士，莫讓仇恨毒害了你的智慧」。「仇恨最容易導致暴力，因此仇恨是民主化的障礙，是獨裁政治的最佳土壤。」

曉波的非仇恨非敵意非暴力的信念，根於數十年來「鬥爭」給中國帶來的慘重災難。為了中國的未來，為了中國能夠成為一個自由、人權、法治的國家，中國民族需要擠掉體內的「狼奶」——仇恨與敵意。一個民族的精神情態決定其國家形態，唯有恢復民族光明、健康之精神，方可有光明、健康之國家。

曉波對中國之國家、社會、國人有深刻的洞察，事情不在有無敵人，而是數十年以來，中國民族積蓄下太多的仇恨與敵意，以此心態無法將中國建設為自由、民主、保障人權的國家。為此，他宣導民間積極抗爭，但堅持非暴力、非仇恨、非敵意。中國民族需要在抗爭中，在追求自由、民主的過程中，同時建設自身，以復原民族健康之精神。

作為異議領袖，曉波有深遠之考慮。該政權已進入末期，結束是早晚的事。然而更嚴峻的事是，中國如何建設？六十多年的極權統治，中國文明一片廢墟，破壞得太久太徹底了，我們的民族被仇恨、敵意和「殘酷鬥爭」深深毒化。這個被毀壞得如此慘烈的民族，有可能建設成自由、寬容、人性的國家嗎？這是曉波更深的憂慮和思考。因而，他提出要擠出我們肌體中的「狼奶」，以愛化恨。

網路上有言諷刺曉波，說「無敵論的劉曉波，最終卻被他的敵人所殺死」。錯了，文明從來都是用生命和血來祭奠的。我們這樣一個經過數十年殘酷極權統治的國家及民族，要回歸文明，消除內心的仇恨與敵意，回歸仁愛之精神，異常困難。殘暴之統治，自然會留下彌天的仇恨和敵意，這不怨國民，是殘酷統治所至。但是，「恨」與「敵」對建設文明之中國乃是負資產，一個充滿仇恨和敵意的民族，不可能建立自由、寬容、仁愛的國家。因此，中國要走出仇恨與敵意，樹立仁愛之精神，同樣需要生命的犧牲與祭奠。曉波的犧牲，除了是為中國的民主、自由之，也是為了讓我們的國家、民族最終走出仇恨、敵意，樹立仁愛精神。他的擔當、犧牲，除了他奉獻的生命，也包括人們對他的誤解，譴責和羞辱。

實而言之，中國民間反對力量很是微弱，較龐大的極權統治勢力不成比例。無論怎樣做，其都沒有直接推翻該政權的可能。中共將完結於自身的崩潰。郭文貴爆料，就對中共政權的直接打擊，遠大於國內外的反對派。如果是其他國家，僅海航案件就足以使全國民眾上街。但於中國，大多民眾只是看客。此即中國現實。既然如此，中國反對派的意義何在？

於中國，由於「反對」稀缺，因而彌加珍貴。其意義主要是理念和道義上的，而在現時與現實的政治層面，其作用是很小的。其意義：在理念上，結束中國極權體制，在中國建立憲政民主體制；道義上，確認中共獨裁腐敗統治的非道義性，確立普世精神及價值。此二者均在使中國由現代野蠻回歸文明。而文明的終極精神乃是天下仁愛，任何文明體系於此都是一致的。自 1949 年，中國在中共極權統治下，其文明遭至全面徹底的摧毀，因此中國的反對運動之意義，不僅是政治層面的，更在回歸文明，確立文明的基本原則、價值和精神。由此，我們說中國的反對運動的理念及道義意義，大於其實際的政治作用。

再強調，文明之原則、價值與精神自確立，乃需要以生命和鮮血為代價，也就是說文明之建立是以生命來祭奠的。「八九」運動，由政治上看是失敗的，但是「六四」的犧牲卻是中國未來之獻祭。如果中國有未來，必以「六四」為始，它的血奠定了中國未來之文明。曉波之死，是中國歸屬文明的又一犧牲。中共極權的終結是註定的，而中國更困難的是文明的重建。一個國家需確立正義，但是卻不能宣導恨與敵意；正義之實行乃是法治，而高於正義的乃是文明的終極：天下之仁愛。異議領袖需要高瞻遠矚，由文明的終極引導反對運動。「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所表達的是超乎政治層面的宗教情懷，是天下仁愛之心。

## 二、由「唯我」走向榮耀

### 1

曉波是文革中成長起來的，帶有那一代人鮮明的烙印。一方面，毛意識已破產，他們對之棄如弊履；另一方面，他們卻又未曾有過完整的教育，中國傳統教育是空白；於西方文明也僅是讀翻譯書；加之文革中暴戾風氣，那一代人滿「野蠻」的。

青年曉波的中心詞是：自由、個性。個人即中心。青年曉波的「個人」主要是叛逆，而有關「個人」的文明秩序尚未建立起來，因此有野蠻性。但他的叛逆針對極權統治，他的指向是「自由」、個人權利；因此該叛逆有文明意義及指向。

方勵之先生記述曉波，有個細節：「1988 年夏，CCQ 和劉曉波二位年輕人闖進我和李在北大的家。C 和劉皆治文學，同李和我的物理專業不相交。C 和劉皆東北人士，也非李或我的同鄉。共同話題不多。幸好，我的『哲學是物理學的工具』一書，當時剛剛出版，劉拿起一本就看，……只有 C 同我們聊。……臨走，劉撻了一句：哦，哲學最多只配當你們的工具，有用就拿來，用完就扔掉。我可要在我的課上講（批判？）。話畢，拿起一本『工具』，轉身就走，至今未還。」這確是曉波當年的風格。

八十年代，曉波作為一匹黑馬，闖入文壇。他生命力旺盛，野心勃勃，鋒芒畢露。其成名作〈危機！新時期文學面臨危機〉（新時期十年文學討論會發言），劍鋒直指當時中國文壇。那個時期的曉波可謂狂人，其言驚世駭俗：「中國文化的危機不僅是民族性的問題，我甚至感到是與人種不無關係。」「在和傳統文化對話的時候，就是得把這樣一些東西強調到極點：感性、非理性、本能、肉。肉有兩種含義，一是性，一是金錢。」（〈危機！新時期文學面臨危機〉）「對傳統文化我全面否定。我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早該後繼無人。」（〈感性 個人 我的選擇——與李澤厚對話〉）「中國的文學只有打倒屈原、杜甫才有出路。」（1986 年 12 月 12 日在清華大學的講演）

今天再讀這些文字，滿可悲的！叛逆、唯我、狂妄不羈是當時中國青年的流行風潮，類似長髮、喇叭口褲。他們的叛逆是對「共產」的反動，但卻與紅衛兵精神有內在的一致性：批判、鬥爭、唯我唯是，只是在「新時期」有了新的指向和語言。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文革廢墟中成長起來的一代的致命處——狂妄、蠻橫、自我中心、攻擊性。中國八十年的文學當然有局限，「一黨專政」下，思想解放僅僅是開了一道缺口。即使是曉波，當時也僅批文學，而不敢涉及「政治」。況且，當時的新文學畢竟是對「黨文化」的反動，向人文精神複歸，是廢墟上嫩弱的青草，且遭當局摧殘，需要保護和扶植，曉波當時對之發難，挺蠻橫的。

青年曉波有野蠻性，但其中有需要肯定的內涵：1、他是個人的，以個人挑戰中國數十年極權統治的集體化；2、立於真實生命，富有勇氣；3、渴求自由、追求探索真理；4、而最根本的是對中國極權體制的叛逆和抵抗。青年曉波的叛逆、挑戰，骨子裏是對抗中國極權統治，只是當時不能明說，於是「文化」便成了發洩口。我們看到，曉波最終站了出來，成了該體制的公開挑戰者和「敵人」。待他找準對象，也就不再提那些文化妄言。

青年曉波的「狂」有些戲劇化，那也是當時中國青年的「時代病」。長期的極權統治，一片文明廢墟，壓抑的青春生命趕上「改革」，一旦遇到縫隙便野蠻、扭曲、瘋狂地生長。道理很簡單，為了一鳴驚人，就必需蠻橫、極端，挑戰權威，聳人聽聞。因此，我們說，狂人曉波是他自己和社會潮流共同製造出來的——文革廢墟上自我戲劇化。他記述「我能意識到自己的種種弱點，意識到社會輿論的放大乃至虛假，意識到我沉浸到這種虛假角色的可悲。然而在內心的深處，在自己的具體行為中，我卻相信這種角色的魅力，只要已走上講壇，一面對人羣，面對閃光燈、攝影機和記者，我就無法控制自己，全力扮演這種虛幻的社會角色。向那些掌聲和歡呼獻媚。」（《末日倖存者的獨白》，後簡稱《獨白》）如果說，曉波的生命本質是悲劇的，那麼青年曉波上演的卻是喜劇。真是不幸！如果不是「新中國」，不是「文革」，青年曉波大致不會扮演這個角色，他本該是哈姆雷特。

本質上，曉波是很真誠、嚴肅的：現實、理智、堅韌、擔當，追求終極真理與價值。可以說，他的性格中有「大哥」、僧侶的成分。只是由於1949年後，中國恐怖荒蕪的文化背景，這些健康的生命元素不得生長，而轉為極端的叛逆及扭曲個性的膨脹。

熟悉曉波的人都清楚，「六四」之後曉波大變。是「六四」的血，喚起他的良知，他由一個搶風頭、唯我的狂人，成為一個承擔道義、擔當公共責任的異議領袖，殉難者，「為了他人的自由，而犧牲自己的自由」。

## 2

1988年，曉波受邀訪問挪威奧斯陸大學，之後到美國訪問、講學。1989年4月15日始，中國爆發「八九」學潮。隨即曉波發表公開信，支持北京學生。4月26日，曉波毅然中斷在哥倫比亞大學的訪問，由美國返回北京，參加學生運動。當時在美國，眾多中國作家、學者、留學生對北京爆發學運興奮異常，慷慨激昂，但毅然回國參加運動的，僅曉波一人。

危難關鍵之時刻，方見人的真性情。曉波毅然「棄」美回國，奔赴「前線」，顯

現他的真誠、滿腔熱血、身體力行，敢作敢為。這是其生命的光彩一章。當然，曉波回國，也有「搶風頭」的因素，要在這個「偉大」的歷史機遇中，留下他的名字。行前他對朋友說「我們此生不都是在為這一時刻做準備嗎？」

有人當面質問曉波「你回國是不是投機？」實而言之，此問挺無理，怎麼可以壞意揣測人家的義舉？即使曉波是圖個人風頭，毅然回國參加運動，也是壯舉，可敬可佩。那畢竟是生死之事，其搶歷史之機，欲青史留名，但冒生死之險，擔責盡力，無可厚非。

有關回國的內心考量，曉波在《獨白》中有詳盡的記述，包括他對危險性、返回美國的估算。曉波的考量也好，他人的評述也好，這些都在理性範疇。命運之擇，遠非是投機還是義舉所能說清。在曉波的一生中，這是一個關鍵的轉捩點，仿佛冥冥中，命運一定要將他推上祭壇。那一場鮮血的祭奠已備好，等他「自投羅網」。人類各文明的建立和延續，需要一批批終極道義的殉難者和持守者。道義永遠是以生命和血來滋養的。在一種文明體或族羣中，有很少的一些人，他們註定是要殉道的。

命運關鍵之刻，人的選擇實超乎理性——儘管給自己擺出種種道理，凡生死決斷，必出於生命深處不可抑制的內在呼喚。曉波說他回國參加「八九」運動，「既不是犯傻，也不是壯舉，而是我之為我的必然。」這個必然是什麼呢？曉波毅然回國可謂是其一生的象徵：面對死亡，衝向悲劇的中心，實現生命的神聖意義。這是一個殉道者的生命姿勢及內心情結。

有關生命，曉波在決心絕食的前夜，有反復的思考：「生活和人生就是悲劇，任何人都無法擺脫，生命的意義……是在正視無法回避的悲劇情境中，投身於其中，以不可為而為之的選擇去完成輝煌的一生，哪怕短暫，哪怕瞬間，也要投入。」在決定絕食時，他記下「看看我究竟能承受多大的苦難，我的生命能否在關鍵的時刻超越生命的極限——死亡。每次激動，每次痛苦，每次身處逆境，都會為一個人提供超越死亡的機會。抓住了這個機會，就等於超越了死亡——不是死毀滅了生命，二是生命創造了死亡，創造死亡就是創造一種神聖的價值。……（這）是個人主義的登峰造極，……是超越性的、聖潔化的，接近絕對價值的個人主義。」「死亡提供了一種超凡的動力，在死亡中能夠完成一種驚天動地的創造。」（《獨白》）

「個人」最簡單的形態就是唯己唯利，但這是生命的低級形態。而一個嚴肅的個人主義者，有意義的要求：人存在的意義是什麼？如果沒有信仰，又分離於他人與社會，那麼在茫茫的時空中，人是沒有意義的。這就陷於了虛無，要不要活下去。這是個人主義的根本困境。如果生命不甘抹去自身，即要為自己創造出意義；生命意志越強，其對意義的要求也就越高越強烈。

青年曉波的主要思想來於尼采。尼采將個體生命的張揚推到極端。既然上帝死了，「我」即要取代這個位置，創造自己，超越世俗、超越道德、超越人，成為超人。但這僅是精神上的妄想，做不到的。青年曉波受尼采的鼓勵，狂傲不羈，驚世駭俗，且而取得了成功，成為突起的「新星」。但這是世俗的成功，卻構不成哲學上所表述的人的意義。不是做超人，而是要實現人的終極意義——生命的神聖價值。由此，曉波告別了尼采。

曉波反復提到「生命的神聖價值」，這是他生命的核心，終極價值。這也就是為

什麼，那麼多慷慨激昂的知識人，唯獨他毅然回國。「八九」學運是一場偉大的悲劇，感動了世界，代表了人類的自由、正義、勇氣、理想。他要投身其中，提升創造自身的生命，以接近那個神聖的價值。即使是死亡，也是生命的輝煌創造和實現。

作為一個個人主義者，曉波將個體生命提升到神聖的境界，或者說他賦予個體生命神聖之價值，並以此要求自己。注意，這裏曉波關注的是「我」——我之個人的意義及價值。但是，什麼是「神聖的價值呢」？它的內容是什麼？你又怎樣抵達到那裏？難道這一場偉大的運動就是為了成就你個人的神聖價值嗎？如果是這樣，這還稱得上神聖簡直嗎？如果僅僅是這樣，那麼該價值就不僅算不得神聖，甚至是危險的，為了成就自己，你可以將這場偉大的運動及無數的生命作為賭註。於是，曉波陷於困惑，他自問：如果殉難僅僅是為了成就自己，「那麼民主呢？大眾呢？民族呢？如果離開了這些讓人肅然起敬的辭匯，殉難又有什麼意義？」（《獨白》）

在此困惑中，曉波還有一段記述「我忽然感到世界上最美的傑作是基督被釘上十字架上的形象。人類的苦難由他一肩擔起，他代表人類受到上帝的懲罰。但他的受難不是屈辱，而是榮耀，不是失敗，而是成功。從根本上說，人與人之間沒有強壯與瘦弱、聰明與愚蠢、文明與野蠻、偉大與渺小、高貴與低賤……之分。……重要的僅僅在於面對殉難的十字架，是否有勇氣走上去。毫無懼色地背起十字架者即聖人。退怯者即庸人。絕食也許會是一次殉難，而且是千載難逢的殉難時機，我不下地獄誰下！我不做殉難者誰做！」

當然，這段記述還是關於他個人的：其個人的生命意義與價值。但是在他的意識中，基督形象的出現，喻示了「神聖價值」。如果僅僅是為成就自己，走不到那個神聖境界。神聖價值必需是承負人類的苦難，替人類接受上帝的懲罰。也就是「神聖」意味著。他必須放棄自己，而為眾人受難。雖然，此時曉波尚未走出「個人」，但基督的出現顯示了他生命中蘊含的殉道情結——殉難者的命運。生命相對於死亡，無論怎樣思辨，只要面對鮮血、死亡，曉波才最終完成了他的蛻變——由尼采到基督，捨棄個人，而為國家的自由受難。

今天重讀這段文字，可體會到，殉道是隱藏在曉波生命深處的一個隱秘情結，這是他生命的核心，是他迎向死亡，走上殉難之途的力量源泉。是這個「秘密」在冥冥黑暗中引導他推動著他，讓他把自己擺上祭壇。這個「秘密」自他誕生，便在他的生命中。曉波的一生曲折跌宕，但最終履行了這個「秘密」，實現了他的生命祈望：歸屬生命的神聖意義與價值。不是他創造了神聖的意義與價值，而是將他的血、生命奉獻給了人類神聖的意義與價值，他的生命最終匯入了那裏，而屬於了那裏。是在這個意義上，他獲得了生命的神聖意義與價值。為此，他的死不是屈辱而是榮耀！

### 三、從「六四」血泊中升起神聖意義

#### 1

1989年4月27日，曉波由美國返回中國後，很快便參加到運動中。開始，他很理性，盡力勸阻學生不要絕食，返回校園。

5月7日，曉波在北師大校園張貼了他回國後的第一份意見書〈我們的要求——

校園內的自由論壇》。該意見書對學生運動提出了一些批評，包括：口號多於行動；不遵循民主程式；不講究用法律推進民主；提出的目標過高；農民式的仇恨。他要求校方設立自由論壇、支持自治學生會、與學生對話等等。總之，他對此次學運評價不是很高，而是期望從大學內逐步推進民主。

5月13日，曉波參加了閻明復召集的統戰部與學運領袖的座談會。會上曉波發表的意見溫和、理性，提出了雙方妥協的方案：政府要肯定此次學運愛國民主運動；承認學生自治會；與學生公開、坦誠對話；而學生則需要讓步、寬容，撤出廣場。該妥協的方案是恰當的，但中共作為極權統治者，沒有可能認錯——否定「四二六」社論，也不可能承認學生自治會。該政權傲慢慣了，反正有刀把子，人民就該順從。這是「八九」悲劇的結癥所在。

會後——次日凌晨，曉波在廣場首次演講。主旨是呼籲學生停止絕食，撤離廣場，回到校園推進民主；並批評學生沒有民主的襟懷，不讓政府官員講話。在演講中，他遭到學生不斷地喝倒彩、嘲笑、謾罵，「學賊」、「懦夫」、「被收買了」、「滾下去」……。這讓他很是沮喪，甚至想不再參加運動，「儘快離開這個倒楣的地方」，返回美國。以後，曉波在運動中變得激進，應該和此次受羞辱有關。

但是曉波很快就恢復了自信，因為「中國只有一個劉曉波，他不可重複」（《獨白》）當吾爾開希請曉波幫忙，勸說學生撤離廣場，曉波的沮喪一掃而光，又恢復了亢奮，立即就去了。

在廣場，他看到完全沒有可能讓學生停止絕食，離開廣場；進而他被絕食學生們的悲壯精神所感動。他記述「政府的冷漠激怒了我，學生們的獻身精神和悲慘處境感動了我。……我不能再旁觀了，應該和他們一起受難。」「廣場上悲壯的就義氣氛和獻身精神籠罩著我，我完全失去了理性的判斷力，下決心和絕食的學生們同生共死。」此後，他積極參與了支持廣場學生們的絕食、抗議活動。

## 2

6月2日，曉波發起「四君子絕食」。該絕食，一是抗議戒嚴和軍管；二是對知識份子的軟弱表示懺悔。其道義性無可置疑。但當時形勢危機，當局鎮壓在即。此時最重要的是說服、促使學生撤離廣場，避免流血、犧牲。由此，「四君子絕食」很不得當，等於鼓勵學生堅守廣場。此後，曉波一生不能為之原諒自己。事實是，即使沒有「四君子絕食」，學生也不會聽勸撤離廣場，當局也會如期進行血腥鎮壓。

曉波發起「四君子絕食」的因素是多重的。一是出於對當局的義憤；二是受廣場悲壯精神的感染，欲與學生共命運；三是出於政治考量：動員更大的社會能量，將運動推向新高潮，瓦解戒嚴；四，隱含的個人動機，渴望英雄的光環，成為運動的中心，青史留名。

其一是為正義；其二是被悲壯精神所感動；其三是對政治形勢的誤判。如果說此三者均情有可原，但是其四則甚有害。甚至可以說，這是「八九」學生領袖們普遍存在的心結，其推動運動不斷激進，錯失讓學生回到校園，避免流血的時機。因此對「六四」這場血難，學生領袖們也是有責任的。

在政治中，最要不得的是政治家對個人得失的計較，特別是在民眾抵抗運動中。因為，其扮演的角色是公眾人物，代表民眾、社會、國家，由民所授權。他必須放

下自己，承擔公眾領導者的角色，負民眾、社會、國家之責任。

「六四」血案，罪責當然在政府，但是學生領袖們——包括曉波亦難免其責，其中最有害的即領袖欲及英雄的光環。膨脹的個人與激情，使他們沉迷於羣眾的歡呼，而失去現實感，不計後果，忘卻對民眾的責任，而將運動不斷推向高潮。這是永久的教訓。在民眾運動中，以「公眾領袖」的身份，不顧後果，卻圖個人「英雄」之光環，即使悲壯，也是「犯罪」。

曉波在《獨白》中記述「當我面對著遠遠超出我的想像能力的公眾場面時，我就把一切都理解為我的魅力和勇氣所致。我暗自得意：這次絕食太對了。運動又有了新的熱點，我也有了新的角色。」「絕食使我們四人成為運動的中心了。我們以無所畏懼的行動贏得了學生們的認可和信任，……我們也成為運動的主角。」

他後來反省：我「急切介入運動的每個環節，想在運動中佔有突出的位置，貪婪地註視著狂熱的人羣，認為如此空前的運動怎麼能不留下劉曉波的痕跡。」（《末日倖存者的獨白》）

感謝曉波的坦誠與反省！這是民眾運動中最危險的情緒。而這卻是「八九」學運領袖們大多有的心態。曉波為之做了懺悔，真誠地說：六四「流血事件的責任也有我一份，我犯了罪。」膨脹的個人，推動「革命」比賽，「比賽」將運動推向極端。

「八九」運動過去近三十年了，除曉波外，至今沒有一位當事者做出過這樣真實、深入而真誠的自我剖析、反省和懺悔。曉波平常顯得不拘小節，放言無忌，甚至有粗話，但內心深處，他對生命有近乎嚴苛的道義要求。

「六四」後，面對血泊和千百罹難者，曉波有深深的負罪感。其後二十多年，他拒絕離開中國，和「天安門母親」站在一起，守護「六四」亡靈，始終不渝地為之呼喚正義。作為異議領袖，他立足民間，堅定地宣導自由民主精神，批判中共獨裁統治，推動中國進步。他之如此，原因之一就是，他要對得起死難者的鮮血和亡靈，他要為自己的「罪責」贖罪。因此，他一直否認自己是領袖、英雄；而將自己當作罪人。

### 3

人性從來都是多面的，彼此矛盾衝突。曉波同樣如此，並不完美；他是血肉的、人性的，在真實生活中左右衝突。

他記述：一個我是理智的，另一個我是情緒化的；一個我是現實的，另一個我則煽情演講；一個我對學運弊端不滿，欲退出，另一個我卻離不開學運領導層和人羣；一個我意識到運動將失敗，另一個我卻要將運動推向新高潮；一個我鄙視投機運動，另一個我卻在投機中；一個我為自己的安全顧慮重重，另一個我卻沉浸在英勇獻身的悲壯中；一個我感到自己無能，只想找一塊淨土，另一個我則陶醉於虛幻的社會角色中……（《獨白》）

一點也不奇怪，人就是這樣，「To be, or not to be」是人性永恆的主題，但最終人還是要選擇，如何選擇？尤其是在關鍵時刻。在「八九運動中」，曉波最出色的表現不是在廣場慷慨演講，發起「四君子絕食」，而是在6月3日夜，當軍隊開進廣場之後。

鎮壓已經開始，廣場轉眼即可能成為屠場，學生陷入恐慌和盲目。此時，曉波卻顯出他「大哥」的理智、勇氣和擔當。作為廣場上的核心人物，「四君子」擔起責任，商量如何應對。最終，他們決定撤出廣場，由周舵、侯德健前去與軍方談判；曉波、高新勸說學生撤離。曉波記述「望著他倆一階階走下紀念碑的背影，我的心一陣陣揪痛，我不知道他倆這一去能否活著或完整地回來，戒嚴部隊的槍口是無情的。如果他倆遭到不幸，我就會背一輩子負疚的十字架……」

在「懦夫」「學賊」的叫罵聲中，曉波拎著擴音機，聲淚俱下地勸說學生撤離，甚至為此挨了一鐵棍。有一情節，很是揪心，兩個市民持一挺機槍，誓言拼命，只要他們扣動槍機，無數市民、學生就將倒於血泊中。曉波趕去，擋在槍前，說「你們或者將我打死，或者把槍放下。」事情急迫，眾生命懸一線，最終曉波失聲痛哭，給他們跪下，懇求他們為了數千年輕的生命，放下槍。於是三人抱頭痛哭。曉波如此自尊之人，忍如此之辱，乃是為數千生命。在以後的二十多年中，忍辱是曉波的一個重要品質，非此他無以承負道義之重任。

在撤離廣場前，即有學生勸「四君子」先撤，因為他們是當局欲鎮壓的「要犯」，但曉波堅持要同學生在一起，共命運。在整個撤離中，曉波是核心人物，堅持到最後，他走前，還去查看帳篷有無落下的人，直到冰冷的槍口頂著他的後腰，他才離開。廣場上的學生得以安全撤出，曉波起了重要作用。

離開廣場後，曉波躲進澳大利亞外交官周思家。次日，他起草了「四君子」給世界的〈呼籲書〉：「向全世界一切維護人權和民主的政府呼籲，向全球一切主持正義、維護和平、反對暴力的良知呼籲，給中國的法西斯政府以經濟上、政治上、外交上、道義上的制裁。」

從離開廣場至被捕，曉波完全有機會躲進澳大利亞大使館，或者逃離中國，但是他拒絕了，他說「在我沒有見到高新和周舵之前，我絕不離開北京。」「如果我進使館尋求政治避難或逃亡國外，而周舵和高新被捕，那我將在國外或使館中背一輩子道德的十字架。」但同時，他卻力勸德健去香港。「德健開始時不同意，但到最後，還是我的話起了作用：『德健，我們四個人必須出去一個人，把6月4日的真相告訴全世界。這是我們的責任。而你出去的條件最充分。如果你也留在北京，也許人們一輩子也不會知道清場的事實。』」告別時，周思的妻子琳達哭著和曉波吻別，說「小波，和我們一起走吧。」，他「固執地搖搖頭」。（《獨白》）

當晚，曉波坐周思的車離開外交公寓。「開車後，周思問我：『小波，你想進使館嗎？』我說：『不想。』周思問：『為什麼？』我說：『周舵和高新怎麼辦？』……車到大使館門前，周思又一次問我：『小波，你想進去嗎？這是最後的機會。』我說：『不，謝謝。』我拿起自己的東西下了車。」（《獨白》）兩個小時後，他即被捕。

在這兩天，曉波確實是個英雄；而也就是在這驚心動魄、生死存亡之際，他卻偏偏放下了自己，既沒想到悲壯、英雄，也沒想到生命的神聖價值。風頭、時尚、名聲渺無蹤影，他置個人生死於度外；焦慮的只是數千學生的生命，必需要讓他們安全地撤出。他的所為不是出於思考，而是遵從生命的直接指令。鮮血、死亡，驅散了虛假，曉波歸回自己最真實的生命，那就是他：必需擔當，必需救助學生、必需守義，必需負重，必需有勇氣、有尊嚴。

什麼是生命的神聖意義？基督走上十字架即是象徵：為公義、為眾生而受難。這是所有文明的基點，也是文明的最高價值，「人」由此而建立。中國已淪為一片廢墟，我們從何而歸復文明？我們從哪里而重新為「人」？歸根結蒂，我們必需回到那個基點，從那裏開始，從那裏奠基，文明必需有其神聖的意義。

「六四」的血奠定了中國未來之文明，那些鮮血、年青的生命是為國人的自由與權利而奉獻的犧牲。這是「六四」的神聖意義。曉波雖未死，但是他的生命匯入了其中。確如曉波所說：人沒有強壯與瘦弱、聰明與愚蠢、文明與野蠻、偉大與渺小、高貴與低賤之分，即使是罪人，重要是否有勇氣走上去。毫無懼色。

如果說，青年曉波是個扭曲的狂人，那麼他則在「六四」中確立了生命的終極意義與價值。「六四」喚醒了他，「六四」的血改變了他，他放棄了那個戲劇化的誇張的「我」，而復原了那個崇尚神聖意義的「本我」，他伏下身子，卻恢復了真實之生命，他從「六四」的血泊中，走上中國自由的祭壇。

#### 四、由反叛走向殉道

##### 1

「八九」運動中，曉波及學生領袖們都有一個情結，即渴求英雄的光環：於社會萬眾矚目；於歷史英名永在。曉波在《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中有深入的表述，說他關在秦城監獄，在電視中看到當局將他作為「頭號黑手」，感到一陣欣喜，因為這意味他是頭號英雄。他釋放後，得知王軍濤、陳子明遭重判，心裏酸溜溜的，居然對他們感到嫉妒和羨慕，因為他們成了「殉難的大英雄」，而他自己則因「悔罪」半途而廢。他記述自己在廣場上的「輝煌」：「我從未見過、體驗過如此巨大的公眾場面，面對人羣的狂熱歡呼，我竟失去了最拿手的演講技能，...這不是由於怯場，而是因為激動——一下子成為公眾矚目的中心而飄飄然。……當我面對著遠遠超出我的想像能力的公眾場面時，我就把一切都理解為我的魅力和勇氣所致。」其後他的一位朋友對他說：「曉波，有沒有當年毛老頭兒接見紅衛兵的快感？老於世道的毛老頭兒都經不住誘惑，你們初嘗雲雨，可以理解。」

這種萬眾矚目的英雄情結，乃是權威崇拜，屬羣體凝聚儀式：羣體崇拜領袖——權威個體；領袖凝聚羣體。在政治上，其是集權模式。歷史上，凡獨裁者都英雄的情結；非此，集權模式即無以確立。帝王崇拜、英雄崇拜、領袖崇拜，都是凝聚羣體的集權模式。

問題的是，曉波及學生領袖們卻都標榜自己崇尚自由主義，是個人主義者；自由、個性是八十年代的青年的核心詞語。尤其是曉波，幾乎將之推到了極致。但是，自由之個人、民主之志士怎麼會跌入羣體膜拜與集權之魔圈呢？

其實，這種現象並非偶然，「五四」青年走過同樣的歷程。「五四」新青年以個性自由、個性解放為旗幟，叛逆家庭、社會、傳統，但是大批叛逆出來的青年後來卻投奔了延安，比如丁玲。不僅是中國，上世紀前半葉，西方大批自由知識份子，也都傾向共產主義的蘇聯。自由、個人似乎與集權僅僅一步之隔。

個人主義是西方近代文明特有的現象。在前，人類各文明均不強調個人，而是重視羣體。古希臘，個人從屬於城邦；古羅馬，個人的最高價值是榮譽，而榮譽是

國家價值符號；中世紀基督教，個人從屬於教會；而貴族需要羣體供養，對家族、領地及農奴負有保護責任，並且他要效忠國王。由於近代歐洲工商業發展，城市規模擴大，平民階級興起，個人主義逐步發展起來。在文化上，文藝復興、啟蒙運動是標識。

個人主義強調個人自由、個人權利、個人利益；但這些均屬社會及政治之範疇，是個人向外的要求。但是，個人之存在，其更重要的問題是：個人存在之意義與價值由何而來？其個體道德規範、秩序如何建立？如果這兩大命題不能確立，那麼其個人的文明意義與秩序就建立不起來，也就沒有「人」的意義，談不上是「個人主義者」，只能算是唯己者。

文明最終是「人」的文明，即每個人的文明化；而每個人之文明素質將決定社會、國家文明之形態。在人類文明史中，各文明首先強調的都是確立人——每個人的道德，《聖經》要求的是每個人；佛教同樣；儒家「克己復禮」也是對個人的要求。「個人主義」不僅意味個人之自由、權利、利益；更在於個人的存在意義與完整的個人道德。

康德說：「有兩樣東西，越是經常而持久地對它們進行反覆思考，它們就越是使心靈充滿常新而日益增長的驚讚和敬畏：我頭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這是西方人文精神有關個人的理想境界。泰坦尼克海難中，那些「紳士」們將生讓給婦女和兒童，而自己坦然選擇死亡，他們體現了這種精神。頭頂的星空等同於上帝，是絕對的世界及真理，它是你的創造者和主使，確定你的來源、位置與意義。而心中的道德律，確立你的生存的價值、規範與秩序。其後，所謂自由、權利與利益方有「人」的意義。如果這二者不能確立，那麼就不能確立個體之「人」的存在，你的所謂「個人」和自由就是生物性的——非文明的。

個人是美國的中心價值，但美國的傳統個人主義是以新教精神倫理為依托的，其注重個人自由、權利、利益，但是其存在的意義以及道德規範是新教精神倫理，二者相容一體。由而，美國有如此偉大的創造力，同時又有良好而有效的秩序。

六十年代，美國爆發青年反文化運動，主要對象即新教精神倫理；但叛逆的青年同時上演了嬉皮運動。這是很重要的文明現象，說明當美國的個人主義失去傳統新教精神倫理的依托，即個人即喪失其人生意義與秩序，其生命由而迷失，陷入混亂，受自然感官支使：虛無、流浪、寄生、性混亂、吸毒等等。嬉皮運動將個人自由推到極致，但同時也失去了個人存在的意義、價值與秩序；於是虛無、孤零、無著落的個人便不自覺地傾向革命及龐大的強力集團：熱衷於共產主義、中國文革「紅寶書」等等，如果，當時美國有延安，他們也會去投奔。

## 2

青年曉波的反叛、狂妄不羈、標新立異，作為個體生命現象，這和五四新青年、美國嬉皮士類似。只是曉波反叛的是極權統治及其文化。但作為反叛出來的個體生命，三者亦有共同處，即他們無法確立個人存在的意義與道德秩序，由而陷入生命之混亂與迷失，充滿焦灼、不安及恐慌。由於人之生命微小而脆弱，於是他們即夢想成為偉大的英雄、超人；如果他們自身做不到，即崇拜領袖，投身集權羣體——

個體安全之依托；或者自我放棄，頹廢，自毀——流浪、吸毒、性混亂等等。

尼采說「上帝死了」。既然上帝死了，其為世人所建立的意義、倫理、秩序即塌毀，那麼遺落在廢墟上的孤零個人怎麼辦？尼采的答案是做「超人」，也就是既然上帝死了，那麼就讓我成為「神」，替代上帝，創造、超越，統治萬物，拯救人類。當然，這是妄想。但重要的是，叛逆、孤零、迷失、無著落的個人卻會自然地產生這種可怕的妄想。希特勒是個典範，馬克思、列寧、毛澤東也是。歷史上的那些可怕的狂人大多是由於自身的脆弱、孤零、恐懼、虛無而成就的。

2017年10月1日，美國拉斯維加斯發生慘烈槍擊案，五十九人遭射殺，凶手斯蒂文·帕達克也是個特立獨行的個人。即使當今科學界，也有高智狂人欲取代上帝，創造人類新品種。人類滿可怕的！上帝死後有了尼采，尼采之後是希特勒及德國民族的納粹化。共產革命、納粹，及中國的大躍進、文革等等都是由叛逆的個體狂人所創造的；或者說他們是傳統文明及信仰倒塌後的產物。這是人類現代文明的特有現象。

曉波下《獨白》中記述和吾爾開希首次見面，吾向他炫耀「沒有我就沒有『四·二七』的壯舉和成功」，「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領導學運，只能和他們講專制，樹立個人權威……」「我領導的學運所產生的影響，遠遠超過你的理論。你的成名是長期積累的結果，我的出名是一夜之間的事。……我想問你，美國對我這個人怎麼看？」

在《天安門》紀錄片中，柴玲說「學生們總在問下一步幹什麼？我們能達到什麼要求。我很悲哀，我沒有辦法告訴他們。其實我們期待的就是流血，就是要政府最後在無賴至極的時候用屠刀來對著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廣場血流成河的時候，全中國的人民才能真正地擦亮眼睛，他們才能真正團結起來。但是這種話怎麼跟同學們說？……就是說，我們就是要在這裏流血，用鮮血和生命喚起民眾，同學們會這樣做……。」「下一步作為我個人，我願意求生下去。廣場上的同學，我想只能是堅持到底，等待政府狗急跳牆的時候血洗。不過我相信一場大革命很快就會到來——要是它採取下策的話。即使不採取下策，保存一些火種和力量，在下次運動中我們一定會站出來……」

我們可以原諒這些年青人，但是作為人類社會現象，這是很恐怖，很值得警惕的。早期那些共產黨領袖們鬧革命時，也都是這種人格和精神，為了理想，為了個人榮光，不計無數人的犧牲。青年時期的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周恩來、波特布特……，何嘗不是滿懷理想，慷慨激昂？叛逆的個人、革命的個人，如果他們野心勃勃，而又失去人類自古以來的道德戒律，很容易便從美好的理想，走向恐怖與極權。

### 3

自人類文明誕生以來，從來都是族羣重要於個人；工商業發展、大規模城市出現，平民階級崛起，促使傳統族羣解體，個人成為社會的中心單位。在前，人類文明可算是簡單形態之文明，但現代工業及大都市的出現，人類文明進入複雜形態，個人重要於羣體。這是現代文明社會的核心問題；由此現代文明也就遠比傳統文明複雜、困難、脆弱，有更激烈的競爭、角逐，解放的個人，意味每一個體的欲望、利益、權利的膨脹，這也就使社會——民眾共生體的構成加倍困難。

現代文明的核心問題是如何確立個人的存在意義與道德規範。個人之自由、權利、利益，這是現代文明中的社會及政治問題；而個人存在的意義及道德乃是現代文明「人」本身的問題。因此，當我們講「個人主義」，首先面對的乃是個人的意義與道德。

傳統文明，可將部落、國家、家族的文明秩序強加於個人，這就是所謂「專制」。但是現代文明是個體重要於羣體，也就是說現代社會是基於個人的，由個人共同立約組建社會或國家，這也就是所謂民主。但是，這也就面臨現代文明的核心問題，個人如何建立自身的文明秩序。如果每個個體不能自覺地建立自身的文明秩序，即不能建立契約社會；社會就進入現代野蠻狀態，或暴亂，或極權強制。

歐洲由傳統文明轉入現代文明，經過上百年的動蕩及流血，絕非容易。歐洲成熟的個人主義——自覺的個人文明秩序，經過長久的時間才得以普及民眾，其有三個思想來源：基督教、貴族傳統、文藝復興後的人文精神。美國則很幸運，一是它沒有傳統封建制度的負擔，二是它帶來了新教精神倫理——新教信仰是個人化的，其直接兌現了建立個人文明秩序，三是美國給全體個人提供了足夠擴張的空間。

當我們提及「個人」時，通常是指個人的自由、利益、權利；但是在其後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就是該個體自覺的文明化，老話就是「私德」：其是一個建立了自身文明規範的個人。包括：1、作為「人」的存在意義與價值；2、自律的道德；3、由以上延伸出來的，個人與他人、與社會之契合的文明關係。

如果個人不能建立自身自覺的文明規範，那麼這個個人則是危險的，因為這意味著其受生命自然本能的趨勢：一、或野心、欲望與權力肆意膨脹，貪婪、掠奪、詐騙、占有、奴役他人，甚至欲充當上帝；二、或虛無，走向享樂、頹廢——自我放棄；三、或投向集權、轉向集體主義。個人是個生命體，其可以是魔鬼，也可以是聖徒，還可以甘當奴隸。關鍵是，你要求的是怎樣的個人。

自八十年代，中國產生了大批「可怕」的個人，他們什麼也不信，唯有私利：野心、貪婪、掠奪、詐騙。「個人」本應是分立於國家、權力、羣體，但是他們卻竭力鑽營，最充分地利用國家權力謀取私利。正是這批人構成了當今中國的貪腐權貴階級。

「八九」運動本是爭自由爭民主，但有的學生領袖，為爭風頭、權力，將運動逼向極端，鼓動流血，而其自己卻揣著護照簽證，一旦鎮壓就逃往歐美國家，用「六四」的血在全世界撈取名聲利益，而後又與中國政府合作，沆瀣一氣，甚至為安全部效勞。這樣的「個人」與「自由」不可悲可鄙嗎？

九十年代後，中國培養了大批的新知識精英，錢理羣教授批評他們是「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他們是「個人」，但只索求掠取，卻絕不承擔義務和責任。當今，中國各界腐敗精英，多是八十年代後得志「個人」，他們唯己至上，如魚得水，而且他們的手已伸遍世界。這是中國特色的「個人」與「自由」。

曉波當初說，「就得把這樣一些東西強調到極點：感性、非理性、本能、肉。肉有兩種含義，一是性，一是金錢。」這是反抗中的亢奮，但他不會想到，中國發達起來的「個人」會是這樣。當時他太年青了，沉溺於叛逆、反抗的激情中，而中國又是一片摧毀的廢墟。廢墟上，再好的生命，也只能扭曲、野蠻地生長。

人類文明無論就時間，還是就各文明體系，其基本原則是共同的，都是要維護族羣的共生與綿延，仁愛、公正、誠實、守信、自律、擔當、有敬畏，等等。傳統的根本意義乃在持守這些文明的基本信條，無論以多麼美好的理由，當這些美德被摧毀被拋棄，社會即退回到野蠻狀態：叢林原則、厚黑。

#### 4

反抗與個人是青年曉波的兩個核心詞語，其時他的思想、言論都是圍繞這兩個中心詞語的。他的話題無論怎樣大，說得怎樣極端，但中心都在此。當然，青年曉波叛逆、反抗的主要是極權統治及其制度與意識形態——雖然他未能明言。

但是這個叛逆出來的個體生命尚未建立起自身個人主義的文明秩序，他是混亂、迷失的，帶有「文革」遺傳的野蠻性——身體中的「狼奶」。劉路在《刺穿黑暗的朝霞——謹以此文獻給曉波老師無十三歲生日》中記述「那已經是文革末期，大多數有門路的知青都找關係回去了，只有他和幾個姥姥不痛舅舅不愛偷雞摸狗的知青留在生產隊。後來他左手提著一把菜刀，右手拿一塊手表去了支書家，支書看看寒光閃閃的菜刀和亮晶晶的手表，留下後者，摸出一張招工表給了他。」這不怪曉波，在當時這就是中國社會真實的生存法則，要活下去只能如此。中共極權統治的最終結果，是整個民族的流氓化。

1977年，劉曉波考入吉林大學中文系；1982年進入北師大讀碩士；1986年讀博士。而在此之前，他隨父母下鄉、插隊，幾乎沒怎麼上學。但這已是中國那一代人受到的最好的教育了。自1949年後，中國的道德倫理遭到全面摧毀。青年劉曉波之所言所為主要是尼采式的。那個時代，中國最有思想和志向的青年多受尼采影響。這不奇怪，既然上帝死了，「我」的最大化就是「超人」。

我們看一下曉波成長的背景；1、中國式的父權家庭，多兄弟；2、文革；3、流落民間：街頭、農村下鄉、工廠；4、大學校園，中國文學專業；5、自我教育：閱讀西方翻譯著作。綜合一下，他生命中的文化元素：包括中共革命；中國傳統家庭倫理；中國民間傳統；五四文化；西方人文思想。

曉波主張全盤西化，但他所接受的西方個人主義的思想是從書本上來的，並沒有實際生活經驗的依托。他的「全盤西化」的主要意義是反抗，以「西化」反抗現實。「全盤西化」：一是支持他的叛逆和反抗；二是為他提供了希望與理想。但作為個體生命，曉波並非是很「西化」的人。簡而論之，曉波身上有三種主要的文化來源：

1、「五四」反叛精神，以及「新中國」以來大批判精神，特別是「文革」。他的那種極端的批判性、攻擊性、唯我正確、狂妄、自我「高大」正是繼承了這兩種文化：叛逆、革命、批判、放大「我」。

2、中國民間倫理。「新中國」摧毀了中國傳統文化，但是中國民間仍然頑強地保持著傳統道德，比如在家庭、在熟人、朋友間。在實際生活中，曉波非不是「個人至上」的人，而是有情有義，能擔當，對朋友尤其「仗義」。中國許多自由知派識份子，活在意識形態中，不接「地氣」；而曉波血肉飽滿，洞悉人性，有深切的現實感與準確的判斷力。他是個可以當「大哥」的人。

3、西方人文思想。西方人文思想很複雜，曉波接受的主要是自由主義這一脈，

這是他的精神理想，甚至可以說是他的精神信仰。（此外，他也接受了某些尼采的思想。）於中國，自由主義有積極的意義，特別是面對當代極權統治。但是，其局限是：它是理想主義的，卻缺少實際的經驗依托，也就是說它在具體應用中是幼稚而偏頗的，往往不切實際。比如「八九」運動中學生領袖們的表現。

以上三點，其一是負面的，而其二、其三大體是正面的。如果說，其一是曉波的自我戲劇化，那麼曉波的生命主體則是在後兩處。對於曉波，這後兩處是很好的互補：現實與理想；思想與倫理；個人與社會。這構成後期劉曉波的人格——「六四」之後至逝世。

## 5

文明之大道在於人類之共生、持久綿延，而這就是「道義」。此是人類存在的大真理。人有道義之要求，但自然人性本身不是道義的，「道義」是文明的創造和建設，需要以生命來維護，來祭奠。必需有人站出來，獻出生命，作為犧牲，證實「道義」至高之價值。

「新中國」摧毀了中國文明——包括中國傳統文明，也包括近兩百年來國人對西方文明的孜孜學習、汲取。如果中國重歸文明，重建文明之國家、之民族，從何開始？以何為證？以何表示其決心、意志與信念？也就是，中國民族以何為祭奠，重歸文明？

我們希望「六四」沒有發生，但是既然它發生了，那麼它就是當代中國重新歸屬文明的血的祭奠。中國民族以這些生命、鮮血為犧牲，以證實：數十年來「新中國」政權的非法性、殘暴性；中國需要重歸天下大道——仁愛、道義、公正；中國需要結束一黨之國，建設為現代文明之國家：自由、憲政、民權。無論這個日子多麼遙遠，但是從「1989」已經開始，中國民族之大血祭已然奉獻於歷史。

正是在這場民族的血祭中，曉波回歸到文明的基點。面對死亡、鮮血，那些誇張、矯飾、虛榮、大英雄的虛幻便失去意義，那是即時生死之擇：背信、逃跑；還是持守、擔當？其來自生命深處的自我道德立法；對個人生命終極價值的定位。數千學生面對屠殺，作為「領袖」，他不能背信逃跑，而要有良心，持守誠信，擔當這份責任與犧牲，這是生命對生命的情感與呼，否則他沒「臉」活在世上。「臉」是漢語通俗口語，在這裏是他的人格價值與尊嚴。於是，我們看到曉波的選擇：與同仁共命運，與在場學生共命運，忘我而救眾生。也就是在這個意義上，曉波拋棄了虛張、招搖——那個自我戲劇化的個人，回到了文明之本——良心、道義與責任，體現出他終極的人生意義與價值。

人類文明的道義、原則、信約，最終都要落實到個人，即康德所說「我心中的道德律」。個人尊嚴的內涵是文明的終極價值：道義、誠信、責任、勇氣。危難之時，面對殺戮，為什麼有的「領袖」逃之夭夭，而曉波卻忘我救助學生，拒絕逃進大使館？為什麼「六四」後，大有人利用之，在海外撈名利；而曉波卻拒絕離開中國，與「天安門母親」一起看守「六四」的血泊，為之伸張正義？人之意義與價值不同、心中的道德立法不同。

「六四」改變了曉波，他從這裏回到文明的基點，確立了他的終極人生意義與價值。由此，他走上中國現代文明的祭壇。當然，其後他入獄、「認罪」、出獄、寫

《獨白》，其間仍有曲折反覆，但自從「六四」，他已然走上殉道之路。他誓言，「為了他人的自由，犧牲自己的自由」，持守、擔當，入獄，再入獄，直至逝世。

這是一個殉道者劉曉波。

## 五、「六四」之後的精神蛻變

### 1

1992年，曉波寫了《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人們對之有許多指責和批評。

作者在前言中即說「這只是我個人的記憶和心態」，「帶有我個人的性格、局限和偏見。」作為「八九」運動的參加者，由個人的角度，表達某些個人之見，即使是批評也是正常的。但這有一個前提，即需要大致正常的政治形態。但中國不是這樣，當時「六四」血難僅過去三年，當局對這場運動還在污名中，數百上千的罹難者冤魂未散，大批參與運動的人還關在監獄中，許多人被判重刑，有的甚至被當作暴徒槍決。當局鎮壓的恐怖陰影仍然籠罩社會，有關這場運動的詞語人們少敢提及。在此種狀態下，反對運動需要抵制當局的污名與恐怖威懾。

再，曉波已是「八九」運動的領導者之一，「六四」血難的見證者，已是公共政治人物。作為「八九」運動及「六四」血難的代表性人物，無論是從政治、歷史、社會，他對這場運動都負有責任。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他更應該從正面維護「八九」運動的聲譽，而不是任性地發表個人對它的意見——包括偏見。

公共政治人物是一種特定的社會角色，由民眾信任認可；負有對社會、公共事務和民眾的責任。當他們選擇充當這個角色，就要放棄個人，擔起這個角色，以該角色的身份說話、行事，即使在某些時候，其個人與所其扮演的角色有分歧和衝突，他也需放棄個人，服從角色的需要，因為這是他與民眾信任的契約，負有國家、社會之責任。公共人物即不可任性，需順從公共事務之需要。

以曉波的「政治」身份，在1992年這個時間點上——當局鎮壓的恐怖仍在籠罩中，他發表《獨白》這部書是不合適的。曉波聲言《獨白》「這只是我個人的記憶和心態」。但關鍵所在，曉波已經是公共政治人物，不能再「特立獨行」，任性發表個人「偏見」。既然你選擇了參與「八九」運動，選擇了在廣場演講、進入運動領導圈、代表學生與政府座談、發起「四君子絕食」、向全世界的「呼籲書」……；那麼你即置身於中國政治鬥爭中，成為公共政治人物，代表「八九」運動及民間「反對派」，抵抗中國極權統治；你的身後是民眾的信任及權力委托。《獨白》說明，作者在寫此著時，尚未完全走出「個人」情結。

該著帶有曉波以往的色彩，立於個人、情緒化、驚世駭俗。對於「八九」運動，該著主要是著眼批評，並且一些話說得很過分，

如「中國，除了謊言，你一無所有」，「中共的殘酷引起全球性義憤，但是更猙獰者在於『六四』提供了一個以謊言撈稻草，自我貼金的好時機」，等等。「八九」運動確實有很多欠缺，需要批評、反省，但是作為如此大規模的民眾反抗運動，還是很了不起，它是正義的，也是和平的，是中國人的驕傲。在這場運動中，確實有投機者，但這是極少數的，而上千萬普通的學生、市民完全是出於熱情與公義。擋坦克的王維林，天安門母親們、無辜罹難的學生、被槍決或判重刑的抗暴市民……，

感天地泣鬼神。

大規模的民眾運動，又是自發的，傳言流言都難免，即使是有人故意散佈謠言，絕大多數人也不可能知情。「八九」後，就中共的殘暴，大多數人「認罪」「認錯」，也算不得什麼，我們不能期待人們都錚錚鐵骨。運動中的缺失、流言、學生領袖的自大、小人的投機等等，不能說之比屠殺更猙獰。當我們將自己視為中心，就不會有公正，而會在聳人聽聞中放大自己。

## 2

世隔近二十多年，作者已逝，今天我們重讀這篇《自白》，可以平心、寬容地待之。

儘管《獨白》有偏頗偏執之處，但是我們換個角度，退出屆時中國之政治與社會，僅僅著眼於文本——一個運動參與者的個人獨白，那麼該著仍是一份十分難得歷史文獻，有珍貴的價值。

儘管《獨白》對「八九」運動的評價有所不當，但是該著對事件的記述大部分是平實的，十分真實。作者真實地記述了他參與「八九」運動的過程、經歷及見聞。從在紐約聲援學生，到毅然回國參加運動，到進入廣場，到絕食，到鎮壓，到逃入外交公寓，到被捕、認罪，被釋放。作者的記述既有真誠之心，又忠實於事實。

作為廣場核心人物之一，曉波提供了許多珍貴的歷史紀錄。如：當時在美國的流亡者對學運的反應；回國後，他去廣場演講，勸學生返回校園，遭到學生們的奚落、起哄；統戰部閻明復召集的座談會；廣場學生對政府官員及知識精英的態度；學生領袖們的分歧及權力鬥爭；5月27日，王軍濤召集的「聯席會議」，決議撤離學生廣場；「四君子」絕食的發起；「六四」之夜，廣場的情態；如何與軍方談判，組織學生撤離，等等。對於研究這段歷史，它們有重要的價值。

《獨白》記述了許多運動中許多具體的細節。比如，在統戰部座談會上，閻明復的善意、誠懇，以及對上層老人權力的無奈。吾爾開希的天真、直率，及他的自大、傲慢。北京市民聲援學生，「一位少婦吧錢塞在孩子的手裏，孩子一邊哭著說『謝謝叔叔阿姨，謝謝大哥哥大姐姐，我要是長大了多好，也能和你們一起絕食』，一邊把一張五十元的人民幣投入募捐盒內。」統戰部座談會後，曉波和王軍濤就運動是否可能「流血」的爭論。6月4日，「凌晨兩點半左右。邵江全身顫抖地找到周舵，向他們詳細敘述了廣場外發生的令人恐懼的場面。他說：『周老師，你們想像不出有多可怕。求求你們想想辦法，救救廣場上的學生們。現在，只有你們四位老師能做到。』邵江邊說邊流淚。時至今日，我們四人仍然感謝邵江，是他的請求打動了我們，之後才有組織學生撤離廣場的行動。」

《獨白》中有不少對學生運動的批評，就事論事，這些批評大體都是對的。比如批評學運領袖們的自戀、自大、狂妄、自視為中國救世主，彼此爭奪權力；批評學生們道德優越感——我們屬於正義，因此居高臨下，唯我唯是，無視公德，浪費民眾無私捐助的資源。他批評吾爾開希自戀自大，對學生戲劇化的表演；批評柴玲、封從德，搞「小政變」，出爾反爾違背「聯席會議」決議，拒絕撤離廣場。他批評「學生們、知識分子們對政府的每一動作都反應強烈，死盯住不放，但對學生內部的種種陰暗面則麻木不仁，似乎誰說學生的弱點，誰就有替政府說話之嫌，其界限已經

到了非此即彼的程度。」他批評知識精英只動口，不動手，即想領導運動，但又不想置身其外；既要居高臨下，而又怯弱逃避。他批評，在6月3日夜，知識精英還「滑稽」地在廣場宣佈創立「民主大學」，舉辦開學典禮。名譽校長發表演講，「要求李鵬必須辭職，如果李鵬還繼續與人民為敵，必將要接受人民的審判。」「如果政府用暴力鎮壓民主運動，我們將以鮮血和生命來捍衛、來鑄造中國的民主事業。」

《獨白》側重於反省、批評的角度，但是我們要看到其中也有許多對運動、學生、市民、學生領袖的肯定和讚揚。反省和批評並不意味作者對「八九」運動的否定。他亦說，「今天乃至將來，『六四』仍然是我們生命中最寶貴的道義激勵，那個血腥而悲壯的黎明，作為中華民族記憶中必須解開的悲劇之結，畢竟為我們這個懦弱而平庸的民族，提供一次活得勇敢、活得有尊嚴、活得高貴的機會，也為民間反對派提供了擺脫貧困的豐厚道義資源。如果大屠殺之後的中國民間反對運動能夠肩負起對亡靈和社會進步的負責，那麼八九運動的失敗就是悲壯，悲壯將成為滋養民間反對派的最好資源。」（劉曉波《中國民間反對派的貧困——『六四』十三周年祭》）

### 3

1991年1月26日，劉曉波被釋放出獄，一陣狂喜之後，就是無休止地自問：「我真的自由了嗎？我為自由付出過多少代價，才有資格享受這份自由？」「我有充分的理由狂喜嗎？難道『六·四』的鮮血中沒有我的責任嗎？」「難道蹲過近兩年的監獄就有資本了嗎？難道參加過『六·四』、待過秦城的人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認為全世界都欠他點什麼嗎？」「難道『六·四』之後中國的倒退與我無關，僅僅是專制政府所為嗎？」……「各種問號折磨著我。儘管在表面上我的生活是平靜的，但內心深處的掙扎一刻也未停止過。而最根本的問題是：我是否有足夠的勇氣和智慧面對自己，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所思所想負責？」（《獨白》）於是曉波寫了此書。

《獨白》這部書主要還是一部作者個人的懺悔錄。披露、懺悔他帶著個人私念參與「八九」運動，激化了運動，最終導致當局的血腥鎮壓。認為「六四」血難有他的一份「罪責」。

在《獨白》中，曉波主要從內心的「大英雄」情結懺悔自己。所謂大英雄情結，他在《獨白》中記述：在秦城監獄，在電視中看到當局將他作為「頭號黑手」，感到一陣欣喜，因為這意味他是頭號英雄。他釋放後，得知王軍濤、陳子明遭重判，心裏酸溜溜的，居然對他們感到嫉妒和羨慕，因為他們成了「殉難的大英雄」，而他自己則因「悔罪」半途而廢。

曉波的「大英雄」情結包括：1、獲得歷史上的永恆；2、英光環雄——萬眾矚目、歡呼；3、進入中心權力。簡單地說，就是成為創造世界、歷史的英雄、萬眾矚目的中心，英名永存。這就是青年曉波的「神聖價值」加「唯我」；或說「唯我」的極限擴張、神化，尼采的超人與此同意義。

在「八九」運動中，學生領袖們——包括曉波——的「大英雄」情結是導致運動失敗的主要原因。其個人的「大英雄」情結帶來他們之間的對中心權力的爭奪，相互比賽式地爭風頭，將運動不斷推向激進，拒絕妥協，一次次失去避免流血的時機。

曉波對之反省及懺悔是很深入的。他記述：「我給別人簽名，一開始是興奮的自

我欣賞，每簽一次都有種名垂千古的感覺，只是我感覺自己的名字寫得不好，恨不得能馬上學到草聖張懷素的瀟灑。」四君子絕食後，不斷有人要求加入，但被曉波拒絕，因為「絕食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人們把在白色恐怖下的絕食視為英雄壯舉，因而，絕食成為一種崇高的榮譽，它與英雄夢、社會威望和知名度血肉相連。我的拒絕，是不願意有再多的人跟我們四人共同分享這榮譽、這英雄的美名。」

他記述在廣場的絕食演講：「我從未見過、體驗過如此巨大的公眾場面，真可謂盛況空前，面對人羣的狂熱歡呼，我竟失去了最拿手的演講技能，只是不斷地重複：『謝謝！謝謝！』這絕不是因為怯場，而是因為激動——一下子成為公眾矚目的中心而飄飄然。」「當我面對著遠遠超出我的想像能力的公眾場面時，我就把一切都理解為我的魅力和勇氣所致。我暗自得意：這次絕食太對了。運動又有了新的熱點，我也有了新的角色。……此時此刻，單純的殉難的激情就轉化為一種引導運動的自信，我相信我們四人有能力把運動引向新的軌道，進入新的境界，使這場以學生為主體的運動轉變為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運動。我突然衝動地接過話筒，面對人羣高喊：『跟李鵬死磕！』」

如果曉波緘口不說，沒有人知道他的內心所想，不能不說他的懺悔是誠摯的，切中了支撐其青年生命的結點。在驟然開放的時代，青年精英們的狂妄、英雄夢是普遍的。「八九」過去了近三十年，但是在曉波之外，我們尚未見到其他運動中的領袖，有這樣深入的反思和責任的擔當。

《獨白》是作者從青年曉波到殉道者曉波的一個精神蛻變，唯有完成這個精神懺悔儀式，方能完成其人格的轉變。其中心就是他從此從內心拔掉了「自戀英雄」這支罌粟。英雄有兩種一種是「自戀英雄」——虛假英雄，其是「自戀」的極致，以眾生、社會、歷史來成就自己，其渴望的是萬眾的歡呼膜拜；而另一種真英雄，他放下自己，以「我」殉眾生、社會、國家。在「六四」夜，曉波忘我而救眾生，是真英雄；而他在萬眾歡呼中，慷慨宣講「四君子絕食」則不屬於此。

「天安門母親」丁子霖說，「六四」之後曉波變了一個人。在以後的二十多年中，他的這種變化是公認的。而這個變化的核心就是他走出了「大英雄」的情結，放下了「唯我」，俯下身子，擔起「六四」血難得責任和意義，為之做終生的祭奠者。2010年，他在監獄中得知他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淚流滿面地說這個獎屬於「六四」的亡靈。

## 六、仰望神聖的贖罪

### 1

「六四」之後的二十多年中，讓曉波痛心不已的是他關押中居然「認罪悔過」，為之他始終不能原諒自己。

在《獨白》中，曉波用了大量篇幅對之做了自我剖析和批判，很是嚴苛。他寫到：「我不但承擔了刑事責任，而且主動承認自己犯了刑事罪，自願地寫了《悔罪書》在監視居住證、拘留證、逮捕證上簽了字。現在回想起來，我的悔罪不是違心，而是真誠地說謊，為自我保存而向謊言、騙局和暴力低頭。不論我的內心怎麼想，行為本身最真實。我的悔罪行為就是對真實、對真理、對自我良心、對『六·四』死難者的褻瀆、甚至強姦。在自我保存和堅守真實之間，我選擇了前者，拋棄了後者。」

如果按照西方現代的道德與價值觀念，這算不得什麼事情。在專橫殘酷的政權逼迫下，當事人違心「認罪悔過」是正當的，是必要的自我保護方式。美國軍人在戰場被敵方俘虜，即使在電視中向全世界「認罪」，其被釋放回國後，仍被視為英雄。但是，曉波為什麼如此嚴厲地拷問自己？

因為有那麼多年青的生命死於那個夜晚，那麼多的無辜鮮血。他的自責是面對千百死難者的，那是在他身邊發生的，因此他感到向屠殺者「認罪」是對死難者和鮮血的背叛、褻瀆。真理、死難、良心，面對這三者，他無法原諒自己。

他記述「我幾次想去天安門而又不敢去，有兩次走到西單附近又回頭。我不敢一個人面對紀念碑，不敢再現記憶中的傷痕，多少與自己血肉相連的往事令我心痛欲裂，常常強忍住欲流的淚水。……。車到天安門廣場，正巧我偶爾向車窗外張望，突然看見了紀念碑。一種巨大的壓力排山倒海般地湧向我，好像正面臨滅頂之災，全身不住地顫抖，胸口一陣陣絞痛。我想低頭，但不能，目光像被釘在了紀念碑上，它的巨大吸引力似乎能把我整個人吸出車窗。淚水慢慢浸出。突然，我嚎陶大哭，全身不住地顫抖……。」

「等我稍稍平靜之後，感到惡心，一種從未有過的對自己的厭惡。同是參加'六·四'，而我卻沒流血，被捕後關在秦城監獄，條件遠比大多數因'六·四'而坐牢的人好。現在，我還活著，還有個不大不小的臭名，還獲得了自由，得到朋友們和陌生人的關心、愛護。而那些死者和獄中人呢？他們的親人、朋友呢？那個只身張開雙臂攔坦克的小伙子呢？你們的血是否白流了？你們的勇敢、良知和獻身精神是否在被戲弄？苦難會為某些人換來美名，犧牲會成為某些人撈取功名利祿的稻草，全民族的悲哀也許僅僅滋潤了幾個膽小鬼和騙子，而我正是其中的一個。我永遠無法原諒自己，直到進入墳墓，因為我居然可以用出賣良知來換取自由——悔罪。」

曉波的這些文字是真誠的，發自心底，痛苦之極，滲著血絲。青年曉波反傳統、反道德——「五四」傳統，但實際他是理想主義的，是出於更高的理想而反傳統。在理想中，他有更高更嚴苛的道德期待。他在反省中引用了他過去的文字「正視和理解人的弱點與遷就和原諒人的弱點是兩碼事。正視不等於遷就，理解也不同的於原諒。恰恰相反，正因為不能遷就人的弱點才必須正視，正因為無法原諒人的醜惡才必須理解它。如果從遷就和原諒出發，就不會有正視和理解。必須理解人為什麼作惡，同時決不原諒人的作惡。即使在強調愛一切人、包括愛敵人的基督教中，也有煉獄的烈火焚燒人的罪惡，有地獄的懲罰等待著邪惡的人。上帝就是為了懲罰人的罪惡而存在的。」

這已經是絕對道德了，是上帝的道德法則。這裏，我們可以看到青年狂人曉波的另一面，他內心深處的道德理想。很難設想，他一方面反傳統，聲言需要「將錢與肉強調到極端」；另一反面在內心深處卻又有著絕對的道德理想。我們只有看到他內心深處的道德要求，也就可以理解，他為什麼能在危難之際，忘我而救助學生？為什麼拒絕躲進大使館？為什麼會對自己和「八九」運動有那麼嚴苛的批評？為什麼他要持守中國？為什麼他最終以身殉道？他的人生神聖價值與其內心的絕對道德理想是一致的，這是他生命中內在動力，將他一步步推上道義的祭壇。

可惜，曉波生於中國當代文明廢墟中，因而有他青年時期那一幕扭曲、狂妄，

否則那將是另一個劉曉波。但是廢墟未能將他掩埋，他在這片廢墟上，最終找到文明的始點——祭奠，在血泊中升起神聖意義。這是上天給予他的使命。

曉波逝世後，徐文立對媒體披露：「劉曉波曾向他透露：那次在央視台做違心見證，是因為當局強迫他父親遊說他就範，他痛苦地對地憶述『平日我可以和父親論辯至反目，可是當父親在那種地方雙膝向我跪下時，我他媽的徹底崩潰了！』」「我從來沒有對誰講過這一幕，今天就想對你說，可是還是不能他媽的原諒我自己！特別面對『天安門母親們』時！沒有借口，只有慚愧，罵自己不是東西！」

在《獨白》中，曉波亦對個人生活做了反省：「陶力，我的前妻，我兒子劉陶的母親，無論是在我們沒有離婚時，還是在我們離婚時，我都對不起她。除了我放蕩的生活給予她心靈上、身體上的痛苦和絕望之外，我參與『八九抗議運動』的風風雨雨，也始終令她懸著心；在驚嚇中度過了我回國後的日日夜夜。」「不管『八九抗議運動』的結果多麼慘烈，不管我因此受了多少磨難，統統與陶力無關，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我在外面風風火火，有刺激、有觀眾、有名聲，即使受難也不會白付代價，即使死了也只能自己負責。而她呢？她得到的是什麼呢？除了痛苦、驚嚇、焦慮、揪心，除了疾病的折磨、撫養孩子的艱辛、臥床兩年 and 病魔搏鬥之外，她一無所得。當我在『八九抗議運動』中面對歡呼的人羣時，我從未想到她和孩子；當我面對成羣記者、閃光燈，自我感覺良好地討論時事時，我從未想到過她的痛苦；當我在廣場上和其他女人調情時，更沒有想到過她那受過多次傷害的心靈還在滴血。因此，陶力與我離婚，無論在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都是理由充足的。像我這樣生性放蕩而又貪戀社會功名的人，根本就不配有家庭、不配做一個負責的丈夫和父親，不配得到陶力的愛。」

## 2

1989年6月6日，劉曉波遭逮捕，關押秦城監獄，1991年1月釋放；1993年1月應邀出訪澳大利亞、美國，謝絕了朋友們「避難」的建議，於同年5月返回中國；1995年5月，因起草《汲取血的教訓推進民主與法治進程——「六四」六周年呼籲書》，被北京公安局以「監視居住」名義關押在北京郊區，1996年1月釋放；1996年10月，因與王希哲發佈《雙十宣言》被判處勞教三年，1999年10月釋放。2008年12月因參與〈零八憲章〉被逮捕，被判刑11年。2017年7月13日，劉曉波病逝於監禁中。

在「六四」之後的二十八年中，曉波寧可坐牢，而拒絕離開中國。從政治上說，他是為了持守自由、民主的信念，抵抗中共極權統治，推動中國體制的變革。這是曉波對中國的政治的理想和奮鬥目標。

他在《中國民間反對派的貧困——六四十三周年祭》中寫道「失去自由的昂山素姬寧願把牢底坐穿也決不流亡，並通過各種努力發出強有力的反抗之聲。在她的高貴而無畏之人格的感召下，民主聯盟也一直堅持反抗。可以說，緬甸的民間反對派幾乎是用填滿軍政府監獄的無畏精神堅持反抗的。正是這種無畏的堅韌，為反對派本身的發展和國際社會的支援提供了充分的道義資源和組織資源，1991年，昂山素姬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而一個剝奪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人身自由的政府，是無法承受由此而來沉重的道義壓力的。2002年5月6日，昂山素姬和她所領導的反對

派終於迎來社會和解的曙光。」而在中國，儘管大屠殺把許多體制內的開明派變成了體制外的持不同政見者，儘管民間反對派向中共政權的零星挑戰一直沒有中斷，但是，由於缺少類似昂山素姬這樣的象徵性領袖人物，也沒有類似民主聯盟這樣成型的民間反對派組織，加之八九運動的風雲人物大面積流亡，中國的民間反對運動缺少道義凝聚核心，也就自然談不上組織化和對民眾的動員力，只能處在分散而孤立的狀態之中，越來越被邊緣化。」

由此，我們即清楚地看到曉波為什麼持守中國，堅持民間的抵抗。正是由於人們紛紛退卻，大部分異議領袖流亡海外，道義資源流失，他決心以薩哈羅夫、昂山素姬、米奇尼克、哈維爾為榜樣，和天安門母親們站在一起，承擔起中國的道義責任。

曉波的這份擔當，直接源於「六四」血難。他經歷了這場慘案，

見證了屠殺者的槍彈和大批生命的死亡。而且他認為由於在「八九」運動中他的某些演講，特別是發起「四君子絕食」，助長了學生們的激進情緒，因此他對這場慘案負有一定的責任。他在《獨白》中記述，「我覺得自己所獲得的自由是建立在別人受難之上的。我的獲釋就是對死難者和獄中人的背叛。……同是深深地卷入『八九』抗議運動，卻沒有與他們共同承擔惡果——牢獄之苦。這是不是一種變相的犯罪……？」那麼多人慘死，那麼多人仍被關在監獄，他要對得起他們，承擔其後的責任和使命，彌補自己的過失，以此慰藉亡靈。

### 3

作為個體生命，曉波持守中國尚有兩個隱由：一是恥感；一是「贖罪」。

對於曉波，在監獄中的「悔罪」乃是他的莫大恥辱，他無法將之抹去。中國古語，知恥而勇。恥是中國人深層倫理意識。抗日戰爭中，張自忠將軍如此英勇，戰功卓越，最終以身殉國；原因之一就是「七七事變後」，平津地區陷落，他受命留守，代理冀察政委會委員長及北平市長，被輿論視為「漢奸」。此後，張將軍誓以勇以死雪之。

曉波在《獨白》中記述：「悔罪已是既成事實，無可挽回，印在自己身上的這一污點將伴隨我的終生。」他痛罵自己：「人們，睜大雙眼看看吧，這就是那個在人們心目中被譽為『黑馬』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在白色恐怖下，在廣場學運日漸蕭條之時毅然發起絕食的所謂勇者；這就是所謂的學生運動的精神領袖、所謂中國知識界的良心……。軟弱、卑鄙、無恥而止於此，也該是中國的一大奇觀。而恰恰正是此人，曾經多麼義憤填膺，滔滔不絕地指責中國知識分子的軟骨症。善良的人們，長眠於地下的亡靈，你們沒有感到被愚弄嗎？沒有感到吃驚和失望嗎？」（《獨白》）

這種恥辱，對於曉波刻骨銘心。他在《獨白》中引述了一段白傑明的話「中國的精英們都想當殉難的基督，成為舉世矚目的大英雄，但是他們不願被永遠釘在十字架上，而是被釘了一會兒就要被扶下來，在人們的歡呼聲中走下十字架，這就是中國特有的或叫有中國特色的走下十字架的殉難者。」曉波斥責自己「不想付任何代價，卻什麼都想要，貪婪得好像這個世界只為我一個人所準備的。這就叫民主思想？就叫英雄？見鬼去吧！行文至此，我真的有點對自己喪失信心了。內心的墮落無可挽回。」

曉波的恥辱感不僅是對自己的「認罪」，也還包括他對「大英雄」奢望，對聲譽、公共形像的斤斤計較，他清楚地看到自己就是白傑明所說的那個「走下十字架的基督」。面對死難者的鮮血和牢獄中的同仁，他為之無比羞愧。

這些羞愧、恥辱銘刻於曉波內心，但這是他自己造就的。不在於別人怎樣看待他；而是他自身不能原諒自己。因此他需要以後半生給出回應，即自覺承擔「六四」之後的責任，為之殉道，以此贖回在前的恥辱。1999年，他在給廖亦武的一封信中寫道「恥辱地活著，為了無辜者的血，是我唯一能夠找到的理由。6月4日的黎明，是我心中最黑也最紅的日子。」

#### 4

曉波寫《獨白》，大致是受到聖·奧古斯丁的影響。曉波曾說「八十年代，聖奧古斯丁的《懺悔錄》是我最喜歡的經典之一，讀了多遍，使我生命中追隨聖跡的衝動變成了自覺的信仰欲望。」（劉曉波《鐵窗中的感動：獄中讀〈論基督徒〉》）。他有一首寫給劉霞的詩《致聖·奧古斯丁》，其中寫道「為什麼你放棄縱欲的沉醉後/ 選擇的是聖徒而不是賭徒」，「不知道懺悔時是否真的顫栗/ 贖罪的路是否真那麼漫長/ 人會在神的戲劇中/ 表演奉獻的悲壯」。應該說嗎這也是曉波反省、懺悔之後的生命再選擇。

曉波生命中有很強的宗教感，可惜中國當代沒有了宗教背景，否則他或許會投身於宗教。他在《鐵窗中的感動：獄中讀〈論基督徒〉》中記述：「儘管自己生長在毫無宗教背景的無神論文化之中，但自己並非無可救藥，自己的靈魂深處還是有宗教性虔誠，那種博大的深刻的宗教情懷常常令我感動不已。」「也許，我永遠不會成為教徒，不會進入有組織的教會，但是耶穌基督卻是我的人格楷模，我知道終其一生也無法企及那種聖徒人格，但被這樣的書所感動所震撼，說明自己還具有作為一個人的虔誠與謙卑，並未被牢獄之災所吞沒，也沒有被曾經暴得的名聲所腐蝕，我還有救，還能夠把自己的一生變成努力地接近這種人格的過程。」這裏我們可以體會到曉波的宗教情感與襟懷。

客觀地看，《獨白》中他對自己的批判過於嚴厲了，超乎世俗的限界，應該說其已是宗教性的了。對於沒有宗教信仰的人來說，如此嚴厲地披露批判自己，是很大的自我「傷害」——他的朋友說他是「自虐」。由人性來說，人有罪感，宗教感越強的人，罪感也就越強烈。在宗教中，解脫罪感是神的重要功能，因此基督教中有懺悔的儀式。人只要懺悔，上帝即赦免。基督代人贖罪乃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內容。遺憾的是，曉波最終未信仰基督教，而是人文主義者。他的生命深處有宗教感，卻沒有宗教信仰；他意識到自己的罪，卻沒有上帝來赦免。因此，他的良心無法從罪中得到解脫，而要終生背負自己的罪責，靠自己來贖罪。

在《獨白》中，我們可以看到曉波的內心掙扎與苦痛。他認為自己有「罪」；卻不能從「罪」中解脫。「六四」之後，他常常處於「罪」的痛苦中。他在《獨白》中記述「我又隱約地感到不安，有一種道義上的犯罪感，總覺得死於戒嚴部隊槍口下的人與我發起的絕食有關。一種揮之不去的推論總是跟著我，直到我被抓進秦城監獄，直到我獲得自由，直到我走進墳墓：『如果我不發起絕食，就不會有新的運動高潮；如果沒有新的高潮，政府也許會等待著學運的自我瓦解，不會進行強硬的清場；

如果沒有強硬的清場，北京市民就不會與軍隊發生正面的暴力衝突；也就不會有現在的暴力屠殺。」……每每想起，都感到自己不自覺地和共產黨一起策劃了『六·四』大屠殺。」

曉波為什麼拒絕離開中國？為什麼堅持異議抗爭？為什麼堅持自由、民主的理念？為什麼堅持非暴力？原因之一，他是以此為自己贖罪。他要和「天安門母親」們一起看守死難的亡靈，維護死者的榮譽；持守其精神。

## 5

曉波企望神聖的價值與絕對的道德，他標出的最好的典範即基督。曉波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在世俗紅塵間望到了基督於文明的神聖意義。基督教的終極價值就是為了持守信仰，而不惜獻出生命，整部基督教的歷史奠立於殉道精神，基督走上十字架就是最高的象徵。這是基督教的根基。

我們反復提到，自 1949 年後中國文明被摧毀為一片廢墟。在這篇廢墟上，我們如何重建文明？從哪裏開始？哪是基點？曉波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以個人的生命痛楚經歷、體驗以及深入反省，在中國當代這片文明的廢墟上，確立了兩個基點，一個是「六四」血泊，一個是以基督為樣板的神聖意義和絕對道德；前者是立足，後者是指向；在這兩者之間，確立起當下中國的道義精神，由此抵制極權統治，推動中國走向文明，完成憲政轉型。

他說「今天乃至將來，『六四』仍然是我們生命中最寶貴的道義激勵，那個血腥而悲壯的黎明，作為中華民族記憶中必須解開的悲劇之結，畢竟為我們這個懦弱而平庸的民族，提供一次活得勇敢、活得有尊嚴、活得高貴的機會，也為民間反對派提供了擺脫貧困的豐厚道義資源。如果大屠殺之後的中國民間反對運動能夠肩負起對亡靈和社會進步的負責，那麼八九運動的失敗就是悲壯，悲壯將成為滋養民間反對派的最好資源。」「在一個全面專制的社會裏，無形的道義資源是我們對抗占據所有有形資源的獨裁政權的唯一支撐。最血腥的時刻也是道義最具有感召力和凝聚力的時刻，如果在最血腥最恐怖時刻，我們的道義象徵人物能夠不畏強暴地屹立著，那麼民心就有凝聚的核心，大屠殺所造成的也只能是外在的有形的暫時的失敗。」「在中國，過一種誠實的生活，做到知識上的誠實和道德上的負責，首先需要的不是知識上的淵博，而是道義上的勇氣！」（劉曉波《中國民間反對派的貧困——『六四』十三周年祭》）

他在《天安門母親的啟示——「六四」十九周年祭》中讚揚天安門母親「『六四』已經十九年了，經常必須面對恐怖政治的『天安門母親』羣體，從未放棄過抗爭，也從未軟化過立場。無論獨裁者們多麼冷血，也無論大眾多麼麻木，她們執著地替墳墓中亡靈們伸冤，用母愛化解仇恨，用勇氣抗拒野蠻，用耐心較量漫長的等待，用不辭辛苦的尋訪拒絕強制性遺忘，用一個個案例解開大屠殺的真相、戳穿謊言化的生存。」「從天安門母親們堅持十九年的努力中，我看到的不僅是不畏強權的勇氣和持之以恆的堅韌，更是苦難所磨礪出的超越自身苦難、克服自家喪子仇恨的公益心——由母愛、寬容、理性、耐心、堅韌熔鑄成的責任倫理。」

在「六四」之後的二十多年中，曉波也正是和天安門母親們站在一起，堅毅抗爭，將苦難升華為道義。2010 年，曉波在關押中告訴律師「我相信我所從事的事業

是正義的，中國終有一天會成為自由民主的國家，所有人都生活在沒有恐懼的陽光下，為此，我付出了代價，但我無怨無悔。在一個獨裁國家中，對一個追求自由的知識分子來講，監獄是通向自由的第一道門檻，我已經邁進了這道門檻，自由就不會太遙遠了。」

## 6

近二十年前，曉波在給廖亦武的信中說「人的善良和堅韌是可以想像的，但人的邪惡與懦弱是無法想像的，每當大悲劇發生之時，我都被人的邪惡與懦弱所震驚。」『六·四』以後的沉寂與遺忘，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們沒有一個挺身而出的道義巨人。『與其他共產黑幕中的人物相比，我們都稱不上真正的硬漢子。這麼多年的大悲劇，我們仍然沒有一個道義巨人，類似哈維爾。為了所有人都有自私的權利，必須有一個道義巨人無私地犧牲。為了爭取到一個『消極自由』（不受權力的任意強制），必須有一種積極抗爭的意志。歷史沒有必然，一個殉難者的出現就會徹底改變一個民族的靈魂，提升人的精神品質。甘地是偶然，哈維爾是偶然，二千年前那個生於馬槽的農家孩子更是偶然。人的提升就是靠這些偶然誕生的個人完成的。不能指望大眾的集體良知，只能依靠偉大的個人良知凝聚起懦弱的大眾。特別是我們這個民族，更需要道義巨人，典範的感召力是無窮的，一個符號可以喚起太多的道義資源。」

這些文字告訴我們，曉波於中國更深的痛苦，不僅在極權，而在文明摧毀後，中國的「人」壞了，它的精神死了，道義死了，良心死了。因此，必須有道義巨人殉難，以生命重燃道義之光，喚醒中國民族的靈魂，提升國人的精神品質。在中國民族道義死亡的黑暗中，挺身做道義的「巨人」、殉難者，這是他給自己的最終定位和選擇。「為了每個人的自由，而犧牲個人自由」。曉波履行了他的諾言，最終以生命殉道義。

在數十年中國異議運動中，有不少品行高尚的人，有的近乎是聖徒，比如楊天水、陳西、唐荊陵……。作為個人，曉波身上有不少弱點，但是他有嚴格的反省精神，和很高道德要求。「二十年來，曉波通過更堅定的抗爭，更從容的面對苦難，包括一次又一次的坐牢，為自己贏回了尊嚴，從而也使得自己的精神境界進入到更高的層次。」（胡平〈聖人就是不斷努力的罪人〉）

曉波並不完美，但是他向著神聖意義不斷努力。如胡平先生所說「聖人，就是不斷努力的罪人。……沒有人天生完美，完美就體現在對完美的不斷追求。那些終生追求完美的人就是完美的。」

2017年10-11月 於伊薩卡

一平——旅美華裔詩人、作家、編輯，獨立中文筆會理事兼自由寫作和文學交流委員會主任。

# 劉曉波與他代表的「非暴力抗爭」路線

何清漣



近二十多年以來，國際社會一直將諾貝爾和平獎的授予當作促使發展中國家民主化的一個重要工具，曼德拉、達賴喇嘛、昂山素姬與劉曉波等人士，由於在他們的國家具有的象徵意義先後獲獎。國際社會這份苦心收穫不一：曼德拉生前在南非實現了國際社會的寄望，從社會和解、打破種族界限，解決了許多社會問題，但也留下了腐敗甚至逆向種族歧視等諸多社會問題；達賴喇嘛以藏人領袖之身份得到諾貝爾獎的加持，極大的擴展了藏人的國際活動空間；昂山素姬雖然成功地讓緬甸達成了民主化，但因緬甸那棘手的羅興亞穆斯林人問題，引起國際社會一片指責。但中國的諾貝爾獎得主劉曉波先生去世。對中國來說，不僅是一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生命終結，還意味著非暴力抗爭這一政治理念在中國將進入塵封狀態。

## 破局之舉：非暴力抗爭主張在中國成為一種理念

劉曉波的異議生涯始於 1989 年六四運動，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作為 2008 年〈零八憲章〉的起草者之一及主要發起者，在推動憲章連署時發揮了重要作用。〈零八憲章〉繼承了捷克斯洛伐克〈七七憲章〉的精神，提倡在中共暴政壓迫之下通過非暴力抗爭促進中國和平轉型，與諾貝爾和平獎評選委員會的遴選標準契合，因此，劉曉波作為〈零八憲章〉的代表人物，獲得 2010 年度諾貝爾和平獎。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在授獎辭中闡明授獎原因：「以表彰他為爭取和維護中國基本人權所進行的長期的、非暴力的努力。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一向的觀點是，人權與和平

之間有緊密的聯繫。」。2017年7月劉曉波在被囚禁中病逝，該委員會再次強調：「通過向劉曉波授予諾貝爾和平獎，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希望強調，發展民主與創造和確保和平之間存在著根本聯繫。此外，委員會發現，劉曉波通過非暴力的方式抵抗中國共產黨政權的壓迫行為，為增進不同民族間的友愛做出了貢獻。」

非暴力抗爭的理念在中國人中引發的爭論，幾乎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就開始了。他個人的命運與中國社會狀態相映照，卻顯得非常奇詭：作為主張非暴力抗爭的代表人物，劉曉波在1989年之後曾幾次入獄，這一經歷將他從激進的文學青年熬煉成主張非暴力抗爭的溫和反對者，這一角色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加持；與此同時，他代表的非暴力抗爭主張，卻在政府的政治暴力與網路革命黨日趨嚴重的暴力傾向這雙重煎熬下，進入奄奄一息之境。劉曉波及其愛妻劉霞的悲劇人生，更成了主張暴力革命者用來反證非暴力抗爭路線失敗的例證。

但是，正如〈零八憲章〉的共同發起人之一、學者徐友漁2017年7月15日在紐約各界舉辦的劉曉波追思會上所言：〈零八憲章〉宣導通過非暴力抗爭，促進中國走上憲政民主之路的思想，並非劉曉波個人獨創，而是一代中國知識份子對現實做了深刻反思後形成的共識。1989年流亡海外的作家蘇曉康在〈劉曉波把激進煎熬成溫和〉一文中，細述了劉曉波獲獎之後，他本人及〈零八憲章〉代表的非暴力抗爭路線遭遇的尷尬：海內外有不小的反對聲音，「以劉曉波的巨大爭議性，對他沒有疑義反而不正常了」，質疑聲中，當然「包含了劉曉波獲獎對中國現實政治能有多少觸動的疑問」。非暴力抗爭路線在當下中國的處境，意味著劉曉波戴上這頂桂冠的同時，就背負了道義的十字架。也正因如此，劉曉波在知悉自己獲獎後稱，這個獎是頒給六四亡靈的。蘇曉康對此做了總結：「在一定意義上，2010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早在1989年春北京的沸騰廣場，血沃長街就應驗了。天安門學子滿腔報國之心，被機槍坦克碾碎之際，啟動了共產主義陣營大坍塌的骨牌效應，八九一代卻抱憾飲恨至今，終於劉曉波代表著他們的理想和叛逆，登上諾貝爾的殿堂；再深一層說，推選劉曉波的，也不是現世的人們，而是倒在長安街上的亡靈們，他們要讓這位前『黑馬』代表他們，來告訴這個世界，殺人不是政治，只是獸行；反殺回去，又在重複獸行。中國要爭取講道理的那一天」。

在中國，從來是暴力革命主張大行其道，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非暴力抗爭的提法雖然時有出現，但成為一種理念，有代表人物，有為數不多的各階層人士共同信奉、並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加持，卻是劉曉波獲獎前後才出現的中國現象。

### 非暴力抗爭的幼苗能在暴力革命的溫床上成長麼？

只有經歷過六四的人，才能理解「中國要爭取講道理的那一天」這句話蘊含的沉重。1989年之後流亡海外的前輩學人李澤厚與劉再複深刻反思後曾出版一本對話集《告別革命》，對海內外中國知識份子影響甚巨。在主張非暴力抗爭的知識份子當中，以胡平的看法最為系統。胡平長期從事民主運動理論研究，他認為：暴力反抗暴政有其正當性，但面對高度現代化熱兵器的專制政權，斬木不能為兵，一般民眾不具有暴力反抗的工具；我們沒有槍，如果不甘屈服，唯有從事非暴力抗爭。1989年的民主運動就是一場偉大的非暴力抗爭，但六四屠殺使很多民眾失去了非暴力抗爭的信心。胡平進而闡述：「有人以為，一旦民眾認識到非暴力鬥爭此路不通，他們

就會轉而投入暴力抗爭，這個推斷不符合實際；若人們失去了對非暴力鬥爭的信念，從而放棄非暴力抗爭，實際上就是放棄了現實可行的鬥爭手段，到頭來也就是放棄了抗爭本身。又由於他們不參加實際的非暴力抗爭，因此使得實際發生的非暴力抗爭總是形不成聲勢和規模，形不成足夠的力量，既不足以對一黨專制構成有力的挑戰，同時又比較容易被當局所壓制。這反過來又使得民眾進一步失去對非暴力抗爭的信心，由此陷入惡性循環。要打破這種惡性循環，首先就要讓人們重新恢復對非暴力抗爭的信心。捨此之外，別無捷徑。」胡平的看法既包含了不能選擇以暴易暴這個終極目標，還包含現實的策略考慮。

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古往今來數千年，不斷出現張角、黃巢、朱元璋、張獻忠、洪秀全、義和團這種暴力革命，就連中共政權也篤信「槍桿子裏面出政權」，並將這一理論發展成今天的「維穩論」。由於政府通過它高度操控的教育系統，長期對國人實行意識形態洗腦，統治者與反對者共用一套以「剝奪剝奪者」為核心理念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以及鄧小平的「摸論」（摸著石頭過河）、「貓論」（不管白貓黑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為代表的機會主義價值觀，因此，在神州大地，暴力革命從來就不缺信奉者。

在這樣一個崇拜權力與暴力的國度，究竟會發生何種類型的革命？這是筆者多年來都在觀察、思考的問題。在劉曉波去世之前，推特（Twitter）中文圈提供了一個難得的觀察窗口。

### 「郭氏推特革命」是未來中國革命的演練

我曾在〈「郭氏推特革命」是對中國革命的隱喻〉一文中，分析了郭氏推特革命展示的暴力化傾向及對財產的訴求，認為這次「推特革命」的暴力化傾向相當嚴重，與文革的語言暴力幾乎相等。這種暴力化傾向從兩方面體現：

第一，相當多的支持者抱持簡單化的敵我觀念，即毛澤東所說的，「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態度是主導。「郭粉」當中一些推號表現出十足的痞子化傾向，對於一切自己不喜歡的觀點缺乏寬容，與毛澤東極權體制不容忍異見一樣，動輒圍攻，痞話髒話鋪天蓋地，而且毫無是非感，表現出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強烈傾向。他們對知識份子羣體的仇恨、蔑視更是溢於言表，其推文與當年的「文革」大字報相近。除了各種將郭吹捧成空前絕後的帶領中國走向民主化的領袖，比如「中國民主第一人」、「耶穌再世」等諛詞頌語之外，甚至有人提出，「凡不支持郭文貴的，必須予以打擊；凡反對郭文貴的，必是中共特務五毛」。

瘋狂是種巨大的破壞性力量。法國學者勒龐在其名著《烏合之眾》中，對這種現象曾做過深刻評析：「羣眾從未渴求過真理，他們對不合口味的證據視而不見。假如謬誤對他們有誘惑力，他們更願意崇拜謬誤。誰向他們提供幻覺，誰就可以輕易地成為他們的主人；誰摧毀他們的幻覺，誰就會成為他們的犧牲品。」一個劣跡斑斑、依靠國安系統敲詐、勒索發家的失意奸商郭文貴，成為中國網路革命黨的主人。

第二，公開鼓吹血淋淋的暴力。一位自我介紹畢業於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的國際法碩士、在京從事律師職業近二十年，現居加拿大的賴建平於8月9日發的一條推文，更是將這種暴力推到了極致：「我有權各（個）別地或與他人聯合起來集體地反抗專制官員，我擁有的反抗手段及其正當性並不因為這種聯合而失去或減損，

當很多人一起行動時，就叫民主革命。革命過程中同樣可以咒罵、欺騙、造謠、傷害、殺死他們。我有權以這些手段對付任何一個或多個或全體壓迫者，怎麼有效、怎麼管用就怎麼來，就這麼簡單。」(1) 意思是說，他認為自己的目標是正確的，為達目標不擇手段，可以視他人生命為草芥隨意剝奪。另一位現居加拿大的維權律師郭國汀在 8 月 21 日發表的推文中說：「如何制約流氓暴君下屠殺令撲滅憲政民主大革命？凡是今後下令開槍及下令執行暴力鎮壓令的任何人，一律連同他們的家屬子女（未成年兒童可除外）處死刑，且得由任何人隨時就地正法，凡是執行其死刑者皆予重獎」。(2)

這兩位前中國律師的言論充滿了血腥，幾乎完全否定了近幾十年國際社會堅持的文明底線，與中共革命初期言論及恐怖組織 ISIS 沒有任何區別。

上述言論的出現，離劉曉波逝世才一個多月。這一事實揭示的中國現實非常殘酷：中國有以暴易暴的制度文化傳統，再加上紅色共產革命洗劫過近百年，以及中共意識形態教育，從來就是暴力革命的溫床，非暴力抗爭理念在這塊土地上，註定是株難以長大的弱苗。

這當然不是劉曉波個人的悲劇，而是這個民族的悲劇。

#### 註釋：

- (1) 賴建平@ljpJames，<https://twitter.com/ljpJames/status/895166811171418112>
- (2) ThomasG.Guo（郭國汀）@thomasgguo，<https://twitter.com/thomasgguo/status/899755983802556416>

何清漣——旅美中國流亡學者、作家。

# 評劉曉波思想遺產之一

## ——〈我沒有敵人〉

裴毅然



2010年1月4日，我在上海接到北京丁東先生轉來的崔衛平女士羣訪帖，誠邀中外幾十位知識份子對劉曉波重判十一年作出「反應」。我立即敲出一段文字，回帖「反應」，崔衛平摘選編輯後，載其推特：

裴毅然的看法：非常贊同余英時先生的觀點，曉波當然是為民主蹲獄。對曉波來說，則可謂家國不幸曉波幸！一次比一次光榮呵！嗣同有後呵！惟一安慰的是：有這麼多人在外面「陪」曉波。

這次蔡楚先生希望我剖析一下劉曉波的思想遺產，囿於網文篇幅，不可能全面展開討論劉曉波思想，只能分析一下那篇頗引爭議的法庭陳述——〈我沒有敵人〉，然後簡述曉波思想遺產的價值。

2009年12月23日，曉波當庭〈我沒有敵人〉一出，海內外「反響」一片，奈何我在大陸看不到（本人很笨，還不懂「翻牆」），只能從港刊上尋覓「出口轉內銷」。最初，我也很納悶，怎麼會「我沒有敵人」？沒有敵人，中國民運的對立面是誰？為什麼需要鬥爭？尤其恐怖暴政源頭的中南海：毛澤東、鄧小平、李鵬……「六四」向學生向人民開槍，偌大血債，還不是人民的敵人麼？再說了，弱者寬恕強者，豈非自作多情太「阿Q」？中南海在乎你的寬恕麼？

## 曹長青的批評

2010年3月號香港《開放》，刊載黑大老同學曹長青的評論〈劉曉波最後陳述的爭議〉，批評「我沒有敵人」混淆了一系列重大原則，貶斥贊同「我沒有敵人」的人「莫名其妙，簡直不可思議」。曹文主要觀點：

**宗教情懷不能等同政治**，不能無視中共政權的殘暴性，沒有對專制獨裁的深惡痛絕，就不可能有對自由的摯愛追求，政治犯怎能讚美監獄？在刺刀面前「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既丟了原則，也自相矛盾，淚水無法感動專制政權，只會使中共政權「萬歲」。

**混淆原則**，認為「我沒有敵人」混淆重大原則，「如果連中國的精英們對這些最基本的原則都不清楚，都沒有根基，還談什麼結束中共專制？」

應該說，老同學曹長青的質疑，戳到「我沒有敵人」的軟肋，起訴曉波的檢察官、判決他有罪的法官、執行中共政權旨意的警察，以及「六四」向學生、市民開槍的士兵，當然不是為私仇，而是執行中南海鄧小平、李鵬集團的意志。面對殘暴野蠻的中共政權，曹長青懷疑劉曉波：他到底是真那樣理解中共政權，還是在寫瞿秋白式〈多餘的話〉——希望得到輕判？曹的質疑與筆者最初的「第一感」有所暗合，我也認為不加解釋地直接宣倡「我沒有敵人」，豈非混淆正義與罪惡、民主與專制等原則性界線？

## 江派眼中的曉波

2010年8月8日，受《領導者》、共識網社長兼主編周志興之邀，筆者曾出席一次滬上餐聚，其他出席學者：劉吉（1935～，前中國社科院副院長）、張汝倫（1953～，復旦大學哲學教授）、蕭功秦（1946～，上海師大史學教授）。劉吉先生乃江澤民幕僚，「三個代表」起草人之一，他說了一段至少代表江派對劉曉波的評論——

左派右派都是一派，右派幫了左派的忙。我們說階級鬥爭不能講，沒有了，左派便指劉曉波說：怎麼階級鬥爭熄滅了？因此，從這意義上，左右兩派都不行，就是一個派，互為依存。從這一意義上，我認為就是槍斃劉曉波也沒什麼。

聽到沒有，今天看來還算開明的江澤民，人家也是以「槍斃」看待劉曉波的「歷史作用」，以「死有餘辜」評價您的「歷史地位」。從人際對等角度，曉波的「我沒有敵人」，實在有失平衡，相當地「表錯情」。不過，曉波會不知道自己是中南海的死敵麼？不知道是人家的掘墓人麼？會不明白自己這廂「我沒有敵人」，人家那頭仍一定視他為「最危險的敵人」。我以為這正是曉波的精明處，他明白這一切，也明白自己打這張牌的「宣傳效應」——反差越甚，傳播越廣。

## 理解曉波

另一方面，劉曉波確實深受基督教影響，「我沒有敵人」清晰體現寬恕一切罪惡一切敵人的基督仁愛。由於在法庭上不可能展開論證——為什麼「我沒有敵人」，我們無法得知曉波之所以選擇這一表述的論據。但根據基督精神，我漸漸理解曉波「我沒有敵人」的深層內涵——除了力倡基督泛愛理念，可能還包含兩層政治作用：①向民運界內部鄭重強調「非暴力」，既然「沒有敵人」，也就沒了「暴力對抗」的必要。②盡量降低中共的敵對感，降低中南海對民運的恐懼，即降低民主轉型過程的

人為因素。③以基督式的高姿勢感召中共與世人，或以徹底慈愛映襯中南海的血腥殘暴。

無論如何，以愛迎恨的「我沒有敵人」極大彰顯了曉波思想的溫度和包容力，從政治上，也可視為最大限度的統一戰線——團結一切能夠團結的力量，盡量凝聚朝野共識，以期合力完成民主轉型。

曹長青先生乃政論家，走的是形而上的純粹理性，可以追求「理論的徹底性」。但作為形而下行動的實踐者，劉曉波必須考量方方面面的原因，不可能追求「徹底」，也不應該設立「徹底」的目標。因為，作為歷史現階段人物，能夠完成目前亟需的民主轉型，就已阿彌陀佛——千難萬難功莫大焉。因此，對劉曉波來說，他必須慮及各階層各族羣對〈零八憲章〉的認同度，得追求最大公約數。

更重要的是：曉波有他選擇如何表述的自由，何況是在刺刀之下的「陳述」。從大方向上，曉波的主要思想、價值旨歸已經凝結於〈零八憲章〉，當然旨在結束中共的一黨專政、完成中國民主轉型。「我沒有敵人」終究只是手段，意在力挺「非暴力抗爭」。若放遠眼量，中國已被近一個世紀的「階級鬥爭」搞得只剩下仇恨，數代國人一生滾爬於仇恨泥淖——反右、文革、六四，還不都是挑動羣眾鬥羣眾麼？弄得國人一生「滿腔仇恨」、「滿大街都是敵人」，曉波的「我沒有敵人」，一個最應該仇恨中共的政治重刑犯竟寬恕所有「仇家」，倡導基督普愛，客觀上也有一份矯正時弊的作用。以「愛」換「恨」，大方向畢竟正確。

民運界內部不必揪住曉波的「我沒有敵人」，不必質疑他的「革命堅定性」。就「革命大節」，劉曉波一再放棄流亡海外、堅持在大陸抗爭，他以自己的生命捍衛中國民運標誌性產物——〈零八憲章〉，以入獄、癱斃向中外昭示中共的殘暴，以「我沒有敵人」實為昭示他徹底的「非暴力」。這些，都是曉波留給中國思想界、中國民運彌足珍貴的遺產。

我在漸漸理解曉波的同時，也感覺對待任何人都不必求全責備，套用一句熟語——宜粗不宜細，只要大方向對頭，枝節問題上不必細摳。事實上，曉波的「我沒有敵人」，也不可能影響我們對中共政權殘暴的「深刻認識」。

### 曉波的價值

曉波雖逝，光芒永存。在相當長的一個歷史階段內，他的名字仍有絕對號召力，仍是中國民運一面相當奪目的旗幟，中共仍將持續忌憚他。他的思想遺產，我們當然要鄭重繼承、發揚光大。

諾貝爾和平獎之所以授予曉波，當然是表彰〈零八憲章〉，表彰劉曉波與他的同志們為中國民運矗立的標竿——自由民主、法治憲政、平等人權，以及非暴力抗爭。曉波也以自己的生命「回饋」這份國際承認、忠貞捍衛了諾貝爾和平獎的崇高榮譽。

當然，〈零八憲章〉也是時代的產物，起草過程中免不了有種種不得已的妥協——降低中南海接受的難度，動作不宜過大……如未涉及中共政權的靈魂——馬克思主義，未沾碰這一最麻煩的意識形態障礙，而是直接表述各項政治述求。因為，對中共來說，他們的政權已與馬克思主義牢牢捆綁，其政權「合法性」全都源自這則紅色邪說，倒旗意味著失魂，意味著自棄「合法性」，這也是習近平至今擰緊意識形態

閥門，高調宣倡「不忘初心」的價值根柢。

不過，中國乃十四億中國人之中國，不是中共一黨之私產，中共黨史、大陸國史也不能任由中共自導自演。對於未來，當然只能鑒古辨今、知往察來。馬列主義如此荒誕悖謬，國際共運如此罪惡昭著，中共政權如此惡劣殘暴，相信絕大多數國人心裏都在問：「紅旗還能打多久？」都在心裏盼：中國何時擺脫中共這一歷史包袱？相信中南海紅牆內的政治局大佬，也早就對共產主義失去信心，早在謀劃自己的各種退路。

中國當然只能走向普世價值的民主自由，難道不以成功的歐美憲政為範例，還會繼續堅持失敗的蘇聯東歐模式——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就算中共想堅持想使「紅旗飄萬代」，歲月無情，歷史終將淘汰罪惡累累、血跡斑斑的馬列主義。如今的中共政權，無非依靠暴政慣性在維持，天安門城牆的毛像搖搖欲墜。難道中共暴政還能萬歲麼？百歲都不可能矣！我們這撥異議份子雖然被趕出來了，但大陸到處都是我們的同志，都是「國保」、「國安」防不勝防的中國民運「第五縱隊」。

曉波未遠，遺音在耳，自由必有接班人，中國民運在繼續，《民主中國》在路上……

2017-10-16 Princeton, East Windsor

**裴毅然**——旅美中國學者、作家，上海財經大學退休教授，獨立中文筆會會員。



# 和平理性價值永恆

## ——如何理解劉曉波

吳祚來



直到今天，仍然有不少人對劉曉波抱有成見，不理解或低視劉曉波的和平理性的政治追求。譬如對劉曉波關於（六四）廣場上沒有看到大量傷亡，還有「我沒有敵人」這樣的表述，甚至他在監獄中說自己受到良好的對待，也為一些人指責（美化了中共監獄）。

如何理解劉曉波的政治追求與政治理念，仍然需要我們進一步的反思與體悟。

### 一、從劉曉波廣場砸槍說起

我六四凌晨從長安街撤退到廣場，在長安街上就看到許多學生守在路邊，持棍或石頭準備狙擊荷槍實彈的入城部隊，但我沿路勸說並阻止，因為這樣的衝動帶來的只會是無謂犧牲。進入廣場之時，我既看到了胸部、背部流血的學生被人攜扶著進入廣場尋求救援，也看到舉著大棒要去衝擊包圍廣場的士兵的學生。當我們阻止時，遇到的喝斥就是：你們是叛徒。

我現在仍然理解當時年輕學子的激烈行為。

再翻看當年關於劉曉波在廣場砸槍的過程，他遇到的事態更為激烈、更為嚴峻。

他先是跪著請求持有機關槍的兩位市民，毀棄武器，以保證廣場抗議是和平的，特別是不引起大規模的流血事件。想像一下，當士兵們進入廣場時，突然遭遇到機關槍掃射，士兵們會有一些傷亡，但更大的傷亡將是廣場和平的學生羣體。

劉曉波的理性，是基於這樣的想像與推測，所以後來他又親手砸了另一枝半自動步槍。可以說天安門廣場事件，起始激怒於三位學生在人民大會堂東門的下跪提交請願信，而終於劉曉波下跪，並請求持槍的市民放下武器，最終實現了整個廣場絕大多數人和平撤離。

中國傳統中素有跪天跪地跪父母，而在廣場抗議過程中，卻有這樣兩次例外的下跪，學子們與劉曉波，是請求政府傾聽人民的聲音，還有就是請求社會非暴力對抗更強大的暴政。

這一過程中，劉曉波本人甚至遭遇到暴力攻擊，被激烈的人視為學賊，要對他暴力清除。無論是持槍做拼死一搏者，還是要誓死堅守廣場者，遇到劉曉波這些和平主義者，在一時失去理性的情況下，外部誓死的過程還沒有開始，內部傷害卻隨時可能發生。

這些人無外兩個理由，一是，軍人已大開殺戒，我們當然應該武器還擊；二是，你們學生與老師是有身份的人，以後還有退路，我們市民或工人沒有退路，只有誓死一搏，你引導學生和平撤離，就等於毀了我就義成仁的夢想。

有人說，廣場傷亡太小了，不足以引發更多的人覺醒與起義，這是大錯特錯，廣場不是傷亡太少，而是有理性的人、成人，特別是大學教師與知識份子一直太少，有影響力的知識份子們儘管也參與示威遊行，但實際參與者太少，進入廣場核心層，像劉曉波、侯德健、周舵、高新四君子這樣直接參與到影響活動進程的人，太少了。

我們必須承認：關鍵時刻成熟學者們的和平理性，是廣場和平撤離的決定性因素。

面對六四中共屠城過程中無數傷亡，人們譴責中共血腥、人們遺憾更多的人沒有起來，這些都是正當的，但另一方面，年輕的學子們如果當時意識到民運的本質是和平請願，在和平請願已被暴力血腥終結之時，要不要以保護自己生命為第一要義？不付出不必要的犧牲，這是人道法則，暴政一染上血腥，它的改變或轉型，可能更難。

現在再反觀四君子勸說學生們和平撤離，特別是與中共軍方談判成功，它保護了廣場數以千計學生的生命，從劉曉波的生命經歷來看，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更多的因素，應該是他與同仁們的和平努力。

## 二、「廣場上」有沒有死人是個偽問題

侯德健被中共官方要求作證：廣場上沒有見到死人。

劉曉波內心掙扎，他知道，如果他說廣場上沒有死人，無疑是替中共圓謊。但最終，他還是說服了自己，說了自己現場所見，他給自己一個理由是，侯德健已經說出了自己所見。

通過回憶錄我們看到，劉曉波、侯德健等人當時主要致力於說服學生與市民和平退出廣場，他們所在的紀念碑附近是天安門廣場的中心地，這個地點確實一直風平浪靜，但廣場周邊，卻出現各種衝突，特別是被包圍之後的天安門前，衝突更為激烈，一些學生去燒軍車與坦克，造成傷亡，連施救者也遭到槍擊。侯德健與劉曉波無從知道，連我這樣一直遊走於廣場上的全程見證者，也無從知道。

還有，海外媒體所說的北京，泛指中國，而報導中的天安門廣場，則泛指長安街與天安門周邊，也即，媒體上報道的天安門廣場出現大量傷亡，泛指北京長安街與天安門等地，而劉曉波、侯德健所說的廣場，則完全是自己當晚目力所及之地。

在沒有自由的狀態中，特別是會受到嚴刑逼迫的情況下，侯、劉等人所做出的證言，我們應該充分理解，他們並沒有做偽證，他們說出了局部的真實，至於中共將其利用，是徒勞的，因為無數的照片與錄相均可以證實，中共對北京對天安門進行了慘無人道的屠城。

任何人借此指責劉曉波、侯德健，都是缺乏應有的同情心與理解力。

### 三、如何理解劉曉波的「我沒有敵人」

「我沒有敵人」，相比基督教所宣導的「愛你的敵人」，是不是還弱一個層次？

愛你的敵人，這是宗教宣導的超然情懷，而「我沒有敵人」，則是劉曉波超然的政治情懷。那些指責劉曉波是「劉無敵」的人士應該反思，劉曉波為什麼會如此而言。

劉曉波在廣場上砸槍，是因為他沒有敵人，如果他當時眼中有敵人，以士兵為敵，那麼就會短兵相接，你死我活，這是劉曉波追求的和平民主運動所需要的嗎？後來劉曉波等人起草〈零八憲章〉並發起簽名活動，不是為了製造敵人，而是為了中國的憲政民主進程。

批評者也許會說，但他是被獨裁者與爪牙們抓捕並迫害的呀。

但這些人隨便拎一個出來，劉曉波都不會認其為敵人（對手都算不上），這些人既是體制的受害者，也是獨裁國家的病人，他們的罪錯最終會有懲罰或追究，但那也得依法審判，在將來的和平民主進程轉型之後，也許審判的結果是對其寬恕與赦免，但劉曉波致力於終結的是造惡的制度。

有多少人用心體會劉曉波如下解釋：

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皆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劉曉波：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

改變人，是啟蒙與訓政過程中的事情，通過革命的方式消滅直接的造惡者，是一種激烈的方式，或者是革命與起義，這當然是一種天然合理的方式，但劉曉波追求的是一種和平的方式，這是另一條艱難的道路。他只是不希望中國通向民主憲政的道路，由鮮血染成，由人頭鋪就。也許追求革命的民主主義者有其合理性，但這並不否定劉曉波的政治追求的合理性。

**吳祚來**——旅美中國學者、作家，曾任中國藝術研究院科研處副主任、文藝理論與批評雜誌社社長。

# 中國民主轉型的道義巨人——劉曉波

楊光



## 悲觀失望的全盤西化論者

1989年之前，劉曉波是橫空出世的「文壇黑馬」，屢有出位之思、偏激之論、出格之言。他對以屈原、杜甫為代表的中國文學傳統、以孔子、儒家為代表的中國思想傳統、以專制帝制為代表的中國政治傳統、以毛澤東、共產黨為代表的當代政治傳統持毫不留情的徹底否定態度，亦對當年新啟蒙時代的所謂「四大青年導師」冷嘲熱諷、不屑一顧。（註：「四大青年導師」指李澤厚、金觀濤、劉賓雁、劉再復——不論這幾位「導師」的思想、言行有何種不足與缺陷，但毫無疑問，他們對於文革之後青年一代擺脫毛主義的思想桎梏，對於八十年代大學校園極為活躍的言論空間和社團活動，起到了巨大的引導作用。八六、八九學潮之所以產生，與以他們為代表的一大批開明學者的思想啟蒙關係甚大。）

劉曉波追問中國落伍的深層次原因（他並不認為中國的落伍是一樁近代史事件，而是認為有史以來中國從來就沒有「先進」過），從制度、文化一直追究到中國人的「人格」、「人種」（他說，「這可能與人種有關」），於是有所謂「三百年殖民地」之說——殖民主義植根於白人種族優越論和先進民族歧視、奴役落後民族合理論，顯然與他後來所堅定信仰的「人人生而平等」（傑斐遜〈美國獨立宣言〉）和自由、人權、憲政、民主的普世價值不相吻合。

那時候的劉曉波還不是一個真正的自由民主主義者，而只是一個激進的反傳統主義者和全盤西化論者。他的言論與日本明治維新初期主張「脫亞入歐」的啟蒙思想家非常接近。他甚至說出「（外國）語言如果可以過關，中國會和我根本沒有關係」，「說我叛國，我就叛國」之類「大逆不道」的話，無非是愛之深、恨之切的激憤之

詞。(事實上，當國難來臨，貌似對中國的一切事物都恨之入骨的劉曉波先生不僅沒有趁機和中國脫離關係，反而燈蛾撲火、以身赴險，從此為中國的人權、民主事業自我犧牲、奉獻終身，堪稱我們這個時代最堅定、最堅決、最偉大的愛國者。此是後話不提。)

關於八九民運之前的劉曉波，有人說他像臺灣戒嚴時期狂傲自戀、放言無忌的作家李敖——言語風格上確有幾分相似，但實際上，正如他自己所言，他更像對歷史和現實失望透頂因而主張「上帝已死」和「重估一切價值體系」的十九世紀德國哲學家尼采。

### 血與火煉就的自由民主主義者

八九民運是中國改革開放時代的分水嶺，也是劉曉波思想觀念的轉捩點。毛澤東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套用毛此語，可以說：八九民運一聲吶喊，給我們帶來了自由民主主義。對於後文革時代苦苦追尋中國現代化之路的幾代中國人來說，八九民運是我們的民主自修課、人權學習班，是自由的播種機、憲政的催化劑。

胡耀邦逝世、學潮初起之時，劉曉波遠在美國作訪問學者。他立刻被這場人山人海、聲勢浩大的羣眾性民主運動所吸引，毅然拋棄了大洋彼岸的學術生涯而返國赴險，全身心投身於天安門廣場的民主抗爭洪流。事實上，這場興起於校園、爆發於街頭的和平抗爭運動，幾乎瞬間改變了劉曉波此前對中國人、中國文化和中國現代化之路所抱有的極度悲觀的成見——他從來就不是一個固執己見的人，儘管他並不像聖雄甘地那樣樂於公開談論自己的錯誤和「糗事」。他發現：中國並非不可救藥，中國人並非麻木不仁，自由、人權、憲政、法治並非不適用於中國，中國進入現代文明國家並非無路可走（亦非只有「三百年殖民地」這一條無路之路可走），八九民運就是中國可救、民主化可望、自由化可期的確鑿證據。

那場超大規模的和平抗爭運動終因中共政府的武力鎮壓而失敗，隨後中國的政治、社會局勢發生大幅度的倒退，八九風雲人物也大都風流雲散，從中國變革的舞臺上迅速消失。獄中的劉曉波也曾經一度消沉，但是，他很快從挫折感和恐懼心中解脫出來且重新振作，因為他深刻地認識到，必須有人肩負起八九知識精英對八九參與民眾的責任、「六四」倖存者對「六四」亡靈的責任——如果所有的人都選擇或流亡、或沉默、或退避，那麼，八九民運的薪火將會熄滅，「六四」死難者的犧牲將會變得一錢不值。所以，劉曉波選擇堅守、選擇抗爭、選擇犧牲、選擇擔當。

當人們因為政府的暴虐、軍人的殘忍、裝甲車和榴彈炮的鐵血無情而陷入普遍絕望之際，似乎只有劉曉波等極少數人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他看到了一黨專制政體在非暴力反抗面前的倉皇失措和內在虛弱，更看到了民間社會所潛伏著、蘊藏著的抗爭勇氣和巨大力量。更為重要的是，劉曉波從曾經羣情激昂的街頭運動及其血與火的悲壯失敗之中遠遠地看到了自由中國的希望和民主轉型的前途。他清晰地辨明了中國社會轉型的未來方向：「未來的自由中國在民間」。

### 為「六四」亡靈而活，為〈零八憲章〉而死

「六四」改變了劉曉波的個人命運。作為中國最著名的政治犯、良心犯，他的

後半生只能要麼呆在監獄，要麼走在通往監獄的路上。當然，他可以選擇出國流亡——絕大多數八九年的廣場英雄和幕後「黑手」都不約而同選擇了這種新生活——只要向當局作出某些承諾，他可以立刻擁有這種新生活；他也可以「識時務」地向當局低頭，選擇遺忘「六四」、不再抗爭——但那就不是劉曉波了。

「六四」後的中國進入了一個漫長而沉悶的政治衰變期和民運低潮期。雖然改革開放並未中止，但僅限於經濟改革，政治改革因「穩定壓倒一切」而夭折——此種「中國模式」的改革被劉曉波形象地稱之為「跛足改革」。鄧小平「九二南巡」、中國加入 WTO 之後，中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有所提升，對外開放程度大幅提高，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但與此同時，言論自由的幅度、宗教信仰的權利、公民結社集會的權利、基層選舉的進展、公共職務對平民社會的開放程度、黨政分開的程度、政治決策的公開性等等，均比「六四」之前有顯著的倒退，且從鄧到江、胡（至習），基本上走的是一條單調的政體下降線，可謂一代不如一代。伴隨「跛足改革」而出現的，則是政治生態和社會結構自上而下的一系列惡化徵兆：意識形態虛無化、統治集團利益化、官僚隊伍貪腐化、執法機構黑惡化、知識精英犬儒化、資本精英附庸化、社會結構兩極化、年輕世代娛樂化。這種局勢變遷令當年參與八九民運的普通羣眾對自由民主事業退避三舍，甚至當年搖旗吶喊的學生領袖和知識精英也大都心灰意冷，放棄理想，自甘邊緣化。

「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孔子「知其不可而為之」，孟子「雖千萬人吾往矣」，佛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劉曉波選擇為「六四」亡靈而活，他要以一己之力為八九民運站完最後一班崗。如同納爾遜·曼德拉、昂山素姬、瓦茨拉夫·哈維爾、萊赫·瓦文薩一樣——他們都曾因為擔心不能回國而寧願坐牢，拒絕出國領獎或出國流亡——劉曉波把牢房當成了反抗暴政的主戰場。其實，自從莫罕達斯·甘地創造現代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以來，反抗運動領袖和廣大追隨者因和平抗法而自願坐牢，就是這一反抗方式的主要內容。甘地在南非抵制亞洲人種「人頭稅」和歧視性《身份證法》，在印度反抗《食鹽法》和發起獨立解放運動，均以對抗惡法、自我犧牲、率眾坐牢為主要抗爭內容。而曼德拉、昂山素姬之所以成為全世界同情並敬仰的道義英雄，亦主要是因為其超長的牢獄生涯或軟禁生涯。

劉曉波第四次坐牢是因為〈零八憲章〉，他一去不返，最終死於孤獨淒涼的監禁狀態之中，成為八九民運最後一名殉難者、〈零八憲章〉第一位殉道者。

他曾經說過，「『六四』後的最佳假設是：如果方勵之能夠走出美國大使館去面對中共的審判，如果大家都留下來填滿中共的監獄，如果趙紫陽能夠象葉利欽那樣公開與執政黨決裂……」，八九民運絕不可能被中共原始的封口術、「維穩」術所輕易湮滅。他還說，波蘭有瓦文薩、捷克有哈維爾、韓國有金大中、南非有曼德拉、菲律賓有阿基諾、緬甸有昂山素姬，但中國經歷了這麼多年的政治大災難，卻沒有出現類似人物，而「一位昂山素姬的份量勝過中國一打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歷史沒有必然，一個殉難者的出現就會徹底改變一個民族的靈魂，提升人的精神品質」。

其實，劉曉波說錯了。中國的民主運動和人權事業並非沒有道義巨人，劉曉波本人，就是這樣的道義巨人。劉曉波絲毫不比曼德拉、昂山素姬遜色，他所面對的中共政府遠比南非白人政府和緬甸軍政府更加兇惡，而曼德拉、昂山素姬的身後，有組織化程度很高的非國大和緬甸全國民主聯盟，而劉曉波的身邊，卻只有一小羣

鬆散、遊離的志同道合者。相比之下，劉曉波的堅守和犧牲，劉曉波道義精神的可貴之處，比曼德拉和昂山素姬有過之而無不及。

### 「沒有敵人」與非暴力

劉曉波最著名、也最富爭議的格言，是「我沒有敵人」。這句話最早出自一九八九年的〈六二絕食宣言〉，而以 2009 年劉曉波的法庭呈詞〈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廣為人知。顯然，與「三百年殖民地」不同，「沒有敵人」並不是劉曉波因筆誤、疏漏或激憤而發的一時錯語，而是他深思熟慮、持之一貫的政治道義原則。但這句話在幫助劉曉波贏得 2010 年度諾貝爾和平獎的同時，卻也為他招致了同一陣營內部數不清的反對聲音。

在〈六二絕食宣言〉中，劉曉波寫道：「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充滿了以暴易暴和相互仇恨。及至近代，敵人意識成為中國人的遺傳；1949 年以後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更把傳統的仇恨心理、敵人意識和以暴易暴推向了極端，此次軍管也是『階級鬥爭』式的政治文化的體現。為此，我們絕食，呼籲中國人從現在開始逐漸廢棄和消除敵人意識和仇恨心理，徹底放棄『階級鬥爭』式的政治文化，因為仇恨只能產生暴力和專制。我們必須以一種民主式的寬容精神和協作意識來開始中國的民主建設。」這一段話比〈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裏對於警察、檢察官、法官、監獄管教幹部的讚揚以及對所謂「人性化待遇」的讚賞更能體現「沒有敵人」的一般政治涵義。

劉曉波說，「我們主張以和平的方式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反對任何形式的暴力」，因為「民主政治是沒有敵人和仇恨的政治，只有在相互尊重、相互寬容、相互妥協基礎上的協商、討論和表決」。他舉例說，「李鵬作為總理犯有重大失誤（註：其時「六四」屠殺尚未發生，所以劉曉波說李鵬犯有「重大失誤」而非嚴重罪行），應該按照民主程式引咎辭職。但是，李鵬不是我們的敵人，即使他下臺，仍然具有一個公民應享有的權利，甚至可以擁有堅持錯誤主張的權利」。這就清晰地排除了「沒有敵人」的一切歧義：「沒有敵人」並不是要停止抗爭，也不是綏靖主義，更不是什麼「投降」或「媚共」，而是拒絕以敵我兩分法劃分政治社會和公民社會，不以「鬥爭哲學」和仇恨思維對待任何一位或普通或特殊的中國公民——包括李鵬那樣的中國公民。

與甘地、馬丁路德金不同，劉曉波並沒有清晰地闡述其非暴力思想及其抗爭策略，但以其「沒有敵人」的政治道義原則，非暴力反抗是他唯一能夠接受的抗爭手段。在〈楊佳式復仇是原始正義〉一文中，劉曉波聲明他既反對政府的暴力「維穩」，也反對民間的暴力維權和暴力復仇。他說，「楊佳不是英雄或大俠，因為他結束了六個生命」，「當正義無法通過合法方式實現時，不惜用毀滅他人生命（哪怕是專政工具的生命）來實現正義，這樣的正義還是正義嗎？」除了針對楊佳個案發表評論，劉曉波更深入地談到了「關乎中國轉型路徑的基本抉擇」，他認為，中國的民主轉型只能以和平方式、非暴力手段來實現，因為「以暴易暴已經成為非常落伍的政權更迭方式，而非暴力轉型，既符合人類文明的道義準則，也符合社會發展的效益原則，所以才能越來越成為大勢所趨的世界潮流」，而且他相信，只要堅持下去，「持續累積的非暴力反抗所形成的壓力」將會比狂風暴雨式的暴力革命產生更積極、更持久、

更可貴的轉型成果。

對於曼德拉來說，非暴力是手段、而非目的（實際上，曼德拉早年曾組建並領導「民族之矛」地下軍事組織，該組織針對軍事、交通設施進行爆炸、縱火等暴力活動，曾因誤炸導致兩名無辜白人喪生。曼德拉是在獄中才建立起非暴力主義策略。其與德克勒克共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則並非因為其早年反抗種族隔離運動的功績，而是因為其出獄後領導南非實現了不分種族的全民和解），而對於甘地、馬丁·路德·金來說，非暴力既是手段、也是目的。甘地認為非暴力是神的旨意、是「真理」、是不可違背的信仰、是「強者的武器」（動輒施暴者才是自私怯懦的弱者）。為了制止反抗運動中的羣眾暴力，甘地寧可終止反抗運動，甚至寧可選擇與統治者合作，也不願意看到暴力活動的蔓延。晚年的甘地多次以個人絕食來勸阻甚囂塵上的暴力騷亂，成就了令人難以置信的道義壯舉。某種意義上，劉曉波以其對於中國和平民主轉型之路的堅守，堪稱當代中國的甘地、馬丁·路德·金。



2017/8/8

楊光——湖北學者、作家，獨立中文筆會會員。

# 劉曉波之死，見證新納粹的誕生

陳破空



2017年7月13日，首位華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偉大的人權鬥士劉曉波先生悲涼辭世。一顆勇敢的心停止了跳動，一盞自由的明燈熄滅，一顆思想的巨星隕落。舉世同悲。這是中華民族的損失，也是全人類的損失。

劉曉波早已做好了殉難的準備，他說過：「為了所有人都有自私的權利，必須有一個人無私地犧牲。為了爭取到一個消極自由，必須有一種積極抗爭的意志。一個殉難者的出現就會徹底改變一個民族的靈魂。」

劉曉波離世的時間，官方宣佈為下午5時35分，醫院傳出是下午6時40分，這個時間對應「六四」，足以讓當局恐慌。不排除官方篡改死亡時刻的可能性。歷史上，中共曾篡改毛澤東死亡的時間，毛死於1976年9月8日晚間10點多，中共當局卻宣佈為9月9日零時10分，其用意，是用兩個最大數，滿足毛的迷信，神化毛。（1949年，毛進京掌權，就擇定9月9日。）

奧斯陸頒獎儀式上為劉曉波設置空座椅，是歷史上的第二次。第一次是為德國和平主義作家奧西茨基所設（1935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在監禁中病亡，劉曉波是歷史上的第二人。第一人也是上述德國作家奧西茨基（1938年）。

不同的是，奧西茨基罹患肺結核獲保外就醫，兩年後病亡；但劉曉波直到肝癌

晚期，才被保外就醫，一個多月後就辭世。奧西茨基從監獄轉移到醫院之後，納粹德國曾允許諾貝爾委員會到奧西茨基的住處為奧西茨基授獎。而劉曉波病危期間，仍受到最嚴密監控，中共不僅拒絕包括諾貝爾委員會在內的任何外人探視（僅寥寥幾位親屬可以），更拒絕讓劉曉波出國就醫。奧西茨基離世後，能夠在德國留下墳墓和墓碑；而劉曉波離世後，竟遭當局迅速火花，骨灰被拋入大海，不讓他在人間留下任何遺跡。

不同的還在於，納粹德國迫害奧西茨基，發生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共產中國迫害劉曉波，發生在二十一世紀。時間跨越八十多年、近一個世紀。中國不僅沒有與時俱進，反而大幅度倒退，倒退百年，甚至更多。

劉曉波以最悲慘的方式告別人世，見證了新納粹的誕生。而新納粹——中共腐敗集團——對劉曉波的迫害與謀殺，其陰險、變態與凶殘程度，遠遠超過當年的納粹德國。

劉曉波之死，沒有在中國社會激起波浪。這源於中共當局對劉曉波消息的最嚴密封鎖。即便是中共外交部對各國記者有關劉曉波提問的回答，也沒有在國內媒體上顯現。僅管，這類新聞發佈會的地點就在北京，就在中國。足見中共對劉曉波這個名字的恐懼。

劉曉波是誰？誰是劉曉波？從中國的年輕人到沈陽醫院的護士，發出的這一簡單疑問，足以見證中共封殺的成功。邪惡的成功，竟然達到這種程度：大多數中國人竟渾然不知，中國出了一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

這不是一個開放的國度，這仍然是一個封閉的國度。「改革開放」已經名存實亡，中國重又一步步回到了閉關鎖國的年代。習近平當局關閉翻牆軟件 VPN，並把翻牆定義為「違法」，就是新一輪閉關鎖國的像征。讓人聯想到毛澤東時代所謂「收聽敵台」、並可獲罪的荒唐往事。

有人感嘆，劉曉波遭中共迫害致死，但西方國家領導人並沒有發出譴責中共的強有力聲音。這源於他們對中共的恐懼，以及，擔心失去經濟利益的顧忌。

在「改革開放」的名號下，先後從香港、台灣和西方大規模引進資金與技術的中共集團，變得財大氣粗和軍力強大之後，把對內鎮壓、對外威脅的兩套本色，耍得更加肆無忌憚。筆者早就斷言，沒有什麼「中國威脅」，只有中共威脅，這是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面臨的共同威脅。中共淫威所至，讓中國人民變得更加膽小怕事、膽戰心驚，讓整個世界變得更加謹小慎微、惶悚不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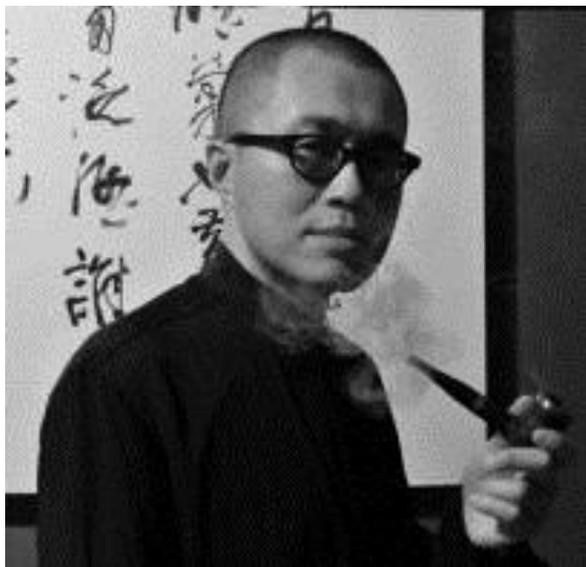
侵占並統治中國近三百年的滿清王朝，曾留下一句名言：「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意思是，利用西方的先進技術來武裝自己，然後，倒過來對付和制約西方。這條名言，或者說計謀，滿清沒有做到，中共卻做到了。

同屬外來政權（中共依靠外來的馬列主義起家），中共紅朝就是滿清王朝的翻版，等於滿清王朝的復辟。百年前的辛亥革命，等於白干。今日中國，一切又都回到了帝制，區別只是，沒有掛「帝制」這個名號。

**陳破空**——旅美華裔作家，獨立中文筆會會員。

# 結局之後的劇情

梁文道



對於北京政府來說，這就是最好的結局。劉曉波先生本來只要再坐個三、四年，就要從牢裏面走出來了，儘管一定會被嚴密監控，甚至遭到軟禁，但他到底是個活人。面對着這麼一個曾經有機會流放國外，卻堅持要把牢底坐穿的人，你還能拿他怎麼樣呢？再找個理由把他丟回監獄嗎？沒關係，他入獄三次，早已習慣囚犯這種職業。於是一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全世界最知名的中國異見份子領袖，就會這麼活生生地站在神州某個角落，成為強權鞋子裏頭一顆讓人從腳到頭都不舒服的石子。一個搞不好，說不定他還真的會是中國版的昂山素姬或者曼德拉，在意外的局勢下促發真正的變革力量。但他卻在這時候忽然病逝，「十九大」召開之前的幾個月，所以問題不再，什麼都沒有發生，迅速回覆正常。

一直不願去國的劉曉波，最後之所以要求外出治病，大家都曉得，是為了他的妻子劉霞。那麼劉霞接下來還會繼續這種暗無天日的日子嗎？許多論者覺得是會的，因為他們認為劉霞可能會被人當做是劉曉波政治遺產的繼承人，秉持丈夫的遺志，成為一個象徵。不過認識劉霞的人都曉得，她實在不是這種人。她愛劉曉波，但這並不表示她愛政治，她喜歡的劉曉波是那個政治之外，絕大部份人都不曾有機會瞭解的「大傻瓜」。而劉霞自己，除去劉曉波妻子這個身份，她首先是個詩人、攝影家、藝術家。如果可能，她大概會想過上一種自在安逸的生活，穿自己愛穿的衣服，吃自己愛吃的菜。儘管我深知我們多少次的呼籲都不會管用，可我還是打心底盼望當局能夠還她自由。經過這麼多年的貼身監控，你們可能比我們任何一個人都還要瞭解她了，你們不可能不曉得她是無害的。既然劉曉波已逝，劉霞做為人質和威懾他人的示範效用當然也就自動消失，又何必還要為難這個本就與世無爭的人呢？我相信，所有劉曉波生前的朋友都不會想到要「利用」劉霞去做些什麼的，你們真的不必擔心。

不過我也明白，短期內的控制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你們那麼聰明，劇本早已寫好。就從劉霞的弟弟劉暉親筆簽署，要外界不要胡說劉曉波治療情況的那封信開始，

不過我也明白，短期內的控制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你們那麼聰明，劇本早已寫好。就從劉霞的弟弟劉暉親筆簽署，要外界不要胡說劉曉波治療情況的那封信開始，

大家便明白是怎麼回事了。讓劉霞一家以家屬身份公開感謝當局的盡心盡力，間接切割他們和外頭所有朋友的關係，然後外面要是還有誰想搞一個追思會，想要抗議劉曉波最後日子所得到的對待，便都是不顧遺屬感受，挾帶政治目的，別有用心的陰謀舉動了。最起碼，你們要讓大家看見，所有這些舉動都得不到劉曉波遺屬的支持。

我們甚至能在《環球時報》等喉舌媒體的評論裏頭看見另一條奇詭的隱伏劇情線，那就是主動把劉曉波描繪成一位「受害者」，不是這個政權底下的受害者，卻是「西方反華勢力」和「錯誤思想」的「受害者」。劉曉波的生命軌跡太過淒慘悲壯，他的言語太過溫和有理，不論生死，如何定性他為十惡不赦敵人，而又要顯得有說服力，都不容易。何不將計就計，乾脆承認他的悲劇，略略把他形容為一個值得同情的人物呢？他是囚犯沒錯，可他犯了什麼罪呢？原來是他太過單純，誤信了不合國情的，西方那套所謂自由、民主和人權的虛偽宣傳，妄圖顛覆國體。國家縱是再寬大，也不得不依法治他。但國家就像慈母，對待逆子還是好得不得了，不只悉心照養他的身體，還允許他在獄中讀書運動。你看他不只在〈我沒有敵人〉當中承認看守人員的友善，還在生前最後採訪片段裏頭感謝醫護的體貼，這豈不是國家仁善的明證？相反地，當初用言語蠱惑他，給他洗腦，害他入獄的那些外部勢力，則至死都不肯放過這個可憐的人。他們完全不顧「人道主義」的大原則，不理他的身體情況，假借自由之名，硬要帶他出國。相比之下，誰才是真正正義？誰更關懷劉曉波？可謂一目了然。

這種宣傳，這個版本的劉曉波故事，對於香港、台灣和其他地方的人而言，應該沒有多大作用，因為我們有另一套截然不同的劉曉波故事。但是對於言路閉塞，信息封鎖，浸泡在主旋律正能量大浴缸下的大陸居民，乃至於到了海外仍然不離這種心理環境的大陸居民來講，這可能就是他們所知的劉曉波生平了。所以劉曉波的死，雖然令外間那麼多人悲痛莫名；令我不得不中斷自己原有的思考，只能胡言亂語；可是我必須悲觀地指出，可能真是沒有多大效應的。原來就厭離這個政權的，只會更增離心；原本樂在其中的，只會再過一關，持續那什麼都有發生過的中國日常。

原載《蘋果日報》

梁文道——香港作家，電視主持人。

# 中國不容劉曉波 他卻與天地同在

曾建元



1980 年代曾經以美學、文學和文化批判在中國大陸文化界引領風騷的劉曉波，2017 年 7 月 13 日，在歷經中華人民共和國長期黑牢的身心折磨後，終於倒下。那本應在宇宙洪荒中激起巨響的傾塌，卻在黨國的全力封鎖消音之下，連妻子劉霞心碎的哭聲都消失了。

劉曉波在 1988 年以《審美與人的自由》的論文獲得北京師範大學文學博士，那一年，臺灣剛解除戒嚴一年，全面啟動自由化，而更早幾年的時候，鄧小平以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理由，把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罷黜掉。劉曉波以審美激情超越物性的侷限，挑戰共產黨的意識形態。1989 年，劉曉波放棄了在美國流亡的機會，來到天安門廣場，承擔起領導學生降低衝突犧牲的責任，6 月 4 日以後，他也未選擇流亡，從此長期進出和生活在監獄裏。

劉曉波被體制隔離，成為官方所畏懼的洪水猛獸。但是網際網路的發展，讓他得以與海外聯繫交往，而能依靠為海外媒體大量寫稿維生。在此期間，他參與創辦了獨立中文筆會，進而擔任了會長，從中國作家協會的版圖中宣告獨立與自由寫作，他的思想和文字魅力在網路的世界中無限延伸。2008 年北京舉辦國際奧林匹克運動會前夕，在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如當年大韓民國舉辦漢城奧運而借力打開民主化道路的期待下，劉曉波參與了《零八憲章》的起草，挑戰了共產黨既得利益。他不是最主要的執筆者，卻因他的聲望而扛下所有責任，成為黨國重點打擊的對象，而

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關押至死。其後他獲頒諾貝爾和平獎，是第一個被當局禁錮不能領獎直到生命最後一刻的諾獎得主，典禮上因他而虛位以待的空椅子，從此成為反共的象徵。

劉曉波深深懷念六四之前中國民間社會的道義激情與社會共識，但他從六四的鎮壓中體會到，共產黨會為鞏固政權而不擇手段。殘酷鎮壓異己的同時，尚且縱容貪腐與收買，使自身成為一個政治經濟的利益共同體，而使共產黨在內部出現蔣經國乃不可期待，所以中國民主的希望在於民間的自覺。劉曉波反對暴力與仇恨，他以宗教家的情懷，主張中國人民要自許為公民和自由人投身公共事務，以漸進的社會改變逼迫政權的改變。

劉曉波的卑微要求有可能顛覆中共政權嗎？天曉得。所以他只有以身殉道，用自身的命運提醒世人，如果共產黨政權不改變，每一個侵害到黨國利益的人，都可能成為劉曉波。他的身後遭遇也警示著世人，如果自由國家不願聯手逼迫中華人民共和國遵守人類的共同價值和規範，則日益強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看待世界的態度，就會像今天他們對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般地狂妄輕慢和泯滅人性。

臺灣解嚴正值三十年，劉曉波在獲得博士三十年前夕走到了生命的盡頭，中國大陸形勢卻更加肅殺。

劉曉波形體已失，在中國無處葬身，但願他的魂魄會化為海上的千風，在天地之間萬古長存。

原載：中央廣播電台網

**曾建元**——台灣作家、學者，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獨立中文筆會會員。

# 劉曉波之死的神學思考

## 尾生

### 一

「因為神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這義是本於信，以至於信。」(羅馬書一：17)

神的義，在耶穌基督身上顯明出來。耶穌基督作為道成肉身的人，具有完全的人性。耶穌基督作為完全人的十字架道路，顯出了人的不義，並同時給那個時代不信的人定了罪。

「因為 神差他的兒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或作審判世人下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經定了，因為他不信 神獨生子的名。」(約翰福音三：17-18) 那些不相信耶穌基督的人，耶穌基督作為具有完全人性的人已經走出了人類的困境，勝過了世界和十字架的咒詛，他們的不信也就定了他們自己的罪。

劉曉波說：「我沒有敵人。」劉曉波已經用他的生命來實踐了自己的信念。那些依然活在階級鬥爭，敵人意識裏的人，他們不相信劉曉波的信念，詆毀劉曉波，實際上他們也因為他們的不信和詆毀，自己定了自己的罪。

在一個人人都說謊話的時代，一個堅持說真話的人就定了那個時代的罪；在一個人人都淫亂的時代，一個堅持敬虔度日的人就定了那個時代的罪；在一個人人都自私自利的時代，一個追求公義的人就定了那個時代罪。劉曉波的死，也定了那個時代的罪。

亞伯拉罕在一個不信神的時代，他因為信就被神稱義了。亞伯拉罕的義，就顯出那個時代其他人的不義。劉曉波在 1989 年天安門廣場從砸槍那一刻，就開始踐行他的「和平理性」「非暴力」之路，近三十年不放棄，始終如一的堅守，讓人不由得敬佩。這期間，他有認罪、悔罪的污點，但這些都讓劉曉波的人物形像更見真實豐滿。

### 二

沒有耶穌基督，人民永遠都是一羣烏合之眾。耶穌榮入聖城，人民高呼「和散那」，其實和山呼萬歲差不多，一周時間不到，高呼「釘祂十字架」「釘祂十字架」的依然是他們：人民。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一邊為他們流血，一邊還要對上帝說：「赦免他們吧，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

劉曉波說：「我沒有敵人。」劉曉波死在了監獄。耶穌說：「要愛你的仇敵，為逼迫你的人禱告。」耶穌死在了十字架上。人民厭棄了耶穌基督，本丟彼拉多也厭棄了

耶穌基督。劉曉波說：「我沒有敵人。」那些活在階級，敵人意識裏的人不理解劉曉波，認為這是軟弱這是妥協這是投降。另外一些人則認為這是極端的不合作，這是最具威脅的反抗。

我寫了一首小詩：〈我沒有敵人〉

如果陸地上的一個國家  
已經無法容忍「我沒有敵人」  
海洋，是不是就能把他容下

如果天空真的有一扇門  
監獄，因為有你而漸漸地  
變成了十字架

如果人流出的血  
在地下，真的有聲音  
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  
你就赦免他們吧

2017年8月14日 於長沙

這是紀念劉曉波的。詩歌最後一句裏的「你」當然是指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揀選了十二個門徒，他們宣揚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的道路，終於改變了世界。天國，新天新地必然有實現的一天。沒有上帝揀選我們成為上帝的選民，那麼所謂的民主，只可能選出滿足人私欲的撒但。

一個人登上月球，整個人類的視野和高度就到達了月球。一個民族精神的視野和深度，往往就是那個民族中某一個或某一羣人的視野和深度。劉曉波用他「我沒有敵人」的一致言行把我們這個民族帶入了一個新的高度，讓我們擁有了新的視野和思想的深度。劉曉波在寫給詩人廖亦武的信中說：與其他共產黑幕中的人物相比，我們都稱不上真正的硬漢子。這麼多年的大悲劇，我們仍然沒有一個道義巨人，類似哈威爾。為了所有人都有自私的權利，必須有一個道義巨人無私地犧牲。為了爭取到一個「消極自由」（不受權力的任意強制），必須有一種積極抗爭的意志。歷史沒有必然，一個殉難者的出現就會徹底改變一個民族的靈魂，提升人的精神品質。甘地是偶然，哈威爾是偶然，二千年前那個生於馬槽的農家孩子更是偶然。人的提升就是靠這些偶然誕生的個人完成的。不能指望大眾的集體良知，只能依靠偉大的個人良知凝聚起懦弱的大眾。特別是我們這個民族，更需要道義巨人，典範的感召力是無窮的，一個符號可以喚起太多的道義資源。例如方勵之能走出美國大使館，或趙紫陽能夠在下台後仍然主動抗爭，或北島不出國。「六·四」以後的沉寂與遺忘，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們沒有一個挺身而出的道義巨人。

劉曉波認為的「偶然」在我看來都是必然。劉曉波這次看似「偶然」的結局，

其實某種意義上也是必然。他已經深思熟慮了。耶穌基督釘十字架被劉曉波認為是偶然，其實舊約早有預言，而且耶穌基督自己也清楚最後的結局。耶穌基督知道自己的時間。劉曉波從某種意義上講也是因著信，而願意走上這樣一條道路，只是這信，是基於對人的道德意義上的相信。我不曉得劉曉波上面的這些話能讓多少良心被喚醒；又有多少曾經死去的人會復活？

據說，有人給劉曉波傳福音，劉曉波說找不到一個讓他佩服的基督徒。我想這個「找不到讓他佩服」的基督徒，一定是指在中國範圍內，而不是世界範圍裏的。我多麼希望是一個說「愛你的仇敵，為逼迫你人禱告」的基督徒能站在劉曉波的位置上來擔當這個時代罪，死在監獄或十字架上。這樣劉曉波或許就會放下「我沒有敵人」，而走向「愛你的仇敵」了。

我現在想找一個讓我佩服的基督徒能超過劉曉波，但我確實也沒找到。也許在未來會有，但只有上帝知道在什麼時候。

劉曉波的道德感召力：這是人的義，會一直延續下去，直到人們在殉道者的血裏看見上帝：人們才會看見神的義。劉曉波讀了許多神學書籍。約伯，在他生命的最後那一刻，才認識到神的義。我不曉得劉曉波最後是不是像約伯一樣。

作為基督徒，我有十萬個軟弱，但靠著主，就重又堅強了。作為基督徒，我們都需要面對一個問題：我們是否準備好了要為我們的信仰殉道？

2017年8月29日 於長沙

**尾生**——本名梁太平，湖南詩人、作家，獨立中文筆會會員；前研究所工程師，因異議作品和參與維權活動，2014年被解雇，2016年曾被拘留一個月。



# 從毒氣室、放射線到劉曉波的晚期癌癥

彭小明

盟軍徹底打敗德國法西斯政權，解放了被關押的集中營囚徒以後，不久就傳出了駭人聽聞的歷史真相，納粹法西斯蓋世太保不僅逮捕囚禁猶太人和政治反對派人士，而且把它們當作奴隸勞動力，強迫勞動。更加滅絕人性的是，他們把囚犯押解到所謂「最後解決」的奧斯維辛等死亡集中營，讓犯人脫衣、脫首飾、脫鞋襪之後，把他們送入毒氣室，利用最先進的化學毒劑，使其迅速死亡，掙扎、慘叫和苦狀都被封閉而不為外界所知，「節省」人力和工序，系列性「合理」操作，一「氣」呵成。

從五十年代到本世紀，《最後階段》、《辛德勒的名單》等文藝作品都介紹了這些真實的歷史。無獨有偶，也是在德國，但是在納粹覆滅之後，又發生了利用先進科學手段製造死亡的案件。

在德國的廢都波恩市歷史博物館，有幾個玻璃瓶展品不太引人註目，如果仔細觀看並閱讀說明文字，就會驚異不已。玻璃瓶內密閉的是當時東德社會壹部分異議人士的身體氣味標本。黨政領導可以利用警犬根據瓶中的氣味標本找到他們的行蹤，以便抓捕審訊。

2000 年第 12 期《明鏡周刊》刊登了一篇報導〈射線的蛛絲馬跡〉(Spur der Strahlung)，介紹的是東德國家安全機關斯塔西 (Stasi) 的人員動用放射性物質追蹤異議人士的故事。魯道夫 巴羅 (Rudolf Bahro) 是一名東德共產黨幹部，擔任柏林某化學公司的部門經理。他曾在自己的住宅中向他的朋友盧休斯談到了他寫的手稿，一本「批判現存的社會主義」的書。這部手稿的一些內容後來在 1977 年曾經由《明鏡周刊》刊登發表，並在當時的兩個德國都引起過強烈的震撼。當時巴羅一度對盧休斯感嘆說：「誰也難以預料，我們什麼時候能夠再見。」巴羅哪裏會想到，盧休斯就是賣友的叛徒，他是斯塔西某部的線人。他立刻向領導報告了巴羅手稿的內容和巴羅藏稿的地方。斯塔西沒有立刻行動。而是採用了另外的方法。他們竟然喪心病狂的動用了放射性物質，故意撒入巴羅私藏的手稿之中。不知就裏的巴羅繼續暗中寫作，並把手稿投寄給他的友人。後來巴羅不幸死於惡性骨髓腫瘤。斯塔西使用的



放射性物質，無色無嗅，平常人根本無法覺察。他們用放射性害死了這位敢於批評一黨專制社會主義國家的正直的人。

1999年第20期《明鏡周刊》還刊登過一篇報導〈斯塔西的射線攻擊〉，介紹了在柏林牆崩潰，東德政權土崩瓦解的那幾個動亂之日，有人發現在東德格拉市東德警察的預審拘留看守所裏有一臺X光發射機。但是事隔不久，這臺發射機卻忽然神秘地不翼而飛了。據推測是前使用者害怕德國統一以後受到司法追查，趁亂將機器搬走，甚至拆毀了。不過機器的布罩和含鉛防護玻璃還在。這臺機器幹了什麼髒活呢？原來它是放在格拉看守所攝影房裏的，前面遮著幕布。用來專門對準隔壁關押的政治異議人士發射X光射線的。被照射的對象根本不可能知道他們所居住的囚室竟有這樣的超級待遇，無端地被這臺殺人不見血的機器慢性絞殺。

東德的異議作家尤爾根·福克斯（Juergen Fuchs，四十八歲逝世）和異議音樂家格茹夫·潘納赫（Gerulf Pannach，五十歲逝世）都曾在這座監獄裏關押服刑。發射機剛好對準的就是囚犯坐姿的頭顱部位。這兩位異議人士去世的時候，明鏡周刊都曾發表悼念文章。

納粹和共產黨，兩個一黨專制的政權都滅亡了。它們的暴政劣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它們的共同點是都用當時的先進科技手段來對付毫無反抗手段的囚犯。共產黨政權只認階級、暴力和利益，從不理會人心、人道和人性。朝鮮可以把年輕的美國大學生弄到口不能言，半月即死。中國的監獄和警察的手裏，躲貓貓死、雷洋猝死、李旺陽被自殺，千奇百怪。高智晟牙病都不讓治；劉曉波判刑獲諾獎，宣傳說他得到特殊待遇（重要的一條就是就醫療照顧），忽然怎麼就是肝癌晚期？竟沒有個中期？現在我們不便揣測遼寧監獄是否採取了現代科技的暗害手段。但是僅僅全天候軟禁他的妻子劉霞這一項迫害就足夠給劉曉波帶來足夠的心理打擊了。劉霞全天候被監控，已經超過了毛時代對反革命家屬的管制。癌癥已經晚期了，全世界的諾獎獲得者一起出面要求中國當局讓劉曉波夫婦出國就醫，仍然遭到拒絕。不由得讓人想起柏林牆倒塌的歲月。東德獨裁者昂納克罪惡累累，不僅對柏林牆下數百起開槍殺人血案負有罪責，而且銀行裏還有大量來源不正的存款。可是聯邦德國法院根據醫生開具的癌癥證明，還是人道地將他釋放出獄。半年以後，此人果然在南美聖地亞哥病死。

鳥之將亡，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論語》把曾子和孟敬子之間的這段對話記錄了下來，表達了儒家的人倫道德底線。曾子和孟敬子在政治上原是對立的，曾子卻在臨終時當面留下了這樣的遺言。奄奄一息的劉曉波，命若遊絲，其言也善。他的最後請求將在世界各地回響，令所有的人對中共當局側目相看。

2017 07 10

彭小明——旅德華裔作家、編輯，《歐華導報》記者，獨立中文筆會會員。

# 中國文化的脊梁

——從劉曉波海葬想到顏真卿〈祭侄稿〉

錢躍君



## 血墨淋漓 一腔孤憤

血色的夕陽吞噬著自由的靈魂。

看到劉曉波被海葬的照片，我心理壓抑得話也說不出，文章也寫不出，只有翻閱藝術書籍以求獲得一點心理的平衡。這時我腦海裏跳出一幅可以用作悼念劉曉波的書法作品，即唐朝顏真卿的〈祭侄稿〉。

華夏藝術中首推書法藝術，書法不僅體現了華夏民族的審美趨向，更體現了華夏民族的民族心理特徵和文化特徵。兩千年來留下了無數書法珍品，僅在行書領域，被後人推為「天下三大行書」的依次是：晉朝王羲之的〈蘭亭序〉，唐朝顏真卿的〈祭侄稿〉，宋朝蘇軾的〈黃州寒食詩帖〉。這幾乎相連的三個朝代，其文化特徵分別是：魏晉玄學，唐朝儒學，宋朝禪學。這三個時代的書法藝術特徵也被歸納為：晉書尚韻，唐書尚法，宋書尚意。

〈蘭亭序〉和〈黃州寒食詩帖〉可供人欣賞，供人臨摹。唯有顏真卿的〈祭侄稿〉，這「天下第二行書」，我卻只有崇敬，崇拜，從不敢臨習，因為這份文稿的背後血跡斑斑，是在祭奠一門慘烈的孤忠。這樣慘烈的祭文，怎麼能像王羲之的〈蘭

亭序〉那樣任人臨摹？如果你沒有〈祭侄稿〉的情，就不要去練〈祭侄稿〉的字。不僅練不出這部貼的精神，也是對書帖者顏真卿的最大不敬。

唐天寶年間安祿山謀反，平原太守顏真卿聯絡其兄、常山太守顏杲卿起兵討伐，顏杲卿之少子、即顏真卿之侄顏季明一直奔走於兩地之間，不幸被捕。叛軍史思明部兵臨城下，要顏杲卿降城，否則將已逮捕的顏季明斬首。顏杲卿斷然拒絕，親眼看著自己的兒子顏季明被砍首。此後城破，顏杲卿及其一門三十餘口被殺。過後顏真卿托人尋得其侄顏季明的首級（身已不見），撫今追昔，悲憤不已，寫下了這篇血淚交加的祭文。



……賊臣不救，孤城圍逼。父陷子死，巢傾卵覆。天不悔禍，誰為荼毒？……

顏真卿是唐朝書家第一位，唐柳公權、宋四家（蘇軾、黃庭堅、米芾和蔡襄）、明朝董其昌、直到清朝錢澂、民國譚延闓……都是從顏體起步。唐書尚法，顏真卿的楷書厚重淳樸，大氣磅礴，是忠臣義士的儒家文化典範。但在親人被殘殺的現實面前，再有儒家風範的書法大家，也難以抑制內心的悲痛和衝動。他起草祭文，無意於書法的用筆用墨之規矩，一氣呵成。

例如從開篇直到「蒲州諸軍事」的三十五個字，前面墨很濃，越寫越乾越淡，抑揚頓挫。即他沒有停頓過，沒有中間蘸一次墨。然後再蘸一下墨，從「蒲州刺史」開始，又是三十餘字。他最為悲慟的，是寫到「孤城圍逼。父陷子死，巢傾卵覆……」濃墨，大字，可以想像他當時痛失親人的悲憤。

顏真卿寫〈祭侄稿〉無意成書，卻把悲憤之情和剛烈之性淋漓盡致地通過書法表現了出來。這樣的書法作品不可能有第二遍，是為顏書孤品。元朝鮮於樞將之評為〈蘭亭序〉之後的「天下第二行書」——〈蘭亭序〉是江左名士的文人雅集，整篇秀逸典雅；而〈祭侄稿〉是一部血祭，悲憤難抑，用筆圓健厚重。

值劉曉波罹難，再讀顏真卿的〈祭侄稿〉，對文稿中的血墨淋漓多了一份感受。此後每讀到〈祭侄稿〉，就會令我想到劉曉波，2017年7月13日，又一個讓我不會忘卻的日子……

## 民族英魂 文化脊梁

中華民族曾是一個剛烈的民族，孟子就留下「威武不可屈」的遺訓。

荊軻刺秦王，他在易水岸告別同仁時唱出「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返」——無論他是否能夠成功地刺殺秦王，他自己是必死無疑，一去不返。儘管如此，他義無反顧地去了，寫下了中華俠客視死如歸的壯烈第一幕。

魏晉時期形成了中國史上最為獨特的文人羣體，崇尚獨立人格，不追逐世俗名利，例如嵇康因為蔑視權貴而被殺，嵇康和阮籍被後世奉為中國文人清廉正直、不畏強權的像徵。魏晉時代提出了「人品」說，獨立人格是文化人之首要，之後又延伸出詩品、畫品、書品等。王羲之的〈蘭亭序〉就出現在這樣時代，獨立的人格，方能造就獨立的書品，在書法藝術史留下了「天下第一行書」。同時代的陶淵明「不為五鬥米而折腰」，體現了文人移情山水、蔑視強權與官場的獨立性，成為中國詩人的楷模——無論文學創作還是藝術創作，首先要學會如何做人。

明太祖的四太子燕王篡位，但想留用前朝顧命大臣方孝孺。新皇帝不僅禮遇、而且親自說服方孝孺，委任他起草即位詔書。方孝孺斷然拒絕，當場寫下四個字：「燕賊篡位」。燕王問：你這樣不想想你的九族親戚？方孝孺答曰：「便十族奈我何？」最後，燕王將方孝孺的十族、即全家九族和他的學生全部殺害——就為一腔正氣，方孝孺放棄高官利祿，付出被殺害本家十族的血的代價。

直到民國時代，1928年安徽大學鬧學潮，蔣介石趕去要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交出學運領袖名單，劉不惜殺頭風險而拒絕，說：「你是總司令，就應該帶好你的兵；我是大學校長，學校的事由我來管。」蔣罵劉是「學閥」，劉反罵蔣是「軍閥」。結果，劉文典被捕入獄——校長替學生坐牢。

今日中國人似乎都學得聰敏了起來，很少會有人為了堅守自己的良知和正義而勇於向強權說不，並勇於為此付出個人的慘痛代價。因為這樣做似乎太不值得、甚至太傻了。所以才會形成「笑貧不笑娼」的社會風氣和犬儒的文化羣體，掙錢和享受才是硬道理，人格與良知能值幾錢？

現在還能找到找到一位方孝孺，皇帝親自送上的烏紗帽不要，寧願去上斷頭台？還能找到一位劉文典，為了不讓學生坐牢而校長自己去坐牢？但恰恰是荊軻、方孝孺、劉文典、以及劉曉波這樣的孤勇之士，撐起了中華民族和中國文化的脊梁。

### 為民主拓荒 為自由殉道

驚聞劉曉波博士患上肝癌晚期，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都在等候他還有三年就可以走出鐵窗，怎麼會突然被宣佈，他將要死於獄中？

奔波，呼籲，希望他能夠離開地獄，前來德國就診，德國和美國不僅準備了所有的醫療團隊，而且準備了專機前往中國護送這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前來。患此絕癥，即使來到德國或美國也不可能妙手回春，但畢竟能讓他在生命的最後一刻呼吸一番自由的空氣，死難於自由之中。

可以想像，如果他來德國，飛機場上將聚集世界各國的新聞社，至少歐美的媒體將會頭版頭條；如果他在德國死難，他的追悼會上將會有許多海外同仁陪伴他走過這最後一程，許多作家、諾貝爾獲獎者將會送花圈，甚至德國總理或外長都會親

臨追悼會，他能在柏林的墓園留下一座悲壯的墓碑，「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

然而，一切都空。儘管德國、美國兩位醫學專家親往中國為劉曉波診斷，確認他身體上可以離開中國前往德國或美國，但所有願望都被中國政府無情拒絕：劉曉波，必須死在中國！

更令人震驚的是，我在臉書上看到他可能被海葬。我立即留言：即使不葬，也千萬千萬不能海葬！要為劉曉波留下一具忠骨。德國納粹時期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奧西茨基被納粹迫害致死——劉曉波是第二位在囚禁中死難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納粹還給他安葬，只是墓碑上沒有刻上姓名，還逼著他妻子改姓，希望「這個世界永遠忘記他」。中共，不見得比納粹還要無恥。但確實就是那樣的無恥，劉曉波的骨灰被迫「海葬」。要讓劉曉波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個人痕跡，消屍滅跡——華夏大地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都容不下這一抔忠骨，豈止憤怒與悲哀可言。

劉曉波因為組織簽署〈零八憲章〉而身陷囹圄，他自己也沒想到會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當他獲悉時，他哭了，說這個獎不是授予他的，而是授予天安門的亡靈。我想想也是，當年六四大屠殺不僅是血洗中國的一幕，也是震撼世界的悲劇，最負盛名的諾貝爾和平獎卻未能反映出這一悲劇。直到二十年後，他們選中了劉曉波：劉曉波不僅是八九學運的主要參與者（歷史性），而且還一直活躍在當今中國的維權運動中（現實性）。兩者兼有者，似乎只剩下劉曉波這唯一的選擇。

當然，誰都沒有想到，他的獲獎改變了他生命的軌跡，註定他不可能再活著走出監獄大門。因為，這樣的人不能留在中國，更不能放到國外。他去世後郭文貴爆料，郭幾年前與國安部的一位部長談到劉曉波時，那位部長就做了一個「死」的手勢。郭非常驚奇，問怎麼死？槍斃？那位部長笑笑。可見，就在劉曉波獲得諾貝爾獎的時候，他背後那雙罪惡的黑手已經做出劉必須死在刑滿前的決定，只是手段和時刻要算計而已。

劉曉波的墓碑無法豎在他的墓地，卻刻在每一位向往自由的同仁心裏，與顏真卿的〈祭侄稿〉一樣壯烈，比海天的血色夕陽還要鮮紅。

錢躍君——旅德華裔工程師、學者、作家、編輯，流體聲學博士，《萊茵通信》和《歐華導報》社長兼總編，獨立中文筆會會員。

# 後記



# 編後記

經過四個多月的策劃和努力，《劉曉波紀念文集》中文版終於可以付梓了。

《劉曉波紀念文集》含三篇序言、七個欄目共九十一篇正文。蔡楚在此特別鳴謝達賴喇嘛尊者、林培瑞教授和張祖樺先生為本書撰寫序言；感謝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國際筆會、獨立中文筆會、天安門母親羣體、自由劉曉波工作組為曉波發出唁辭、訃告、文告和公告；感謝曉波生前的各位老友、各位漢學家、〈零八憲章〉簽署者為曉波撰寫悼文、詩歌、回憶、述評和評論。

本書編輯和製作過程中得到民主中國編輯部、獨立中文筆會張裕先生、廖天琪女士、彭小明先生和潘永忠先生的幫助；本書的封面和封底設計得到寒冰女士和凱撒先生的支持；本書的出版得到中國民主轉型研究所王天成先生、胡平先生、滕彪先生的支持。蔡楚在此一並致謝。

出版《劉曉波紀念文集》的目的，是繼承劉曉波先生的精神遺產，以繼續推動〈零八憲章〉運動，努力去完成劉曉波先生未盡的目標，把中國推向自由民主憲政。

出版《劉曉波紀念文集》是一種人性的堅守。即使失敗，即使像樹一樣被雷霆劈斷，仍然挺立。同道或受難者要用行動書寫自己的歷史，「需要一種『明知不可為而強為之』的近乎決絕的生存勇氣和意志決斷。」去紀念劉曉波先生。

蔡楚謹記

2017年11月9日

## 出版後記

這一紀念文集的出版，是未曾料到的痛心的結果。2017年初，《民主中國》網刊主編蔡楚先生囑我代為撰寫計劃書，向一個基金會申請資助，以在10月份召開一個國際性會議，即「全球聲援劉曉波研討會」。

在做計劃、提申請時，以對當下中國專制政府的了解，我們沒有期待過曉波會提前出獄。但是，我們更沒有想到，曉波已經不可能等到10月份召開這個專門為他呼籲的會議。

在曉波病危的消息傳出後，我們曾想修改計劃、將會議提前到8月上旬，雖然匆忙，也要為他發出聲音。可是，曉波也沒能等到8月份。

曉波的去世使得聲援會議不再有意義。蔡楚先生、胡平先生以及我經商量後，試探性地向基金會提出將原來同意用於支持會議的資金，轉用於出版《劉曉波紀念文集》。這實際上是與原來的計劃不同的一個申請，正如所料，基金會沒有同意。

然而，曉波的去世是當代中國反對運動的重大事件，除了種種悼念活動，還應該有持久的文字記載。基於這樣的考慮，我們決定繼續推進編輯、出版紀念文集的計劃，由《民主中國》和中國民主轉型研究所另想辦法共同承擔費用。

感謝為這個文集撰稿的所有作者。彙集在這裏的數十篇文章，從不同的角度追憶或評述了曉波的生平、事跡、思想和精神。

我還沒有專門為曉波寫點什麼，這在我本人實在是一個很大的遺憾。在此我想利用非常有限的篇幅，提到我與曉波接觸的兩個場景。

第一次見到曉波是1987年。當時，曉波作為「文壇黑馬」橫空出世，我是北大法律系的學生。曉波應邀到北大在三角地附近一個經常放電影的大廳演講。整個大廳包括通道、大門擠滿了人，我當時就在台下那羣被曉波激情飛揚的演講所深深感染的莘莘學子之中。現在我還記得他演講中的一句話：「為了自由，哪怕邁出這個大門後就死，也值了！」

最後一次與曉波接觸，是在2008年12月。那時我在哥倫比亞大學做訪問學者，曉波頻繁聯繫我，希望我能參加獨立中文筆會某些方面的工作。但是，基於種種考慮，我非常猶豫。12月7日，曉波再次通過SKYPE聯繫我。第二天他就因為〈零八憲章〉被捕了。

消息傳來後我的心情久久難以平靜——如果我知道，那或許是他人獄前的一個安排、托付，我必定會拋開所有顧慮接受的。

曉波的一生凝聚了這個時代的憂傷與豪情、苦難與盼望。他沒有看到專制主義在中國的崩潰，但是，他的精神已經戰勝了專制主義。他已然進入歷史，將受到後世永遠的景仰。

王天成

中國民主轉型研究所



我期待我的国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在这里，每一位国民的发言都会得到同等的善待；在这里，不同的价值、思想、信仰、政见……既相互竞争又和平共处；在这里，多数人的意见和少数人的意见都会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别是那些不同于当权者的政见将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的；在这里，所有的政见都将摊在阳光下接受民众的选择，每个国民都能毫无恐惧地发表政见，决不会因发表不同政见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将<sup>中国</sup>缔结不以文字狱为最后一<sup>个</sup>受害者的，从此之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

—— 刘晓波

定價 \$30.00 USD

民主中國和中國民主轉型研究所共同出版

ISBN 978-1-9798-3088-1

US\$30.00

5 3 0 0 0 >



9 781979 830881